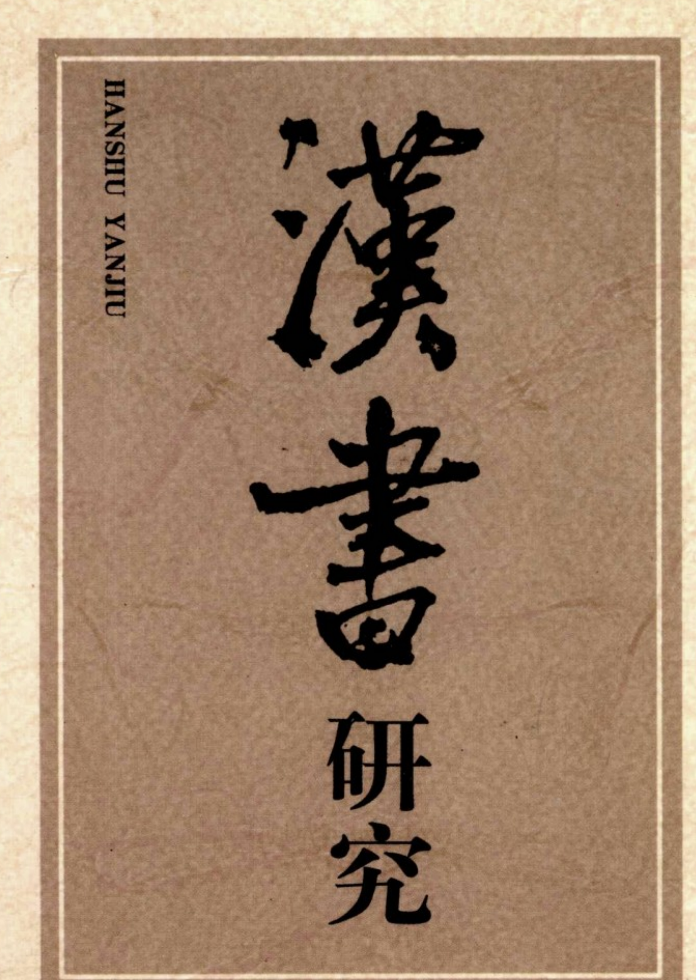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

主编 瞿林东



漢書研究

第四卷

分卷主编◎陈其泰 张爱芳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第四卷

漢書研究

HANSHU YANJIU

分卷主编 陈其泰 张爱芳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研究/陈其泰,张爱芳编.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瞿林东主编)

ISBN 978-7-5000-8012-1

Ⅰ.汉… Ⅱ.①陈…②张… Ⅲ.①中国-古代史-西汉时代-纪传体②汉书-研究 Ⅳ.K234.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7357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王亦妮
前期统筹 劳雅路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037
电　　话 010-88390671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7.625
字　　数 370千字
印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8012-1
定　　价 55.00元

凡　例

一、本书收录范围，限于1901年至2000年中国学者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研究论文，以及有关的文章、讲话等，未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文章及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一般不在收录范围之内。

二、本书收录原则重在学术标准。

三、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均收录全文，其标目、文字，一仍其旧，一般不作删节或节录，以存其真。

四、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其注释形式作如下处理：凡脚注（页下注）、夹注（随文注）者，一仍其旧；凡文尾注者，为读者阅读方便和全书体例大致统一起见，则移为脚注（页下注），移置中不改动其注文。

五、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一律于文末圆括号内注明其原始出处。

六、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如系繁体字竖排者，一律改为简体字横排，并按规范加上新式标点。

七、本书各卷均包含总序、前言、目录、正文、主要论著目录索引等几个部分：总序略述全书宗旨；前言概括本卷主要内容及问题，并对重要专著和未曾发表于报刊的重要论文作适当评介；正文与主要论著目录索引略按总论、分论分类编次，以便于阅读和检索。

总 序

瞿林东

一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二十四史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正史"的缘故。它们的重要和价值,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唐初史学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小序,回顾了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东汉史官著《东观汉记》、陈寿著《三国志》等撰述活动后指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又说:"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①]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正史是依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体裁即纪传体所撰写的皇朝史,或称朝代史;第二,除《史记》上记轩辕、下迄汉武是一部通史外,《汉书》记西汉历史,《东观汉记》记东汉历史,《三国志》记魏、蜀、吴三国历史,多以"世代"断限而述其史事,所谓"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正史"的两个基本特点[②]。

---

①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类,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②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著《史通》,把编年体皇朝史(朝代史)也列为"正史",但后世少有遵循者。参见《史通·古今正史》,清人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从上引《隋书·经籍志》来看,“正史”之说当先于隋朝。据《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著录,有南朝人阮孝绪所撰《正史削繁》94卷,似是根据有关正史删削而成。这是目前所知“正史”之最早的称谓。《隋书·经籍志》以下,“正史”之名历代相沿,直至清代。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称:“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①四库馆臣把“正史”看作历代历史著作的“大纲”,认为其余14类或是“参考纪传”,或是“参考诸志”,或是“参考论赞”,尽管这一见解并不十分准确,但可以表明“正史”在诸种史书中的崇高地位。

二

20世纪伊始,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倡导“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对历史学的变革和走向近代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梁启超在讲到“中国之旧史”时认为:“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他还说:“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这一看法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广泛的影响。但是,梁启超对二十四史的这个评论是不正确的,其所造成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其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自己已经改变了对二十四史即历代正史的看法,他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

讲到“人的专史”时说:“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而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以后二千余年,历代所谓正史,皆踵其例。老实讲起来,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专以人为主的历史,用最新的史学眼光去观察他,自然缺点甚多,几乎变成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许多人以为中国史的最大缺点,就在此处。这句话,我们可以相当的承认:因为偏于个人的历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惩恶,差不多变成为修身教科书,失了历史性质了。但是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的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①这个说法同《新史学》对二十四史的说法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之所以引用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讲的这番话,是为了说明梁启超并不是一个固执的史学家,他是一个能修正自己的某些不恰当见解的史学家。同时,我们引用梁启超的这段话,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时至今日,也还有一些对二十四史抱有偏见的人,其中或许有人就是受到梁启超早年看法的影响。

当然,二十四史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因时代的局限和作史者立场、观点的局限,还有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局限,因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二十四史决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相斫书”,而是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伟大记录。

---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第18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三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二十四史,如何评价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卓越贡献,是人类文化工程中的一个罕与其匹的奇迹。

二十四史的撰写,上起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中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历代纂修,未曾中断,各朝正史,代有所出,下迄清代官修《明史》,前后连续一千八百多年,历代史家、史官笔耕不辍,成此系列的浩大工程,这在全世界的史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十四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灭亡,上下近五千年中国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面貌,反映了中华文明之连续不断发展的伟大轨迹,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十四史作为纪传体史书,是以记述历史人物活动为主,同时记述了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及有关典章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实质上是古代的一种综合体史书。这种综合体史书,是古代史学家用以全面反映历史进程、历史面貌的最好形式。清代四库馆臣把"正史"称为"大纲",把其他十四类史书看作是参考"正史"中的纪传、诸志、论赞而作,固然不恰当,但从中可以看出"正史"之全面反映历史面貌的特点和价值。

二十四史记载了大量的、社会各阶层或不同群体的历史人物,显示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中心位置。恩格斯针对欧洲的历史这样说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

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①二十四史虽然也时时讲到"天命",但它客观上都是记述人的活动,它所展现的,正是无数历史人物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道德、智慧等留给后人的启示。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②这就是一种启示。江泽民指出:

>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这是更高境界的、更加深刻的启示。这种启示,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要之,二十四史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性,但它的积极方面的历史影响却是无限的和永恒的,因为它是我们为之自豪

---

①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信》(1999年4月25日),《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的中华文明的光辉记录。历史学家顾颉刚在 1935 年指出:历代正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①。史书重在“事实”,正史既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评价。另一位历史学家白寿彝在 1981 年曾对二十四史做了这样的评价:“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②这可以看作是对二十四史的全面的评价。

四

在 20 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几代学人对二十四史做了广泛的研究和精心的整理,也可以说是研究中有整理、整理中也有研究,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其所得者专著以百数,论文则以千计。

以研究而言,至少包含考证和评论两种类型。前者如范文澜的《正史考略》,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陈垣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冯家昇的《〈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等,都是名著;后者如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季镇淮的《司马迁》、白寿彝的《〈史记〉新论》、安作璋的《班固与〈汉书〉》等,亦皆佳作。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精彩之作,更是不胜枚举。考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考镜源流,正其讹误,有助于人们的阅读和研究。范文澜在《〈正史考略〉绪

---

① 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 · 序》,开明书店 1936 年版。

②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言》中这样写道："《四库》区分群史，首曰正史，即糅合私修官修之二十四史而成者，次曰编年，曰纪事本末，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曰史评，凡一十五类，而正史为之大本。兹编所述以正史为境域，过此以往，则非日力所及，不复赘述。考四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清乾隆时增《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为二十有四。浩兮汗兮，非旦暮所得遍读也。文澜偏陋，未尝学史，然窃观前儒著述，或考源委，或正得失，美言可善，示我周行；窃欲九杂旧闻，缀为一编，他日翻阅正史，此或为其一助云。至于耳目所囿，遗落滋多，琐碎考证，例不具举。大雅君子，傥不我遐弃，幸复有以教正之。"①这里说的"或考源委，或正得失，美言可信"，就是作者"考略"的旨趣，即"他日翻阅正史，此或为其一助"，此系"考略"者之良苦用心。

白寿彝在评论《史记》一书是"空前的巨著，优秀的楷模"时写道："《史记》这部通史在它所包括的时代上，在丰富的内容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书中写贵族的很多，写平民的也不少，这是二十四史里的其他著作比不上的。司马迁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就能不仅记载上层，而且也记载下层人物；不仅记载统治集团的人物，而且也记载被统治阶级的人物，说明他的眼光是比较远大的。这一点和以后的史书比起来也是很突出的。《史记》里面不仅写男子，还记载了妇女当中比较出色的人物，如聂政的姊妹，王陵的母亲，虽没有为她们专门写传记，但写得很突出。在写妇女历史方面，

①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1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史记》不仅写汉族,还写少数民族。他写了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等列传,并且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按历史顺序编排。此外,《史记》不仅写中国,还写当时接触到国外情况。就是这样,司马迁把他当时能收罗到的材料和书面上见到的东西,都利用起来,写成了一部从远古传说时期到汉武帝时期的通史,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从内容的丰富、包含时间的长远来看,《史记》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来史家的优秀楷模。"①这一段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把作者多年研究《史记》的心得都表达出来了,人们从作者的这些认识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史记》的伟大。

至于整理,主要也包含了这两个方面,一是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精心点校。前者如顾颉刚主编的《二十五史补编》,后者如张元济等在二三十年代之校《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集众多学者点校二十四史,都是浩大的工程而有大益于学林。

《二十五史补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史学家们之所以要致力于这一工程,是因为:"历代史书里头,表谱书志未必齐备;那原有这些门类的若干史,又往往因为当时作者的疏忽以及后世传刻的错误,引起读者的憾惜。历来的史学家弥补这种缺失,做了许多的工作。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一是补作的工作,像钱子文作《补汉兵志》、郝懿行作《补〈宋书·食货志〉》等就是。二是校正的工作,像王元启作《〈史记〉月表正讹》、汪远孙作《〈汉书·地理志〉校本》等就是。三是考订的工作,像梁玉绳作《〈汉书·古

① 白寿彝:《〈史记〉新论》,第74—75页,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今人表〉考》、姚振宗作《〈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就是。"[1]正是为了弥补这一"憾惜"，编者搜求丛书和稿本，荟萃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成果，定名为《二十五史补编》，与二十五史相辅而行。七十多年来，此书对历史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元济在《校史随笔》序文中说："曩余读王光禄《十七史商榷》、钱宫詹《廿二史考异》，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会禁网既弛，异书时出，因发重校正史之愿。闻有旧本，展转请托，就地摄影。影本既成，随读随校。有可疑者，辄录存之。每毕一史，即摘要以书于后。商务印书馆既覆印旧本行世，先后八载，中经兵燹，幸观厥成。余始终其事，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文字繁冗，亟待董理。际兹世变，异日能续印否，殊未敢言。友人傅沅叔贻书，属先以诸史后跋别行。余重违其意，取阅原稿，语较详尽，更摘如干条用活字集印，备读史者之参证。管蠡所及，讵敢望王、钱二子之什一，亦聊师其意而已。"[2]以十余年的工夫，"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就是为了"备读史者之参证"，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一种什么动力？这除了说明二十四史的极其重要的地位，除了说明校史者对二十四史极其敬重和热爱，恐怕没有别的原因了。作为读者，要真正体会到校史者的这种甘苦和心境，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中华书局为依托，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和许多高等学校的学者们共同参与对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史学界完成的一项大规模的史学遗

---

① 《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载《二十五史补编》第1册书首，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② 张元济：《校史随笔》，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产整理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可以说，当今的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以及众多的史学爱好者，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对自己的重要。甚至可以认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史学工作者，都是在阅读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一步一步走向史学殿堂的。正如参与点校工作的史学家唐长孺、陈仲安所说：“二十四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选择一种较好的版本，照原样重印行不行呢？我们认为，那样做很不便于读者。古书既无标点，又无断句。由于句读不明而引起的误解屡见不鲜。特别是到了近代，语言文字、名物制度的变化很大，现在的青年阅读二十四史，实在是困难重重。即使中年以上有过阅读古汉语训练的人，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才能读懂。各史流传的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漏，给阅读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花一番工夫整理二十四史是必要的。标点便是这种工夫之一。我们按文义划分段落，区分句读，让读者易于理解。在人名、地名、书名旁加上标线，使读者易于识别。把一连串的官称、爵号、器物名称用顿号隔开，以利读者区分。把书中引用的古书、成语、文章、讲话加上引号，使读者明了。这样就使读者省出一些推敲文字的时间。”[①]这些话，讲得很具体，也很中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人如今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对此当有深切的体会。二十四史点校本对于推进历史研究的发展，推进历史知识的传播，推动历史研究人才的成长，其功可谓大矣。

---

① 唐长孺、陈仲安：《点校本为读者提供方便》，见《整理二十四史工作的感想和体会》，《光明日报》1978 年 6 月 1 日。

五

20世纪的几代学人，用他们的勤奋、心血、智慧和对于二十四史的尊崇与挚爱，为后人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在二十四史的研究和整理的历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为了总结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推动关于二十四史的深入研究，促进二十四史的广泛传播，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我们从数千篇研究二十四史的论文和文章中，精选出一部分，汇集成书，定名为《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予以出版，供史学工作者和广大的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和研究。本书凡十卷：第一卷《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第二、三卷《〈史记〉研究》（上下），第四卷《〈汉书〉研究》，第五卷《〈后汉书〉、〈三国志〉研究》，第六卷《〈晋书〉、"八书"、"二史"研究》，第七卷《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第八卷《〈宋史〉研究》，第九卷《辽、金、元史研究》，第十卷《〈明史〉研究》。

本书各卷主编在搜求有关论著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时间的限制和文献资料的分散，难以求全，因而遗漏在所难免，应该收录而未能收录的情况也是可能出现的。对此，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并给与谅解和帮助，以裨将来再版时有所改进。

2007年9月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前　言

《汉书》,东汉初大史学家班固(32—92,建武八年至永元四年)撰,共100卷,后人又析出子卷,为120卷,起汉高帝元年(前206),迄王莽地皇四年(23),记西汉一代230年史事,为一部断代史巨著。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如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六家》中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故长期与《史记》并举,历代学者研习赞誉不衰。至20世纪,由于学术近代化的推动,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和利用这部巨著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　《汉书》研究的初步展开

20世纪《汉书》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50年,为研究工作初步展开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前段,为深入探索并经受严酷考验阶段;1979年以后,为取得重要进展阶段。

《汉书》自成书后即享有盛名,它记载了西汉一代历史,内容丰富,体例严整,文字具有典雅深奥的特点。故迄清季以前,历代学者或对其著史风格、体例得失进行评论,或对马班异同抒发己见,还有大量属于为《汉书》做补订,或对其史实、文字进行考证注

解之作，这些成果都为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基础和须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进入20世纪以后，整个学术工作进入近代化时期，不论在历史观上、研究视野和方法上，都较前明显进步，《汉书》研究也开始有了变化。这就是，与以往学者每每只作简略的评价不同，20世纪前期的研究者，已开始重视对《汉书》在著史体裁上的创造性、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基本倾向等问题上，作了一些带有理论色彩的分析。如，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中，评价《汉书》具有创造性，班固是断代纪传体史书的开山祖："司马迁以后，带了创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做的《汉书》，内容比较《史记》还好，体裁半是创作。就在断代成书这点，后来郑樵骂他毁灭司马迁的成法，到底历史应否断代还有辩论的余地，但断代体创自班固则不可诬。从此以后，断代的纪传体，历代不绝，竟留下了二十余部。称中国历史，必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除《史记》外，都是断代的纪传体，谈起这体的开山祖，必曰班固。所以班固须占史学史的一段。"[①]刘咸炘撰《汉书知意》，对《汉书》的历史地位予以高度评价："史家并称迁、固，以其刱纪传之格，通古、断代，义法皆精也。六朝《汉书》之学盛于《太史公书》。"严肃批评唐、宋以后许多学者不明了班氏著史宗旨，不推究班氏义法，有的只知摘词论事，有的只作史实名物的考订，其尤下者，只知重复别人讥评《汉书》的旧调，因而严重地掩盖了《汉书》的真价值。刘氏对比前代学者研治《史》、《汉》的不同倾向："马书众知其断制，《货殖》、《游侠》，论议恢奇，《封禅》、《平准》，刺激显著，故学者多知求其旨意。独治班书者，徒知摘词论事，考

---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57—15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据家考订详密，亦只古事古言，鲜推义法，一言体例，则群持后人褒贬之论以概之，马迁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究罕其人。夫班氏自谓‘纬六经、缀道纲’，岂徒大言以欺后世？华、谢而后，断代为书，愁遵其规度，列于正史，十有余家，而开山作祖之书，顾无人深探义例，且致谤焉。史法之堕，讵不由此？”因此在书中将讥议班氏的言论一一摘出辩驳，同时举出《文心雕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文史通义》各篇为班书辩论之语。刘氏对章学诚论班、马异同的观点极为推崇，云：“章君尝谓：‘马书体圆而用神，班书体方而用智。’然方智之中，仍有圆神者存，后世失之矣。马、班异同，乃在于是，非区区校文字所能得也。”以章氏所论为基本观点，结合《汉书》各篇的记事特点详加发挥，意在求得班书本旨。[①]范文澜在《正史考略》(1931)中，对前人有过的班固“尽窃父书”之诬，作了有力的辩驳，既举出诸多确凿的事实，又有本人逻辑严密的推理、论断，其论云：“考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语，俱称‘司徒掾班彪曰’。……如孟坚真欲窃盗父书，何以不改叔皮之言乎？”“《廿二史札记》云：‘《汉书》武帝之前纪传多用《史记》文，而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记引用史迁云云。所引《过秦论》及《战国策》、陆贾《新语》之文，亦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某人，盖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抄袭为嫌也。’择善而用，何必强事更张，潜精积思，二十年之久，始能成书，书成而当时学者莫不讽诵，绝无讥议之者，乃后人忽加弹论于千百载之下，徒见其无知谬妄耳”[②]。范文澜又论述班固创立断代史体裁何以为后世史家所遵行的原

① 《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上》，第171、17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正史考略》，《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27—28页。

因，云："《汉书》为断代之史，自班固创此新体，后世正史，莫不奉为程式。……案中国自汉以下，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必不敢指斥本朝，以速罪戾，班氏史体，最合著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弹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1]至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44)，则论述班固著《汉书》，与《史记》一同标志着私家修史之高度成熟，对后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私家修史之风，导源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而魏晋六朝所修诸史，皆其支与流裔也。……自马、班二氏，发凡起例，创为纪传一体，后贤承之，多有名作，遂于魏、晋、南北朝之世，大结璀璨光华之果。"[2]金毓黻又论《汉书·叙例》所言"该万方，纬六经，函雅故，通古今"，即为班固自定之史法，故云："《史记》、《汉书》未明言有例，然《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例即寓于《自序》、《叙传》之中。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固所谓该万方，纬六经，函雅故，通古今，皆属言之有物，非好为大言者比，谓之史法也可，谓之史例也亦可。"[3]

文献整理考订之学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乾嘉时期风气更盛，这种治史方法对20世纪前期的《汉书》研究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学者每有补志、补表、史实考订、整理、笺注、集解，或读史札记之作，如：丁谦撰《〈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1915)，周正权撰《〈汉书·律历志·补注〉订误》(1920)，孟森撰《〈汉书·古今

① 《正史考略》，《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28页。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63—6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③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65—66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人表〉通检》，张骥辑撰《〈汉书·艺文志·方技〉补注》(1936)，张傧生撰《〈汉书〉著述目录考》(1931)，郑鹤声著《班固年谱》(1931)等。尤须提及的是杨树达所撰《〈汉书〉释例》(《燕京学报》第2期，1928年6月)和《〈汉书〉所据史料考》(收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两文。前者总结《汉书》记史的例法有十项，所列有较量例，附记例，互文相足例等。后者，称“班氏采摭前修，成为杰著”，并将班固所依据的史料来源，分列为七项，有本之父业，本之刘向、歆等。此两文均显示文献考证之功力，为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他又在《〈汉书〉窥管》之卷四至卷九若干条目之下，指出班固有恰当地设立“合传”记载历史人物的长处。

综上20世纪前期有关《汉书》的论著不难得出如下看法：对于这部名著的研究，亟须加强理论的指导，作更深入的分析，尤应着重于对班固史学思想、编撰成就以及《汉书》的历史地位等项，提出更有见地的见解并做出更加充分的论证。杨翼骧所撰《班固的史才》(《经世日报·读书周刊》第70期，1947年12月17日)一文，已在某些方面预示出这样的研究趋势。此文虽以班固的史才为论题，但作者论证的落脚点实则在于《汉书》的历史地位，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班固虽然有不及司马迁的地方，但从总体而论，马班应当并提，《汉书》足以比美《史记》。杨翼骧重点论述班固对司马迁既有因袭，又能变通改革，表现出深厚的功力和高超的创造才能：“班固虽然仿效《史记》的体例，取资《史记》的材料，但并非一味因袭而不知变通改革的。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增加《刑法》、《地理》、《艺文》诸志；叙述汉朝武帝以前的史事，也重新费过排比、整理、增补、删节的功夫，比《史记》的原文详细正确。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汉书》移置《史记》文’、‘《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汉书》增传’、‘《汉书》增事迹’诸条，举出

许多实例，以见他虽依据旧史，而能别具剪裁之才，固然，‘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班固因循《史记》的规模而有所改进，并不是他的史才高于司马迁，并不足以特别值得赞美炫耀；但他确有深厚的功力，独到的才能，绝不像郑樵所说的那么低能，是不待烦言的。”作者又指出《汉书》以详赡完备见称，所以卷帙繁富，而针对晋张辅所言“司马迁叙三千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固不如迁”，单以文字烦省持论之不当，提出应从史料之价值和反映历史真实之程度来评价高下，方为恰当。

二　深入探索并经历严酷考验阶段

1949年至1955年，是《汉书》研究进入深入探索而又经受了严酷考验的阶段。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确立了指导地位，《汉书》研究也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进入更加重视对其史学思想的发掘、重视理论分析的阶段。首先从著作来说，可以举出以下两部。一为刘节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稿》，此书是以其在50年代中期于中山大学讲课讲义为基础而撰成的，列有“司马迁与班固”专章，论述《史记》、《汉书》创立纪传体史书这一辉煌成绩在史学史上的巨大意义，肯定《史》、《汉》都是有思想体系、有严密组织的巨著，论述班固虽然变《史记》之通史为断代史，但《汉书》中仍然贯穿了会通之义，指出光从通史和断代史上区分马班之高下优劣实为不正。其论云：“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司马迁与班固，真是要大书特书的事。……在这样早的年代，我们中国就有这样有思想体系、有具体计划和严密组织的著作，而且用光华灿

烂的文字写出来，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这是因为中国的史学，在先秦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春秋》、《国语》、《国策》、《世本》，是先秦时期的四部大著。司马氏、班氏父子，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辉煌的成绩来。从此以后，纪传体的所谓正史，就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要体制。不只是国内，就是东亚各国如《大日本史》、《三国史记》、《高丽史》、《大越史记》，这些日本、朝鲜、越南各国的正史，都是受他们的影响的。这功劳不能不说是很巨大的！纪传体的创立是司马迁父子之功，断代为史的创立，是班固之功。……事实上，即使是断代为史，会通之义照样可以贯串在里面的，不一定上下古今，才能算是会通。所以郑樵之推崇司马迁是不错的，一定说断代为史就没有会通之义，就不正确了。照我们现在看来，为便于收集史料，断代修史，确乎有许多好处。不过司马氏与班氏的著作内容很丰富，若光从通史与断代上分优劣，还很不够的。"又说："班固《汉书》体制模仿《史记》，而改通史为断代，于二百三十年间之史事之记述则甚整齐划一。所以刘知幾《史通·六家篇》中说他：'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至于《汉书》十志，远远超过司马迁。"[①]当代史学史专家曾评价说，《中国史学史稿》在20世纪的史学史著作中，标志着重视对历史思想作分析、评价之新风格开始出现，因而是传世之作，从上面举出的刘节对《史》、《汉》的评论，即可见一斑。二为由侯外庐撰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中，曾设立专节，论述《汉书》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认为"两汉的班氏，自始即赋有边疆豪强的传统及正宗的家学渊源"，从班彪著《王命论》，到班固"继采前史遗书"，撰成《汉书》，以至班昭的续作，"都是正宗史学的家传"。班固"在

① 《中国史学史稿》，第55—56、62页，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天人关系上,也承袭了董仲舒及刘氏父子滥释灾异的附会之法"。汉章帝时,诸儒集议白虎观议论经义异同,班固负责整理记录,成《白虎通义》;他又继承了刘向父子的人文主义传统,抄袭刘氏的《别录》、《辑略》而成《汉书·艺文志》。"《白虎通义》是神学的,《艺文志》是人文的……皆假班固之手传于后世,其为折中主义观点,似无可疑。而且此两大文献,所影响于后世学术思想者至深且巨,使我们不得不着重地提出"。侯外庐还认为:"如果将《汉书》的全部论赞及叙文,加以归类研究,则班固的是非评断,不但自论相违之处甚多,且其思想的支离贫乏而无创见,以难以为讳。"①

这一阶段发表的几篇论文,对于《汉书》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价值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最具代表性者可举出三篇。一为白寿彝先生撰《司马迁与班固》,对二人的史学成就和思想倾向作比较研究,其基调是马班并提,又认为马班异趣。文中有四小节:"两汉之际的史学","刘向、歆","班固改《史记》","《汉书》的博洽",后两小节均属专论《汉书》,前两小节所论也与《汉书》关系密切。作者对侯外庐所言"正宗思想"和"折中主义"的提法是赞成的,认为《汉书》在天人关系上,是受神学思想的支配,"这跟《史记》的历史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在"《汉书》的博洽"一节中,作者分析《汉书》在历史编撰上的成就和著史内容在史学史、文献学史上的开创性价值,指出,"它在史学史上的重大影响并不在于它的正宗思想而在于它的博洽。它曾以'博物洽闻'推重司马迁、刘向和扬雄。它在《叙传》里提出了的任务,也是在要求建立正宗

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218—22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史学的同时,要求各方面的淹博贯通。范晔称它'文赡而事详',颜师古称它'宏赡',都是从博洽的角度去肯定它的"。并着重论述以下四项:1.《汉书》的博洽,首先在于创立了一个纪传体断代史的规模。2.《汉书》的十志是最足表示其博洽的。"这里包含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学问,也包含了可信的和神秘的学问;包含了理论,也包含了技术。《沟洫志》详于《史记·河渠书》所缺的元鼎六年以后的史事和治河对策,备载了贾让《治河三策》这一重大的治河文献。《食货志》基本上是《汉书》新创立的。它采用了《史记·平准书》的材料而冲淡了《平准书》对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揭露。但另一方面,它系统地记述了宗周以至王莽时期的农政和钱法,反映了这一千多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侧面"。3.《汉书》对于国内外民族历史的记载,也显示其博洽的特色。4.《汉书》比起《史记》,有意多载诏疏和论议,对于西汉一代学术,以及各种文体的名家名作,所载尤为详备。① 冉昭德《班固与〈汉书〉》一文,分为四个部分:论述班固的学术特点和著史经历;《汉书》的编纂成就和取得成功的原因;《汉书》的内容特点和文学成就;《汉书》史学思想的进步面和落后面。此文以简洁的文字、清晰的条理和充分的史料,对《汉书》编纂特色和历史观点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如论述班固的思想倾向为既尊崇儒家,但并不反对诸子学说,评论历史人物有褒有贬,并不绝对化,注重从"时"、"势"来总结历史人物的成败,征引了大量很有说服力的史料,并加以分析,对读者很有启发。作者对《汉书》的总体评价是:"《汉书》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我国人民的一份珍贵遗产,我们应当认真地学

①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习它。”[①]冉昭德又撰有《班固的首创精神与进步思想》一文,关于班固的首创精神,作者着重从如何评价《五行志》与《沟洫志》进行分析,认为:“班固生于东汉初期,正是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盛行的时代。作为一部官撰的《汉书》,又怎能不记载这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呢?班固之所以志“五行”,从《汉书·叙传》所说‘告往知来,王事之表’来看,其目的在于用五行灾异来警告专制帝王的胡作乱为。”作者又提出,班固并非五行迷信的说教者,而是持以反对态度:“(《汉书·两夏侯京翼李传》)又着重指出:眭弘、京房等推阴阳,言灾异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眭孟诛死、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又说他们是些‘学微术昧,或见仿佛、疑殆匪阙,违众迕世,浅为尤悔,深作敦害’的人物。由于班固对五行学说没有深入研究,以致记述错误、互相矛盾,诚如刘知幾所指出的。因此,用《五行志》来推论班固的神学思想,是不公平的。”作者又说,《汉书·五行志》“虽然充满着汉儒对灾异迷信的说教,但还保存着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原始形式。它的特点,在于班固分别记录有关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和地震、日食等,保存着珍贵的科学史料”。而《汉书·沟洫志》,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治河经验的总结,是一种创举”。文中对班固进步的史学思想的论析,则包括:班固对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一定的认识;《食货志》表现出浓厚的富民色彩;对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极为重视;在学术观点上能客观地分析武帝定儒学于一尊的政策之失误,主张学者的著作要“有补于世”[②]等。上面举

---

① 冉昭德:《班固与汉书》,《历史教学》1962年第4期。

② 《班固的首创精神与进步思想》,《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第8号,1964年6月。

出的三篇论文证明:无论是对《汉书》的学术思想渊源、著作体裁、编撰特色、史学思想等项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起以前来,论述深刻得多,也较为全面,对《汉书》的思想意蕴和本身存在的矛盾,比较以往的论述作了揭示。这一明显进展,与建国后学者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是有直接关系的。

至60年代前期,《汉书》研究经受了严酷的考验。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左"的路线越来越加剧,造成学术研究中公式化、教条化的做法泛滥。有不少研究者,片面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放弃了"要把问题严格地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进行分析"的原则,对于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作为一概骂倒,对于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的著作采取"断章取义"的态度,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夸大其思想中的封建性、落后性的一面,而对他们的贡献一笔抹杀。班固及其《汉书》即遭到这样的粗暴对待,有人写文章对班固全面地加以否定,认为班固"不择手段制造迎合统治者的理论",他的"《五行志》为东汉统治者所提倡的谶纬迷信思想制造了理论依据"。称班固把《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改为《陈胜项籍列传》,又不同意司马迁所歌颂的"布衣之侠","班固这些和司马迁不同的地方",证明他"只能是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在当时,这种错误的看法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迎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不少人的思维定式,大有咄咄逼人之势。面对学术研究中的错误看法,正直的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的原则作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面对其势汹汹的批判声浪,不惧怕被扣上政治大帽子的巨大压力,勇敢地挺身而出,捍卫历史科学的客观真理性和尊严,据理进行反驳。冉昭德即为一个代表,他于1966年初发表《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一文,明确指出:"班固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不能一笔抹煞的。我们应当承

认班固是我国公元1世纪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汉书》不仅在《史记》的基础上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的历史著作，创立纪传体断代史，成为史学名著和优秀的文学传记。更重要的是班固表现了首创精神，较之他的先驱者司马迁做出许多新贡献，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知识，从而把中国历史编纂学推向一个新阶段。"对于有的文章中加给班固"是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等诬枉不实之词，作者以坚实的史料和恰当的分析予以辩驳和澄清，他说："班固既没有不择手段制造谶纬迷信，而且持以反对的态度。……例如，《货殖传》删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的两段话。又着重指出推阴阳、言灾异的眭弘、京房等都是'学微术昧'、'违众迕世'的人物。又如王莽大力提倡谶纬迷信，利用符命证明自己得天命，应该做皇帝。班固批判王莽说：'昔秦燔诗书以立私义，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这里所谓'奸言'主要是指谶纬迷信。"故《汉书》中虽然确有五德循环论和阴德报应等神秘主义的说教，但不是主流。在文章最后，冉昭德归结说，如果按照有的人"全盘否定《汉书》的办法，来清理历史遗产，那末，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批判继承的东西，将化为乌有"①。此文发表时间为1966年年初，离"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仅有数月时间，作者所面对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明乎此，作者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评价文化遗产的勇气和态度，就更令人肃然起敬。"疾风知劲草"，中国史学历来有"据实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家强调以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自觉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从事学术研究，冉

① 《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文史哲》1966年第1期。

昭德发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科学地评价《汉书》，表现出高尚的史德，值得表彰。

三　《汉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阶段

1979 年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生活领域的巨大变革，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汉书》研究也进入取得重要进展的阶段。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砸烂了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枷锁，人民大众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实现了思想解放。重新运用科学理论和理性态度探索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领域逐步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汉书》研究领域也真正实现了拨乱反正、更新观念的深刻变化。以往曾经长期阻碍对《汉书》得出客观性评价的是套用“对立面斗争”的模式，为了赞扬司马迁史学的进步性、创造性，就需要寻找一个“对立面”作为反衬，班固和《汉书》不幸就成为贬低和苛责的对象，作为“正宗史学”、“神学体系”、“唯心主义”的代表，甚至被加上“封建皇帝忠实奴才”的恶谥。由于这种错误的思想框框的影响，造成一些论著中对《汉书》中保守性的片面夸大，而对其进步性和人民性的观点加以贬抑，甚至视而不见。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这种由于极“左”路线影响下形成的错误观点和思想框框终于被抛弃了，这就彻底破除了思想束缚，为一系列学术创新成果开辟了道路。《汉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阶段可从 1979 年算起，一直到 20 世纪末，这一新阶段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白寿彝、安作璋发表的两篇文章。白寿彝于 1979 年年初在北京六所高校历史系联合学术讲座上作了题为《司马迁与班固》的学术讲演，即讲到：“《史记》开创的书志体虽

有光辉篇章,却很不完整,后来又有遗失。相对来说,完整的还要算《汉书》。""班固将书志体完善起来,他死前没来得及把十志写完,是他妹妹班昭和马续接着完成的。班固为史学上的有关学科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是很有地位的。有的为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历史地理各科的学术源流,提供了开创性的著作。十志的范围不限于汉代。自古以来的典章制度,包括传说,都写进十志了。好多分支科学都是从十志开始有了记载。研究两汉及汉以前的典章制度,必须要看《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特别是把十志搞清楚,才能搞清后世的典章制度"。"班固在十志方面的贡献,超过司马迁。班固时候所见的典籍、材料,比司马迁时,内容要丰富。班固的十志,在体例上,吸收了司马迁的成果而比司马迁做得更好些。但从思想性看,如《平准书》,司马迁要高于班固"①。这些论述,明显地指出应当提高对《汉书》成就的评价。安作璋于 1983 年 3 月 23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谈班固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一文,提出班固和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齐名的两位史学家,作者的明显用意,同样是要改变贬抑班固史学的不正确看法,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成就。文中从以下四个方面肯定班固的贡献:1. 创立了断代为史的史学体例;2. 开拓了许多新的史学领域;3. 求实致用的史学思想;4.《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②

进入新时期以后,《汉书》研究的崭新阶段所具有的特点是:创新意识强,探讨问题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视野较前大大开

---

①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史学史资料》1979 年第 2 期。

② 安作璋:《谈谈班固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光明日报》1983 年 3 月 23 日。

阔，开拓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成功地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摒弃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尊重客观的历史实际，对问题作具体的辩证分析，由此而取得了大量有创新价值的成果。现谨就研究范围，归纳为五个方面加以概述。限于篇幅，只能举出若干例证，难免挂一漏万。

（一）“断汉为史”的著史新格局与“宣汉”的旨趣

司马迁撰《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班固撰《汉书》，变之为纪传体断代史。以往郑樵曾对此大加挞伐，章学诚则赞誉班书成为后世“不祧之宗”。那么，班固“断汉为史”究竟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有何意义？新时期学者对此做出具有理论价值的探讨。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一书中指出，班固断汉为史，是发扬司马迁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创造精神，解决了历史编撰上的困难课题，开创了著史的新格局。因为，从褚少孙到班彪，“他们所做的都只限于‘续作’。即是说，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所做的工作置于司马迁巨大成就笼罩之下，只限于修修补补。他们并非意识到要构建新的史书体系。而这个问题若不能解决，则‘保存历史记载连续不断’的目的就不能达到。试看：众多续作者中，除褚少孙所补若干段因附于《史记》，班彪所续一些内容因包含于《汉书》，因而得到保存外，其他作者所续之篇，都早已湮灭无闻，便是明证。道理很明显，若无一个构建起来的体系，再好的内容也无从依附，无法流布，更不能传世。班固却有气魄创立了著史的新格局。他‘断代为史’，在内容上提供了时代所需要的历史教材，在构史体系上则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史学从司马迁的巨大身影笼罩下走出来，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汉书》的体裁，是对《史记》的继承，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造，以后历代修史者对此不改。这意味着班固创立的断代史体裁，恰恰符合中国封建社会演进久远行

程中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所以才被相继沿用垂2000年”。书中运用著作年代相近的《论衡》和《汉书》作比较研究,对班固著史“宣汉”的旨趣做出新的分析,认为:“《论衡》书中一再尖锐地批评俗儒‘好褒古而贬今’、‘尊古卑今’的偏见,原因即在儒生自生下来读的就是记述和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为了驳倒复古倒退论者,迫切地需要一部记载汉史的著作。若有擅长著述的人修成这样一部记载汉代政治功业的‘汉书’,让读书人从小诵习,那么其价值即可与六经相比!王充所言,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召唤‘汉书’出世。班固恰恰也意识到撰写汉书的需要,并且以艰苦的史学实践做出成功的回答。这是他的一大贡献”。因此,放在东汉初的时代背景来考察,“班固不满意‘以汉代继百王之末’,固然表现出其正宗思想,但主张‘大汉当可独立一史’客观上又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的积极意义”,“满足了社会思想前进的要求”①,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二)“实录”精神和卓越史识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高度评价司马迁著史具有“实录”精神:“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借评《史记》以寄志,以发扬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忠实于历史,作客观、准确的记载作为本人治史准则。以往冉昭德对此有所论述,新时期又有多篇论著着重对此作了发掘、评析。陈其泰在《再见丰碑——班固和〈汉书〉》中立有“弘扬实录精神”的专节,对此主要概括为“据事直书社会矛盾”、“揭露弊政”两

---

①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第73—7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项,论述:班固一再揭露西汉土地问题的严重性,《食货志》载有董仲舒上言,讲汉朝仍然继续秦朝当年土地兼并的严重局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因此建议"限民名田",却不得实行。至哀帝即位,师丹辅政,他指出:"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因此又建议限田。《哀帝纪》中也载哀帝的诏令承认兼并的严重,要求大地主占田不得超过30顷,但也徒具空文。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最后必然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汉书》还揭露诸侯王及外戚集团奢侈纵欲,无法无天。《景十三王传》有一段总概括:'汉兴,以至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在骄淫失道。'就是说,西汉210余年间,数以百计的诸侯王,大多是骄奢纵欲、荒淫无道之徒,人数既多,为害时间又长,可见给西汉人民造成多么严重的祸害"。其中像广川王刘去等"燔烧烹煮,生割剥人",罪行骇人听闻。"武帝和宣帝时期是西汉的'盛世'。班固揭露武帝刑罚之滥。张汤、杜周在武帝时先后任廷尉,都以治狱严酷出名,专门揣度武帝的用心,武帝要重处的,便设法陷害;揣测武帝要从轻发落的,便设法把犯人关着,然后找借口陈述此人受冤。《汉书》还揭露武帝重赋于民,竟规定小儿三岁起便应交一份口赋(人头税),致使民众无法负担"。《夏侯胜传》和《食货志》揭露武帝连年征伐造成国库空虚、人口大量死亡。《汉书》对宣帝时吏治修明是大量记载的,同时对于当时豪强作恶多端也如实记载。总之,《汉书》"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为指导,既赞扬西汉的功业,又如实揭露弊政,这才使《汉书》成为一部可信的西汉史,赢得后人做出'其文赡,其事赅'的高度评价"[1]。许殿才

---

① 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第184—18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汉书〉的实录精神与正宗思想》一文,论述班固"继承了古代史家不畏强御,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如实记录了封建统治者淫逸腐败,残害人民的罪行。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恶政,成帝宠信赵氏姐妹,毒杀亲子的罪行,书中都做了详细记述。文帝是汉代恭俭爱民的典型,是班固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家,可他仍逃不脱班固的笔伐。邓通是文帝的男宠,此人'无他伎能,不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文帝一改俭朴作风,对他特别慷慨,曾赐他'矩万以十数'。有人给邓通相面,说他会因贫穷而饿死。文帝听说后竟大言:'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乃赐给邓通蜀严道铜山,让他自铸钱,结果'邓氏钱布天下'(《佞幸传》),邓通成了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富翁。这同文帝惜百金而罢筑台,'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纪赞》)的记载对比起来,真有绝大讽刺意味。班固通过这一事例告诉人们:即使是最有德、最恭俭的封建帝王,骨子里仍脱不掉自私、奢靡、矫饰的习性。这是《汉书》中耐人寻味的史笔"。

关于班固的卓识,新时期以来学者的探讨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较前有重大进展,包括《汉书》中对时势的看法,对谶纬迷信的批评,对禄利之儒的批评和对正直人士的肯定,对人民的同情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人才观,对民族关系的看法等项,都有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分析。仅其中关于班固论述历史时势的进步看法一项,学者们就作了诸多方面的探讨。如对郡县制的肯定,施丁在《班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一文中认为:"他记述并指出,汉初郡国并行,诸侯'骄蹇,数不奉法','率多骄淫失道',是皇朝的离心势力,对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才有贾谊、晁错之议,

削藩之举。他评论贾谊之议'通达国体','吴楚合从(纵),赖谊之虑';评论晁错削藩之策,'锐于为国远虑',比司马迁的观点显然正确。"[①]陈其泰在《〈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一文,论述班固以时势即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观点来解释秦汉之际重大变局的进步史识,认为:"刘邦为什么能'无土而王',迅速建立起汉朝,这是西汉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班固在《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中对此作了分析。他总结自虞夏至秦之得天下,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历经了长期的艰难创业:虞、夏之兴,'积德累功'数十年,商汤、周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历十余世,而后成功;秦的帝业,先由襄公崛起,经过文公、穆公、献公、孝公、昭襄王、庄襄王历代经营,'稍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并天下。刘邦得天下却与历代君主相去天壤,'无尺土之阶,繇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书传所记,未尝有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大变局?班固认为,这是因为秦始皇的倒行逆施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为刘邦的迅速兴起准备了条件。……这样,刘邦'无土而王'这一亘古未有的历史新格局,就完全可以用能够确切指明的时代条件来解释。班固用'势'的命题对此加以概括,云:'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业,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以此与司马迁相比较,《史记·秦汉之际月表》序中,"确已论及秦的暴政为汉的兴起准备了条件,表现出其卓识,他感慨'岂非天哉',其中也确有历史时势的意味。但是不能否认,司马迁讲的'天'又含有命定论的意味,所以他称刘邦为'受命而帝'的'大圣'。换言之,司马迁的议论中重视历史时势与命定论二者兼而有之。相比之下,班固的认识明显地提高了,他完全以

① 施丁:《班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历史时势来解释,摆脱了命定论的影响。这是观点上的一大进步"[1]。许殿才在《〈汉书〉中的天人关系》中,认为班固已认识到民心关乎国家盛衰,把重民看作了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说:"这是班固通过历史研究总结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显示了《汉书》中蕴藏的智慧。"在对秦亡教训的总结上,班固引用并赞同贾山的《至言》的论述,指出人怨不但是亡国之因,而且是天下坏之因,这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放到了重要的地位[2]。关于《汉书》的民族思想,施丁在其文章中提出: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强调夷夏之别,鄙视匈奴族的思想需要批判;但其反对攻伐,强调守御,主张礼待友好者,值得肯定。他对汉文帝遗南越赵佗书所强调两族间"通使"而不相争的态度,非常赞赏,感叹"岂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3]其他关于班固对谶纬迷信思想的批评等项,学者们也都有深刻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列。

(三)历史编撰成就

安作璋认为,班固在推进纪传体史学编撰体例的整齐划一上有突出的贡献:"《史记》的专传或合传与类传的次序间杂,或以时代相同,或因事迹相关,体例很不统一。如《刺客列传》本属类传,竟置于专传吕不韦、李斯列传之间;《汲郑列传》本是专传或合传,反置于类传循吏、儒林列传之间;《匈奴列传》置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前,《游侠列传》置于《大宛列传》之后。《汉书》则一律以时代的先后顺序为主,先专传、合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而

---

① 陈其泰:《〈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

② 参见许殿才《〈汉书〉中的天人关系》,《历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③ 施丁:《班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以'贼臣'《王莽传》居末。又如《史记》列传的篇目,或以姓标,或以名标,或以字标,或以官标,或以爵标,体例也很不统一。《汉书》则大体上都是以姓或姓名为标题,这样就统一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后来各朝代的正史,基本上都沿袭《汉书》的编纂形式。"班固又继承了司马迁重视记载国内各民族历史的传统并加以发展,"运用新的史料,把《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汉朝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争夺战争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汉书》又将《史记》的匈奴等列传加以补充,增补武帝以后大量的史实,使之更加详备。这些记载,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各民族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最珍贵的资料"[①]。陈其泰对《汉书》的历史编撰成就总结为以下五项:1. 调整总体布局。除了"断汉为史"外,《汉书》取消了《史记》原有的"世家"。这一创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因为"到武帝之后,所谓诸侯只存虚名,实际上已同于衣租食税的郡国",故取消"世家"的做法,"是符合时势变化的恰当做法,反映了统一国家权力战胜了旧的割据势力这一新的时代特点。故后来一直被修史者所沿用不改"。2. 移置内容。如"《史记》为项羽立'本纪',排在《高祖本纪》之前。因此,有关楚汉战争的许多重要事件,都先在《项羽本纪》中叙述,往下的篇章则略提或不提。《汉书》开卷第一篇是《高帝纪》,项羽改为'列传',在'本纪'之后,所以重大事情都必须在《高帝纪》中叙述,必须从项羽篇中剔出补入。这类事件有鸿门宴上刘邦脱险;刘邦在彭城失败后,半路上遇到惠帝和鲁元公主,载在车上一同

① 安作璋:《班固》,《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0、82 页。

逃走;刘邦下令韩信、彭越率兵会合,一起包围项羽,韩、彭二人不发兵,刘邦用张良计策,分地封二人为王,才实现了对项羽的包围等”。“由于本纪是记军政大事,列传记人物活动,根据这一原则,班固把《史记·吕后本纪》中的一些宫廷斗争(吕后杀戚夫人及赵如意)都写入《外戚传》,这样做使《吕后纪》的纲更清楚”。3. 多设合传,以醒眉目。作者指出:“《汉书》体例的严密,特别体现在70篇列传的编排上,做到了历史联系与逻辑联系二者相一致。”书中共设置7篇类传,有《儒林传》、《循吏传》、《外戚传》等,共记载了98人事迹,此外还有人物239人。为了避免零散纷繁、无有头绪,班固采用了专传与合传相结合的形式,作了周密安排。专传,是为所记人物事迹多,或是载入篇幅较长的论议、作品者而设。合传,是按人物事迹联系密切,或是人物的身份、行为互相近似者,合在一起记载。“《汉书》多设合传,极有匠心,其好处:一,避免头绪纷繁。把200多人物组织到47篇合传之中,显得眉目清楚,便于查检。二,从现代观点来看,设置合传,可以突出某一类型人物的行为和思想特征,以群体的形象出现,有利于反映社会情状”。4. 断代为史与“通古今”。“班固发愿要写一部‘汉史’,它的上限自然起于高祖。但是历史发展又是前后相互联系,不能割断,尤其是有关制度的问题,为了说明汉代何以是这种情况,还必须向上追溯其来源”。因此《汉书》中不少篇章的记载,又做到了“通古今”。如《刑法志》所载,起自西周,中历春秋、战国及秦,重点论述西汉刑法制度的沿革,篇末一直记到东汉建武、永平间刑狱案件大减的情况。“显然,只有首先追述汉代以前刑罚的严酷,读者对于进入汉朝以后颁布‘约法三章’、文帝废肉刑和有关各种论议的意义,才能有深刻的理解。在这里,班固不受断代史体例的限制,灵活地做到‘通古今’,作用是很大的,它说明了汉代

的刑法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演变的。同时,他的论述又为后人提供了一部中国刑法史的雏形。像这样体现出他'通古今'的撰写意图的篇章,在十篇志中,还有《律历志》、《礼乐志》、《食货志》、《郊祀志》、《地理志》、《沟洫志》,以及《百官公卿表》"。5. 兼具"志"、"表"的妙用。《汉书·百官公卿表》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它兼有"百官志"和"公卿大臣年表"的作用。前面的文字综述部分,"提供了关于秦汉官制系统、全面的综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专制皇权被强化到何种地步",其作用等于一篇论述官制沿革的"通古今"的"百官志"。后面则以表格形式列出汉初至汉朝灭亡,中央政权各部门每个长官任职年代的起讫,把复杂的事项用简明的表格列出,极便查找。"我们若要查找何时何人任某一职务,或要查找某一年代同时担任高级职务的是哪些人,都可一目了然"①。

(四)十志的成就

《汉书》的十篇志,在传统史学中历来被视为精华之作,突出地反映出班固治史的"博洽"。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甚为关注,取得不少创新成果。白寿彝指出,《汉书》的十志的最大贡献,是在继承《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将典志体完善起来。他说:"要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及封建国家的作用,班固在十志中提供了很好的材料。"②史念海则强调《地理志》是班固撰成的东汉一代一部"自古迄今"的沿革地理书。"《地理志》虽说是西汉一代的典籍,实际上却是起到了沿革地理的作用,它应是由夏商肇始,历经春秋、战国、秦、汉,而至于王莽新朝的沿革地理。

---

① 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第169—177页。

②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2期。

班固所说的:‘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是完全与实际相符,一点也不夸张,不过下面还应该添上‘新朝’的字样”[①]。张孟伦同样对《地理志》在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予以高度评价:“班固的修《地理志》,不但引起了后代统治者,更加知道撰修地理书的重要性;且给后代修地理志的得着了一种最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宋书州郡志》、《北魏书地形志》都说明了这一点),促进了中国地理典籍纂修事业的发展。所以清代治《汉书》极有成绩的王先谦说:‘班志地理,存前古之轨迹,立来史之准绳;兼详水道源流,使后人水地相资,以求往迹,可谓功存千古者也’(《〈汉书·补注〉序例》)!”还有的学者从总体上对《汉书》十志的史学价值作了探讨,认为:“《汉书》十志完善了史书中的典志体,使历史学家描绘人类社会生活的能力增强了;班固又有意识地克服了断代史体制的局限,以典志体贯穿古今。从现代观点看,这两项都是史家在历史视角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在今天也仍有启示的作用。”[②]

(五)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

《汉书》历来以文笔优美著称,宋代黄庭坚曾称誉说:“每相聚辄读《汉书》数页,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③]新时期以来,学者们

---

① 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期。

② 陈其泰:《对〈汉书〉十志的总体考察》(上),《汉中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

③ 凌雅隆:《汉书评林》卷首《汉书总评》,见《汉书研究文献辑刊》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对此多有探讨,高度评价《汉书》是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安作璋称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一个传记文学的杰出作家,说:“他写西汉一代不同社会阶层各种类型人物,虽然没有《史记》那样生动活泼,但结构严密,言辞精练,显示了它的特色。例如晁错、朱买臣、李陵、苏武、霍光、杨恽、赵广汉、盖宽饶、张禹、龚遂、严延年、陈万年等传,班固都能利用他所掌握的丰富材料,经过选择和鉴别,抓住主题,运用艺术手法,加以深刻细致的描写。使一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感情和动态非常形象地再现出来,确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①]郭预衡认为,班固的文章和著作,尽管具有正统思想的桎梏,但有时又能“突破这种思想的束缚,表现出一定高度的史识和正义感”。如《汉书·李广苏建传》中“对于李陵的英勇和战功都是写得非常充分的,笔端也是饱含着情感的”;对苏武的事迹也写得“慷慨悲凉”,“极有精彩”。又说:“《汉书》文章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些篇章比《史记》更多学术气息。”如《景十三王传》中河间献王传的特点,即为“略去一般生平事迹而专讲学术活动,并且着重叙其搜集图书、保存文献之功”[②]。陈梓权认为,《汉书》的人物传记部分具有“题材丰富,剪裁适当”和“善用对比和衬托,突出重要人物和中心思想”等特点。“就描述个别人物、事件而言,取材也求其充实,既采集前史遗事,又旁贯琐事异闻,在真实的基础上对材料经过选择取舍,从而较鲜明深刻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体现作者的褒贬态度。如《霍光金日磾传》既涉及霍光生前身后有关的重要人物事件,又着重从他秉政二十余年的漫长政治生涯中选取武帝托孤、辅政昭帝、废昌邑王、拥立宣帝四件

① 安作璋:《班固〈汉书〉评述》,《破与立》1978年第1期。

② 郭预衡:《班固的思想和文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大事，加以集中描述，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霍光忠于汉室、独操权柄、沉静详审而专横恣肆的生动形象”。又说：“《苏武传》表现苏武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爱憎分明和刚强不屈的性格，也从苏武八十多岁的一生中，重点截取、描述出使、羁留匈奴十九年的艰苦斗争生活；在羁留匈奴十九年漫长岁月中，又仅选择诱降迫降、幽禁断食、流放牧羊、李陵苦劝等几件带关键性和特征性的事件，做了细致的描写，充分表现苏武经得起生死攸关、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种种考验；还精巧地突出了苏武牧羊时‘杖汉节’，‘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及还，须发尽白’等含义深刻、形象鲜明的细节，使人物栩栩如生。其艺术感染力千百年来不曾泯灭，首先有赖于题材的典型性和精心的剪裁。”①

四 《汉书》研究的展望

回顾百年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推动20世纪《汉书》研究不断获得进展的力量，是历史观点的进步、研究视野的拓宽和方法的改进。清代学者对《汉书》做了大量史实考订和文献注释工作，同时有精彩的点评。进入20世纪后，由于西方近代进化论和系统分析方法的传入，《汉书》研究开始出现将之置于古代史学发展纵向中考察的论述，出现将班固的史学思想与其编撰方法联系起来的论述；又由于唯物史观的传播，《汉书》研究有了更具思想深度的成果，将《汉书》的产生与班氏所处时代的特点联系起来分析，将其史学思想、编撰成就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作辩证的分析，将班固史学对司马迁史学继承的一面和相互异趣的一面作具体的分析。由于克服了

① 陈梓权：《〈汉书〉的文学价值》，《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极“左”路线的干扰、肃清了教条主义的流毒，实现思想解放，《汉书》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从探析班固的著史旨趣，到评价其历史文学成就，取得了许多视角新颖、论述精辟的创新成果。

然则，《汉书》作为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确立的名著，拿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其历史地位相比，又是很不够的。展望21世纪，《汉书》研究仍然空间广阔，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将提高认识能力、开阔研究视野，与认真细绎原著结合起来，开掘出更多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将《汉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在此，仅提出以下四点不成熟的思考。

1. 对《汉书》史学成就和历史地位的考察，不但应从班固对司马迁创立的史学传统之继承、发展关系来分析，还应从传统史学演进的长过程中来评价。传统史学肇基于孔子、左丘明，至司马迁出现了著史高峰，然而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确立则是班固。《汉书》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六百年间为“诸儒共行钻仰”，视为五经之亚，尊为修史法式。故刘知幾赞扬其“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宋代学者同样推崇备至，视为必须经常研习之书。《汉书》在学术文化史上的又一重大意义是，由于它和《史记》从国家盛衰、人事成败的理性主义视角记载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力地抵制了两汉之际盛行的阴阳灾异迷信思潮，使中国文化走上一条与神学体系迥然不同的道路。这些都须要结合班固的著史事业来作进一步的阐释。

2. 深入进行《史》、《汉》比较的研究，但应注意彻底摆脱扬此抑彼思维方式的影响，正确的指导思想是马班并提，各有优长。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的论述，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说：“记注藏往似智，撰述知来拟神。”“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迁史不可为定法，

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然则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传世行远也"。章氏指出了马班二人的不同风格,同时又恰当指出班固史学的特点,这就是在体例谨严、储备大量知识、组织缜密合理之中,又有卓越的史识贯穿其中。如果跳不出扬马抑班的思维定势,就会只看到《汉书》的局限,而对其长处视而不见。譬如,《汉书·高帝纪》的大量史实是承袭《史记·高祖本纪》而来的,但班固所载,自高祖二年至十二年,共增补了十二项内容。其中,如高祖五年五月,连续颁行了两项诏令,规定:①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12年,回关东的免徭役6年。②劝说原先因逃避战乱逃亡山泽的回到原籍,重新成为编籍内的民户,恢复他们的爵位、田地、住宅,以从事生产,不准官吏虐待。③原先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庶民的身份。④所有军吏卒无罪的,凡是无爵者一律进爵为大夫,原是大夫的进爵一等,这些人并且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等项内容。这些政策规定,乃是事关汉朝开国恢复生产,奖励、慰劳征战多年返回原籍的军功士卒,释放奴婢,稳定社会秩序的各项重要措施,近年来汉史研究者根据新出土的汉简与班固增加的重要史实相比照,充分肯定了这些内容对于西汉初年恢复国力、安定社会局面的意义;也恰恰证明正如章氏所言,《汉书》"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这就启发我们,应通过比较研究,联系西汉当年社会情状,去进一步认识班固史学的特点,更恰当地评价《汉书》的贡献。《史》、《汉》比较无疑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中国学者尚未拿出系统而深刻的著作,这更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3. 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对《汉书》中一些重要篇章作分

析、阐发，实为推进《汉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例如，《汉书·五行志》以往长期被视为宣扬迷信之作，刘知幾《史通》中写有《〈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专以驳斥《五行志》错误命名，加上以刘氏权威史学评论家的地位，更使这种看法几乎成为定论。但有的学者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作专门探讨，提出：典志的任务是对典章制度、社会生活和学术文化作记载，西汉中叶以后，阴阳五行之说盛行，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的特殊现象，故从典志体的性质说，设立此志是合理的，设立它的本身不等于班固提倡迷信思想。而班固又有明确交代，"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分明是采撷、区别、汇编纂辑之作。而联系班固在《郊祀志》和《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的言论，他固然一方面有天人感应的神秘观点，另一方面又尖锐批评这些阴阳五行家善于附会，"亿(臆)则屡中"。而《五行志》中，记载了大量有关日食、彗星、太阳黑子、地震、自然灾害，和毛孩、连体婴儿、牛的变异等有关自然史和生态史、特异现象等珍贵资料，故为中外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高度重视并且大量引用。再一一分析刘知幾在《错误》、《杂驳》两篇中的论述，确系批评班固迷信思想和附会的仅占三条，其余都与班固本人无关①。这样就澄清了长期以来对《五行志》的错误指摘，恢复了其作为一篇记载了大量珍贵文献的"志"的价值。在十志中，如《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篇，其思想价值、撰述宗旨、内容特点、体例布局，以及议论的运用等项，也都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总结。

---

① 参阅陈其泰《〈汉书·五行志〉平议》，《人文杂志》1993 年第 1 期。彭曦《我谈〈汉书·五行志〉》，《光明日报》2007 年 8 月 16 日。

《汉书》中有关人物记载的大量篇章，也是班固精心构撰之作。如《王莽传》，是纪传的最后一篇，其篇幅分别超过《高帝纪》一倍、《武帝纪》两倍，《汉书》向以文字简要为史家所称道，独此篇如此纵横驰骋，可见其别具匠心。有的学者已着手从其记载内容和思想价值分析，认为此篇为"了解古代帝王禅让之谜的钥匙"、"刺坏谶纬符命假象的投枪"、"儒家复古思想大悲剧的实录"[①]，颇有启发意义。然则，若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来分析，此篇仍大有文章可做。因为，《王莽传》的编撰特点，是把刻划一个阴谋家如何窃取大权的种种恶劣做法和伪善面孔，与总括王莽新朝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大事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从纪传体史书的要求说，新朝也应该有"本纪"记载大的事件，可是在东汉初，王莽被认为是"篡窃"，不可能立本纪。所以这篇王莽传，实则起到人物传记和记载大事的本纪这双层作用。班固成功地把二者糅合起来，做到记载头绪清楚，而且囊括丰富，波澜起伏，刻划了一个擅长玩弄阴谋的野心家的典型，写出周围众多人物的不同态度和命运，又揭示出王莽的种种倒行逆施必然走向灭亡的深刻哲理。清代学者方苞对王莽传的写作技巧有极高的评价，说此篇"钩抉幽隐，雕绘众形，信可肩随子长"，认为在揭示王莽内心世界和表现众多人物性格的手法上，同司马迁的名篇同样成功。[②] 前人恰恰有的因不理解《王莽传》上述特点而有误评，如张衡认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③]东汉人既有误评，更说明重新评价此篇在历史编撰上的特点和价

---

① 沈重、李孔怀：《论〈汉书·王莽传〉》，《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② 参见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第 271 页。

③ 《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

值,实在大有必要。《汉书》纪传中有大量出色之作,如《高帝纪》、《文帝纪》、《武帝纪》、《李广苏建传》、《张骞李广利传》、《霍光金日磾传》、《赵充国辛庆忌传》、《元后传》等,都是值得进一步认真探析的。

重点篇章的探析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突破口,在对这些局部问题作深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对《汉书》这部名著的整体认识就能更丰满、更准确,使之更增添光彩和更具说服力。

4. 开展《汉书》与西方史学名著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前已有研究者开了头,撰写了博士论文《论塔西佗、班固的史学思想》,很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此外,如班固《汉书》与古罗马史家普鲁塔克(约46—120)《传记集》(又称《希腊、罗马名人合传》)的比较研究,也应是很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因为,二人时代相近;《汉书》是以人物纪传为中心;《传记集》中的设置有合传也有专传,它既载史事,又重视宣扬伦理道德,不重视史料的真实而加有许多主观想象的成份,重视人物刻画的文学手法①,这些著史态度和手法显然与《汉书》有些相似,又有些迥异,故二者很有可比性,值得探讨。开展这类比较研究,既能推进对《汉书》的认识,对于中西史学比较的大课题也能有所裨益。

《汉书》是一部出色的名著,内容丰富,包涵着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只要我们创新观念,创新研究方法,认真开掘,刻苦钻研,就一定能不断取得引人注目的新成果,迎来《汉书》研究更加美好的前景。

陈其泰

2007年10月10日作于

北京师范大学

① 参阅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目　录

班固的史才

杨翼骧

在我国史学史上,班固是常常与司马迁并称的。班固的史才虽然不及司马迁,但他学养很深,又富于综合的能力,所以他所著的《汉书》,组织完密,叙事详备,足以比美《史记》。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论里说:

>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而且班固作史的动机,也与司马迁相似,那便是所谓"世业"或"家学"。他的父亲班彪,是一个潜心史籍、有志撰述的人。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虽有刘歆、冯商、扬雄等相继撰述,而"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班彪遂博览典籍,旁采旧闻遗事,作《后传》六十五篇,以接续《史记》。班彪死了之后,班固觉得他父亲的著作不够详备,便立志改作。后来又以为汉朝的史事应当有专书记载,不应"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于是改变接续前史的计划,重新从汉高祖起王莽止,写成一部包举一代、首尾完备的《汉书》。

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纪传史书的体例;班固作《汉书》,建立了断代修史的法式。后来一些作史的人,遵循着这种纪传体、断代式的成规,而形成了所谓“正史”的系统。刘知幾对于班固断代为书的办法,深加称许。《史通·六家》篇里说: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史,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而迄今,无改斯道。

这并不是刘知幾的偏见,事实上,断代为书的办法确有其独特的方便与长处。其后每一朝代的灭亡后,便有专记此一朝代的史书出现。而我国的史籍得以继续衔接,没有间断,不能不说是班固的功绩,所以班固对我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实在是至深至大,不容忽视的。

但是到了南宋时代,郑樵因为提倡通史,便对这位“断代之祖”的班固痛加诋毁,甚至骂他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郑樵《通志·总序》里说: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倘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倘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论,如此人

材，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斜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

这一篇话，可说是尽诋毁之能事。在郑樵自己觉得是大泄积忿，非常得意了。然而客观地看来，实在是意气用事，厚诬古人。刘知幾虽然赞成班固断代为书的法式，但对于司马迁的长处仍加表扬；章学诚也是主张通史的，但并不任情地讥斥班固。因为对于体例方面的批评，各人的见解虽有不同，而其"潜精积思二十年"，撰成一部巨大的史书，在史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更不能因其著作的体例不合己意，就连他的为人与学力也一概骂为一文不值了。所以郑樵这篇议论，确乎失掉了史学批评家的公正态度与客观精神，是不能令人赞同的。

郑樵除了骂班固破坏通史的体例以外，还骂他剽窃因袭司马迁等人的著作，这一点也是未加深思，因为历史的著述必须取资于已往的记载，不能自行杜撰或凭空臆造的。郑樵推崇司马迁的通史制作，而《史记》还不是因袭《春秋》、《国语》、《战国策》等书吗？郑樵自己撰作的《通志》，除了《二十略》以外，不更是完全抄袭以前的史书吗？怎能以"不以为惭"、"复不以为耻"的话来责骂班固呢?！所以章学诚虽然赞成郑樵修史的主张，了解他的旨

意,为他申解辩护,但对于他这段骂班固的话则毫不同情,并且严加驳斥,《文史通义·言公上》篇里说:

> 世之讥史迁者,责其裁裂《尚书》、《左氏》、《国语》、《国策》之文,以谓割裂而无当(原注:出苏明允《史论》)。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以谓盗袭而无耻(原注:出郑渔仲《通志》)。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迁史断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书》、《左》、《国》,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赋乎?必谓《左》、《国》而下,为迁所自撰,则陆贾之《楚汉春秋》,高祖、孝文之传,皆迁之所采摭。其书后世不传,而徒以所见之《尚书》、《左》、《国》,怪其割裂焉,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书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决科之同题异文乎?必谓孝武以后,为固之自撰,则冯商、扬雄之纪,刘歆、贾护之书,皆固之所原本。其书后人不见,而徒以所见之迁史,怪其盗窃焉,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

章氏这段话说得很切要明白。因为历史是可以"述而不作"的,即如司马迁的史才,自己也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郑樵只顾以诋班固为快,而忘其言之不能成理了。

班固虽然仿效《史记》的体例,取资《史记》的材料,但并非一味因袭而不知变通改革的。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增加《刑法》、《地理》、《艺文》诸志;叙述汉朝武帝以前的史事,也重新费过排比、整理、增补、删节的工夫,比《史记》的原文详细正确。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汉书》移置《史记》文"、"《汉书》多载有

用之文"、"《汉书》增传"、"《汉书》增事迹"诸条,举出许多实例,以见他虽依据旧史,而能别具剪裁之才,固然,"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班固因循《史记》的规模而有所改进,并不是他的史才高于司马迁,并不足以特别值得赞美炫耀;但他确有深厚的功力,独到的才能,绝不像郑樵所说的那么低能,是不待烦言的。

《汉书》以详赡完备见称,所以卷帙繁富,但竟有人以为这是弱点。晋朝的张辅曾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固不如迁。"(见《晋书·张辅传》)殊不知《史记》叙事虽然历时三千年,至秦汉以前的史料缺乏,记述简略,仅占全书十分之二三的篇幅。秦汉以下不过一百年,已占全书大半的文字。汉书记载前汉一代的事迹,因为史料丰富,叙述详备,卷帙自然增多。并非因为二人修史的才能有差,才有烦简的区别。况且史才的优劣,也绝不能以文字的多寡来决判。所以张辅的见解实在浅陋,不明了记事的原则。刘知幾在《史通·烦省》篇里已驳正他的错误,详述史文烦省的意义,并且一再地说:"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阙害,斯则可矣。必重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杂说》篇里又说:"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愈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史》、《汉》烦简"条,也指摘张辅所说的不当,以为班固的史才虽逊于司马迁,但不能以烦简定其高下,并讥以"强作解事"之语。

撰著史书固然不能有闻必录,需要对史加以鉴别整理,行文叙事要避免重复累赘;但采择去取之际,须以史料的真实价值定。有史料价值的,不厌其烦;史料缺乏或者没有价值的,宁欲其简。并不能事先存着必烦必简的成见。所谓叙事的烦简,要从史文的内

容来看,不能只从篇卷字数的多寡上评其得失。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史》、《汉》互有得失”条,便是从《史记》与《汉书》记载同一事迹的不同,来比较其略,而评论其得失。这才是正当的批评方法。

班固自幼就有文才,长大后更是当时的博学名儒。范晔《后汉书·班固传》里说他“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谢承《后汉书》又有这样一段记载:“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范晔《后汉书》李贤注引)如果谢承的记载是真实的,则班固在十几岁的时候,已被王充看出他有修史的才能了。后来又奉汉明帝的命令,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同撰成了《世祖本纪》;又采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他自己撰著《汉书》,共费了将近二十年的功夫,而且他又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汉书》文辞的优美,能使读者“亹亹而不厌”,赵翼曾称赞他的文笔无愧于司马迁,《廿二史札记》“《汉书》增传条”里说:

> 《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述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魏禧谓固密于体,而以工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

总之,班固的创作天才虽然不及司马迁,而以综合整理的能力见长,再加以高博的学养,优美的文辞与深厚的功力,所以他所著的《汉书》能与《史记》并传并重,而他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也与司马迁相提并论了。

(《经世日报·读书周刊》第70期,1947年12月17日)

从史学和史料来论述《汉书》编纂特点

卢南乔

一　创立了断代为书的汉书家

汉当武帝之世，中国第一部以纪传体见称的史学名著，司马谈、迁父子的《史记》完成了。在这以后，社会又经历了一个行程，发生了许多变化，如王莽的移汉，赤眉、绿林的起义，更始的建号、入关，最后，由刘秀奠定了名为“中兴”的东汉王朝。这时上距《史记》成书年代，约为一百三十年左右，中国第二部纪传体的史学巨著，可说也在不断地酝酿、形成中，班彪、固父子实承担、实现了这一伟业。在汉史的撰修上当时首待解决的，恐怕要算书的起讫问题了，他父子俩对之正抱持着不同的见解。其所以然，皆从《史记》的论定而起。“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班彪认为“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①。既肯定了《史记》这一部分的成功，自必是“跟着讲”。原来“太初以后，阙而不录”的，就该补录（司马迁自叙其书“至太初而讫”）；后来“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的，就该改作（褚少孙等复有修记，以附益司马

①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

迁之书，而自称为“后进好事儒者”，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遂“作《后传》数十篇”[1]。班固则认为《史记》把本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够“宣汉”之美，遂“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凡百篇”[2]。这里，不但班、马有了异同，就是彪、固之间也不能统一步骤。进一步探索其故，可知自五行说与政治发生关系后[3]，每个朝代的开创，必然要找五德运行中的一德以为“兴王”的依据。汉初，还计不及此，直接因袭了秦的水德，到文帝时，才定为土德。不管水德也好，土德也好，都无碍于百王的合法存在。因为，周代既公认为火德，秦承周，便是水克火，汉继秦，便是土克水，所以，司马迁说，“余述历黄帝以来”[4]，编成十二个“本纪”，顺列五帝以至周、秦、项羽，加上刘家诸帝，是很讲得通的。到东汉之初，刘家已被派定为尧后，承尧运，被改造成火德（这一派定改造运动，约略始于成哀，成于王莽），依据五德终始原则，往上编排的结果，新室王莽固然打倒了，算不得正经的皇帝，连秦也给挤掉，落得个“闰位”的名色（按五德相生的次序，以周为木德，汉继周，是木生火，故秦无德可据）。而且，刘家的子孙早忘记他们的祖先刘邦是“起微细”[5]，更感触不到项羽

①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

②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按，班固这种看法的形成，与东汉初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更进一步发展也有关。

③ 参看《古史辨》第5册，顾颉刚《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④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自序》。

⑤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

“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侯王”[①]不可一世的气概。于是，班固特标汉目，以系其书[②]，自必是认为至当不移的（这一层，连班彪都没意识到）。当然，在书的起讫问题解决上，也透露了班固的思想性，历代史论家纠缠不清的“正统”观点，就是他提示的，“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③]他在“叙帝皇”时，削去秦、项，不及秦以前的百王，不已隐约为这种观点所支配吗？然而，正是这个处所，他却别开了纪传体的路数。如果说司马迁统叙百王，是“通古纪传家”，那么，班固专演西京，即是“断代纪传家”了。从通古转为断代，立刻被奉为史家不易之大法，刘知幾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④]拿今日通行的二十五史检查一下，没有不是纪传的、断代的（除《史记》和《南北史》外），形成国史以“纪传为正”，纪传以“断代为正”的看法，而高膺“正史”的称号[⑤]。中国史书三体，首编年，次纪传，而纪事本末最为晚出。当知幾时，惟行编年和纪传，所以，他于“考兹六家”之后，做出“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尚书》、《春秋》、《国语》、《史记》），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编年）及《汉书》（断代）二家而

①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② 《汉书·叙传》：“凡《汉书》，叙帝皇。”云云。

③ 《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固《典引》；《文选》卷四十八所载为全文。按，汉成帝时，梅福上书已有“正统”的意思；但对历代王朝正式提出正统的看法，则始于班固。

④ 《史通》卷一《六家》“汉书家”。

⑤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二），史部收自《史记》至《周史》六十七部书，而为之叙曰：“自是世有著述，以为正史。”

已”的论断①。本此立意，我们不又可以说，历来史书编纂体例占统治地位的，还只有《汉书》一家而已。

二 《汉书》对以前诸家的修记及对其史料的利用

在本节里，我只想探讨一个问题，即《汉书》的史料价值怎样？先从《汉书》缘起开端。

大抵《史记》成书后，并没有什么一本“藏之名山”，一本“副在京师”②，只有一份家稿，由司马迁的女儿杨敞妻保留下来，又由他的外孙杨恽把它“宣布”出来③。不久，杨恽“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稿本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下，归了朝廷。等到“载笔”之臣看到时，已经不是足本④。因此，元、成间，就有补续的人，“求太史公之传”（如《三王世家》、《龟策列传》），“终不能得”⑤。成帝中，又

---

① 《史通》卷一《六家》“汉书家”。

② 《史记·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按：迁死稍后，《史记》所缺篇数，所缺篇目，诸家记载全同，不似有正副两本在；否则无缘巧合至这种程度。

③ 《汉书》卷六十六《杨敞传》“（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又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④ 按，《史记·自序》谓其书“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不似没完成的。

⑤ 按，元、成间，褚少孙为郎，一再说“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好读外家传语”，“窃好太史公传”；但“求其世家，终不能得”。“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是已经有了缺佚，分见《史记》、《三王世家》、《滑稽龟策列传》附褚先生曰。又按，魏、张晏举出《史记》所亡十篇的名目，并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见《史记·自序》，《集解》引。

有流出外廷的副本,依然是"而十篇缺焉"[①]。平帝后,司马迁被追封为"史通子"[②],《史记》地位抬高了,续撰的人更多起来,如有什么羼伪,也只有这个时期最容易产生[③]。总计从元、成至平帝后,意在继太史公书而有所"祖述"的,相传褚少孙和刘向、歆父子外,历次而及,则有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④];也有添人柳孟、贾逵的;而杨恽属于疑可之间[⑤]。其中,褚先生等补的十篇,附于《史记》[⑥],冯商所

---

① 《汉书》卷一百上《叙传》:"斿(班固之伯祖)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王凤)白不许。"按,于赐书下接言东平思王求太史公等书不许者,正说明班氏独得赐此类书之为优异。又《后汉书·班彪传》载其《略论》谓《史记》"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艺文志》,班固原注亦谓《史记》"十篇有录无书"。

② 《汉书·杨敞传》附"子恽传":"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按,此乃封迁为史通子而求其后承袭之。

③ 按,崔适《〈史记〉探源》力主《史记》一书,多有刘歆等的伪羼。

④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按,《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有"阳城卫"、"史孝山",当即此处的"卫衡"、"史岑"。杨树达先生又据《太平御览》引《桓谭新论》及《通志略》引《风俗通》,以"李注之阳城卫当作阳城衡,《史通》之卫衡,卫乃衡之误衍,衡上又夺阳城二字"。见《小学金石论丛》卷五《〈汉书〉所据史料考》,特补录于此。

⑤ 郑樵:《通志·总序》:"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按,首先祖述太史公书的是杨恽,见《汉书·司马迁传》。日人泷川资言以为:"《汉书》云祖述者,其义未详。"(《〈史记〉会注考证·总论》)今按《杨恽传》明言"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当亦有所附益。

⑥ 按,《史记·自序》、《集解》引张晏只言褚先生补四篇;高步瀛先生云:"其他六篇不言补,则今本十篇具在者,与魏时之本又不同。"见所著《〈史记〉选》、《太史公自序》后附考。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条,将褚少孙补缺的与续撰的混为一谈,又不察张晏只言补四篇之意,遂云"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补人者"。实误,但其下续云:"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甚是。

续七篇，录见《艺文》[①]。其后，班彪尽黜诸家之作，按照自己的主张，干脆把“太初以后，阙而不录”的，来一次十全大补，成功“后传六十五篇”[②]；但是，班固对这位“才高而专心文史之间”[③]的乃翁，依旧有不满足的地方，“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于是，一变前人作法。前人，连同班彪在内，对《史记》只是缺了的，补；断了的，续[④]。班固则不然，他是要另起炉灶，自成一家的。如他已经承认司马迁“其言秦汉，详矣”，还是来个大翻修：“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⑤]由此可知，《汉书》以前诸家对汉事的修记，司马迁而后，自杨恽至班彪凡历二十家[⑥]，只是由于《汉书》的体制一新，且获得成功，才算告一段落。

---

①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太史公记》7篇。

② 《史通·古今正史》：“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③ 袁宏：《后汉纪》卷十三，孝和永元四年纪。按，《后汉书·班彪传》作“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彪时，四部未分，史部未立，不得云“史籍”，当以袁纪为是。

④ 《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又《通志·总序》：“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

⑤ 分见《汉书·司马迁传》赞及《叙传》(下)；《后汉书·班固传》。

⑥ 杨恽、褚少孙、柳盂、贾逵、班彪加上《史通·古今正史》所出自刘向、向子歆，迄萧奋、刘恂等15家，适为20家。浦起龙于刘向等15家下注云：“向、歆、扬雄自有传，冯商见《艺文志》，史岑见本集《人物篇》(按，亦见《〈班彪传〉注》。《人物篇》出史岑，注云，字子孝，王莽末人)，晋冯、段肃，见《后汉·班固传》(按传云：京兆祭酒晋冯好古乐道，玄默自守。弘农功曹史殷肃——李贤注：固集殷作段——达学洽闻，才能绝伦)，冯衍自有传；余七人未详。”

其次，当及《汉书》与以前诸家修记的采摭、撰用关系。班固自叙其书"凡百篇"①，张辅统计其辞"乃八十万言"②。这么一部鸿篇巨著，是不能凭虚立事的。如果我们了解到它是如何广裒众善，取证群言，在史料的精粗上有个谱儿，就可袪疑释惑，增加考信的力量。试作三点分析。

（一）从《汉书》本身的征引来论证它对史料的综合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汉书》的史料出处，的确不如《史记》来得明显。其次，前人指目为《汉书》所取资的修记汉事诸家，有许多是失考的。现就本书征引范围，逐一商讨。

勹、冯商——《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于"太史公百三十篇"后，即紧接"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这个篇数，班彪、固父子都著录过；但在撰《艺文志》时，却省去四篇③，因此，只有七篇了。我们根据班固叙说他对诸家述作的删存状况，大略地看出，存下来的是可起作用的；于是，检得两事：《张汤传》赞，"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赵尹韩张两王传》赞，"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扬雄亦如之"。这样一来，有人就进一步推测说，

---

① 《汉书》卷一百下《叙传》。

② 《晋书》卷六十《张辅传》。

③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都凡"下原注云："省太史公四篇。"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一，按云："班氏省之，即冯商书。"又其所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一（下），按云："冯商所续，著录七篇，省四篇，盖十一篇，故班氏、韦氏（昭）并云十余篇。"

"《张汤传》,班氏亦采冯商所续书","《王尊传》,当是商作原文"[①]。如果承认推测合理,冯商所续的就七取其二了;不过是否即原文很难确定。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把问题转向班固是在什么意义上、两处利用到冯商?对照《史》、《汉》看,显而易见,是从改传、立传而起。《史记》入张汤于酷吏,而《汉书》把他独立出来,完全是因为汤的子孙自宣、元以至光武后,一直是尊宠的。冯商续《太史公书》怎样对待汤及其子孙,不得而知,而谓他们是与留侯张良同祖的一支,却不合乎事实。所以,班固借《杜周传》赞以见意:"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而俱有良子,继世立朝,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可见他家和元功张良之后不相关)又在《酷吏传》赞里明白表示:"汤、周子孙贵盛,故别传。"然而,司马迁立张汤于酷吏传并没有错,也就是说事实俱在,不能无缘无故地增减;张汤本传部分,《史》、《汉》无异辞,也就是没有增减处,所以,"司马迁不言,故阙焉",又无异暗示张汤虽有"别传"的改易,并无内容的变更。当然,《张汤传》如果是冯商七篇之一,传后附其子孙张安世以下的史材,也必是在这个严格意义下,《汉书》才利用到他的。至《王尊传》本《史记》所无,这位受到吏民称颂的京兆尹,想来应在撰续之列;可是,竟不被"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的刘向留心。"赞"中的意思,表示在看了冯商、扬雄所为的传,也就利用到他们的史材,并且觉得把这位人物编纂在和"前有赵王"一起,是有援据的。以上,是我粗浅的看法。

夊、刘向、歆——扬雄。拿纪传体来衡量现存于世或征引在

① 分见《〈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一(下)及《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赞,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

《汉书》里面的刘向、歆父子及扬雄的著述,都是不合标准的,也就是说他们修记汉事以续太史公书所用的编纂方式,看不出史体的痕迹。但汉、唐以来都交口承认他们曾发挥了史笔的作用,甚且当这个看法发现是有问题时,总是喜欢做些解释。试看与班固同时的王充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雄)录宣帝以至哀、平。”①稍晚的张晏对《匈奴传》中李广利降后的一段记载,指出:“自狐鹿姑单于已下,皆刘向、褚先生所录。”②宋人郑樵也说:“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③不就很显然么。但就在前面所举冯商的一个事例中,已发现“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扬雄亦如之”的问题。刘向是怎样“序”,扬雄又是怎样“如”呢?《汉志·诸子略》儒家类出“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本注谓即《新序》、《说苑》、《太玄》、《法言》等,但我们还是不能在现存这几部书里头寻找到一个有合史体的痕迹。清人姚振宗拾补《艺文志》却巧为回护:“向、歆本传虽未有作史明文,而范书《〈班彪传〉注》及《史通》所言章章若此,非向、歆作史之确据乎?”④杨树达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此文,刘向、扬雄并举,疑皆指其所续撰之《史记》而言,与向之《新序》、雄之《法言》无涉。”⑤他在另一处并再次提到“盖向、歆父子皆尝续撰《史记》”⑥。我则始终认为修记汉事诸家有如刘

---

① 王充:《论衡·须颂篇》。

② 《史记》卷一百一《匈奴传》“使(李)广利得降匈奴”下,索隐引张晏云:“自狐鹿姑单于已下,皆刘向褚先生所录,班彪又撰而次之。”

③ 《通志·总序》。

④ 《〈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一,刘歆续太史公书下按语。

⑤ 杨树达:《〈汉书〉窥管》卷八。

⑥ 《〈汉书〉窥管》卷四。

向、扬雄等，正是与他们的《新序》、《法言》有涉，他们修记汉事的内容，就包含在《新序》、《法言》一类的著述中①。他们对汉朝时政、汉代人物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发表用的是论议式，而不是纪传体；然而不为其良好史料，以供“缀集”者的资求。现在，顺序列举《汉书》所征引于他们的例证，以实吾说。

《高帝纪》赞：“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

《贾谊传》赞：“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尚黄、数用五；及欲……其术固以疏矣。”

《东方朔传》赞：“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闻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正谏似直，秽德似隐……其滑稽之雄乎。”

《王贡两龚鲍传》前序：“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及雄著书，言当世士，称此二人。其论曰：或问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盍势诸？名卿可几。曰……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楚两龚之絜，其清矣

① 《史通》卷五《采撰》：“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至余嘉锡先生著《目录学发微》，站在目录学立场，特申《七略》一语：“余因以疑《史通·正史》篇‘向、歆相次，撰续《史记》’，即是指《七略》、《别录》；因其体如列传，故为后人采入续《史记》之中，并非向、歆实尝修史。”（《叙录》篇）可供参考。

乎。蜀严湛冥……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

《董仲舒传》赞:"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尹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尹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仲舒遭秦灭学之后……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 至向曾孙龚,笃信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在《汉书》纪传里,征引自刘向的有四,刘歆一,扬雄四(凡本传、自叙及录于《全汉文》中类似之文不计;另二,见《张冯汲郑传》赞,《司马相如传》赞,从略)。逐条考核,可知第一,为议论式,多评其人的贤否,其论的当否,其事的得失,意存鉴戒。第二,原著存者,引文皆可复案,不是别有续史之作。以扬雄为证,则其讥短东方朔,见《法言·渊骞》篇,赞许郑子真、严君平及楚两龚,亦见《法言·问神》篇与《间明》篇。刘向《新序》自宋时已不全,后人求其所以为《汉书》援据之辞又不可得,遂多揣测。我意以为,如谓"其记汉事或在《新序》已佚之二十卷中"(原三十卷),极是;如谓"疑向续撰之《史记》尝编入《新序》中"①,却不见得定是那么一回事。第三,《汉书》于此等处,特标出诸人姓字的缘故,是因为班氏父子对刘向、歆,扬雄诸人,尊之重之,仰之甚高,认为"其言有补于世"。从《楚元王传》赞:"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今古,其言有补于世。刘氏《鸿范论》(向作)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歆作)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即透露出这种思想。班氏父子是崇儒的,而把他们当作仅次于孔子一等,则受其议论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如刘向谓贾谊"其论甚美",所以《陈胜

① 《〈汉书〉窥管》卷八。

传》就全用《过秦论》以代赞语[1]。东方朔在社会的“传闻”名头很大,所以借重刘向的采访,宣明以耳代目的失实。《王贡两龚鲍传》序的借重扬雄的论断,也是这个意思。《董仲舒传》赞兼述刘向、歆对之有不同的评价,则是因为当时有把董仲舒看成是汉朝的孔子,而在王莽的学术大整理工作后,这位为汉制法的董仲舒的地位,已被为新定制的刘歆代替了,评议起来,不十分容易。所以,并录刘歆、向的不同意见,以代分析,以自取信,而终取刘龚之言,以明己意所属,都是有意识的征引。这些,都是很可理解的。

一、班彪——除褚少孙外,我们今日能够断言其为续《太史公书》的,只有冯商、班彪二人。彪书,王充说是“百篇以上”[2],范晔所作的传中说,“彪乃作《后传》数十篇”,刘知幾还确凿指出“六十五篇”,这应该是有根据的。但班固《叙传》于此只字不提,所以招来“窃盗父名”的讥刺。号为《汉书》功臣的颜师古,于注解到《韦贤传》赞才碰上“司徒掾班彪曰”,遂亟加辩护:“《汉书》诸赞皆班固所为,其有叔皮(彪字)先论述者,固亦具显,以示后人。”郑樵是于《汉书》颇致不满的人,当然还是要提出异议:“且善学司马

---

① 按,贾谊论议之美,不独刘向称之,即南朝以论赞高自期许之范晔,亦以追踪贾谊为鹄的。但贾谊主张汉土德,色尚黄,两汉之际,莫不否定之;故赞云“其术固以疏矣”。杨树达先生未能细审其故,于《〈汉书〉窥管》卷五提出疑辞:“又连用两‘及欲’,殊为不辞……愚疑上‘及欲’为衍文,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尚黄,数用五,凡十五字,当在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一句之上……”至过秦论之引用,亦可参看《廿二史札记》卷一,“过秦论三处引用”条。

② 《论衡·超奇》篇:“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按,彪续史公书,王充以在其门而得目睹其事,故《论衡》屡言之,如《佚文》篇:“班叔皮续太史公,载乡里人,以为恶戒。”《案书》篇:“(叔)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

迁者，莫如班彪……，其书不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①]如果不承认古人著书也有注意力不及的地方，我们就要觉得很奇怪，《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应劭注明说："外祖金敞也。"《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晋灼注明说，"班彪之姑"，是这两个"臣"字都是班彪自称，而颜注失察。《韦贤传》赞、《翟方进传》赞、《元后传》赞都劈面大书"司徒掾班彪曰"，而郑樵竟无睹。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要批驳颜、郑的漫不经心、轻下考语，而只在讲清楚《汉书》中已为前人发觉是班彪手笔的，共得五处。杨树达先生说："况彪撰《后传》有六十五篇之多，赞岂止三五首而已？此知固没而不言者甚多，彰彰明矣。"这话是有道理的。他并举出金日磾、安上传和《外戚传》的班婕妤篇，疑为彪作。[②] 此外，我也想从彪、固对其书的起讫问题上具有不同的见解（固书讫于孝平、王莽之诛，彪书延至光武中兴之际）及二人生存的年代着眼，试立二例，以求还有没有为彪笔而未为前人所觉察的。

甲、今见例。

《楚元王传》赞："呜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按本传载刘向《谏成帝营起昌陵疏》："丘陇弥高，发掘必速。"及赤眉起义，西入长安，果然在光武建武二年，"发掘诸陵，取其宝货"[③]。彪时续史，正接其事，故云"于今察之"。若固为书，晚在明帝永平中以后，于文似有未妥。

《曹参传》："参玄孙之孙本始为平阳侯，子宏嗣，建武中，先降

---

① 《通志·总序》。

② 参见《小学金石论丛》卷五《〈汉书〉所据史料考》等。

③ 《后汉书》卷四十一《刘盆子传》。

河北,封平阳侯,至今八侯。”按《曹参传》,参至宏,凡八侯[1],当建武中。而《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建武二年,侯宏嗣。”宏为参之十世孙。又“侯旷嗣,今见”。旷为参之十一世孙,应该是九侯,或当建武三十年,班彪死后。这两个“今”字统一不起来,显然出自二人之手。如果解释为班固对父书“刊落不尽”,也偶而留下几笔“不齐一”[2]的迹象,我想是可邀允许的。

《武五子昌邑哀王髆子贺传》:“元帝即位,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按《王子侯表》(下):“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贺子绍封,原侯保世嗣。侯会邑嗣,免;建武复封。”即指其事。可知“今见”为建武时,可知传文为班彪作。独《王子侯表》(上),安众侯宠,系“建武二年,以崇从父弟绍封;建武十三年,侯松嗣”。直到班固作表时,松还在世,表于其下另一栏标明“今见”,与上引“侯旷嗣,今见”的同在一栏不合,可知“侯松嗣”的“今见”非为建武时,可知表文为班固作,与彪无涉。王先谦补注云“盖光武时……”[3]实坐未尝细加稽考的缘故。

此外,《杨胡朱梅云传》:“(福)常以读书养性为事,至元始

① 《汉书》卷三十九《曹参传》,王先谦补注引齐召南曰:“案参传子窋,窋子奇,奇子时,时子襄,襄子宗;参玄孙本始,本始子宏。”是为八侯。

② 《后汉书·班彪传》,载彪《略论》,其评《太史公书》云:“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多盈辞,多不齐一。”

③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昌邑哀王髆传》附《昌邑王贺传》,王先谦补注引案顾炎武云:“……《汉书》表传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绝,惟此传言今见为侯。表云……又安众侯宠以建武二年绍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见。盖光武时,亦但随宜封拜,未尝遍及……。”今案顾氏云云,见《日知录》卷二十二“汉王子侯”条。王氏节录其文,而以案语出之,则意实欲据之以释“今见为”,然顾氏着重处原不在此。

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姓名为吴市门卒云。”又“赞”中亦云“全性市门”。我认为“至今”以上为彪原来之辞，“其后”以下为固附加之辞（赞语同），两者未及划一；否则，于文理说不过去。

乙、圣王例。

《西域传》赞：“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阨，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按当明帝之世，汉已出师通西域，置都护。至章帝初，西域叛服无常，班超留而未归，“绥集诸国”。固于明、章之日为书，安得有此“违时”之论，且亦为其书的断限所不许。是必在建武中，鄯善、车师诸国“愿请都护”，光武“以中国未定，未遑外事”①，才“辞而未许”的。因此，这位“圣上”当然是光武（与《〈艺文志〉序》明指孝武为“圣上”的不同）②，而这位史臣当然是班彪了。

《王莽传》赞：“王莽始起外戚，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而言之，亦天时、非人力矣。……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圣王之驱除云尔。”按此处“圣王”自然指的是光武帝；另外，我们还可拿《叙传》

---

①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建武二十一年纪。

②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赞，王先谦补注引徐松曰：“孟坚生于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诏校书郎修《汉书》，至建初乃成，是作书正当明帝章帝时，而此赞称光武为圣上者，盖（为）叔皮之辞，孟坚因而不改。”按，徐氏亦是从时间、史实考得者，详参其所著《〈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

中班彪对隗嚣问答的一段话对照："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位号，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不但立意相同，而且辞句也有符合的，更可知为彪之作了。

从春秋、战国以后，"官"学逐渐转为"家"学，私人著述的标名列姓也开始多起来。魏、晋之际，事富文繁，更有"别集"出现。但在两汉时代，这种"据为已有"[①]的情况，还没发展到严密的程度；尤其是一门所专、一家所擅之业，递相撰修，以成简篇，如班固之于彪，好不好说作"盗窃父名"呢？是个问题。上边花费了一些篇幅，钩稽了《汉书》中因仍班彪之处，倒不是要解答这个问题，只是想对史料来源多取得点说明，从而证实班固利用先人撰述，不但赞语中常见，就是传文中也有，此其一。又利用时，他是认识到身历其事者的"口语"材料的价值；虽然他自己并不曾去多方寻求，此其二。余下的，就不遑细论了。

（二）从所谓"尽窃迁书"来考察史料上的班马异同关系

尽管班固和他父亲一样在某种观点上讥正过《太史公书》的得失，但到底承认它是"实录"、"焉可阙哉"[②]。前人也从《汉书》利用《史记》——主要是纪传部分，指出班固"自高祖至武帝，凡六

---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② 袁宏《后汉纪》卷十三，孝和皇帝永元四年纪："(班彪)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其得失曰……《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焉可阙哉。"(按，后四字，《后汉书·班彪传》不载)《汉书·司马迁传》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世之前，尽窃迁书”[1]。更有明白地说：“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文，而即以为己有，未尝自言引用史迁云云。”[2]如果真的这样，谁也保不住要对《汉书》发出“身其余几”的疑问了。宋人倪思[3]《班马异同》一书的出现，不是没来由的。原来，《史记》纪传部分，包括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而属于先秦时代的即有本纪六，世家十七，列传二十八，余下的略占半数。倪书三十五卷，一卷等于《史记》的一篇，仅《司马相如传》分为两卷，包括了本纪二，世家五，列传二十八，比勘其异同处，也就不算少了。明人许相卿又在这个基础上作了《史汉方驾》一书，纪传中人的名称和上书几乎对得起号来，只是在《魏豹传》、《陈余传》后补入了英布，另添了陈涉，而将《司马相如传》并为一卷，所以，卷数也是三十五。从史料意义看，究竟勘出了什么异同呢？赵翼也是想在这里头寻找答案的人，他不曾看到倪书，但依靠自己“互勘”的结果，还算成功；《史汉不同处》条，提供了三十一例，多是有关“字句异同”方面的，和《四库总目提要》对倪书的说明相仿佛[4]。我们不难领会“尽窃（改为据就妥当些）迁书”及“多用《史记》文”的实际意味了。然而班固毕竟有其独到处，他本着原定编纂方案（有他父亲的见解在内），对所谓“六世之前”的汉事，非但“整齐其文”，不使有“盈辞”；（顾颉刚先生尝云《汉书》征用《史记》之处，往往是《汉书》的正确），还从史料角度上开辟了三径：赵翼的“《汉书》

① 《通志·总序》。

② 《廿二史札记》卷一“过秦论三处引用”条。

③ 《四库总目提要》卷四十五《班马异同提要》云：“旧本或题宋，倪思撰，或题刘辰翁撰。……案《通考》之载是书，实据《直斋书录解题》，使果出于辰翁，则陈振孙时，何得先为著录？是固可不辨而明矣。”

④ 参见《廿二史札记》卷一，《四库总目提要》卷四十五。

多载有用之文"、"《汉书》增传"与"《汉书》增事迹"诸条[1],也提供了数十例,因此,他指出"皆《史记》无而《汉书》特载之者"。另有,"《汉书》移置《史记》文"[2]条;移换位置,虽无改于史料的短长、丰啬,但可借以了解其中所增有哪些不是真正新出的,免得蒙蔽了耳目。现在,剩下的另一个疑问,这里新出的史料何以不为"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太史公书》所容纳呢?昔年,陈垣先生以为一是由于恩怨关系,当时碍于撰人的,到后来就可摆除顾忌了,所以有增事,一是由于鉴赏关系,文章得失,存乎寸心,此或认为无当于理,彼则深感有补于世,所以有增文。至由于对传主的编排、分合关系,各有主观看法,所以有增传,那是必然的。赵翼解释《汉书》增立《李陵传》、《苏武传》说:"盖迁以陵事得祸,故不敢多为辨雪也。"又说:"《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3]其实,史书还没有为活着的人立传的例子,只有述事而连及其身的。总之,足够证明在史料上《汉书》超越《史记》的并无多,但它别有成功处,这也就是在史料上考察班马异同关系,我们初步取得的结论。

(三)从《艺文志》的著录群书来了解《汉书》对史料的"慎核"关系

我国图书大整理工作的开始,是在公元前1世纪末,刘向、歆父子的领校群书,内有中秘书、中书、外书、太史书、太常书、民间书、臣向书、卜圭书、富参书以及臣立书、臣叙书等等[4]。大概经武

---

①② 《廿二史札记》卷二。

③ 《廿二史札记》"汉书增传"条。

④ 严可均校辑《全汉文》卷三十七,刘向校《战国策》、《管子》、《晏子》、《列子》、《邓析子》、《说苑》诸书,《叙录》所述。

帝世的藏书、写书，成帝、哀帝世的求书、校书，天下遗书集中和整理也差不多了。《艺文志》著录了“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这对于撰述汉事的人说来，真是一个大便利。当时，刘向、歆校书的奏记如《别录》、《七略》——中国第一部目录工具书——完全存在，所有这些书的内容，似不必一一过目，就可按各人不同的要求而“各取所需”来利用它了。其实不然，《艺文志》本身表明，班固之于《汉书》，在材料上是尽了“慎核其事”的努力：

第一，作了“省”、“出”，“入”的加工。

班固据《七略》而为《艺文志》，系散《辑略》为小序，而于其他六略下的各书时加类似题解的小注，这种小注，今通称为本注或原注（实际也只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有注），注中说到“省”、“出”、“入”的处所凡十，为便说明，移录如下：

书：入刘向《稽疑》一篇（新入）。

礼：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从《兵权谋》出而入此）。

乐：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春秋：省《太史公》四篇。

论语：出孔子壁中两《子张》。

小学：入扬雄、杜林二家三篇（新入）。

其《六艺略序》原注云：“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儒家：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新入）。

其《诸子略序》原注云：“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按从此出而入《兵技巧》）。

赋：入扬雄八篇（新入）。

其《诗赋略序》原注云：“入扬雄八篇。”

《兵权谋》、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

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篇),重,出《司马法》入礼也。

《兵技巧》,省墨子,重,入蹴鞠也。

其《兵书略序》原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

什么叫做“省”、“出”、“入”呢?由于历代辗转钞、刻关系,《艺文志》中各家分记的篇数与部类总记的篇数,两下已经不相符合,也就不易找到区别。颜师古在“凡书九家”下注云:“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解说不全面。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出,是出之于此而入于彼,多因重复或类别不同而有所出。入,有新添入的和因重复或类别相同而有所入的两种。省,也有自本书省减一部分和各家原书俱存而仍省其一部分以另归一类的两种。还可以看出:出、入的关系不大,省、入的变动较多,所以,班固在总结六略书的卷数下又注云:“入三家五十篇,省十家。”可见其意之所重了。

第二,作了记佚,辨伪的考查。

经过王莽后期的战乱,图书也难免不遭逢“五厄”而有散失,在有了目录学之后,是不是需要把这笔账记下来呢?郑樵的意见是肯定的:“古人编书,皆记其亡缺。为亡缺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①]可是,首次以目录学的眼光进行这项工作的是班固。由于当时典籍幸不如牛弘所云“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②]的严重,我们在《艺文志》只发现了《史籀十五篇》的问题,其下的注语是:“建武时亡六篇矣。”(原注中“有录无书”问题,另论),但它却符合郑氏“编次必记亡书”的原则。

---

① 《通志》卷二十二《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其一)。

② 《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

在简篇出现了赝品，如果对之不经过一番审订程序，也就不好利用了。刘向领校工作时，已开其端绪，《叙晏子录》云："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而班固在这方面尤为注意，并可看出他的辨伪手法是多方的。一是从时代乖舛上着眼。《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力牧》篇二十二，注用的方法同此)一是从文辞不类上着眼。《大禹》三十七篇注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又《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师旷》六篇，《务成子》十一篇，《天乙》三篇等注用的方法皆同此)一是从内容荒谬上着眼。《黄帝说》四十篇注云："迂诞！依托。"其他大荒谬的或伪迹显然的，就径加贬斥。如《鬻子说》十九篇注云："后世所加。"而《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鬼谷区》三篇，注皆云："黄帝臣，依托也。"[①]都是鲜明的例证。

不惟如此，在《汉书》列传中还可看到类似的表白。《东方朔传赞》云："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也是鲜明的对照。

同时，还可补充一点，《艺文志》著录各家的篇数，并不一定是完全的，《枚乘传》附子皋传："故其赋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在《诗赋略》中所见的就是"枚皋赋百二十篇"，删落了数十篇。《张丞相传》："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历事。"在《诸子略》中

---

① 以上俱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诸子略》、《兵书略》部分。

所见的就只"张苍十六篇",删略了两篇(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艺文志不载。"是未经细检之过)。至此,我们要问一问,用作取舍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且出三例以明。《贾谊传》赞云:"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赞:"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故备论其语。"亦犹是意)《董仲舒传》云:"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晁错传》赞:"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亦犹是意)《司马相如传》云:"相如它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由此可知,班固不但对《汉书》史料抱着"慎核"的态度,而从中也透露了对历史编纂学的识见(不及其识见高低的评论),如果认为后代"文选家"脱胎于此,那就未免小觑其人其事了。

附带,我还想提出《艺文志》与《汉书》史料相关系的另一个问题来讨论。《六艺略》春秋家载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颜注引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而《张汤传》赞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颜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后人习见刘向《别录》之名,又罕闻班固有《目录》之作,面对这两处密切关系到班彪、固父子掌握史料的线索,就让它滑过去了,甚且造成辑佚上的错误。如清,马国翰等于上述韦昭注一条,乍睹《别录》两字,即贸然断归刘向,而抹去"在班彪"之文①,即其例。至《班固

① 《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六十四《史编目录类》、《七略》、《别录》。

目录》，据《艺文志》原注内容，已是叙书之体，或更斐然有作，一如郑玄《三礼目录》，尤不必致疑。清人姚振宗精研汉志，既为《条理》，又撰《拾补》，他确信从褚少孙以下诸家是曾续过太史公书的，对班彪来说，是会收集"欲据以作《后传》"的资源，遂谓"叔皮备有诸家之书，合而编之谓之别录"①。还是未达一间，但认识总算接近事实一步。在这儿，我挑出了问题，肯定了《班固目录》，虽于《艺文志》本身没添入些什么新的东西，但联系《汉书》对史料"慎核"的努力与成功或可增加些理解与证明。

三 《汉书》的组织系统与纂修过程

就体制来说，纪传体是一部史的全书大共名，而一个完备的纪传体，以《史记》为例，包含有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这五体，又可说是一部史的全书大别名，历代史书，也有不具书（后多改称为"志"）表的，也有不具世家的；但总得有本纪、有列传，如《三国志》即是。《汉书》首先破除了世家一体，应该是班彪作《后传》时就打好了的谱："今此后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②道理很简单，汉开国之初，只立王侯二等封爵，到武帝后元之年，原来"侯者百四十三人"，已搞得"靡有孑遗"，而王国权势又与富室无异，"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③。比起《史记》创制体例如

① 《〈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一《〈六艺略〉拾补》"刘向续太史公书"条。

② 《后汉书》之《班彪传》、《略论》。

③ 《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卷十四《诸侯王表》序；卷三十八《高五王传》赞。

班彪所认识的："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的盛况，真同霄壤之别，更不用提"兴师不请天子，政由五伯"①的先秦诸侯了。至班固心中的世家又是怎样的呢？我且先揭举《汉书》中几处带着世家字面的例句："汉兴，立都长安，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路温舒辞顺而意荐，遂为世家"。"如陈咸、朱博、萧育、逢信、孙闳之属，皆京师世家"。凡此，都是指"齐诸田、楚屈昭景及诸功臣"因迁徙或住家于长陵的，"子孙皆至牧守大官"的，及"以材能少历牧守卿相、知名当世"的。如路温舒不过是一个临淮太守，压根儿没封侯②，这类变种的世家，哪好特立一种传体来安置他们呢。所以，《汉书》的组织系统是"春秋考纪（本纪）、表、志、传"③，虽受先人启发，倒是切合实际。

在纪传部分，新立了武帝以后六世的诸帝本纪和群臣列传，连通改作的，共成十二帝纪，七十列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适当地利用了合传形式，收到了行简、知类的成功。如魏豹、田儋、韩信以"皆故六国之人"而合传；同于本例的，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皆以"武帝时丞相御史大夫"而合传，隽、疏、于、薛、平、彭、皆以"宣、元以来名公卿"而合传。又如张苍、周昌至申屠嘉等以"诸为御史大夫者"而合传；同于本例的，有公孙弘、卜式、兒宽的合传。至季布、栾布、田叔则以"皆有侠烈之行，又皆初罪而后见赦者"，故合传。杨、胡、朱、梅、云则以"狂狷"闻，故合传。傅、常、郑、甘、陈、段则以"皆经营

①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②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后序；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及"赞"；卷八十四《翟方进传》。

③ 《汉书》卷一百下《叙传》。

西域者”，故合传。睦、两夏侯、京翼、李则以“皆通术数说灾异者”，故合传。谷永、杜邺则以“皆有文学，同附王氏”，故合传。荆、燕、吴则以“宗族诸王”，故合传。王商、史丹、傅喜则以“皆外戚之贤者，故不入外戚传而特传之”，亦是合传。[①] 明白这个道理，就可顺恉推求到许多特殊事例，如“外戚之贤者”既可特传，则成就“王莽之兴”的孝元皇后既不与汉兴以来的“外戚后庭”同传而又不次本纪，自是计虑已熟的，张衡条上班固所叙“不合者”，乃有“宜为《元后本纪》”之议[②]，不能不说是孟浪！类传虽较《史记》少掉《刺客》、《滑稽》、《日者》、《龟策》，但其中属于汉时人物原只寥寥一、二人，东方朔单独为传，而以“其滑稽之雄乎”见意，还是填补起来了。何况，由类聚相同的（如部分的合传）即可悟类传之理，故《后汉书》本“狂狷”以立“独行”，因“近世之逸民”[③]而成传目，数量虽减于旧，功能无改于初，似不得以此讥弹班氏。至附传之设，实缘传主事迹无多，乃寄托他传以显，有洁笔省文的作用，班固书中亦多具有，故如汉代丞相位尊[④]，例当立传；但“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彊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功名著于

① 分见《〈汉书〉窥管》中。《汉书》中合传当不止此，合传之故亦未必仅此，录举杨书十二例，以供参考。

② 《后汉书》卷八十九《张衡传》。

③ 按，逸民之称，数见《论语》：“逸民伯夷、叔齐。”（《微子篇》）“举逸民”（《尧曰篇》）皆是。《汉书》汇集商雒四皓，谷口郑子真，蜀严君平，而为之序曰：“皆未尝仕，近古之逸民也。”实开史传重逸民之先声。范蔚宗书有《逸民传》，当本此。至《独行传》，《〈汉书〉窥管》于《杨胡朱梅云传》下云：“此以狂狷诸人合传，范蔚宗有《独行传》，本此也。”亦是。

④ 《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传》：“（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挠。”

世者”。仅叙此数语于《申屠嘉传》末。杨树达先生云：“诸人无可特记，故附书之，此古史省约之法。《公孙弘传》亦附书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固、石庆、公孙贺、刘屈氂六人，与此传可互参考；《王贡两龚鲍传》附书纪逡、王思、薛方诸人例亦同。”[①]而《卫青霍去病传》附同征诸将竟至十人之多，不禁使人发“伙颐”的惊叹，然而这还不算《汉书》的特点，也就从略了。

在表、志部分，《汉书》不同于《史记》的，是取消了无与汉事的《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又纳《秦楚之际月表》的重要事项于《异姓诸侯王表》中，而新立了《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合并了《礼书》、《乐书》、《律书》、《历书》而为《礼乐志》、《律历志》；又易《平准》为《食货》，《封禅》为《郊祀》，《天官》为《天文》，《河渠》为《沟洫》；又纳《律书》的一部分于《刑法志》，《货殖传》的一部分于《地理志》；并新立了《五行志》和《艺文志》：共成八表十志[②]。我们认为，表、志是最好的寓繁于简的方式，而志还可说就是事的类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个新立的如《古今人表》、《地理志》等。唐、宋评史诸家于此是各尊己见，坚持异议的，刘知幾甚不以表为然，不仅认为“列之以表，成其烦

---

① 《〈汉书〉窥管》，第261页。又第433页，于《傅常郑甘陈段传》之出“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亦云：“此班书附著之例。”今按“附传”与“附出”不同，当分别观之。

② 《史通》卷三《书志篇》：“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于其编目，则有前曰《平准》；后云《食货》，古号《河渠》，今称《沟洫》；其归一揆也。若乃《五行》、《艺文》，班补子长之阙……”按，《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谓《汉书》“惟外戚恩泽侯表，《史记》所无，又增《百官卿表》，最为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汉人，何烦胪列？”又谓“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今于诸家之说略有异同，亦缘《汉书》实际如是，非苟异前人。

费”，并且重申把它搁置在本纪于世家中间，也是白搭的论调：“语其无用，可胜道哉”①。这明明是兼点到《史记》的缺失；可是，郑樵却以为“《史记》一书，功在十表”②。当然，郑樵是一般地赞成表、志的形式③，但他又不满意班固，因此，他们两人还是一致地谴责了《古今人表》：“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往往出固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④我们知道：刘氏是主断不主通，郑氏是主通不主断，人表呢，恰巧是介乎二者之间——断代为书中而以通古今为名的。在这点上，形成了各执一端的相反的人，发出相同的议论，倒真是“异哉”。现在回过头来研究一下这个为众不容的表吧，于是有两个问题要求回答：《古今人表》，古而不今怎么办？评而不当又怎么办？对此有研究专家说的：“始三皇以迄嬴秦，圣仁智愚，不胜指数，马迁既未能尽录，班氏广征典籍，搜列将及二千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恶，准古鉴今，非苟作者。”又说：“钱宫詹（大昕）尝谓余云：此表用章儒学，有功名教，观其尊仲尼于上圣，颜、闵、思、孟、于大贤，弟子居上等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刘诸家咸置中等……（实具特识）余甚服膺斯语。”⑤还是没抓住要旨，回答问

① 《史通》卷三《表历》篇。

②③④ 《通志·总序》。序云：“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纪传）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按，《通志》一书，功在二十略，郑氏盖亦借此宣扬“自有所得”之意。余见《史通·表历篇》。

⑤ 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序》。序云：前哲每议此表为妄作，如《史通》，《表历》，《品藻》诸篇；宋、郑樵《通志序》；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十；罗泌《路史后记》十四；王观国《学林》三；明、杨慎《升庵集·人表论》：“皆竞相弹射，少所推嘉。”今按班氏《古今人表》此处于孔老两派升降在手，正说明其尊儒黜道的主张。

题（当然，在保存佚文上，是对的）。我们认为：第一，人表不是完全不及今人的，那些"事起秦余，身终汉始"的，如秦二世胡亥、秦子婴、赵高、李斯、阎乐、陈胜、吴广、孔鲋、孔襄、项梁、项羽、董翳、司马欣等等，难道不是今人反是古人吗？至于正广的汉代衣冠，已编纪传，多有品题[①]，本来是"用相考核，居然可知"的，何须"重列于表"[②]！第二，评议失当，是间或有的，因为其中总不免带点主观成分，总难免夹杂些恩怨关系。加之崇儒黜道，进孔抑老，又是他家编纂汉史的宗旨之一，不能拿"定以三科（上中下三等），区分尚易；别以九品（每等又分上中下），确当为难"[③]来寻解脱。陈垣先生曾对之做过原情略迹的判断说：借此可窥汉代所以品第人物的标准，借此可见于不能分年论月中而列表的苦心。谨记存，以供参详。《汉书》的志，还应该说曾获得文家史家的佳评："其十志该富，信有遗味。"[④]但《地理志》全录《禹贡》，《艺文志》一本《七略》，《五行志》杂采董仲舒、刘向父子互异之语而无折衷，也曾引起后人的抨击。我想，《禹贡》既编之于经（《尚书》），又载之于史（《夏本纪》），在汉末尊经信古以为用的风气下，全录一篇最早最系统的讲述经济区域的东西于地志是可以的。元帝时，贾捐之《弃珠崖议》就提到"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⑤]。它是何等受人重视！其他，虽不是"往往出固胸中"，但一想念到古人"言公"之义，也就豁然了。

---

①② 按，历代史家多以一人之贤否，一事之得失，皆寓于纪传中，不别为论以亦褒贬。其例甚多，《〈汉书〉窥管》，第438页于此已有论列，不复赘。余亦见《史通》、《表历篇》。

③ 《〈古今人表〉考·序》。

④ 刘勰：《文心雕龙》卷四《史传篇》。

⑤ 《汉书》卷六十四下《贾捐之传》。

我是不赞同把史的体制增分为七的,[①]因为除纪、传、书(志)、表、世家外,论赞本来包容于篇中,它不能格外列为一体,正犹如手足之在人身,也不能说"四体"可离身而成独立的体,是同样的道理。叙例又非史家所特有——如《天下篇》是《庄子》的叙录,《要略》是《淮南子》的叙例;《太史公书》因之有《自序》,班固书因之有《叙传》。而《叙传》的一部分是叙例,一部分又是家传,也不好说另是一体吧。但是,班固在这方面却是有所贡献的,历来,只有"君子曰"(《左传》),"太史公曰"(《史记》),到他父亲手里,还是保持着旧时风格——"司徒掾班彪曰";而《汉书》篇末凡班固之辞皆改称"赞曰",我们应当承认它是一个发展,一个进步,往后所谓正史中史官抒议就少有"自显姓名"而毕竟"总归论赞"[②]了。

最后,当略及关于《汉书》编纂经过。班固生卒年岁,成书年岁,倒不象司马迁《史记》那样成问题,但要想弄得一清二楚,却也并非易事。如固死窦宪之狱,时年六十一。宪被诛,在永元四年,逆推固生当在建武八年。但《叙传》自称"有子曰固,弱冠而孤"。而其父彪以建武三十年卒官,则固生又当在建武十年;于是,我们只好认为弱冠是举成数,而以八年为定[③]。又如固受诏终成所著

①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上编,第58页,《史部流别论》注3云:"中国正史之体制有七:(一)本纪;(二)年表;(三)书志;(四)世家;(五)列传;(六)论赞;(七)叙例。"

② 《史通》卷四《论赞》篇。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出《荆轲论》五篇,而《文心雕龙》卷二,《颂赞》篇云:"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似以赞肇端于相如。然孟坚变化之而成定式,以入史传,何可湮没!

③ 《后汉书·班彪传》;《汉书·叙传》(下)。按范书,于其本传又云:"永平初,时固始弱冠。"上距建武三十年,还有三年。

书,"自永平始,研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其书乃成"。而徐松据固弟超于永平五年诣阙上书,以明固"系京兆狱"之无辜;获释后,除兰台令史,遂以是年为始修书之年。而齐召南据刘之遴所谓《汉书》古本上书年月有"永平十六年",遂以是年为始修书之年。于是,我们也只好在这两者的大概年数内推求一个比较合理的年为定①。班固《叙传》述其书内容,篇目极为详备,而且,建初(76—83)"其书乃成"之年,距永元"遂死狱中"之年(89—92),至少还约有十年上下,不会留个"杀青无日"的憾事。我们假定《汉书》第一次完成本是建初本。但自晋、袁宏以往,莫不言其表、志部分有缺,我们且先摆几条重要材料再分析。袁宏在顺帝永和五年的记载说:"班固著《汉书》,缺其七(当为八)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马)续尽踵而成之。"范晔于其本传不及此事,乃于其妹《曹世叔妻传》(班昭)内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及邓太后临朝,《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梁、刘昭亦云:"续志、昭表,以助其间。"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袁纪里有马续无班昭,范书里有班昭而马续在《汉书》始出之后,这就需要把几个有关的人物联起来看才能明白。邓太后是"(和帝)永元八年冬,入掖庭为贵人"。"太后自入掖庭,从曹大家受经书"。"元兴元年,(和)帝崩,太后临

---

① 《后汉书》卷十三,孝和皇帝永元四年纪。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补曰:"孟坚生于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诣校书郎,修《汉书》。"余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叙传》下引齐召南曰。

② 袁宏:《后汉纪》卷十九,孝顺皇帝永和五年纪。《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四《列女传·曹世叔妻》。梁、刘昭《注补续汉书八志序》。

朝”。而马融是“(安帝、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时,邓太后临朝。……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①。可知和帝永元八年稍前,班昭已入东观续书,永初四年后,马融亦入东观,才有“受读”的机会。这时,邓太后临朝已五年,《汉书》新出世(公布),我们假定第二次完成本是永初本。永初后一年多工夫,邓太后便死了,她在死前,还为多年的老师“年七十余卒”的班昭“素服举哀”②。自此至顺帝永和五年,整整二十年,当然没有班昭,而这位以“博观群籍,善《九章算术》”的马续出来续成《天文志》③,也是可能的,我们假定第三次完成本是永和本。刘昭生在梁朝,大概还能了解这种编纂经过,他看到袁纪,《天文志》由“有录无书”到有录有书,当然是马续办的事,剩下了八表由“未及竟”而已竟,当然是班昭办的事,所以说出“马志、昭表”的话。到唐代,就有点搞不清了,《隋志》称十志续成于曹大家,《史通》谓八表踵成于马续④。到宋代,高似孙又混同而言班昭与东观诸儒校辑补成⑤,而晁志及陈氏解题还是附和范书⑥,没有新见,我意以

---

① 《后汉书》卷十上《和熹邓皇后纪》;卷九十上《马融传》。

② 《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四《列女传·曹世叔妻》。

③ 《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附子严传,内出马续事。

④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史部”序云:“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后,始命曹大家续成之。”《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云:“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时曹大姑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其八志及《天文志》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⑤ 高似孙《史略》卷二,《汉书》:“固卒,书颇散亡,章帝(按当云和帝)诏其妹昭与诸儒校辑于东观,八表,《天文志》是其补成。”

⑥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前汉书”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汉书”条。

为今传《汉书》百篇，不显众手杂糅之迹，而昔时“许班之贵”也未必因固一人之败而骤枯落，正恐书的散乱不如是之甚。梁玉绳以《人表》“科段并出固手，昭特复更缀辑尔”[①]。所谓“未及竟”的八表一志，似亦可由此类推而得其真相，然亦可见《汉书》的编纂虽经班固力成其事而亦有其复杂过程。

史料与史学是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上面，只就《汉书》的体制、例目、史料等方面，就若干问题提出了些不成熟的见解，以说明《汉书》撰修的特点和史料的镕裁在史学上的成功所在，并略及《汉书》的编纂过程，其他方面还是来不及详论。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今选自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上），第271—2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 《〈古今人表〉考·序》。

班固的庸俗思想及其人文思想

侯外庐

在理解班固的思想之前,我们先理解一下班氏的家世。兹据《汉书》卷一百《叙传》及《后汉书》卷七十《班彪传》所载,分述如下:

(一)按班氏得姓,始于秦之灭楚。班固的七世祖班壹及六世祖班孺,当秦末汉初之际,均为著名的边地豪强:"始皇之末,班壹避坠(地)于楼烦,至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壹生孺,孺为任侠,州郡歌之。"

(二)从五世祖班长起,班氏即由富而贵,从豪强变成了官吏:"孺生长,官至上谷守。长生回,以茂材为长子令。"

(三)从曾祖班况起,班氏大富大贵,以农村的豪强进入了庙堂。"回生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女为倢伃,致仕就第,赀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

(四)从祖父班穉起,班氏一门,才人辈出,对正宗思想的生产上及对农民战争的镇压上,均有大功,"况生三子:伯、斿、穉","王莽少与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穉","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女宠至极,不可

尚矣”。更分别言之：

大伯祖班伯，少受《诗》于师丹，成帝召见于晏昵殿，班伯“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诏受《尚书》、《论语》于郑宽中张禹，“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迁奉车都尉”。“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河平中，“定襄大姓石季群辈，报怨杀追捕吏，伯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拜伯为定襄太守”。“伯至，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迎延满堂，日为供具，执子孙礼”。“诸所宾礼皆名豪，怀恩醉酒，共谏伯宜颇摄录盗贼，具言本谋亡匿处”。“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吏，分部收捕，及它隐伏，旬日尽得。郡中震栗，咸称神明”。及“许商师丹为光禄大夫，伯迁水衡都尉，与两师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

二伯祖班斿“博学有俊材”，“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

祖班穉“少为黄门郎中常侍”。“哀帝即位，出穉为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平帝即位，太后临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大司空甄丰“劾闳空造不祥，穉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穉惧，上书陈恩谢罪，愿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郎。太后许焉”。

（五）伯父班嗣，父班彪，俱以学显名当世：“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名当世。”“穉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其门”。然嗣与彪的思想属性，则大异其趣：

1. 伯父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桓生（谭）欲借其书，嗣报曰：‘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絓圣人之罔，不齅骄君

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既系挛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眩耀?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嗣之行己持论如此”。

2. 父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此所谓“圣人之道”,可分两点:其一,在王莽失败,群雄逐鹿之际,从符瑞迷信的宿命论观点,力说刘氏正统不可动摇。他在《王命论》说:“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妊(孕)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压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铁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此种拥汉思想的神学性,初不亚于董仲舒。其二,在儒学正宗时代,据儒家观点攻击司马氏史学思想的异端性。其后附略论(见本传)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采经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见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

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在这里,所谓“条例不经”,只指出了“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至于迁之进孔子而黜墨子,则不在此例;其为正宗观点,其正宗思想之“细意委曲”在乎拥汉,已昭然若揭。而此种史学,正是“班司同异”的核心。

据上可知:两汉的班氏,自始即赋有边疆豪强的传统及正宗的家学渊源。从班壹“以财雄边”,到班伯“家本北边,志节慷慨”,及其定襄太守任中收捕盗贼的“杰作”,再到班超之西域冒险与劫杀,更到作为班固系狱致死主因的“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都是七世祖传的豪强铁证。所谓“固不教学诸子”,则是旧日史家的误断。从班伯的晏昵殿儒教神父式的诵说有法,到班彪的疾恶隗嚣及《王命论》之作,再到班固白虎观集议的“实主其事”,即是正宗的家学承传;从班斿与刘向同校秘书,并“以选受诏,进读群书”,及承“赐以秘书之副”,到班彪“继采前史遗书,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及《后传略论》的对司马氏史学攻击,再到班固的“除兰台令史”,“典校秘书”,与其断代史(《汉书》一百二十卷,起于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的创著,以及班昭的续成工程,则是正宗史学的家传。凡此等等,皆是两汉儒学宗教化,学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学者神父化演进程序上的产物。理解了这些情况,然后始可以理解班固的思想。

据《白虎通义》看来,班固的思想乃是董仲舒神学体系的延长和扩大。关于这一点,另有专章详述,这里从略。

不仅如此，班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也承袭了董仲舒及刘氏父子滥释灾异的附会之法。这在《五行志》里，有明白的证据；其荒唐违谬之处，也经刘知幾驳斥。例如：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归氏薨，昭不戚而大搜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二大夫围郓。"案：大搜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围郓，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载。夫以国家恒事而坐延灾眚，岁月既遥而方闻响（感）应，斯岂非乌有成说，叩寂为辞者哉？此所谓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也。（《史通》卷十九《五行错误》篇）

当春秋之时，诸国贤后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鹢退蜚于宋都，龙交斗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既而古今路阻，闻见壤隔，至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之徒，始别构异闻，辅申他说，以兹后学，陵彼先贤；盖今谚所谓季与厥昆争知嫂讳者也。而班《志》尚舍长用短，损旧习新，苟出异同，自矜魁博，多见其无识者矣。此所谓不循经典自任胸怀也。（同上）

所定各目凡二十种，但其失既众，不可殚论。……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亦有穿凿成交，强生异义。如蜮之为惑；麋之为迷；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征；溃七山者，汉七国之象；叔服会葬，郕伯来奔，亢阳所以成妖；郑易许田，鲁谋莱国，食苗所以为祸。诸如此比，其类弘多，徒有解释，无足观采，知昔君子，幸为详焉。（同上）

倘由此推理,班固应有一套神学的学术思想史论,方见其上下一贯;然而,班固承袭了刘氏父子人文主义的传统。如众所周知,他的《艺文志》完全抄袭了刘氏的《别录》与《七略》,据姚振宗考释,班固对于《别录》与《七略》不过是将作为总最的"辑略"折入"六略"里面;其诸书,除出入省并,皆"六略"所有;其注亦不出《七略》之外。总之,《艺文志》乃《七略》的节本,所谓"《别录》繁矣,《七略》从简;《七略》简矣,班氏裁为《儒林列传》,编为《艺文志》,则简而又简"(《师石山房丛书·〈七略〉佚文·叙》)。

诚然,《白虎通义》是笔录,《艺文志》是抄袭;笔录或抄袭不能与创著同视。然而,从其裁成取舍之际,未尝不可窥得班固思想的大体。事实如前所述,《白虎通义》是神学的,《艺文志》是人文的,二者之间殊无必然性的内在联系,而思想属性上判然两橛的两种文献,皆假班固之手传于后世,其为折衷主义观点,似无可疑。而且此两大文献,所影响于后世学术思想者至深且巨,使我们不得不着重地提出。

班固的史学与司马迁异。例如他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凡此所说,是班固史迁之所以异,也是班彪略论之笔直的学舌。班固依此清规,将陈胜从"世家"里拖出,将项羽从"本纪"里拖出,取"以类相从"之义,而退之于"列传";并在论赞里抄入了贾谊《过秦论》。在《游侠》、《货殖》二传的叙文里,复据"各有等差"的阶级观点,对于司马迁的正义是非,颠之倒之。例如:将司马迁以郭解为"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换书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将司马迁的"仓廪实而

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换书为“四民不得杂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等等。这样，就完成了与《史记》严有区别的“是非不颇缪于圣人”的正宗史学。

但是，纵令如此，班固的史学思想与其天道观念，依然不能结合。例如在《陈胜项羽列传》论赞里，抄完贾谊以“仁义不施”为秦灭亡原因的论断以后，接着又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怨王侯畔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这样承袭《史记》从人为得失方面寻找王朝兴亡的原因，而与《五行志》及《白虎通义》里的神学思想，显属两种，其为折衷主义更为明显。

如果将《汉书》的全部论赞及叙文，加以归类研究，则班固的是非评断，不但自论相违之处甚多，且其思想的支离贫乏而无创见，亦难以为讳。

在这里，我们要问：官学的正宗思想，到了两汉之际，为什么竟转入于折衷主义？为什么像班固这样典型的正宗人物，亦竟如此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从思想家的思维能力优劣来说明。其最大的原因当在于两汉之际的社会危机。西汉自成帝以降，农民战争渐趋高潮，而以王莽时代为最高峰，到了东汉光武末年，方告一阶段。但中古的统治者，经此震撼，虽然“宣布图识于天下”，愈加走上神学迷信一途，但董仲舒以来的一元神学系统之不足以解决问题，则渐唤起学人的注意。从这里，就产生了刘向、歆父子及扬雄的二重真理观。尤其到了班固时代（1—92），桓谭及王充的异端体系正在形成中，他们的怀疑和批判的

光芒，更使正宗思想暗淡无光；因而连白虎观神学集议的主稿人（班固）也失去了对正宗的信心，变成了二重人格的折衷主义者。

（原载《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6章第4节，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今选自《中国史学史资料》第八号，1964年）

班固与《汉书》[1]

冉昭德

一

《汉书》亦称《前汉书》[2],东汉班固(32—92)撰。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出身于世代显贵的家庭,而且家学渊源[3]。父班彪,字叔皮,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是个著名的

---

① 《汉书》的版本、种类繁多。现存重要的版本以北宋景祐本为最古,二十四史百衲本即影印景祐本。明代有嘉靖南监本、汲古阁本。清代有武英殿本。《汉书》多古字古训,在东汉中晚期已有注释。现在可以见到的,有服虔、应劭二家的音义。唐代颜师古采集隋以前二十三家的注释汇成集注,判断前人是非,纠正错误,补充缺遗,贡献是巨大的。清代王先谦又汇集唐以来至清末注释《汉书》的四十余家之说,成为《〈汉书〉补注》,搜罗宏富,详于考证,是现在通行的较好注本。近人杨树达著有《〈汉书〉窥管》,对王氏补注又有补正;陈直著有《〈汉书〉新证》,取证于考古材料,各有参考价值。

② 《汉书》的名称是班固自订的,见《叙传》。《前汉书》之称是对《后汉书》而言。梁元帝《金楼子·聚堂》篇说:"又使孔昂写得《前后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合得六百三十卷。"是为《汉书》加"前"字之始。

③ 班固的祖先,当秦汉之际,原为边地豪强,从五世祖班长起,由富而贵,从豪强变成官吏。曾祖班况的女儿为汉成帝婕妤,家累千金,官至左曹越骑校尉。大伯祖班伯,通晓诗书,为定襄太守。二伯祖班斿与刘向典校秘书,家有赐书(秘书副本)。祖班穉,哀帝时为广平相。正如班固在《幽通赋》中所说:"皇十纪(指成帝)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父彪与从兄嗣游学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

儒学大师。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就是他的学生。他才高学博,专心史籍,著有《〈史记〉后传》百余篇①,为班固写作《汉书》奠定下良好的基础。固九岁能作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读书。他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及长,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读。他熟悉汉代故事,在他父亲直接影响之下,逐渐转向汉史研究,建武三十年(54),班彪死了,他从洛阳还归故乡,时年二十三岁。

班固在家居丧期间,着手整理他父亲的《〈史记〉后传》,叹其"所续前史未详"②,欲竟其业。遂于明帝永平元年(58),"探撰前记,缀集所闻"③,开始编写《汉书》,时年二十七岁。永平五年,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改国史,被捕下京兆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上书,替他辩白,地方官吏把他的书稿送到京师。明帝看过之后,很赏识班固的才学,就召他到京师的校书部,派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代皇家藏书的地方,设令史六人,掌管图籍,校定文书。这时班固和陈宗、尹敏、孟异等共同写成《世祖本纪》。明年,升迁为郎,典校秘书,他又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④奏上。明帝命他在兰台把未完成的《汉书》继续写下去。从此班固集中精力,"以著述为业"⑤,一直坚持到章帝建初七年(82),

---

① 《论衡》卷十三《超奇篇》:"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数十篇。"《史通·古今正史》篇:"作后传六十五篇。"今从《论衡》。

②③ 《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

④ 这28篇列传、载记及《世祖本纪》,都是《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与《汉书》无关。

⑤ 《汉书》卷一百二十《叙传》。

才写成这部著名的《汉书》[1],前后历时二十五年(58—82)。

建初四年(79),章帝在白虎观召集诸儒会议,讨论六经同异,用皇帝名义制成定论,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编成《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以固为中护军,随宪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记汉威德,由班固作铭。永元四年(92),窦宪以外戚专政,图谋叛乱,畏罪自杀。班固因此免官。固家奴曾侮辱洛阳令种竞,及窦宪失败,其宾客皆被逮捕,竞趁此捕系班固,遂死在狱中,时年六十一。固所著诗文,后人辑有《班兰台集》。

二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沿用《史纪》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传,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全书共一百篇,后人分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载汉高帝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三十年的历史。有十二帝纪,是从汉高帝到平帝的编年大事记。有八表,前六表分别谱列王侯世系,《百官公卿表》则记录秦汉官制沿革和汉代公卿大臣的迁免;《古今人表》分为九等,是对汉代以前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十志——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是叙述古代到汉朝的制度、经济、文化史。有七十传,除《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记载汉代边疆各民族的历史及《叙传》外,其余都是西汉人物传记。这四个组成部分的形式尽管不同,但通过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可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实不失为断代史的典范。

① 班固死后,《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写成,和帝命其妹班昭补作,又命马续补作《天文志》。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他是适应时代的要求，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写成《汉书》，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班固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汉前期封建统治相对稳定、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社会生产力由恢复到发展的时期，也是东汉帝国鼎盛时期。东汉王朝为进一步巩固政权，总结前朝的历史经验就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汉书》就是适应这一要求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止于武帝，天汉以后，缺而不录。汉代学者褚少孙、刘向、刘歆父子及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一作殷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都缀集时事，相次续补《史记》，到建武中，班彪以为这些著作不足以踵继前史；扬雄、刘歆等又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任其流传下去。于是慎覈其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百余篇。由此可见，从褚少孙到班彪，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都只是作了《史记》的续编，而不能写成一部汉史。到了班固，东汉王朝已在开始编修国史，同时又需要总结前朝的历史，而且“汉承尧运”、“协于火德”之说，已为统治阶级所公认。如果再依照前人的成规，续编汉史，不但不能宣扬“汉德”，而且也同司马迁把《汉高祖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一样，势必将《世祖本纪》编于王莽之后，置于新市、平林之列，这是当时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在这种形势之下，就要求摆脱旧传统，开创新体裁。《汉书》之所以成为断代史，正符合了这一时代的要求①。

---

① 《太平御览》卷六百三，《史传》上引《后汉书》：“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以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终王莽，为记、表、传、志九十九篇。”按，此《后汉书》作者无考。

班固编写《汉书》,首先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并重视审查资料,辨别真伪。举例来说:《贾谊传》,依据他本人的著述五十八篇,"缀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爰盎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东方朔传》,则详录朔的文辞和著作篇目,由于后世好事者,多"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真伪难辨,因而着重指出:"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律历志》则删去刘歆等所条奏的"伪辞","取正义著于篇"。又如在《张汤传》中说:"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班固这样求实的态度,基本上保证了《汉书》的真实性。

其次,班固善于利用前人研究的成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汉书》武帝以前的记载,大都采用《史记》。但不是照抄原文,而是进行加工整理,创造补充。我们就《史》、《汉》两书比较一下,可以看出班马有许多相异之处。司马迁"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乎情,肆于心而为文"①。班固则以历史学观点写《汉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②。因此他在文学上修正了《史记》的"盈辞"。所以《汉书》尽管采用《史记》,但没有一篇是与《史记》完全相同的。更重要的是班固创立了些纪、表、志、传。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等传,《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都是《史记》所无,《汉书》增立的。《史记》不为张骞立传,事迹附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后,叙述简略,《汉书》特为张骞立专传。但也删去了《仓公传》。此外,班固又增加新材料,补充《史记》的缺遗。在淮南王安、韩信、楚元王、卫青、公孙弘等传中,都有所增补。特别是在帝纪中增载许多重

---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10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② 《史通》卷一,《六家》篇。

要诏令，贾谊、晁错、邹阳、韩安国等传中载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的奏议，全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可见《汉书》一面继承《史记》，一面也有一定的发展和创造。后人批评《汉书》前半部全同《史记》，甚至“专事剽窃”（郑樵语）显然是不正确的。武帝以后的记载，是以班彪的《〈史记〉后传》为蓝本，综合各家续《史记》，缀集所闻写成的。除元、成二帝纪和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用《〈史记〉后传》原文外[①]，其余纪传，大都是班固改写的。我们从“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②]来看，从“以父所撰，未尽一家”[③]来看，可以得到证明。后人指责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傅玄语）；甚至有“盗窃父史”（颜之推语）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第三，《汉书》在编纂形式方面，整齐了纪传体的体例。我们再就《史》、《汉》的篇目比较一下，可以发现许多不同之处。1.《史纪》没有《惠帝本纪》，但在《吕后本纪》中，仍用惠帝纪年。班固特为惠帝立纪，确立了“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④]的义例。2.《史记》的专传或合传与类传的次序间杂，或以时代的先后，或因事迹的相关，而不拘于体例。例如《刺客列传》在专传之间，《汲郑列传》反在类传之间。《匈奴列传》则置于卫将军骠骑之前，《大宛列传》反置在游侠之后。

---

① 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都称“司徒椽班彪曰”，分明是后传的文字。《元帝纪》赞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这里所谓“臣”，即班彪自称，外祖即金敞，婕妤为班婕妤。应劭说：“元成纪皆班彪所作。”

② 《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

③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

④ 《史通》卷二《本纪》篇。

《汉书》则以时代的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次边疆各族传,而以"贼臣"《王莽传》居末,开后世叛逆或贰臣传的先例[①]。3.《史记》列传的篇名,或以姓标,或以名标,或以字标,或以官标,或以爵标[②],虽寓褒贬之义,而体例不统一。《汉书》除诸王传外,概以姓或姓名标题,统一了体例[③]。所以章学诚说:"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④]这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断代史,最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所以后来各个朝代的正史,基本上都是沿袭《汉书》的编纂方法。

三

《汉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和影响,不仅在于编纂体例,它的特点还在于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有着较详尽的记载,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汉书》十志取法《史记》八书,但规模宏大,记事丰富,特别是对汉代的记载较为完备。《食货志》为研究西汉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文献。《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及《百官公卿表》叙文记载中国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法律制度。后来各个封建王朝的制度,不管其组织形式如何,基本上都是这一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沟洫志》系统地叙述秦汉水利建设,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尤为珍贵而有现实意义。《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它不单限

---

① 《汉书》外戚及元后传在王莽之前,此为特例。

② 以字标者如《伍子胥列传》,以官标者如《李将军列传》,以爵标者如《淮阴侯列传》。

③ "万石"(石奋)为《汉书》中的特例。

④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于西汉地理，而且“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在篇末又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及海外交通作了综合的叙述，在今天看来又是一部有关地理的著作，开创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艺文志》采自刘歆《七略》，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和是非得失，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不仅是目录学的开端。《五行志》虽然充满灾异迷信，但也保存下了大量的有关自然灾害、地震和日月蚀的记录，仍为有用的科学史料。《天文志》、《律历志》也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自《史记》创立八书，《汉书》加以发展，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书志体。后世正史的志，大体依据《汉书》十志有所增减。从唐杜佑作《通典》到近人刘锦藻作《续清文献通考》，有所谓“三通”、“九通”、“十通”，尽管它们的分类不同，纪事各有详略，但都是从书志体相继发展而来。我国的典章制度，绝大部分得以保存，《汉书》十志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汉书》的另一特点，是对中国边疆内外各民族的历史有着较详细的叙述。我国自古以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汉代以前的历史著作，虽也记载各族的生活状况，但为国内外少数民族立传，则始于《史记》。班固继承这个优良传统，运用新的史料，把《史记·大宛列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国家的历史，以及汉朝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争夺战争的历史，汉朝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汉书》又将《史记》的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列传，加以补充；尤其是《匈奴传》增补武帝以后大量的史实，使之更加完备。这些记载，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各兄弟民族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东亚、东南亚和中亚有关各国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后代正史中的少数民族传和外国传，大都取法《史》、

《汉》而加以推广。其次，班固对民族关系提出新的看法。他既反对征伐匈奴，也不主张屈辱和亲，并严肃地指出董仲舒“说以厚利，结之于天”的主张，是“务赋敛于民，远行贿赂，割剥百姓，以奉寇雠”。他提出“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①]的政策主张。这一观点，在《匈奴和亲议》和南粤、西域两传中也反映出来。

《汉书》不单是在史学上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文学上也有重要的地位。班固依据实际材料，描写西汉一代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类型人物。运用巧妙的手法，精辟的对话，刻划出人物的性格、面貌，使读者如见其人。例如苏武、霍光、杨恽、赵广汉、张禹、龚遂、严延年、王莽等传都写得生动活泼，表达出人物的个性、感情和动态，确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为后世文学家学习的榜样，范晔在《班固传》里说：“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四

班固的历史观点，就其进步方面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班固批评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②]这段话表明班固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论大道则先六经的观点。但他并不反对诸子学说，以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通万方之略矣”[③]。在《答宾戏》中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赞。

②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

③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也指出："有同有异，圣哲之常。"这又说明班固对事物的看法，不偏执一端，而注意到它的全面。所以他在评论历史人物时，有褒有贬，而不绝对化。他既称赞汉武帝"雄才大略"、"号令文章，焕然可述"[①]，又指出武帝连年发动战争，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②]，对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一面肯定霍光有"匡国家，安社稷"之功，一面又责斥他"不学亡术，闇于大理"[③]，终遭族诛之祸。另外，班固用"时"、"势"或"天时"变异来表达历史是发展的，人们不能扭转历史的车轮。他说汉高祖之所以"由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是由于"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④]。并批判贾谊、司马迁以为"向使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是"不通时变"，不知"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⑤]。而王莽之所以篡汉，是因为"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⑥]。因此，他总结历史上成功的人物是"遇其时"[⑦]，失败的人物是"不知时变"[⑧]，从而提出研究历史要"究其终

---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赞。

② 《汉书》卷七《昭帝纪》赞。

③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赞。

④ 《汉书》卷十三《异姓诸侯王表》序。

⑤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附录。

⑥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赞。

⑦ 《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娄叔孙传》赞；卷五十八《公孙宏卜式儿宽传》赞。

⑧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赞。

始强弱之变"[1],"列其行事,以传世变"[2],要"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3]。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可贵的、进步的。

第二,班固能从人民的利害关系,来衡量政治得失。因而关怀人民的思想,在《汉书》中不断地流露出来。他歌颂"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的汉宣帝。在宣帝时,不但"吏称其职,民安其业"[4],"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5]。而且对经常人侵的匈奴,"权时施宜,复以威德",使"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藜(黎)庶亡干戈之役"[6]。反之,对于汉武帝却批评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7],而不能法"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8]。他歌颂萧、曹为相,"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9]。在《循吏传》中,用"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来表扬文翁、朱邑、召信臣等人;对酷吏张汤则说"汤死而民不思"[10]。《刘屈氂传》叙述汉代人民转车边郡的痛苦。《贾捐之传》描写死亡战士的"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惨景,尤其在《鲍宣传》记载了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奏疏。这说明班固对人民的疾苦是抱有

---

①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
②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③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序。
④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序。
⑤ 《汉书》卷四《宣帝纪》赞。
⑥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赞。
⑦ 《汉书》卷二十二《刑法志》。
⑧ 《汉书》卷六《武帝纪》赞。
⑨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⑩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

同情心的。

第三，班固还能从经济关系来论述历史，他在《食货志》中首先肯定食货为“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如果“上贪”则民怨，必然导致“灾害生而祸乱作”。武帝之所以能开拓疆土，通使西域，是由于“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但因“师旅之费，不可胜计”，于是“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以至“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①。这里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同时也指出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地理志》后序中，论证自古以来各地区的人民生活、风俗习惯、生产情况是受自然条件、民族关系和外来的历史影响等所制约，使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差异。这在对秦、楚等地的叙述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此，我们应当肯定这是《汉书》中进步的一面。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汉书》落后的一面。由于班固过分强调“天时”——客观规律，非人力所致，否定了人的主观作用，使人们等待客观规律的恩赐，而坠入了宿命论的深渊。他虽然批评眭弘、京房、翼奉、李寻等人推阴阳，言灾异，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②。他自己终于不能摆脱阴阳五行学说和他父亲班彪“王命论”的影响。在《汉书》中又出现一系列五德循环论及王权天授、天人相威等等神秘主义的说教。但这种矛盾，是古代历史学家难以避免的。我们莫要忘记，班固撰写《汉书》时，汉光武已“宣布图讳于天下”，而《汉书》又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怎能不记载阴阳五行、谶讳迷信呢？但难得可贵的是

①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

② 《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

班固不为汉讳。如《贾山传》载他的《至言》,揭露号称“文景之治”的弊政。在《外戚传》批判“穷富贵而不以功”的裙带关系。《景十三王传》指出西汉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哀帝纪》、《董仲舒传》叙述名田、限田政策,打击豪强的土地兼并。《儒林传》指明儒学大师多至千余人,都是为了“禄利”;在匡衡、张禹等传中更进一步揭发: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宗居宰相位”的公孙弘、蔡义、韦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孙光、平当、马宫等,都是“服儒衣冠,传先王语”、“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的乡愿。特别是在《陈万年传》中辛辣地讽刺这位大官僚在临死的前夕,谆谆教诫他儿子的只是一个“谞”(谄)字! 这些记载,正是班固继承司马迁在写史态度上“不虚美,不隐恶”的一种自我表现。

总上所述,《汉书》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我国人民的一份珍贵遗产,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它,批判地继承它。

(《历史教学》1962 年第 4 期)

班固的首创精神与进步思想

冉昭德

班固(32—92)是我国公元1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今年是他诞生1930周年,又是他逝世1870周年。仅就班固在《汉书》中所表现的首创精神和进步思想,做些概要的分析,从而阐明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以资纪念。至于《汉书》的评价问题,在拙著《班固与〈汉书〉》(《历史教学》1962年第4期)一文中,已略作探讨,不再论述。

一 班固的首创精神

《汉书》不仅在《史记》的基础上开创纪传体断代史,为后代各王朝的"正史"所取法,尤其可贵的是,班固较之他的先驱者司马迁做出许多新贡献,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史学宝库。从而把中国历史编纂学推向一个新阶段。

《汉书》中的首创精神,表现在几个方面。有如:班固创立《百官公卿表》(卷上)和《刑法志》,比较系统而全面地叙述中国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和法的制度,开创"正史"百官志和刑法志,并为研究中国二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班固创立《地理志》,如实地记载西汉帝国的疆域政区、领土面积,里数及郡县、户口、垦田的数字和各地区的风俗民情。还在各郡县

条下，注明建置沿革，山川方位，水利物产，官府设立的盐铁工官，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城邑乡聚，重要的关塞亭障，著名的庙祠古迹等等，并扼要地记述西汉海外交通的行程。开创"正史"地理志及各种地理学科的研究。班固依据刘歆《七略》，创立《艺文志》，把中国学术源流派别及图书目录，载入史册。不但开创"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有利于学术史和目录学的研究，而且为中国保存下古代的典籍目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本文不拟再多申述，只就《五行志》、《沟洫志》两志，发表一点意见。

班固创立《五行志》，最受后人攻击，说它是集阴阳五行迷信之大成，《汉书》中的糟粕，其荒唐谬误，不值一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

五行学说是和古代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早期科学。从子思、孟子把五行学说唯心化以后，遂变成自然和社会的演变法则。到秦汉时期，五行学说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又成为统治人民思想的武器。班固生于东汉初期，正是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盛行的时代。作为一部官撰的《汉书》，又怎能不记载这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呢？班固之所以志"五行"，从《汉书·叙传》所说"告往知来，王事之表"来看，其目的在于用五行灾异来警告专制帝王的胡作乱为。例如在《五行志》中解说木性云："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返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徭役，以夺民时，作伪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

班固并非五行迷信的说教者，而是持以反对态度。例如《货殖传》删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两段话。又着重指出眭弘、京房等推阴阳，言灾异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

屡中。仲舒下吏，眭孟诛死、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①。又说他们是些“学微术昧，或见仿佛、疑殆匪阙，违众迕世，浅为尤悔，深作敦害”②的人物。由于班固对五行学说没有深入研究，以致记述错误、互相矛盾，诚如刘知幾所指出的。因此，用《五行志》来推论班固的神学思想，是不公平的。

《汉书·五行志》虽然充满着汉儒对灾异迷信的说教，但还保存着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原始形式。它的特点，在于班固分别记录有关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和地震、日食等，保存着珍贵的科学史料。《五行志》的可贵还在于所记自然灾害较之帝纪为详，如记录武帝时发生大旱八次，而《武帝纪》只有五次。又如《成帝纪》记载的一次地震云：“河平三年春二月丙戌，犍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而《五行志》则云“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为拍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壅江水。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地震积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动”。尤其难得可贵的，是班固第一次记载太阳上黑子的出现，为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的记录。以上可以说明，为什么自《汉书》以后，各朝代有“志”的正史，几乎完全效法班固而立《五行志》，并不是偶然的。因此，我们不能单从迷信的角度，来否定《五行志》的创造性和历史意义。

《汉书·五行志》的另一特点，在于班固记载西汉儒家唯心主义的五行说，在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方面的具体运用，反映了许多形形色色思想实际。从《五行志》序文中所说“揽仲舒、别向歆、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来看，可以得到证明。这些记载，正是研究汉代思想史的第一手资料。况且唯心

① 《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② 《汉书》卷一百《叙传》(下)。

主义的五行说，是二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它在中国社会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又怎能单从迷信的观点来看《五行志》，而弃置不顾呢？

其次是《沟洫志》。如所周知，班固是继续并且补充《史记·河渠书》而作《沟洫志》。但二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司马迁之所以写《河渠书》，一则曰："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作《河渠书》"①，再则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河。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洛、漯各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以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②。可见司马迁是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并亲自负薪塞决河之后，认识到水之利害，而作《河渠书》。班固自述其作《沟洫志》云："夏乘四载，百川是导，惟河为限，灾及后代。商竭周移，秦决南涯，自兹距汉，北亡八支。文陻枣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后遂滂沱。爰及沟渠，利我国家。"③又云："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④这说明班固以黄河为主题而作《沟洫志》。所以他用大量篇幅叙述汉代治河的历史，并记载从武帝时齐人延年到新朝王横（《儒林传》作王横）等十余人的治河方案，其中尤以贾让的《治河三策》最为名贵而有现实意义。因此，《汉书·沟洫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治河经验的总结，是一种创举，我们应当肯定它的历史意义，而予以新的评价。

---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③ 《汉书》卷一百《叙传》（下）。

④ 《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

班固所以重视黄河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西汉一代的河患最为严重。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河决酸枣,到王莽始建国三年(11)河决魏郡,一百八十年间,黄河决溢了十次之多①,造成严重的损失。单从元帝建昭三年(前36),河决馆陶及东郡金堤来看,就泛滥四郡三十二县,浸淹良田十五万余顷,冲毁官亭民舍四万所。政府发动五百艘船只抢救被水围困的灾民九万七千余人②。可见在公元前古代中国屡次发生这样的灾情,问题是何等严重!因此,不能不引起总结西汉历史的班固重视黄河问题。另一方面,当班固在东观写《汉书》时,汴渠决坏已六十多年,河汴合流,兖豫一带,多被水患。由于广大人民再三的呼吁,汉明帝于永平十二年(69),才征发士卒数十万,在著名水利工程师王景、王吴的主持下,按着王莽以来的决河经验,从荥阳到千乘海口千余里,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程。第二年,全部工程告竣,施工费用以百亿计,从此河汴分流,复其旧迹,人民获得安居。渠成之后,明帝又亲自巡行视察,诏令滨河郡国,设置河堤官员,如西京旧制,这一项伟大的也可以说是空前的治河工程,对于史官班固来说,又是何等重大事件,自然使他感受到关系国之利害的治河问题,有载入史册的必要,因而就继《河渠书》之后,写下中国第一部治河史。

二　班固的进步思想

班固不只是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表现了首创精神,而且在总

---

① 参见《汉书》之《沟洫志》、《文帝纪》、《武帝纪》、《成帝纪》、《王莽传》。

② 参见《汉书·沟洫志》。

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发扬了儒家“民为邦本”的进步思想。所以《汉书》虽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但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班固首先肯定人是“有生之最灵者”。人之所以为贵，由于“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羽毛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的形成，便产生了所谓“君”、“王”。他说人“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悦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能“明仁爱德让”，才是“王道之本”[①]。这些论点，基本上依据荀子的学说，明确了儒家所歌颂的“王道”，是以人民为基础的。

其次，班固又指出先王之制，“教民树种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龟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死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然后才能“蕃阜庶物，穑足功用”[②]。明确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所谓“先王”，不过只是“教民”而已。

由上所述，可见班固对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一定的认识。

历史证明，秦汉以来，土地与流民问题，一直成为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由于货币商品关系的发展，土地集中，政府对小生产者的超经济强制，使广大农民破产。只是因为农民占有小块土地，必须为政府“服兵役，由此在劳动条件的再生产上，阻碍他们，使

①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②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他们贫穷化”[①]。因而抛弃土地,流离载道。他们为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而汇合为起义军。强盛的秦王朝在人民“离散逋逃”、“群盗满山”、“一夫大呼,天下响应”[②]的农民战争中,迅速地倒下去了。在西汉王朝长期统治下,造成“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③]的严重局面,激起各地区的农民起义。在农民军的扫荡下,强大的西汉帝国将要倒下去。王莽新朝在由流民组成的绿林、赤眉、铜马等革命军冲击下结束了。班固世代居住的扶风家园,也被这次农民起义军焚毁了。东汉统治者夺取农民革命果实之后,虽然实行了一系列的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如解放奴婢,劝督农桑,减轻赋税,以公田赋予贫民、流民,自报户籍者赐爵一级等等,但流民问题依然严重地存在着[④],由此可见,流民所举行的多次起义,不但打击并推翻前朝的统治,而且又成为东汉政府的重大问题。在这种形势下,班固认识到“民为邦本”的现实意义,从而提出食货“为生民之本”、“理民之道,地著为本”[⑤]的政治主张。并把这一主张贯彻到许多方面,反映了班固的富民思想。

《汉书·食货志》就带有浓厚的富民思想色彩。班固既明确食货与土地是生民之本,又着重指出:“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第778页。

② 《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

③ 《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

④ 例如光武帝建武十二年,“米谷荒贵,民或流散”(《续汉书·天文志》)。明帝永平十二年诏:“田荒不耕、游食者众。”(《后汉书·明帝纪》)。章帝建初三年诏:“此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后汉书·章帝纪》)。

⑤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

而教化成。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贾谊、晁错的上书,务在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而后"可以为富安天下","则民富乐矣"。董仲舒、师丹的名田限田政策,在于打击贵族豪强的土地兼并。王莽之所以垮台,由于"富者不能自保,贫者不能自存",所以班固称赞吕后虽以女主临朝,"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①;文景之治,所以能比隆成康,由于"海内殷富","民用宁康"②,肯曹为相,"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③;霍光秉政,"轻繇薄赋,与民休息……百姓益富"④。班固歌颂"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而能使"吏称其职,民安其业"⑤的汉宣帝;表扬"所居民富,所去民思"⑥的循吏。另一方面,班固批判汉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断击"⑦,致使天下户口减半。并反对那些盘剥细民,强占民田,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利,锢齐民之业的贵族、豪强、富商大贾。类此事例,在《汉书》中多不胜举,都是班固富民思想的具体表现。

富民之道,首先要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生产。班固在这方面也表现了非战思想。

农民之所以不能"地著",固然由于土地兼并、赋税繁重等等因素,使农民破产;失去本业的另一原因,就是无休止的战

---

① 《汉书》卷三《高后纪》。
② 《汉书》卷四《文帝纪》;卷十《叙传》(下)。
③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④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⑤ 《汉书》卷八《宣帝纪》;卷八十九《循吏传》。
⑥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⑦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争。因此，班固对统治者发动的战争，抱着反对态度。他既批评汉武帝长期的对外战争，给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又强调“兵家之策，唯在不战”[①]。“兵犹火也，弗戢必自焚（引用《左传·隐公四年》仲众语），是以仓颉作书，止戈为武”[②]，甚至认为汉武帝和戾太子所以两败俱伤，因为太子生于战乱之中，正当武帝命将出征之时，“师行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及巫蛊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③]这虽是一种迷信的说教，但也反映了班固的非战思想。特别是班固在非战思想指导下，批判汉帝国侵略少数民族的战争政策，而主张“招携以礼，怀远以德”[④]的对外关系。在《匈奴传》中，他总结汉朝对匈奴的政策，不外两科：“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都是偏见一时的利害，而非长远之策。因此，班固既反对征伐，也不主张屈辱和亲，提出“来则征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的对外政策，虽然他晚年参加了窦宪出征匈奴的战役。这种思想在古代中国来说，是可贵的、进步的。

其次，班固对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极为重视，也是富民思想表现的一个方面。如《食货志》叙述李悝尽地力之数、赵过的代田法和耕耘下种的农具，及其推广的情况。在晁错、赵充国、西域等传中记载移民垦荒及西汉屯田的始末。一面称赞

① 《汉书》卷一百《叙传》（下）。

②③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

④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汉宣帝重视生产,"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①],是汉代中兴的一个标志。另一面批判汉武帝"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②]的措施,反对"工作无用之器"[③],揭露各地工官主作的纯是一些无关生产的奢饰品[④],而不重视各地铁官的生产。对农田水利的兴建,班固则尽情歌颂。如《沟洫志》不但叙述治河史,而且补充《河渠书》失载的水利工程家史起,引漳水溉鄴的故事。用人民之歌:"鄴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来表扬史起的政绩,然后起事得以流传。又用同样的方法表述白渠的兴建,赞美号称"召父"、为民开通沟渎、以广溉灌的召信臣,并在《西都赋》中描述关中水利云:"源泉灌注、陂池交属。……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刻镂,原湿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菜。"对于强占陂地田园,横霸颍川的灌夫,则引用童谣:"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⑤]以表达人民的怨恨。丞相翟方进奏罢汝南鸿隙大陂,郡中时常枯旱;及翟氏族灭,乡里追怨方进,也引用童谣"坏坡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身?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⑥],以志惩戒。以上事例,有力地说明班固是怎样的重视农田水利。[⑦] 此外,又在《地理志》中分载各郡县的山川水道,把促进社会生产和为民兴利的人物,如管仲、郑子户、李悝、西门豹等

① 《汉书》卷八《宣帝纪》。
②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
③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④ 《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⑤ 《汉书》卷五十二《灌夫传》。
⑥ 《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
⑦ 按,西门豹引漳水溉鄴事,《汉书·沟洫志》失载。

都予以较高的评价，列于《古今人表》的上等。

当然，由于阶级利益，班固不可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他的一切言论主张，归根结底是为汉朝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关怀人民生活、重视社会生产，也多少体现了人民的要求。

最后，谈谈班固在学术观点上表现的进步性。这大致可概括为三点。

1. 自汉武帝实行学术思想统一，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以来，产生了专以说经而猎取功名禄利的汉儒，形成今古文经学派别。班固虽然出身于太学，并参加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群儒会议，以史官兼任记录，编成钦定的《白虎通德论》。但他却是"所学无常师"，"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①]的史学家，尽管他倾向于古文经学。因此，班固能客观地分析武帝统一学术的失策。他在匡衡、张禹等传中指出："自孝武兴学，公孙宏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籍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是多么辛辣的讽刺！而汉儒传经的流弊，大都是乖离经义，"便辞巧说，破坏形体"，或"随时抑扬，违离道本"，或"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学者之大患也！"[②]班固所称赞的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河间献王刘德，特别叙述他搜求遗书，多与汉朝等，皆古文先秦旧书。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以提倡并保存古文经典。他赞扬以"好学明经"出身，而敢于揭发汉朝弊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下)《班固传》。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六艺序"及"儒家序"。

政的王吉、贡禹、龚胜、鲍宣等人物。举此数例，可见班固对汉代经学的评论，基本上是公平的，正确的。

2.《汉书·楚元王传》赞云“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兄（即荀卿）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这段话说明班固所谓学者是“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的，而不是专守一经，“白首而后能言”的学究，说明著作要“有补于世”，而不是随时抑扬、哗众取宠的胡说。同时也说明班固能重视各家优点，而不死守一家之言。

3. 班固虽然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但他并不反对诸子学说，而且在《艺文志》中比较全面地总评诸子之学云，“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的时代，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希望实现自己的主张。他们的言论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但“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然后提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些论点，不但是正确的，而且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色彩，与他在《答宾戏》中所说：“一阴一阳，天地之方；乃文乃武，王道之纲；有同有异，圣哲之常。”是一致的。

总上所述，可见班固不仅在史学上有着巨大贡献，而且他的思想是进步的，而不是落后的，是开明的，而不是庸俗的。

1962 年 11 月 15 日

（原载《西北大学二十三届校庆学术论文集》历史分册，
今选自《中国史学史资料》第 8 号[1964 年 6 月]）

《汉书》的博洽[①]

白寿彝

一　两汉之际的史学

自司马迁《史记》成书以后，约一百七八十年，班固写成了《汉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二部巨著。

《史记》的创造性的工作曾吸引了这一百七八十年间的历史学者，成为模仿、学习的榜样。宣帝时，《史记》经司马迁外孙杨恽的祖述，得以宣布于世。元、成之间，褚少孙为《史记》作了一些续补。后来，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史记》。东汉初年，班彪不满意《史记》的这些续作，"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②]。班固是班彪的儿子，他的《汉书》是在这些已有的基础上，断代为史，写出了起于汉高祖、终于王莽的二百三十年间的史事。他的工作代替了各家续补的《史记》，得以单独地流传下来。后人曾经长时期地以《汉书》与《史记》并称，作为纪

---

① 本文节选自作者所撰《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4期)中第6—8节。题目是编者加的。

② 《史通·古今正史》。

传体史书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百七十八十年间的时代特点。第一，是阶级矛盾的尖锐。继武帝晚年南阳、齐、燕各地暴动之后，成帝时有颍川、山阳铁官徒的起义，广汉郑躬、尉氏樊并的起义，王莽称帝后有绿林、赤眉的大起义。那次大起义，首尾约十年（17—27），在规模的壮大上，在历时的长久上都超过了秦末的大起义。第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帝室和外戚间的矛盾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自成帝时王氏当权，发展到王莽称帝，而达于极点。第三，是皇家对学术思想控制的加强。继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公元前51年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宣帝亲临决断；公元79年白虎观讲五经同异，章帝亲称制临决；其间又有公元56年光武帝之宣布图谶于天下。这些时代的特点不能不在当时的史学上加了烙印。《史记》的体例和司马迁的史学才能虽受到推重，《史记》的进步的历史观点却决不会在正宗学者或正宗思想中得到地位。扬雄称《史记》为"实录"[1]，但讥其"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2]。班彪称《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但大大地反对了它的论议，说是"浅而不笃"，"大敝伤道"，其罪状是"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3]。班固略同于班彪的看法，而措词少有不同。明帝也曾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言，扬名后世"，但因《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就断定司马迁"非谊

① 《法言·重黎》。
② 《汉书·扬雄传》。
③ 《后汉书·班彪传》。

士也！”①从这些抑扬之词来看，两汉之际的史学是为阴阳学说和儒家伦理思想混合起来的正宗观点所支配的，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正宗史学形成的过程。正宗学者继承了司马迁的技术的方面而阉割了他思想上的精华。

两汉之际的学者如刘向，向子歆和班彪的思想，都是折衷主义的②。刘向、歆父子各著书论《洪范五行传》，“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是以天人感应的神学说历史③。但他们考镜学术源流，就脱离了神学的支配。班彪著《王命论》④，旨在申明汉承尧祚，有灵命之符，“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但同时又以汉所以成帝业，归功于刘邦之大略，说他能使“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智力在这里便又起很大的作用了。班固继承了班彪的看法，力图使折衷主义能更好地为皇家的封建统治服务。

扬雄（前52—18）字子云，成都人，有无神论的倾向。他认为“神怪茫茫，若存若亡”；仙人号称永生，“名生而实死”；天“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力而给诸”。他论秦亡六国，由于天时、地利、人事的具备。论项羽之灭，也是反对项羽“此天亡我”之说，而归结为“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⑤。但他著《太玄》，却又捡起了阴阳学家历数之说，用神秘的数字去陈说宇宙的构成，把人们的富贵贫贱祸福和思维活动都用一定的数字去安排

① 《文选》卷四十八，班固《典引·序》。

② 以下关于折衷主义多参用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说，见该书第2卷第6章，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③ 参见《汉书·楚元王传》附传，又《五行志》。

④ 参见《汉书·叙传》。

⑤ 《法言·重黎》，《君子》，《问道》。

起来。实际上这就把数当作宇宙和人类社会的主宰了，这仍是一种神学的形式。扬雄是统治阶级内部被放置在闲散角落的人。他不满现实，但怯于斗争，在世界观和历史观上摇摆不定。他的无神论倾向在西汉末年阴阳学说盛行的时候是有历史价值的，但他终于堕入了折衷主义。他在晚年献《剧秦美新》，盛陈符命，颂新朝威德。说者以"非本情"[1]为扬雄辩解。但从扬雄的思想特点来说，他写出这样的赋来，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两汉之际正宗史学的建立及折衷主义之作为支配的历史观的出现，这一方面表示正宗思想已在史学领域内建立了阵地，又一方面则表示正宗思想的危机，它在社会矛盾的剧烈冲击下已显露出其内在的贫困而不得不谋求某些合理的因素以增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有如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之为当时正宗思想的对立物一样，折衷主义历史观是作为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之对立物而出现的，这是正宗思想向进步思想反攻的对立物。

两汉之际的史学也有它的新的发展。第一，纪传体逐渐为历史学者所普遍采用。有的学者还试图加以改进。成帝时，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2]，可见这种体裁也为皇家所认可了。明帝诏班固和陈宗、尹敏、孟异共成《世祖本纪》，班固又作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3]，后来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继撰次[4]，称为《汉纪》。纪传体从此成为"国史"的主要体裁。尽管此后纪传史的写作流品不齐，但为各个历史时期史料

① 见《文选》卷四十八，《剧秦美新》李周翰注。
② 《汉书·张汤传》注，引如淳说。
③ 参见《后汉书·班固传》。
④ 参见《隋书·经籍志》。

的保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成帝哀帝时由刘向、刘歆负责进行了大规模的皇家藏书的校订,为史料的考订、书籍的分类和系统地论述学术源流提供了范例。司马迁在《史记》里已开始了论述学术源流的工作,现在是向前发展了。以上主要是属于技术性的发展,但对于史学的发展,在不同条件下是起着不同的作用的。班固作为两汉之际史学的代表者和总结者,在这两点上也体现着《汉书》的成就。

二 刘向、刘歆

两汉之际历史学者的著述多已不传。刘向的著述保留下来的要多一些,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比较大些。在东汉学者眼中,扬雄和刘向都是博学的典范。但扬雄关于历史的著述本来不多,传下来的更少。传世的《太玄》、《法言》虽是他的代表作,却毕竟是他哲学方面的论著,仅只多少包含有一些历史观点。刘向跟他的情况,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是不同的。

刘向(约前79—前7)字子政,初名更生,是汉宗室,父兄相继为阳城侯,家产过百万。他在元帝、成帝时,先后两度拜光禄大夫。他热诚维护汉家的统治,企图削弱外戚的权力,因此下过两次狱,丢过三次官。他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八篇,就是"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均已失传)。他著《洪范五行传论》,是结合当时"灾异",对外戚王氏而发。他著《列女传》,是因为赵皇后、卫婕妤的家人"起微贱,逾礼制",乃"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的故事以成书。他编次《新序》、《说苑》,也是采集前人行事和论议,奏上成帝,以期有益于政治。他的儿子刘歆也是一个博学的人,但在政治上是跟

王莽在一起的。王莽称帝后，刘歆拜国师，封嘉新公，为四辅之一。刘歆别著《洪范五行传论》，并有《三统历谱》，这都是跟刘歆的政治态度相联系的，有一些地方跟刘向的说法很不相同。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正宗的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正宗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倒退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两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①]。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

① 以上刘氏父子生平，略见《汉书·楚元王传》附传。

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①。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②。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刘氏父子作为折衷主义者,当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公元前27年,刘向奉命校书③,把书分成六类,由他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做了这个工作约二十年之久,刘歆在向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书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④。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并称“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

---

① 参见《汉书·楚元王传》附传。

② 班固在《律历志》里没有明文写出这一点来。《王莽传》赞说王莽是“余分闰位”。这是东汉人的说法,应与《三统历谱》的精神不同。

③ 参见《汉书·成帝纪》。

④ 参见《汉书·艺文志》,并参考《隋书·经籍志》。

刘氏父子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书籍为五类。他们把皇家藏书定为六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多篇。他们在总的分类上是按着皇家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的。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上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书籍的具体分类、书籍的保存和检寻上是可以起一定的指导作用的。第二,刘氏父子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做出了评述。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们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像是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氏父子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终始”,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数术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

在技术上,刘氏父子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

看起来,刘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华贵外衣下掩遮

着虚弱的贫困的思想。这是他们父子学风上的特点。班固称赞他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箸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赞语说明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刘氏学风的很好的继承人。

三 班固改《史记》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七世祖壹在楼烦有马牛羊数千群,是秦汉之际的边地豪富。曾祖况以大臣名家的身份占籍长安,女儿是成帝的婕妤。大伯祖伯能说讲《诗》、《书》、《论语》,辨究不同的经说。在任定襄太守的时候,以善于搜捕,使"郡中震栗"。后来官至水衡都尉,成为皇帝亲密的侍从。二伯祖斿,同刘向校书,受到成帝的器重,得到秘书副本的赏赐。当公元前1世纪20年代,班氏同许氏是齐名的外戚,被称为"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父彪,当两汉之际,"家有藏书,内足于财",在上层社会中颇有声誉,"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他续《史记》,但反对司马迁的异端观点,坚持"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的正宗之学[①]。

班固在公元32年出生在这个豪富、外戚身份并有正宗家学传统的人家。明帝时除兰台令史,迁郎官,典校秘书。章帝时,"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他的官职并不高,但以文章写得好,得到皇帝的喜欢。公元79年,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

① 参见《汉书·艺文志》,并《汉书·叙传》。

异。他奉命撰集当时的论议，成《白虎通德论》，或称《白虎通议》。这是皇帝亲临裁决的正宗经学的结集，他担任了主编的角色。公元89年，他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兵匈奴。公元92年，窦宪因罪自杀，他为仇家借机罗织，死于洛阳狱中[①]。

班固写《汉书》，约当于公元1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经历了二十余年。全书记刘邦起义以至王莽的失败，共分纪、表、志、传四个部分。表和《天文志》未及竟而卒，由其妹班昭和扶风马续相继完成的[②]。

《汉书》中有四篇纪、六篇表、三篇书、四十篇传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有的是增补了多少不等的材料，有的是就原有的材料另行编排，有的是就原文作了简单的分合，有的是基本上依原文照录。长期以来，旧史家就《汉书》是否抄袭《史记》而展开了对《汉书》的评论。其实这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汉书》利用了《史记》在体例、史料、写作艺术以及在某些观点上的成就，并且也利用了《史记》的学术威信和社会威信，但却用正宗的观点挤掉了《史记》的进步精髓而加以改写。

第一，《汉书》不是像《史记》那样把汉的建国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虑。它反对这种作法，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把汉的历史地位压低了。它在《叙传》里既特别提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在《高帝纪》还把刘邦的世系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之际，都大体地编排起来，

① 参见《后汉书·班固传》。

② 参见《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

并申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①]，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律历志》依据《三统历谱》，"删其伪辞"，把所谓太昊以至刘秀的世代更替都排列起来，一一注明所值五德之运。这也不过是要证明汉以火德代周之木德，正如帝尧之以火德代替帝喾的木德一样，是按着必然的程序出现的。

《汉书》所表示的五德终始说是属于五行相生说的。这是西汉末年形成的一种说法，跟旧有的五行相胜说不同。按照这种说法，火生土，故王莽自称以土德代替汉的火德；土生金，故公孙述自称以金德代替王莽的土德；刘秀复兴，便要以火德继承西汉的火德。五行相生说，在东汉皇朝来说，是对农民，同时也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表达其封建统治之神学的合法的依据。《汉书·高帝纪》几乎全部因袭《史记·高祖本纪》，但却特别编排了高祖世系和斩蛇的奇迹。当然，这就改变了《史记》的原有精神。但这正是为班固的正宗思想所决定了的，是反映了东汉皇朝的要求的。由于同样理由，《汉书》虽为王莽写了一篇详细的传记，但却特别指出他同秦一样，都是"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蠅声，余分闰位"。如果把《叙传》除外，《高帝纪》和《王莽传》恰好是《汉书》的一首一尾，表明了班固以西汉历史神化东汉皇权的企图。

---

① 赤帝子斩蛇的奇迹，现行本《史记》、《汉书》高祖纪所记同，但这决非《史记》原来所有。因汉火德之说创自西汉末年刘向父子，见于《汉书·郊祀志》赞。从汉初以至司马迁时期只有水德土德二说。《史记》中不会出现了火德的符应。现行本《史记》、《汉书》所记刘邦奇迹数事，都称"高祖"。这在《汉书》来说，前后的称例是一致的。在《史记》来说，前后的称例却是相矛盾的。《史记》记刘邦自起义以至立沛公以前事，都称"刘季"而不称"高祖"。现所记各奇迹，也都属于立沛公以前事，但称"高祖"而不称"刘季"，颇可疑，或也不是原本所有。

《汉书》也称道高祖“明达、好谋、能听”,“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建国后“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运”①,但把这些又归之于“实天生德,聪明神武”②,好像高祖个人的一切作为也都是天意早就规定了的。《汉书》在这里虽把皇权神授的说法说到了家,却不可能把这种说法在别的历史问题上都贯彻下去。如果都贯彻了这个说法,人们就成了天意支配下的傀儡,他们的是非善恶都不必对历史负责了。因此《汉书》在惠帝以下的各帝纪里就把“实天生德”的论点搁起来了,却就各帝的政绩和个人言行评论起来。并且《成帝纪》赞还说到:“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就完全是就历史发展形势来讲的。在这里班固又好像已经忘记了他对高祖所弹的调子。仅仅在帝纪十二篇之间,他的调子就已经是这样的不调和了。这是他的折衷主义的表现,他是看不出他自相矛盾的拼凑的。

第二,《汉书》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天人感应的神秘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作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五行志》是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的。它是《史记》八书所无而班固新创的项目。它在这里集中了董仲舒、夏侯始昌、眭孟、夏侯胜、京房、刘向、刘歆、谷永、李寻等这些阴阳五行学说大师的论述,加上自己的意见,系统地编写起来。在时间上,它包含了对春秋以来直至王莽时期某些史事在灾异上的附会。在内容上,它企图表明水火木金土等自然现象可以反映政治上的得失,貌言视听思的失当也可影响到风雨水旱寒暖蝗灾地震等等。《天文志》有许多内容同于《史记・天官书》而特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汉书・叙传》。

别强调“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并且详记秦楚以来天变对人事的征验，这跟《天官书》主旨在于记天官职守者有很大的分歧。

在纪的部分，《汉书》依《史记》高、吕、文三篇本纪写成《高帝纪》、《惠帝纪》、《高后纪》和《文帝纪》，除了在史事的分合增减上略有不同外，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按年代的顺序分别加上了灾异的记事。

在传的部分，《汉书》依《史记》写公孙弘传，而增以公元前130年贤良对策，这主要是在答复武帝所问天人之道，吉凶之效，“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它把董仲舒从《史记·儒林传》里分离出来，为立专传，而以天人三策占了主要的篇幅。它改《史记·楚元王世家》为《楚元王传》，实际上是以刘向言天变的封事占了大量的篇幅。它新创的传，如《萧望之传》、《翟方进传》、《谷永杜邺传》等，都盛言灾异。《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是专为阴阳五行学者立的合传，赞语中说他们“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这对于他们的本领虽好像不太尊敬，但既能“屡中”，实际上还是在肯定阴阳五行学说之正确性的。

我们知道，《史记》还不能完全摆脱神秘思想的束缚，但它是走向无神论并且已具有无神论思想的。《汉书》就不是能否摆脱的问题，而是抱住有神论，多方宣传有神论，它强调灾异的作用，只不过是要表明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上天的注视，都必然发生相应的影响。这跟《史记》的历史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汉书》以强调封建性代替《史记》的人民性。班固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并没有批评倒了司马迁，反而是显示自己拥护封建的面貌。《史记》本来也尊信《诗》、《书》，“折衷于

夫子”，详于孔子、七十弟子、孟荀等儒家之传记的，但决不同意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且还自命为“一家之言”。《汉书》于《艺文志》也序列诸子，但却是把“艺”置于“文”之首，把诸子诗赋都看作“六经之支与流裔”。《史》、《汉》各有《游侠》、《货殖》二传。《史记·游侠列传》以布衣之侠跟好宾客的贵人、跟恣欲自快的豪暴严格地加以区分，称颂布衣之侠“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行为，以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之虚伪的封建道德相对照。《汉书·游侠传》正相反，是把结宾客、广交游，能形成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叫作游侠，而把孟尝君、淮南王安、魏其侯窦婴、效忠于王莽的楼护和陈遵，再三以报自己私仇著名的原涉，同布衣之侠剧孟、郭解等同列，一律谴责他们“背公死党”，说他们废弃了“守职奉上之义”。《史记·货殖列传》申述财富的不齐决定了人们社会身份的贵贱，并肯定农工商虞治生谋利的活动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从而反对官方的经济垄断。《汉书·货殖传》也与此相反，以封建等级是不可逾越的永恒秩序，说什么“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为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以生产活动归之于圣王之教，说什么“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并且要求当老百姓的要“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史》、《汉》的《游侠》、《货殖》两传，篇名同，篇内的材料也多相同，但精神面貌却完全是两样了。

《汉书》依据《史记》的五十多篇，改写的并不多。如果除去了技术性的修改，改写的就更少了。可是这种不多的改写却突出地体现了《史》、《汉》的对立。这是封建性和人民性之政治倾向性的对立，是有神论、永恒不变和不断变化之历史观的对立。总之，这是异端史学和正宗史学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中国封建时代史学发展中是有深刻意义的；它体现着中国封建时代史学前进

行程中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

四 《汉书》的博洽

《汉书》的正宗史学为后来的封建政权和正宗学者所支持，但它在史学史上的重大影响并不在于它的正宗思想而在于它的博洽。它曾以“博物洽闻”推重司马迁、刘向和扬雄。它在《叙传》里提出了的任务，也是在要求建立正宗史学的同时，要求各方面的淹博贯通。范晔称它“文赡而事详”，颜师古称它“宏赡”，都是从博洽的角度去肯定它的。

《汉书》的博洽，首先在于创立了一个纪传体断代史的规模。在全书百篇中，十二篇记述了高、惠、高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世的大事，作为全书的纲领。在跟《史记》有关的四篇里，有了史事的隐讳，有了灾异和符应的增加，但也有了更详明的年月，有了更多的纲领性。八篇表，有六篇王侯表是分合增减《史记》有关各表而成。《百官公卿表》记秦汉官制和西汉将相大臣的迁免死，《古今人表》分九等谱列远古至秦楚之际的历史人物，都是《汉书》所新创。十篇志，有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郊祀志》是承袭《史记·封禅书》而作，但把原来讽刺世主之作改为祭神求仙的简单记录了，这里还是体现了《史》、《汉》的分歧。《天文志》和《沟洫志》也承袭了《史记》的一些材料而增加了新的内容。其他七篇，虽有篇名同于《史记》或承袭了《史记》的一些材料，但实际上都可说是新创立的。十志和《古今人表》都不限于西汉年代的断限，而《古今人表》却又是专谱汉以前的人物。七十传，有陈胜、项籍、张耳、陈余等秦汉之际的起义人物，有韩信、张良、萧何、晁错等汉家将相名

卿,有荆燕吴楚等同姓王侯,有窦田王史等外戚,还有经师、文学、说士、行人、清节、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妃后嫔御、国内外民族,最后是《王莽传》和《叙传》。除了在《史记》原有基础上写的四十篇外,有三十篇是新创立的。全书具备两汉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共八十余万言。

《汉书》的十志是最足表示其博洽的。这里包含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学问,也包含了可信的和神秘的学问;包含了艺术,也包含了技术。《沟洫志》详于《史记·河渠书》所缺的元鼎六年以后的史事和治河对策,备载了贾让《治河三策》这一重大的治河文献。《食货志》基本上是《汉书》新创立的。它采用了《史记·平准书》的材料而冲淡了《平准书》对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揭露。但另一方面,它系统地记述了宗周以至王莽时期的农政和钱法,反映了这一千多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侧面。《刑法志》是《汉书》完全新创立的,它记述宗周以来至东汉初年军制和刑法的变化。《地理志》和《艺文志》也是《汉书》所创立的。《地理志》记载《禹贡》、《周官》的九州,汉郡县封国建置由来和变革、它们的山川和户口、各地区的风土及海外交通。《艺文志》概括了刘向、刘歆《七略》的成果而有所出入,反映了西汉官府藏书的基本情况,并综述了各个学科和学派的源流和短长。这五个志,对于纪传体史书中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或提供了新的具体内容和新的写法,或创始了一个新的探索的部门,对于后来纪传体史书的书志部分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等书也有很大的影响。而《地理志》在地理沿革的研究上,《艺文志》在目录学的研究上,后来逐渐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汉书》对于国内外民族历史的记载,也是可以表示其淹博的一个部分。它在这方面继承了《史记》的传统而有所发展。它合

并了《史记》的有关列传而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于西南夷传增益了史事几乎一半。它承袭了《史记·匈奴列传》，而增益了史事约五分之三，整齐了自远古以至更始末年匈奴的历史。后来史家相继传述，因而匈奴民族历史在汉文载籍中得以保持首尾相当完整的记载。它又创立了《西域传》，记述了今新疆境内各民族、城邦的风土、户口和道路远近，记述了安息、大月氏、大夏、犁靬、条支等中亚、西南亚国家的历史。无论在国内民族史或中亚、西南亚古民族史的研究上，《西域传》占了重要的文献地位。

《汉书》承袭《史记》的纪传，有时增多了诏疏或论议。如《汉书》所增董仲舒天人三策、公孙弘贤良对策，这可以说是《史记》作者有意地摒而不取。然如《汉书》所增晁错的募民徙塞下疏、韩安国和王恢关于伐匈奴的辩论，这就可能是由于司马迁的疏漏或当时未能见到，因而未入《史记》。《汉书》的正宗思想在《史记》进步思想的照耀下当然是黯然无色的，但在历史文献搜集上，班固有更方便的条件，他记下了更多的、有时是在历史文献上更重要的东西。

《汉书》记载西汉一代的学术，是丰富的。十志中本来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对西汉学术某些方面的总结，而《汉书》在传记中也给西汉学人以相当多的篇幅。它给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扬雄都立了专传。刘向、刘歆的传虽附在《楚元王传》中，篇幅并不算少。《汉书》记载了贾山的《至言》、邹阳的狱中上书、杨王孙的论裸葬、贡禹的奏议和夏侯胜等的论灾异；记载了楚元王、淮南王安和河间献王的学术活动；记载了陆贾、蒯通等的著作；还记载了著名政治人物与学术的关系，如晁错之学申商，韩安国之学韩非，汲黯之好黄老以及韦贤、肖望之、张禹、翟方进等的经学。

《汉书》的博洽还表现在另外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汉书》多古字古义，因而东汉末年以后的所谓《汉书》之学，差不多可以说是《汉书》训诂之学。又一个是《汉书》收载文章诗赋，具备多种文体，富于辞藻，为后来文章家所取资。这就是柳宗元所说：“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之文章盖烂然矣。史臣班孟坚修其书，拔其尤者，充于简册。”[①]这两个方面都不属于史学的范围。第二个方面也只是指《汉书》所收的文章，而不是说《汉书》本身的文学成就。但后人评论《汉书》者往往因这两方面的影响，不适当地抬高《汉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汉书》的博洽，是从具体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说的，也是从它能把后者组成为一部断代史来说的。它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并有利于后人对西汉史的研究，这是可以肯定的。但这种博洽并不能解救它在历史思想上的贫困，也掩盖不了这种贫困。正相反，这种博洽却助长了它的驳杂，成为折衷主义的工具。

上文已说到十志最足以表现《汉书》的博洽，但折衷主义的面貌也在十志里暴露得更显著。《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或把政权的兴替说成是神意规定的历史秩序，或把自然的灾异说成是跟政治的得失有必然的联系。《刑法志》在解释国家政权的形成时，则把它归之于人民群居的需要和对于圣王的归心，这里就没有神意的影子了。《食货志》通过农政叙宗周以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地理志》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说明各地区物产和风俗的特点。《艺文志》总括古今学术的流变。尽管它们也偶尔点缀一两句阴阳五行说的术语，但都是脱离神学的轨道而基本上就具体的现象作了人文主义的解释。这是《汉书》的折衷主义首先

① 《唐柳先生集》卷十九《柳宗直西汉文类序》。

表现为对政治史跟经济史、政治史跟文化史之理解的矛盾，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史现象之间理解的矛盾。

甚至在同一历史问题上，《汉书》也遮盖不了它的折衷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混乱。例如秦楚之亡和汉之兴是一个历史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不同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具体解释，但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基本理解是应该一致的。《汉书》并不能这样作。它在《高帝纪》，采用了刘向的五德相生说，把汉之建国归之于"协于火德"。在《陈胜项籍传》赞，用了贾谊《过秦论》，把秦亡归之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又用了司马迁的说法，把楚亡归之于项羽战略上的错误。在《诸侯王表》序，又用封建论者的说法把秦亡归之于"内亡骨内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像这样地采用众说，博洽是博洽了，但这四个说法之间却无一不矛盾。单独地就一个说法来看，却都还不失为一种看法。但合起来看，就什么问题也都不能说明了。

《汉书》的折衷主义是正宗思想在已经威信衰落时所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它在一开始就表现出生命枯竭的窘态，另一方面它无论如何在混乱的博洽中翻跟头，却万变不离其宗，顽固地抱着拥汉的立场不放。

《汉书》在史学史上的成就，是在思想性和技术性矛盾下的成就，是技术性远远超过于思想性的成就。这种情况还会在以后的中国史学发展中，以新的形式出现的。一向把《史》、《汉》并举，应该说是一种很不相称的并举。它们在体例上虽各有创造性的地位，但就它们的史学的全部成就来说，是属于不同性质的类型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 年第 4 期，第 6—8 节)

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

冉昭德

一

1965年第1期《文史哲》发表了牛致功同志的《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一文，对我评价《班固与〈汉书〉》①的历史观点部分提出批评。我阅读这篇文章以后，得到启发，再检查旧作，发现某些问题的提法不够恰当，个别论点也不正确，从而把班固的史学地位拔高了。例如，我一方面肯定：班固之所以以断代为史，编撰《汉书》，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说"班固能从人民的利害关系，来衡量政治得失"。这是一个矛盾。牛致功同志提出："一个正宗的封建史学家处处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为维护封建政权而斗争。"班固所"关怀的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不是人民的利益"，又"怎能从人民的利害关系来衡量政治得失呢？"这意见是正确的。我诚恳地接受这一批评。又如，班固从"时"、"势"或"天时"的变化出发，提出研究历史要"究其终

① 参见《历史教学》1962年第4期。

始强弱之变”①,要“列其行事,以传世变”②等观点,只能表明班固具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我却当作客观规律来看待,说“班固用‘时’、‘势’或‘天时’变异来表达历史是发展的,人们不能扭转历史的车轮”。又说“由于班固过分强调‘天时’——客观规律,非人力所致,否定了人的主观作用”等等。这样分析和论断显然是不正确的。正如牛致功同志所指出的:“这就无形中把班固现代化了。”

我在论述班固的历史观时,为什么会产生不正确的看法呢?现在检查起来,主要由于没有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的研究。用断章取义的办法,从《汉书》中寻找班固的历史观点,就难免主观性、片面性,从而陷入形而上学。

事实又一次证明:评论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③谁违背了这条原则,谁就要犯错娱。

二

牛致功同志在批评班固的历史观的同时,对班固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一笔抹煞,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呢? 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既要看到班固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又要看到他的缺点和错误,而不

---

①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

②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822页。

能绝对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牛致功同志批评班固的历史观,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有意识地贬低《汉书》的价值,从而否定班固在史学上的贡献和地位。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下面提出几点意见,与牛同志商榷。

班固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不能一笔抹煞的。我们应当承认班固是我国公元1世纪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汉书》不仅在《史记》的基础上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的历史著作,创立纪传体断代史,成为史学名著和优秀的文学传记。更重要的是班固表现了首创精神,较之他的先驱者司马迁做出许多新贡献,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知识,从而把中国历史编纂学推向一个新阶段[①]。范文澜同志说得好:"(班固)博采群书所长,加以精确的考核,首尾洽通,创立断代的新体。《汉书》叙事详备周密,在封建主义的正史体历史书中,《史记》、《汉书》是最成熟的两部巨著,后世用纪传体编写的正史,没有一部能超过它们。孔子、左丘明以后,司马迁、班固应是杰出的历史学者。"又指出"《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②]。

但是,牛致功同志却避开这些不谈,不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按着《汉书》的具体内容,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班固的贡献和缺点,而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全盘否定的态度来批判班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牛致功同志提出三个理由,来否定班固的《汉书》。第一,班固"不择手段制造迎合统治者的理论"。他的"《五行志》为东汉

① 参阅拙文《班固与〈汉书〉》,《历史教学》1962年第4期。

② 《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修订本,第248页。

统治者所提倡的谶纬迷信思想制造了理论根据”。第二，班固“把《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改为《陈胜项籍传》”。第三，班固不同意司马迁所歌颂的“布衣之侠”。“班固这些和司马迁不同的地方”，证明他“只能是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由此出发，牛同志就断定：《汉书》仅有的一点“史料价值”，也“正是超出了班固的主观愿望的客观效果”。

这就是说，班固以奴才观点编撰的《汉书》，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可言。那末，依照牛同志的说法，就把班固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和作为史学名著的《汉书》一笔勾销了，还谈什么批判地继承呢？

我认为牛同志否定班固与《汉书》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是班固不择手段地制造谶纬迷信思想理论根据的说法，不能成立。《五行志》序言说：“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以为《五行志》。可见自董仲舒使经学阴阳五行化以来，西汉中晚期，宣传五行迷信的言论著作，是大量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一部官修的而且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汉书》，怎能不记载当时的客观事实呢？记载前人的“所陈行事”，能说是不择手段的制造么？这种论点不是尊重史实，而是有意歪曲。

班固之所以立《五行志》，从《汉书·叙传》所说“告往知来，王事之表”来看，其目的在于用五行灾异来警告专制君主的胡作乱为。例如《五行志》解说木性云：“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返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傜役，以夺民时，作伪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

不仅如此，班固既没有不择手段制造谶纬迷信，而且持以反

对的态度。依照范文澜同志的分析，班固在经学方面属于古文学家[1]。东汉古文经学的特点是通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之学。班固读经就是不为章句，只求通晓大义，而且“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2]。古文经学的又一特点是反对谶纬。如桓谭、尹敏、王充等。这些反对谶纬的学者，都与班氏有一定学术关系。班固反对谶纬在《汉书》中也表现出来。例如，《货殖传》删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的两段话。又着重指出推阴阳、言灾异的睦弘、京房等都是“学微术昧”、“违众迕世”[3]的人物。又如王莽大力提倡谶纬迷信，利用符命证明自己得天命，应该做皇帝。班固批判王莽说：“昔秦燔诗书以立私义，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4]这里所谓“奸言”主要是指谶纬迷信。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范文澜同志发现古代巫教不能形成汉族的宗教，而外来的宗教也不能生出深根来，“应归功于史官文化”，由于“史官文化与以迷信为重点的宗教，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因而在史官文化的基础上不可能创立宗教”[5]。这个创造性的发现，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初步体会所谓“史官文化”，应当包括自然科学。中国古代史的特点既记录社会历史，又记录自然科学史。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官，如司马迁、班固、张衡等都精通天文学、历数学。他们大都

---

① 参见《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225页。

② 《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

③ 《汉书》卷一百《叙传》(下)。

④ 《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⑤ 参见《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240—241页。

能用科学观点解释自然现象。所以中国正史的著名的书志，就是科学文化史。可是，当史学家解释社会现象时，又往往成为客观唯心主义者。这种矛盾是古代史学家难以避免的。我们从上述班固对谶纬迷信的态度来看，他应当是"史官文化"派的学者，虽然在《汉书》中也有五德循环论和阴德报应等等神秘主义的说教，但不是主流。

牛致功同志否定《汉书》的第二个理由，是班固把《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改为《陈胜项籍传》，贬低了陈、项的历史地位。其实这个说法在史学界早已有人提出过许多次，并非牛同志的发现。我认为持这种论调的同志，只从形式上要求《汉书》应当同《史记》一模一样，而不从内容体例上来评论马、班的得失。我们很难设想作为西汉王朝的断代史，在以皇帝为首的本纪之前，首先编列上《项羽纪》，再说《陈涉世家》改为传，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班固继承他父亲班彪的《〈史记〉后传》的体例，"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①。实际上从景、武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②，名为王国，实同郡县。所以刘知幾在《史通·世家》篇说《汉书》："无复世家，事势当然，非矫枉也。"

问题不在于班固用什么体裁来记述项羽和陈胜，而在于怎样记载，把他们放在什么地位。难道说班固把《陈胜项籍传》放在《汉书》列传之首，又采用《史记》的材料和论点，就是贬低陈、项的历史地位，表明班固是"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而司马迁是"异端"史学家么？班固能把农民起义的领袖贫农陈胜置于西汉王侯

① 《后汉书》卷七十《班彪传》。

②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

将相之前,较之司马迁把"开小差逃跑"的伯夷放在《史记》列传之首,岂不是还高明一点么?"在《古今人表》中,班固是把陈胜、吴广、项羽同秦始皇、李斯等人列为第六(智人)",虽然表现了班固的阶级偏见,但也表明没有把陈、项打入冷宫,列为下愚。

牛致功同志否定《汉书》的第三个理由,不但不能成立,而且是错误的。班固不歌颂"布衣之侠",是完全正确的。西汉游侠虽然同最高统治者有矛盾,但他们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们是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又怎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有些史学家也跟着司马迁歌颂"布衣之侠",那是颂错了。拙文《关于〈史记·游侠列传〉人物的评价问题》①,已略加分析批判,这里不再申述。

综上所述,可见牛致功同志对班固与《汉书》的批判,只从表面上看问题,从枝节上看问题,而没有接触到《汉书》的实际。用此来否定班固与《汉书》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否定不了的。

三

牛致功同志批判班固的历史观的论点,也有不正确的一面。仅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

研究吾国历史遗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但不能要求古代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如果这样要求,势必割断历史,否定历史。

牛致功同志在批判班固的历史观时,就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要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64年6月3日。

求古人。牛同志说班固“不能把社会历史放在阶级对立的基础去认识”,他“既然以地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去认识历史人物,无疑是避开了阶级矛盾这个问题的实质,从而也就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只能是反科学的历史观点”等等。这些论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要求公元1世纪的封建史学家班固,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评论历史人物、不能避开阶级矛盾,不能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未免过高了。实际上是将古人现代化,也就是非历史主义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据我初步体会,从孔夫子以后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珍贵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给以批判的继承,不能一笔勾销。这就要求我们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批判班固的历史观,既要指出落后的一面,也要看到进步的因素。只有对《汉书》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明确什么东西是应该肯定的,什么东西是错误的。牛致功同志却不是这样,只看到班固的落后一面,从而肯定他是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他只能是循环的、唯心的、反科学的历史观,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因素。这样否定一切地看问题,是片面性、绝对化的形而上学。从此出发,牛同志就断定:既然班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对事物的看法”,就“不可能不偏执一端”,也就是绝对化,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书中指出:“我们尊重前代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视他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做出的某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却是根本不同于前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根据这一指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历史学者,尽管他们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也有可取的地方,不能一

概持否定的态度。

我们认为班固不但在西汉史料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且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也做出某些真知灼见的判断。举例来说，主父偃受大臣“赂遗累千金。或说偃曰：‘大横’！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①]。后来由于公孙弘的建议，偃以劫齐王自杀被族诛。班固提出批评：“世称公孙弘排主父……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这说明班固认识主父偃之死，是决定于“倒行逆施”的内因，而外因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班固之所以对历史人物能做出比较公正的批评，表现了“真知灼见”，正是他对事物的看法，不偏执一端的结果，这种事例，在《汉书》中多不胜举。

我们先谈谈班固在学术思想方面所表现的“不偏执一端”的观点。

班固依据刘歆的《七略》，创立《艺文志》。他虽然站在儒家的立场，但对诸子学说的评论，却能明确地指出各家的优点和缺点，主张“舍短取长”。并认为诸子学说，“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的时代，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希望实现自己的主张。他们的言论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②]。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引用了“相反相成”这句话，指出：“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由此看来，班固的这些论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进步的。同他在《答宾戏》中所说“有同有

① 《汉书》卷六十四上《主父偃传》。
② 《汉书·艺文志》诸子序。

异,圣哲之常"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说,班固对诸子的评论,比起孟子攻击"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①的观点要高明多了。

其次,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产生了专以说经而猎取功名利禄的汉儒。班固对西汉经学和儒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汉儒传经的流弊,在于乖离经义,"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或"哗众取宠","随时抑扬",以致"五经乖析,儒学寝衰"②。又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③"班固又批评"以儒宗而居宰相位"的公孙弘、蔡义、韦贤、匡衡等人都是披着儒家的外衣,"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④的乡愿。另一方面,班固对于保存古文经典,能"实事求是"的河间献王刘德⑤,则予以表扬。

第三,《汉书·楚元王传》赞云:"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荀卿)、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这段话说明班固所谓学者要"博物洽闻,通达古今",而不是偏执一端,专守一经的学究。也说明班固把司马迁同孟、荀并列,是孔子以后的著名学者,他的《史记》是"有补于世"的著作。可见班固对司马迁的态度。

以上事例,充分证明班固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所做出的比较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正是他不偏执一端,对问题不绝对化

---

① 《孟子·滕文公》。
② 《汉书·艺文志》"六艺"序。
③ 《汉书》卷八十六《儒林传》赞。
④ 《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赞。
⑤ 《汉书》卷五十一《景十三王传》。

的自我表现。

再一个问题,是牛致功同志对《汉书》的看法,见小不见大。例如,牛同志批判《律历志》中的《世经》,说这是班固“从传说的太昊一直到东汉的刘秀,都按五德终始说的次序排列起来”的正统表,是专门为谶纬迷信制造理论根据的。而看不到《世经》在中国史学上的伟大贡献。它是刘歆用三统历将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一一推算出来的成果,由班固加以补充,收在《律历志》里。这是对古史年代的总结,是一种发明。怎能单从消极方面评论《世经》,把它一笔抹煞呢?

总之,依照牛同志全盘否定班固与《汉书》的办法,来清理历史遗产。那末,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批判继承的东西,将化为乌有。

1965 年 5 月 22 日初稿,11 月 14 日修改

(《文史哲》1966 年第 1 期)

班固《汉书》评述

安作璋

“四人帮”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狂热吹捧法家，把法家人物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比马克思主义者还要高明，实际上是吹捧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他们高喊批判儒家，要把儒家人物统统打倒，实际上是妄图打倒一大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他们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把历史科学变为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

毛主席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就批评过一些人，“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974 年，毛主席又批判“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对于历史人物，不论是法家还是儒家，都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阶级的、历史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个根本原则。法家在历史上虽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绝不能改变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质。儒家诚然是历史上的一个反动学派，但其中的某些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就以班固来说，他显然是一个儒家信徒，但我们绝不能因为他是儒家，而完全否定他在我国历史编纂学方面的重大贡献；同时，当我们肯定他的历史贡献的时候，也绝不能忽视对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批判。本文试图以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和一分为二的方法对班固《汉书》作一分析,希望得到读者指正。

《汉书》也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列传,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全书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八十余万言,主要记载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其中帝纪十二篇,是从汉高帝到平帝的编年大事记。表八篇,前六表分别谱列王侯世系;《百官公卿表》,记录秦汉官制演变和汉代公卿的任免;《古今人表》分为九等,是对汉以前历史人物的评价。志十篇,即《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是叙述古代到汉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史。传七十篇,除《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记载汉代边疆各少数民族历史、一部分邻国史以及《叙传》外,其余都是西汉人物传记。这四个组成部分的形式尽管不同,但通过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可以形成为一部完整的汉代史。刘知幾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①现在保存下来的所谓"正史",除《史记》和《南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断代为史的体例。

班固编写《汉书》,不仅有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彪的《后传》等史籍为基础;而且由于他参与典校秘书,并经常"读书禁中",有这些方便条件,因此使他能占有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再加上他又能吸取过去各种历史书籍的长处,进行整理、充实和提高,这就使《汉书》成为继《史记》之后一部有关西汉一代历史的重要著

---

① 《史通·六家》。

作。为后人研究西汉史保存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汉书》中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大都采用《史记》。这是因为《史记》本来是一部"实录"的史书，班固写西汉史，不能不依据《史记》。但班固并不是完全照抄《史记》原文，而是进行了一番加工整理和修改补充的。正如他父亲班彪所说，《史记》"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又"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①。《汉书》有《史记》、《后传》作底稿，又经过班固二十余年的辛勤写作，无论是在内容、文字或体裁上，当然都能补正《史记》的缺陷或疏略之处。所谓"慎核其事，整齐其文"，《汉书》是达到了这一要求的。

我们只要把《史》、《汉》两书的内容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许多相异之处。例如《汉书》中的《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四志，都是《史记》所无，而为班固新创立的。《史记》不为张骞立传，事迹附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后，叙述简略，《汉书》特为张骞立专传。此外，在韩信、淮南王刘安、楚元王刘交、石庆、卫青、公孙弘等传中，《汉书》都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以补《史记》的缺遗。特别是在帝纪中增载了许多重要诏令；贾谊、晁错、董仲舒、路温舒、邹阳、枚乘、韩安国等传中，增加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的奏疏，这些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至于纪传之间，详略互见，剪裁去取，可以说两书没有一篇完全雷同的。后人批评《汉书》"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②，显然是不公平的。

---

① 《后汉书·班彪传》。

② 郑樵：《通志·总序》。

武帝以后的记载，是以班彪的《后传》为蓝本，综合各家续《史记》，缀集所闻而写成的。除元、成二帝纪赞和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系采用《后传》原文外，其余纪传，大都是班固改写的。我们从"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①]来看，也可以得到证明。后人指责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②]；甚至有"盗窃父史"[③]的说法，也是不公平的。

应当指出，在这方面，《汉书》也不是没有一点可非议的地方。班彪《后传》今已不存，无法对照。但可以看出《汉书》确有抄袭《史记》的一些痕迹，虽说史事有本，不容虚构成文，但作史连别人的论赞也一样照抄，有时往往闹出时代不对头的笑话，这样就不免招致"剽窃"之讥了。当然，我们决不能像前人那样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完全抹煞《汉书》的成就。

班固编撰《汉书》，不仅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而且重视审核和选择资料。例如《贾谊传》，据他本人的著述五十八篇，"缀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故备论其语"。《东方朔传》，由于后世好事者，多"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真伪难辨，因根据刘向《别录》所载，详录朔的文辞和著作篇目，并着重指出："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律历志》则删去刘歆等为歌颂王莽功德所条奏的"伪辞"，"取其正义著于篇"。又如在《张汤传》中说："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班固这样对待史料

---

① 《后汉书·班固传》。
② 《全晋文》卷五十，傅玄语。
③ 《颜氏家训·文章篇》，颜之推语。

“求实致用”的慎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史家来说，也还有他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班固在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方面，也做了整齐划一的工作。以时代的先后顺序为主，先专传合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而以“贼臣”《王莽传》居末。并大体上都以姓或姓名为标题，统一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后来各朝代的正史，基本上都沿袭《汉书》的编纂形式。

不过《汉书》在中国史学上的主要贡献和影响，还在于它的十志。江淹认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①，一般说志是比较难作的，《汉书》十志取法《史记》八书，但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对汉代的记载更为详备，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食货志》为研究宗周以至王莽时期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发展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水利建设，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是一篇重要的古代治河文献。《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它不仅限于西汉地理，而且“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的地理沿革，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户口山川、风俗习惯及海外交通，也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三志及《百官公卿表》记载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艺文志》采自刘歆《七略》，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和是非得失，不仅是目录学的开端，而且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五行志》虽然充满阴阳五行灾异迷信思想，但也保

① 刘知幾：《史通·正史》。

留了大量的有关自然灾害、地震和日月蚀的记录，不失为有用的科学史料。《天文志》、《律历志》两志也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自从《史记》创立八书，《汉书》又加以发展，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书志体。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依据《汉书》十志有所增减，相继发展而来。

《汉书》对于国内外各民族的历史也有着较详细的记载。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以前的历史著作，有的虽然也零星地记载了某些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但为它们专门立传，则始于《史记》。班固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运用新的史料，把《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属国和邻国的历史、汉朝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争夺战争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汉书》又将《史记》的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列传加以补充，尤其是《匈奴传》增补武帝以后大量的史实，使之更加详备。这些记载，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各兄弟民族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后代"正史"中的少数民族传和外国传，大都取法《史》、《汉》而加以扩充和发展。

《汉书》不仅在史学上有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文学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汉的散文，是当时文学上的主流之一，而散文的发展和成就，又主要表现于传记文学方面。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的一个传记文学的杰出作家。他写西汉一代不同社会阶层各种类型人物，虽然没有《史记》那样生动活泼，但结构严密，言词精练，显出了它的特色。例如晁错、朱买臣、李陵、苏武、霍光、杨恽、赵广汉、盖宽饶、张禹、龚遂、严延年、陈万年等传，班固都能利用他所掌握的丰富材料，经过选择和鉴别，抓住主题，运用艺术手法，加以深刻细致的描写，使一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感情和动态非常

形象地再现出来，确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汉书》对唐宋以后的“古文”也有很大影响。唐朝的文学家柳宗元就是精通《汉书》的。宋代黄庭坚曾说：“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①虽不免有些夸张，但说明了《汉书》对后代文学家的重要影响。《汉书》好收载文章诗赋，具备各种文体，富于辞藻，也为后来文学家所取资。

总之，《汉书》在详细占有史料，整齐文字、体例以及写作艺术等方面都在《史记》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但是在历史观方面，它并没有继承《史记》的进步的异端思想，而是沿着他父亲班彪的思想路线向前发展的，这一条路线就是尊儒宣汉。

班固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司马迁的时代。东汉的地主阶级及其政权，是豪族地主、官僚地主、商人地主的结合体。这时的地主阶级已日趋保守和反动，作为它的指导思想，就是尊儒。班固出身于显贵世家，以及他个人的经历，都和汉王朝有着血肉的联系。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当时的思想界儒家独尊的局面已经确立。他要继承父志、重振祖业，在政治上就不能不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在思想上也就不能不尊儒。这一点，在他所撰集的《白虎通议》一书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编撰《汉书》，同样也是贯串了这个基本思想。

第一，《汉书》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儒家的“天人合一”的谶纬神学，以及阴阳五行灾异学说当作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五行志》是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思想的，它是《史记》八书所无而为班固所新创立的篇目，集中了董仲舒等许多儒家阴阳五行灾异说的论述，加上自己的意

---

① 《〈汉书〉评林》。

见，系统地编写起来的。《天文志》有许多内容同于《史记》的《天官书》，但它特别强调了“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并且详记秦楚以来天变对人事的征验。在纪和传的部分，《汉书》也渗透了这种观点。

固然，《史记》也未能完全摆脱神秘思想的束缚，但它是倾向于无神论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无神论思想因素的。而《汉书》多方宣传有神论，强调五行灾异的作用，极力表明“君权神授”，即皇帝是授命于天的，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上天的注视而发生相互影响。因此，《汉书》不是像《史记》那样把汉朝的建立放在历史发展中去考察，它反对这种做法，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把汉朝的历史地位降低了。它为了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在《高帝纪》赞里特别替刘邦编造了一个从尧开始的所谓世系，说明汉既是尧的后代，又同属于火德，是得到了“天统”的。

《汉书》所表示的五德终始说，是属于五行相生说的。这是西汉末年形成的一种说法，和旧有的五行相胜（克）说不同。它认为木、火、土、金、水五行就是“五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生关系，每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特定的一德（性质），朝代兴替，就是按五行之间前后相生的顺序，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按照这种说法，火生土，故王莽自称以土德代替汉的火德；土生金，故公孙述自称以金德代替王莽的土德；刘秀是“受命中兴”，便要以火德继承西汉的火德。五行相生说，在东汉王朝来说，是对广大农民，同时也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表达其封建统治的神学的合法依据。在这样的历史观指导下，《汉书》不仅完全否定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而且也否定了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而只能写成西汉一代帝王将相史。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和颠倒。

第二,《汉书》以儒家的封建正宗思想代替了《史记》进步的异端思想。以《古今人表》为例①,它把远古到秦的历史人物划分为九等,而把孔丘列入第一等,孟轲列入第二等。清儒钱大昕尝称赞"此表用章儒学,有功名教"②。班固就是以这个标准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③。但这并没有批倒司马迁,反而否定了自己。《史记》和《汉书》各有游侠、货殖二传。《史记·游侠列传》把布衣之侠同结党营私、设财役贫、恣欲自快的豪暴之徒,严格地区分开来,称颂布衣之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汉书·游侠列传》正相反,它把结宾客、广交游,能形成一种社会势力的人物,都叫做游侠;而把战国的四公子④、汉代的贵族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以及效忠于王莽的楼护和陈遵,再三以报自己私仇著名的原涉,同布衣之侠剧孟、郭解等同列,一律谴责他们"背公死党",废弃"守职奉上之义"。而对真正布衣之侠郭解等人,则认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辠(罪)已不容于诛矣"。《史记·货殖列传》论述财富不均决定了人们社会身份的贵贱,并肯定了农工商虞治生谋利的活动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汉书·货殖列传》也与此相

---

① 《史通·表历》认为《古今人表》"上自庖牺,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破坏了《汉书》断代为史的体例,因而怀疑非班固所作(《正史篇》)。但从思想体系来看,和班固的思想是一致的。怀疑是缺乏根据的。

② 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序。

③ 《汉书·司马迁传》。

④ 即齐孟尝君田文、赵平原君赵胜、魏信陵君魏无忌、楚春申君黄歇。

反，认为封建等级是不可逾越的永恒秩序，说什么“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把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归于圣王之教，说什么“后（君）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并要求劳动人民要“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史》、《汉》的游侠、货殖两传，篇名同，取材也大多相同，但精神面貌却完全两样了。

司马迁的“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历史观，除上述班固所指责的那些以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大胆地暴露统治阶级中一些人物的暴虐、奢侈和愚昧；而对那些敢于反抗强暴而不怕牺牲的社会下层人物，则寄予一定的同情和称赞。而班固在《汉书》中，对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有时虽然也有讥刺之辞，但总的来说，是褒多于贬，为尊贵者讳，甚至有意造作粉饰之辞。西汉成帝是一个有名的荒淫酒色的昏君，他经常化装外出，奸淫民间妇女，公卿百官一连几年都不知其所在。这在《五行志》中也有记载。但在《成帝本纪》赞里，却说什么成帝“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不顾自相矛盾，多方加以美化。更为露骨的是班固把张汤、杜周从《史记·酷吏传》中抽出，另立专传。其唯一理由就是“汤、周子孙贵显，故别传”。另一方面，班固对于反抗强暴的社会下层人物则又力加排斥、贬低，上引《游侠列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尤其是他把“亡秦首事”的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和最后推翻秦朝统治的项羽，分别从世家、本纪中勾去，都贬入列传，称陈胜、项籍而不字，反过来还指责《史记》“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这更充分表现了他的儒家封建等级观念和正宗思想。

在伦理观上，班固的儒家面目暴露得更加明显。《汉书》和《白虎通议》一样，都把“三纲六纪”捧为最高的政治原则和伦理

规范,并用“天道”神化儒家的纲纪礼教,用歪曲历史的手段来论证儒家礼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例如《礼乐志》宣称儒家礼教是“圣人”根据天的意志创立的,“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又说:“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因此,尽管朝代有更替,而“圣人”、“法天”的伦理教条却是万古不变的,用班固的话说就是“王者必因前王之礼”。董仲舒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在《汉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第三,班固虽然在《汉书》中给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但是他的历史思想却显得支离贫乏而少创见,因此在他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上,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以《汉书》十志为例,《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都把历代王朝的兴替说成是上天规定的历史秩序,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神意的安排。《刑法志》在解释国家政权的形成时,则把它归于人民的需要和对于圣王的归心,这里就只有阶级偏见而见不到神的影子了。《食货志》肯定食货为生民之本,《地理志》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说明各地区物产和风俗的特点,《艺文志》总结古今学术的演变,尽管其中也偶尔有阴阳五行的术语,但基本上已脱离了神学的轨道而就具体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作了人文主义的解释。《汉书》对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理解,往往出现矛盾,表现出班固顽固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尊儒宣汉,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态度,同如实反映历史资料的矛盾。

最后,就文字和语言表达方面来看,司马迁“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①],又往往采用当时流行的口语

① 鲁迅《汉文学纲要》第10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所以《史记》的文字特别显得感情充沛，浅易近人，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而班固有时虽也直录口语，但由于他是辞赋名家，不免多用文人辞藻，文字近于骈偶，如《西域传》赞就显得过于整饬、铺张，有的地方甚至是以辞害意。可以说，《汉书》的文字已开了六朝骈俪之风。

《汉书》好用古字古义，当时人就有此种非议。如供给的"供"，《史记》作"供"，《汉书》作"共"；嗜好的"嗜"，《史记》作"嗜"，《汉书》作"耆"，踪迹的"踪"，《史记》作"踪"，《汉书》作"纵"，谦让的"让"，《史记》作"让"，《汉书》作"攘"，等等，不胜枚举。故"《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学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班固又好省字，如《李广传》、《窦田灌韩传》、《酷吏传》等，大多袭用《史记》原文，"所争只在二三字，却失语气之重"②。有时甚至文理不通。如《史记·宁成传》："操下如束湿薪。"《汉书》则作"操下急如束湿"。增一"急"字去一"薪"字，则不知所束为何物。《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则文义不明。文风历来是同作者的思想政治面貌分不开的。

（《破与立》1978年第1期）

---

① 鲁迅《汉文学纲要》第10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② 查慎行《得树柚杂钞》卷十二。

谈谈班固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

安作璋

《汉书》的作者班固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齐名的两位史学家,他们对我国封建史学体系的创立,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过去旧史家扬马抑班,或扬班抑马,都失之偏颇,不足为训,应该说各有短长。近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司马迁的文章比较多,相形之下,关于班固的文章却比较少,是否还有点扬马抑班的倾向,不敢妄加评说。今天我们要开创历史学的新局面,我觉得不论前人的长处和短处,都应该加以认真的研究,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评论马班之长短,仅就班固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谈几点粗浅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　创立了断代为史的史学体例

班固所著《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全书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这四个部分的形式和内容虽各有不同,但是综合起来看,却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历史。唐代史论家刘知幾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现在保存下来的纪传体的二十五史,除《史记》和《南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断代

为史的体例。这种断代为史的纪传体的体例,虽然有割断历史前后联系的缺陷,但如果把所有的断代史一代一代地连接起来看,也可以弥补这种缺陷。然而这种体例的优点却是很多,它不仅便于及时地保存和整理史料,更重要的是其容纳量最大,即所谓"包举一代",举凡一代的历史内容都可以包罗进去。解放后盛行的讲义体,不论通史还是断代史,都着重于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点应加以肯定;但由于这种体例的限制,有许多内容写不进去,致使本来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变成干巴巴的没有血肉的几根骨头。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种新的史学体系,像《汉书》这样能够包罗一切的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仍值得我们作为参考或借鉴。

二　开拓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领域

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武帝太初以后,缺而不录。班固的《汉书》不仅增补了武帝以后至平帝的一段历史,而且对武帝以前的历史也进行一番加工整理和修改补充。仅就占有资料来看,《汉书》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史记》。例如《汉书》中的《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四志,都是《史记》所无,而为班固新创立的篇目。《史记》不为张骞立专传,事迹附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后,叙述简略,《汉书》特为张骞立专传,给予这位对中西交通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史记》的《大宛传》,《汉书》则扩充为《西域传》,详细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汉朝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争夺战争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这些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各兄弟民族

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汉书》在帝纪中增载了许多重要诏令，贾谊、晁错、董仲舒、路温舒、邹阳、枚乘、韩安国等传中，增加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的奏疏，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和《贤良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路温舒的《尚德缓刑疏》，贾山的《至言》，邹阳和枚乘各自写的《谏吴王书》以及韩安国和王恢关于征伐匈奴的争议等等。这些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不过《汉书》在中国史学上影响最大的还在于它的十志。梁人江淹认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史通·正史》)。一般说，志贵在博而约，比较难作的。《史书》十志取法《史记》八书，但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对汉代史事的记载，更为详备，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食货志》为研究周代以来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发展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系统地叙述了战国秦汉的水利建设，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是一篇重要的古代治河文献。《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它不仅限于西汉地理，而且上溯先秦，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户口山川、风俗习惯以及海外交流，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以及地方志、地理学史的先河。《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三志记载了秦汉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艺文志》论述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和是非得失，不仅是目录学的开端，而且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思想文化史资料。《律历志》、《五行志》以及后续的《天文志》虽然掺杂了一些封建迷信思想，但仍不失为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汉书》十志不但为后世的史志所取法，而且也为《通典》、《通考》、《通志》一类政书体史

书创立了楷模。今天随着史学的发展,仅有几部通史、断代史是很不够的,还要开展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例如经济史、水利史、地理学史、政治制度史、军事史、法制史、思想史、文化史、自然科学史等等。这些专史,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都和《汉书》十志有着历史渊源的关系,也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作为编写各种专门史的借鉴。

三　求实致用的史学思想

在《贾谊传》中,班固根据贾谊的著述,从中"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董仲舒传》"掇其切当时,施朝廷者著于篇";《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故备论其语"。由此可见,班固选择史料的标准,是为了"切于世用",并非为作史而作史。正因如此,他对史料的真伪,也进行了大量的考辨工作。例如《东方朔传》,由于后世好事者,多"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真伪难辨,因此根据刘向《别录》所载,详录朔的文辞和著作书目,并着重指出:"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张汤传》说:"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朱云传》赞说:"世称朱云,多过其实。"《韦贤传》说,韦孟《讽谏》,乃"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汉书》中《志》的部分考辨之处更多。如《律历志》删去刘歆等为歌颂王莽功德所奏的"伪辞","取其正义著于篇"。《艺文志》《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其他十分荒谬或伪迹明显的篇目,则斥之为"迂诞、依托"、"后世所加"等语。班固这种对待史

料"求实"、"致用"的慎重严肃态度,和我们主张的求实致用自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他能在阶级的历史局限以内,努力达到他所能达到的高度,还是对我们有所启发的。

四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

《汉书》列传中所载的人物,上自王侯将相、儒生、文人、谋士、说客,下至游侠、商贾以及农民起义领袖,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众态纷呈。班固对于这些历史人物,都能利用他所掌握的丰富资料,经过选择提炼,抓住主题,运用文学艺术手法,作了深刻的描写。如《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在失意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待遇,就写得非常生动,可以说相当充分地揭发了封建社会中世态炎凉的丑恶现象。又如《陈万年传》万年教子的一段描写,文字虽然不多,但都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封建老官僚善于逢迎拍马、谄媚权贵,卑鄙无耻的丑态。最著名的还是《苏武传》,班固在这篇传记中大力表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品德。通过许多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怕威胁、不为利诱、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李陵劝降一段,更表现了苏武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情操。明代黄省曾说:"孟坚之史,每传一人,则不特功德言语,了了无遗,描写如画;又且并其形态之状以铺张之。"(《〈汉书〉评林》)通过一些具体情节的描写,使一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感情和动态非常形象地再现出来,确实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汉书》对唐宋以后的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唐朝大文学家柳宗元就是精通《汉书》的,并对《汉书》做了很高的评价。宋

代黄庭坚也曾说过，久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汉书〉评林》）。虽不免有些夸张，但说明了《汉书》确已成了后代文学家学习的楷模。一千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是受到了它一定影响的。现在我们出版的一些历史著作，虽然在学术上有较高的成就，但由于缺乏文采，读起来总是令人感到呆板、干瘪、枯燥乏味，甚至难以卒读。有些流行的中国通史、断代史，总是政治、经济、文化那几套死板的格式，很少见到有历史人物的具体活动，更谈不上对历史人物的形象作生动的描述。像《汉书》这样既是历史巨著，又是脍炙人口的文学杰作，还不多见。中国向来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我认为要使历史研究成果能为更多的群众所乐于接受，要使历史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很有必要继承和发扬《汉书》这类史学著作文史结合的优良传统。

（《光明日报》1983 年 8 月 23 日第 3 版）

试论《汉书》的学术成就

刘隆有

自从《汉书》问世以后,人们便将它与《史记》并称,以之作为我国古代史书的代表。实际上,在封建社会里,《汉书》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史记》。旧史家曾将之奉为"命代奇作"、"史家冠冕",争相钻仰,"奔走班固之不暇"①。平心而论,《汉书》的学术成就,确也不在《史记》之下。然而,建国以来,对《史记》的研究甚为热烈,对《汉书》的研究却异常萧条,这对《汉书》来说,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这种扬马抑班,同旧时代的扬班抑马,同样是学术研究中不应有的片面倾向。本文试对《汉书》的学术成就略作探讨,以期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汉书》的编纂方法,承袭于《史记》而有较大变化,最重要的是变通史为断代。这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堪称一空前创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东汉初年,随着君主集权专制的日益强化,刘姓王朝的灭而再兴,统治者既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又要求史书主要写自己一家一姓之史。同时,学术文化的不断发展,国家档案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为写近代史和当代史提供了丰富的资

---

① 《通志·总序》。

料。相反，去古愈远，有关古代史的资料日益减少，写通史和古代史也就日益困难。因此，史学本身的发展，也期待着断代史体的出现。《汉书》正是适应封建政治和封建史学的需要，建立了以王朝为断限的断代纪传史体。

《汉书》以前，无论何种史书，都不曾专门地完整地写过一个王朝的历史。“《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各家续《史记》，更只记两三个帝王，或补缀些零星篇章。班彪《〈史记〉后传》记西汉事虽较完备，但仍沿袭通史之体，创新无多。至班固《汉书》，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成为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断代史。断代史较之通史，虽然不易写出历史的发展联系，却易于写近代史和当代史。它不仅便于史家及时成书，也便于避免通史的相互重复，使一个王朝的历史能够比在通史中得到更详尽、更完备的反映。“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①]。东汉至隋，世有著述，多用此体，“一代之史，至数十家”[②]。

《汉书》主要以西汉王朝的历史为限断，同时在某些篇章里，也保持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如十志和《百官公卿表》等，皆以载西汉典章制度为主，而兼及远古，有的并记到班固著书的东汉当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断代史易于割断历史联系的缺陷。在《史记》里，纪、传、书之间有时界限并不明显。《汉书》则严其体例，事皆详载于传，而撮其要书于纪，志则一律记典制文物。从而抬高了帝纪对全书的统帅地位，增强了纪的纲领性，也使传更充实，志更明晰。《史记》标目和篇章排列，没有统一

① 《史通・六家》。

② 《隋书・经籍志》。

的义例。《汉书》则将之整齐划一。此外,《汉书》还在人物传中大量采用合传,在以时间先后为序的前提下,总是把那些人品相近或事迹相类的人物合记一起,使许多人物传都各具特色,既加深了对读者的感染力,全书篇目也显得简明规整。总之,《汉书》不仅首创断代史体,而且在《史记》的基础上,整齐了纪传史体,较之《史记》,它更显得条理井然,有章可循,因此,"后代史家之例皆由此出"①。章学诚指出:"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②

《汉书》的学术成就,还表现在叙事的详实,十志的丰赡,文与史的高度结合,史学思想中的进步因素诸方面。

班氏父子严肃处理史料,不轻信世俗传闻,并有意识地用史实纠正一些讹传,恢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鉴于"世称朱云,多过其实",后世好事者常取奇言怪语托为东方朔的著作,《汉书·朱云传》便详写朱云事迹,《东方朔传》详录朔之言辞,以纠世传之非。成帝时,鸿隙陂水溢为害,丞相翟方进派人考察后,"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及翟氏灭,乡里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班彪遂在《翟方进传》中根据史实,写明方进奏罢鸿隙陂的本意,原为当地人民避免水灾,使流传了近百年的讹言得以澄清。

不因主观爱憎和观点异同而随意涂抹史实,增减史料,是班固求实精神的又一体现。班固著《汉书》,受到东汉王朝的严格控制,他本意也是要使汉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但他尊重史实,对西汉统治者作了尽可能的揭露。汉武帝的专制残忍,好

① 《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② 《文史通义·书教下》。

大喜功,奢侈无度,汉元帝的无能,汉成帝的好色,汉哀帝的愚蠢,在班氏父子笔下,都有如实的记叙。为了批判武帝以后西汉帝王的崇尚厚葬,班固还特为提倡并亲自实践裸葬的平民杨王孙立传,着意点明:在对待葬仪上,平民百姓的见识贤于汉家帝王远矣!班固虽在理论上排除秦、项,贬低陈胜,宣扬大汉承尧继周,但在记事上,还是写明了"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①和项羽"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②这一客观历史进程。《王莽传》虽以"贼臣传"的性质安排于全书列传之末,但自王莽居摄以后,即编年记事,实为帝纪的一种变例,又将名义上的西汉末帝孺子婴三年间事,皆入其中。在君主集权专制日益强化的时代,班固能这样写,实在需要一点勇气。《汉书》武帝太初以前,多照抄《史记》,旧史家曾批评这是剽窃,其实,这恰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班固的求实精神。对这段历史,班固有许多看法与司马迁不同,但他决不因史观相异而任意处置史料,以就己说。这正是一个史家应当具有的可贵品德。

《汉书》不仅记事真实,而且详细具体。武帝太初以前部分,较之《史记》,增写了许多具体内容。太初以后部分,由于综合了众家续《史记》,并运用了诸如《汉著记》等大量档案资料,较之太初之前,显得更为具体翔实。《霍光传》写昌邑王和宣帝废立之际,细致入微,览之如亲睹其变。《王莽传》长达四万余字,运用资料很丰富,实为一部新朝史。《汉书》对国内少数民族和中亚、西南亚古代民族史的记述,也远比《史记》翔实。此外,《汉书》还多载有用之文。帝纪中,收入许多重要诏令。人物传中,于所记人

①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②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

物的对策、谏言、奏疏、文章，常“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①]。《史记·贾生列传》仅载贾谊《吊屈原赋》和《鹏赋》两篇文学作品，而于最能反映贾谊政见和当时一代大事的上疏和谏言却不录。《汉书·贾谊传》则于载此两赋外，又载其《治安策》和另外两次上疏，“皆有关治道，经事综物，兼切于当日时势”[②]。《史记》的公孙弘传、董仲舒传不载二人的天人对策，《汉书》则皆收入传中。这固然反映了班固的正统史观，却也保存了一代重要文献。王鸣盛论《史》、《汉》繁简有云，司马迁“意主行文，不主载事，故简。班主纪事详赡[③]”。“纪事详赡”，不仅是《汉书》的特点，更是它的优点。

《汉书》记事详赡，在十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汉书》十志取法《史记》八书，却在各方面都有重大发展。举凡西汉和新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天文、历法、迷信、学术、典籍情况，以及行政区划、水利设施，在《汉书》十志中，都得到了较为全面而翔实的记叙。同时还载及远古至秦的史实，使各方面的源流演变，一览了然。

《郊祀志》、《天文志》、《沟洫志》承袭《史记》材料较多，但也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郊祀志》保持了《史记·封禅书》的写法，集中记帝王的迷信活动和各种祭祀典制，补充了宣帝至王莽时的内容。对汉、新统治者怎样把政权和神权结合在一起，以及为此演出过怎样的闹剧，作了生动具体的记叙。《天文志》学习《史记·天官书》，分星占、望气、候岁、总论几个部分，介绍了先秦

---

① 《汉书·贾谊传》赞。
② 《廿二史札记》卷二。
③ 《十七史商榷》卷七。

至汉的天文学知识。其间虽然充斥了天人感应的说教，却也不乏科学的观察，反映了当时天文学所达到的实际水平，记下了许多重要的天象资料。《沟洫志》和《史记·河渠书》一样，旨在记以治理黄河为主的水利事业，增写了武帝元鼎年间至王莽新朝的史事，远比《河渠书》详备，尤以所载贾让《治河三策》，为最珍贵的水利史资料。

《律历志》、《礼乐志》分别合《史记》的《律书》、《历书》、《礼书》、《乐书》而成，《食货志》则源于《史记·平准书》，但均创新多于继承。《律历志》包括律和历两个部分，但扬弃了司马迁以《律书》记兵制的作法，主要依据刘歆《三统历·谱》，"删其伪词，取正义著于篇"。介绍了当时有关数、声律、度量衡的知识，西汉历法以及它们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的关系，实为一部综合性的科学简史。《史记》的《礼书》、《乐书》，有录无书，褚少孙所补，主旨乃在阐述制礼作乐的理论，有关汉制的记载，各仅有四百余字。《汉书·礼乐志》则比较实在地记述了自古至东汉初年礼、乐的演变，而于西汉尤详。《史记·平准书》仅记汉初（主要是武帝时代）的经济情况，而且农政、财政相杂，记叙也较简单，《汉书·食货志》则通叙自古至王莽新朝经济生活的演变，分为食、货两个部分，食的部分记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货的部分记货币、商业和财经政策。脉络清晰，叙致井然，内容更超出《平准书》一倍还多，为研究先秦和秦汉经济史提供了系统而丰富的资料，是《汉书》中最有价值的篇章。

《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均系《汉书》首创。刑法乃是阶级统治最直接的工具，是社会阶级矛盾、阶层矛盾最集中的反映，《史记》对此仅在《律书》中略略述及，《汉书》特为刑法创立专篇，是抓住了历史记载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刑法

（包括兵制）的产生及其历殷、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直至东汉初年的发展演变，大体拉出了一个线索，对西汉刑制的记述则最为详实。如揭露文帝时“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武帝时禁网繁密，“奸吏因缘为市”，随便置人生死，均深刻而又具体。《地理志》依据《禹贡》、《周官》，简叙了先秦的地理沿革；又参考刘向、朱贡的地理著作，以郡国为目，详叙了西汉各行政区的统辖范围，山川名胜，户口物产，风俗习惯，中外交通；总计了平帝时全国的疆域范围，政区数目，土地面积，户数和人口数。从而把全书所写政治史、经济史置于它们发生其上的地理范围之内，把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艺文志》主要依据刘歆《七略》，但也有班固自己研究目录学和学术史的成果。他长期任校书官，熟悉皇家图书，在著《汉书》的同时，还编有《东观新记》、《仁寿阁新记》和《兰台书部》。《艺文志》按照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的顺序，注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名称、卷数、作者，并论其所属学术的派别源流、是非得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图书目录，也是略具雏形的一部学术史，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五行志》是《汉书》中历来最受批评的篇章，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班固唯心史观的集中反映。其实不能作这样简单的评价。班固创立此篇，有其看重阴阳灾异说的一面，但也是史家的职责使然。西汉中后期，这种学说风靡一时，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不仅涌现出大批学者，而且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并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班固为之创立专篇，使一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得到比较翔实的记载，显然是有功史学的。

《汉书》十志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扩充了书志的记叙范围，整齐了它的体制，不仅使西汉一代

的典制文物及其起源得以"包举",而且使纪传史中的书志体臻于成熟完备。后来一些纪传史书中的志,大都依据《汉书》十志而略作增减。唐以后典志专史的大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它的影响。

《汉书》的表也比较详赡,其中以《百官公卿表》最为突出。《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仅记西汉三公官的升降迁免,而且有表无序,反映不了汉代官吏制度的全貌。《汉书·百官公卿表》则有表有序,表序皆详。序中记了汉代分官设职、各级官职的权限范围和俸禄数量、爵位等级,以及汉承秦制的情况。表中分十四级、三十四官格,谱列西汉(不包括新朝)一代三公九卿的迁免死。西汉官僚制度的演变和重要官吏的变动,在《百官公卿表》中均被反映出来。它实际是表和志的结合,是班固的一种创造。后来纪传史中的官志,实起源于此。

可以看出:对于研究西汉史和新朝史以及先秦至西汉的典章制度史,《汉书》的价值是远在《史记》之上的。

《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是相当浓厚的,但就其史学思想的整体来说,也包括了不少进步的因素。

班固有一种历史变化的思想,贯彻于《汉书》之中。他曾批评那种"法难数变"的议论,认为是"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①。明确表示,他要在《汉书》中"列其行事,以传世变"②,"备其变理,为世典式"③。即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写出历史的变化,供后世取法。如其通过记叙公孙弘以后丞相地位的改

① 《汉书·刑法志》。
② 《汉书·货殖传》。
③ 《汉书·叙传》。

变，写出武帝时君主集权专制日益强化的过程；纵观西汉帝业，写出汉家鼎盛于文、景，转机于武帝，衰败自元、成的一代变化大势，都是比较准确而有意义的。

《汉书》写历史变化，非常注意客观形势的作用。认为周统治时间长，秦统治时间短，是因为采用了截然相反的行政制度，“国势然也”[①]。刘邦兴起较易，是收了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②]。西汉数以百计的诸侯王大都骄淫失道，是“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③]。这里所谓的“势”，或指一定的历史条件，或指一定的历史环境，显然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用语。“势”之外，《汉书》还常爱使用“时”字。贾谊、司马迁曾认为，子婴若有庸主之才，那么只要有个中等辅佐，秦就不致灭亡。班固批评这是“不通时变”，认为秦乃亡于始皇肇始的积衰积弊，当子婴之时，天下已土崩瓦解，非亡不可，即便有周公那样的大才，也改变不了秦亡的命运。分析王莽代汉，他也运用了这样的观点，认为王莽之兴，“所由来者渐矣”，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除靠其个人的“佞邪之才”和长期努力外，乘四父历世积累的权势，汉家皇嗣屡绝，实际上掌握汉家大权的王莽姑母王政君之长寿不死，乃是造成其“篡盗之祸”的重要原因。“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④]。这里所说的“天时”和“时变”，除了和“势”相同的含义外，还包括了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和个人无能改变历史大势的观点。这是班固史学思想中最为闪光的部分。较之司

① 《汉书·诸侯王表》序。
②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
③ 《汉书·景十三王传》赞。
④ 《汉书·王莽传》赞。

马迁，班固史学思想中的封建糟粕确实很多，但上述观点却比司马迁进了一大步，这是不容否认的。

《汉书》写历史变化，还常从民心向背着眼。西汉之兴，由于刘邦能“顺民心”，“扫除烦苛，与民休息”。文帝、景帝恭俭利民，遂成文景之治。武帝滥用民力，“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遂极盛而衰。昭帝宣帝关心“民所疾苦”，复又中兴。元帝、成帝以后，渐失民心，遂至于亡。这就是《汉书》所写西汉兴衰成败的过程。它写循吏之治绩，也指出是由于他们“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故能“所居民富，所去见思”，“而民从化”①。班固在这些地方，显然把民之爱憎，视作了政治好坏、王朝兴衰的决定因素。当然他所说的“民”，主要是指地主阶级，但也包括了广大劳动人民，所以他的这种观点，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进步史观。

重视经济的作用，是《汉书》写历史变化的又一特点。较之《史记》，《汉书》更强调了经济生活在历史演变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厥初生民，食货惟先”②。经济乃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件大事。所以，《食货志》开首即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乃刀金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故舜以之为“政首”，殷、周之盛，也是“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强调自有人类历史，经济问题便是统治者为政的首要大事，能否做到“食足货通”，乃是决定政治优劣、王朝兴衰的根本。《食货志》全篇，正是以这样的观点，叙述了远古至王莽新朝经济政策所引起的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导致

① 《汉书·循吏传》。

② 《汉书·叙传》。

的社会历史的变化。《史记》八书,《平准》居末,《汉书》十志,《食货》为四。这种排列次第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对经济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上,班固比司马迁又前进了一步。自此以后,纪传史书凡有《食货志》者,皆居志之中间或稍后,再没有像《史记》一样置于最后的了。

《汉书》用了较大篇幅记载西汉学术,其中所反映的班固的学术思想,更充满了历史变化的观点。班固认为各个学派和各种学术思想,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他分析诸子十家,皆源于王官,除小说家外,其余九家原本皆好,但后来经“辟者”、“放者”、“拘者”、“刻者”、“警者”、“蔽者”、“邪人”、“荡者”、“鄙者”扩其一点不及其余,便皆走向反面,而非其本源。譬之儒家,本来“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①]。汉儒说经,“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②]。五字经文,解说至于二三万言,一经则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而皆非儒经本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盖禄利之路然也”[③]。西汉王朝自武帝以后,既以经术取士,儒生亦皆恃此求禄,经术不过用以缘饰吏事,哪还顾得了什么儒学真义?再如阴阳家,“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五行之说,“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寖以相乱”[④]。汉代推阴阳言灾异者便是如此。所以,尽管班固深信阴阳五行之说,他在《汉书》里并曾以较大篇幅记载汉儒的

①② 《汉书·艺文志》。
③ 《汉书·儒林传》。
④ 《汉书·艺文志》。

有关言行，对其学说有时却持保留态度，甚或尖锐批评。在《五行志》中，对于董仲舒和刘向、歆父子同说一事，其旨却大相乖异，并不加以评论，只是“揽仲舒，别向、歆”，将其客观地记下而已。在《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中，更批评董仲舒等人的学说是千篇一律，不过“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竟劝诫后学，再不要随便以推阴阳言灾异为务了！

《后汉书·班固传》说，班固少时即“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联系《汉书》所反映的班固的学术思想，可以看出，班固虽然崇儒，但他历来就是个杂家，和汉代的章句之儒有着明显的不同。他认为：“一阴一阳，天地之方；乃文乃质，王道之纲；有同有异，圣哲之常。”① 自然，政治、学术都处于对立的统一之中。诸子十家，皆“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看起来言殊义乖，“辟犹水火”，但“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各有所短，各有所长。就连“道听途说”，不入流的小说家，“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因此，各家之间应当相互折中，舍短取长，在六经的基础上综合贯通，而不应单守一家一术。特别当汉儒背离原始儒学，繁琐解经，致使“道术缺废”之时，更应如此。“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②。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他明确宣布，他写《汉书》，既首推儒学，“纬《六经》，缀道纲”，又兼收各家观点，“总百氏，赞篇章”③。《汉书》的记事和评

① 《汉书·叙传》。
② 《汉书·艺文志》。
③ 《汉书·叙传》。

论，正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对于儒学，的确给了很高的地位，却又如实地记了儒学的无用乃至误国：文景之治是靠了黄老思想的指导，宣帝中兴是因为“夤用刑名”，元帝笃信儒术，遂使“孝宣之业衰焉”。东汉自光武帝以后，历代皇帝以及王公重臣皆特崇儒学，班固又亲自参加了白虎观会议，却仍持这样进步的学术观点和直笔无讳的书法，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

史学与文学的浑然一体，是《汉书》的又一重要成就。它“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①。如李陵苏武传，写李陵之勇猛善战，含冤受辱，降匈奴后对故国的深切眷恋，慷慨悲凉，催人泪下。写苏武之忠心义胆，正气凛然，更是叙次精彩，千载下犹有生气。再如《王莽传》，主旨在“究其奸昏”，而究奸究昏，皆生动传神，将王莽作为一个“贼臣”的奸诈昏聩、可憎可笑的心理、行径，描摹得淋漓尽致。《汉书》的不少序、赞，也写得温雅弘丽，耐人品味。在二十四史中，《汉书》的文学成就仅略逊《史记》而已。

总之，《汉书》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史》、《汉》并称，《汉书》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应当给它以恰当的评价和深入的研究。

（《天津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

① 《后汉书·班固传》论。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

陈其泰

一　时代召唤"汉书"出世

历史现象往往有极相似之处。司马迁著《史记》，是在西汉皇朝鼎盛的武帝时代；班固著《汉书》，则是在东汉国力强盛的明帝、章帝时代。《史记》的成书，凝聚着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汉书》的撰写，则是班固父子兄妹一家学术的结晶。与司马迁同时代的有大思想家董仲舒，他的言论对于我们理解《史记》成书的社会、思想背景有极大帮助；跟班固同时代的也有一位大思想家王充，他所著《论衡》一书，对于我们理解《汉书》产生的社会条件、思想背景，同样提供了很可宝贵的资料。

比如，以往我们评价《汉书》，对《汉书》撰写的目的是为了"宣扬汉德"，认为这是班固忠实地维护汉家统治的正宗史学思想的突出表现，而作了许多批评贬责。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评价《汉书》将它放到什么基本点，关系颇为重大。然而，若果我们联系《论衡》一书中的有关论述，我们就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产生新的认识。

王充（光武建武三年至和帝永元十六年，27—104），是班彪的

学生[①]，比班固(光武建武八年至和帝永元八年，32—92)年长五岁，《论衡》中多次提到班固，两人当有交往，而且，他们的思想也确有互相沟通之处。《论衡》撰作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颂汉”。书中有《须颂篇》，篇名即揭示出对汉朝必须颂扬的著述宗旨。王充讲：“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浮于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历难测。汉德丰广，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汉盛也。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又《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王充赞美汉德之盛，如阳光普照天下，如东海不可测量。批评当时许多学者都对此毫无认识，著书只言远古，对汉代之事不加涉及。他认为班固写有《汉颂》，别具识见，所以引为同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充赞美汉代的言论是有的放矢，态度鲜明地同当时盛行的复古倒退的观点相对抗。《论衡》中《超奇》篇、《齐世》篇等都一再尖锐地批评俗儒“好褒古而贬今”、“尊古卑今”的偏见。《超奇》篇批评他们迷信古代达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齐世》篇进一步列举倒退历史观的种种表现：一是认为人的相貌、体质、寿命，当今比古代普遍地丑化或退化了：“语称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老寿，百岁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丑，夭折早死。”二是认为古人与今人品质道德优劣悬殊：“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上世之人重义轻身，遭忠义之事，得己所当赴死之分明也，则必赴汤趋锋，死不顾恨。……今世趋利苟

① 《后汉书·王充传》。

生,弃义妄得,不相勉以义,不相激以行,义废身不以为累,行隳事不以相畏”。三是认为政治功业古今相比高下悬殊:“语称上世之时,圣人德优,而功治有奇。……及至秦、汉,兵革云扰,战力角势……德劣不及,功薄不若。”“画工好画上代之人。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王充所概括的种种谬误说法,突出地表明人们头脑中尊古卑今的意识是多么根深蒂固,需要有见识的人物以社会进步的事实加以批驳,廓清迷误。王充提出了与世俗眼光截然相反的看法:“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也。”“光武皇帝龙兴凤举,取天下若拾遗,何以不及殷汤、周武?”汉代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当然比三代大大前进了,王充的结论自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那么,俗儒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颠倒历史的看法呢?王充分析说,这是因为儒生们自生下来读的就是记述和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所以识古而不识今。王充断言:“使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六为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为圣帝矣。”为了驳倒复古倒退论者,迫切地需要一部记载汉史的著作。王充认为,若果有一位擅长著述的人修成这样一部“汉书”,记载汉代的政治功业,让读书人从小诵习,那么这部书的价值便可与《尚书》、《春秋》相比美,人们尊奉的“六经”也可增加而成七了。王充所言,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对“汉书”的召唤。《论衡》即是一部用政论形式“宣扬汉德”的作品,书中直接赞美汉朝功业的篇章,还有《恢国》、《宣汉》、《验符》、《超奇》、《齐世》等篇。

王充所论与班固的著史目的是相通的。班固恰恰也意识到撰写汉史的需要。《太平御览》卷六百三《史传》上引《后汉书》:“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因

史迁所记,乃以汉代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至王莽,为纪、表、志、传九十九篇。"①班固《汉书·叙传》中也有类似说法:"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纪,缀辑所闻,以述《汉书》。"班固不满意"以汉代继百王之末",固然是正宗思想的表现。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班固主张"大汉当可独立一史",客观上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的积极意义,而且以艰苦的史学实践,成功地回答时代对"汉书"的需要。因而,对班固"宣扬汉德"需要有新的看法,应该承认,班固这样做,在当时有其历史进步性。以史学实践满足社会思想前进的要求,是班固的一大贡献。

白寿彝教授在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对《史》、《汉》作比较研究,独到地分析了班固的正宗思想及其在十志等方面的贡献,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且在研究方法上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今天,我们应该推进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做《汉书》、《论衡》的比较,使我们达到更深层的认识,更准确地确定《汉书》时代和历史的方位,从而提高对班固史学成就的评价。

与《汉书》撰写目的密切相联系的是: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叙述高祖之母"梦与神遇"而生高祖,高祖斩白蛇是赤帝子斩白帝子等神话,历来也因宣扬"皇权神授"、宣扬神怪迷信而一再受到贬斥。这一点,我们再拿《论衡》中相关的内容作比较,也能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

---

① 按,这部《后汉书》作者未详。

王充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气”生万物，讲“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使应政事，是有非自然也”，对于人死后变鬼的迷信说法，驳斥尤为有力。[①] 然而，《论衡》书中又有许多地方讲“天命”，如讲到高祖的神怪故事的，书中就有《吉验》、《初禀》、《指瑞》、《齐世》、《宣汉》、《恢国》等篇。仅举出《吉验》篇所载即略见一斑。篇中云：“高皇帝母曰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蛟龙在上。及生而有美。性好用酒，尝从王媪、武负贳酒，饮醉，止卧，媪、负见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饮醉，酒售数倍。后行泽中，手斩大蛇，一妪当道而哭，云：‘赤帝子杀吾子。’此验既著闻矣。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高祖之起也，与吕后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求之，见其上常有气直起，往求辄得其处。后与项羽约：先入秦关王之。高祖先至，项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气，气皆为龙，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气也。急击之。’高祖往谢项羽。羽与亚父谋杀高祖，使项庄拔剑起舞。项伯知之，因与项庄俱起。每剑加高祖之上，项伯辄以身覆高祖之身，剑遂不得下，杀势不得成。会有张良、樊哙之救，卒得免脱，遂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龙之神；既生，酒舍见云气之怪；夜行斩蛇，蛇妪悲哭；始皇、吕后，望见光气；项羽谋杀，项伯为蔽，谋遂不成，遭得良、哙：盖富贵之验，气见而物应、人助辅援也。”举凡《汉书·高帝纪》所有的神怪故事，此篇全有，甚至讲得更集中，更活灵活现。王充在此篇中，还讲光武生时，“时夜无火，室内自明”；嘉禾生，“三本一茎九穗”，等等。《论衡》书中还讲明帝、章帝时祥瑞很多，“永平之初，时来有瑞，其孝明宣惠，众瑞并至。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时

① 以上分别见《论衡》之《自然》篇、《寒温》篇、《论死》篇。

俱应,凤凰、麒麟,连出重见,盛于五帝之时"[1]。这类神怪、符瑞说法盛行的原因,一者,自西汉中期"天人感应"学说传播,至西汉晚期、东汉初期,更形成谶纬迷信的极度泛滥。王莽、刘秀都曾利用图谶迷信说法上台。光武中元元年(56),还"宣布图谶于天下"[2]。章帝时,天下各郡国竞相献上符瑞,种种迷信说法弥漫于朝野。二者,汉高祖斩白蛇之类神话所以特别为人们所乐道,还由于刘邦平民出身,"无土而王",古代帝王无此先例,这是汉代人无法解释的。于是把他神话化,在他头上添加层层光环。这种特殊的社会和思想的环境,造成《汉书》中大讲刘邦的神怪故事,也造成《论衡》中大讲天命符瑞,并不足怪。问题在于:《论衡》中讲了那么多刘邦的神话,却并不影响我们称王充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而对于讲了刘邦神怪故事的班固,我们多年来却一味加以严厉的批评,这不是不大公平吗?对于同一时代人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只能使用同一个标准来进行评价。班固神化了西汉皇朝,其目的在于神化东汉皇朝,这是他封建正宗思想的表现,指出其历史局限性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们又应了解:即令在王充这样的代表时代思想最高水平的哲人身上也有类似的反映,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出这样的思想,那么对于班固也就不应过分地责备。

二　继《史记》而起的巨著

《史记》产生于封建制度成长的前期,《汉书》产生于封建制度业已全面确立的时期,两部史书在历史思想的不同特点,即是

---

① 《论衡·讲瑞》。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

它们各自时代的投影。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处于迅速上升阶段,就中国整个两千年封建社会来说,也是它最有生气的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讴歌"汉兴,海内一统"的局面,对于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中处于发展阶段的封建等级关系,他表示赞成并加以维护。当时,文化上"独尊儒术"的政策刚刚提出,专制主义还没有充分控制各个思想领域,所以司马迁仍继承了先秦诸子百家的余波,要"成一家之言",敢于提出与统治者不同的观点,思想比较自由。到东汉班固的时代,封建制度已经稳固化。在文化上,自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以后,经过西汉宣帝石渠阁会议,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会集大儒讲论经义异同,皇帝亲临裁决,表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控制达到强化的程度。① 班固参加了白虎观会议,并被皇帝指定为整理会议纪录的定稿人。这种时代特点及班固本人跟东汉皇室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他要站在朝廷的立场说话。《汉书》封建正宗思想之时代根源,正在于此。

不过,我们不能因《汉书》的正宗思想而忽视其进步面,也不能因班固有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话,而忽视他对司马迁优良史学传统的弘扬。无论从班固创立的修史格局,从他的实录精神,特别是从班固对历史问题的见识来说,《汉书》都不愧为继《史记》而起的成熟巨著,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地发掘和总结。

(一)班固继承了史记的体裁,同时发扬了司马迁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创造精神,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格局

《史记》成书以后,它的巨大成功吸引着许多学者继续司马迁的工作。人们对司马迁所载只止于汉武,太初以后没有记载,感到极大遗憾,希望一代代史家继续写下去,保持历史记载的连续

---

① 参阅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叙篇》第2章。

不断。自司马迁之后一百余年间,续《史记》的作者,先有褚少孙,以后有刘向、刘歆、冯商、杨雄、史岑等十五人[①],以及班固之父班彪。班彪续作成绩最大,他"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他具有独到的眼光,认为以往那些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于是"乃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②],作"后传"六十五篇。当时学者对班彪续作给予高度赞扬,王充称他:"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③]说班彪的续作超过《史记》显然过分,但他的努力成为班固著《汉书》的重要基础,则应该肯定。

从褚少孙至班彪,尽管在推进司马迁以后的史学上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是他们所做的却只限于"续作"。即是说,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所做的工作置于司马迁巨大成就笼罩之下,只限于修修补补。他们并未意识到需要构建新的史书体系。而这个问题若果不能解决,则"保存历史记载连续不断"的目的,是不能达到的。试看:在众多的续作者中,除褚少孙所补的若干段落由于附于《史记》,班彪所续的一些内容由于存在于《汉书》,因而得到保存外,其他作者所续之篇,早已统统湮灭无闻,便是明证。若无一个构建起来的体系,再好的内容也无从依托,既不能流布于社会,更不能传留给后代,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班固却有气魄创立了著史的新格局。他"断汉为史",在内容上提供了时代所需要的历史教材,在构史体系上则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史学从司马

---

① 此据《史通·古今正史》。其余10人是卫衡、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此外,《通志·总序》还讲有贾逵。又,据《汉书·杨恽传》,言司马迁外孙杨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或者也有所补作。

② 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班彪传》。

③ 《论衡·超奇》篇。

迁的巨大身影笼罩下走出来,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司马迁在先秦史书规模比较狭小、形式比较粗糙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和改造,创立了气魄宏大的纪传体史书,在历史编纂上表现了了不起的创造活力,这对班固是很大启发。《汉书》的体裁,是对《史记》的继承,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造,以后历代修史者对此沿用不改。今天我们考察这个问题,还应该比前人有进一步的认识:它意味着班固创立的断代为史的格局,恰恰符合中国封建社会演进久远行程中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所以才被相继沿用垂二千年。

(二)班固撰《汉书》,还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首先是体现在班固对司马迁史学成就的评价上。《汉书·司马迁传》赞语,内容大体采用班彪所写的《略论》[①],代表了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史学的看法。赞语对司马迁史学有表扬有批评:"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是拿"独尊儒术"以后将儒学神圣化的正宗观点,去衡量别一时代的思想而得出的偏颇结论。其实,司马迁并没有贬低孔子和儒学,正相反,他对孔子和儒学是多所肯定和表彰的。事实不胜枚举:司马迁认为孔子所修《春秋》,是"王道之大者","礼义之大宗","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司马迁宣称他撰史目的,就是"继《春秋》"[②];司马迁整理史事、考辨史事的基本方法和标准,是"考信于六艺"[③];司马

① 参见《后汉书·班彪传》。
② 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 《史记·伯夷列传》序。

迁为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修撰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儒林列传》，特别是在《孔子世家》赞语中讲，许多生前地位显赫的人物死后都被人忘却，唯独孔子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不朽，“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孔子学说非常尊奉，证据凿凿，不可否认。所以直到近代，龚自珍仍称司马迁为“汉大儒司马氏”[①]。梁启超也说，“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②]，“司马迁固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矣”[③]。司马迁与班固所不同处在于：司马迁是以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眼光表彰儒学，他不把儒学绝对化、神圣化，而他在推崇儒学的同时，吸取老庄、法家等学说的内容，并且批评俗儒、陋儒和谄媚之儒；班固则把儒学绝对化和神圣化，将儒学跟老庄等学说对立起来，尊此抑彼，毫无调和余地。正宗思想使班固走得太远了，所以他要对司马迁做出“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偏颇批评。

可贵的是，班固并没有因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有所批评，而降低他在史学上的杰出成就。相反地，班固十分推崇司马迁的著史才华和品德：“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④]称赞司马迁既具有善序事理的史学才华，又具有直笔无隐的高尚史德，实际上，是尊奉他是历史家的楷模。班固的这些精到评价对于确立司马迁在史学史上的地

① 《龚自珍全集·陆彦若所著书序》。
② 《读书分月课程》，《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
③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④ 《汉书·司马迁传》。

位起到了不能低估的积极作用。班固不被其正宗思想所蔽,公正地表彰司马迁的杰出史学成就,这本身就表现出班固忠实于历史的品格,并且说明,他同样以“不虚美、不隐恶”,写出“实录”式的史书作为自己的治史准则。

其次,体现在班固对内容取舍和史料抉择的标准上。前人曾批评《汉书》武帝以前“尽窃迁书”①,这个批评是极其不妥的。既然司马迁对西汉历史的记述是“实录”,那么《汉书》武帝以前的史实,当然绝大部分要以《史记》为依据,班固这样做正是忠实于历史,未可指摘。况且,即令对武帝以前历史的记述,班固也在进一步占有材料的条件下,作了不少有价值的补充。我们对此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增设篇目,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东方朔、李陵、苏武等传。特别是张骞事迹,《史记》仅附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后,叙述简略。《汉书》特为张骞立专传,给予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二是班固根据“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②、“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③的原则,在有关篇章中记载了西汉一代重要的文章、言论。如《贾谊传》载其《治安策》,《食货志》载其《论积贮疏》;《晁错传》载其《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食货志》载其《论贵粟疏》;《贾山传》载其《至言》;《邹阳传》、《枚乘传》各载其谏吴王书;《韩安国传》载其与王恢辨论对匈奴策略的言论;《公孙弘传》载其《贤良策》。④ 三是《汉书》对西汉前期史实也有重要增补,如《萧何传》增项羽负

① 郑樵《通志·总序》。
② 《汉书·贾谊传》。
③ 《汉书·晁错传》。
④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

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汉王怒,欲攻羽,萧何力言不可,乃之国。《韩信传》对韩信战功,《王陵传》述吕后王诸吕的复杂经过,也都有重要补充①。根据班固自己所申明,凡是《史记》所无材料,决不随便添加,必须确凿有据,方予增补,否则阙疑。《张汤传》赞语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又《东方朔传》称,朔以滑稽诙谐著名,"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考核的结果,凡属刘向著录的东方朔的言行才可靠,"世所传他事皆非也"。从班固昌言的标准和他对材料的严格审核,确实说明他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第三,也是最主要一点,体现在班固敢于秉笔直书、揭露汉代封建统治的阴暗面上。《汉书》是以宣扬汉朝政治功业为撰写目的的,那么,敢不敢暴露汉代封建统治的阴暗面,就成为班固是否具有"实录"精神的试金石。班固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他发扬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好传统,据事直书。有的学者称赞班固"不为汉讳",是很中肯的②。这里举出以下四个方面。1. 班固揭露西汉土地兼并的严重。《食货志》载有董仲舒上言,讲汉代仍继续秦朝当年严重兼并的局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因此建议"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同篇又载: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所以又提出限田。《哀帝纪》中也载皇帝的诏令承认兼并的严重:"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无限,百姓失职,重困不足。"2. 揭露诸侯王及外戚集团奢侈纵欲,无法无天。《景十三王传》总括说:"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在

① 参见安作璋《中国史学家评传》(上),《班固》。

② 冉昭德:《班固与汉书》,《中国史学史论集》第1册。

骄淫失道。"并载广川王刘去,"燔烧亨(烹)煮,生割剥人。距师之谏,杀其父子。凡杀无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节绝理"。江都王刘建,纵狼杀人,或将人幽禁活活饿死,"凡杀无辜三十五人"。《外戚传》揭露外戚集团利用裙带关系盘踞高位,"穷富贵而不以功",骄奢淫逸,凶狠残忍,宫廷后妃之间、外戚之间因争宠争权,互置对方于死地,甚至杀人投毒。3. 班固对于即使是他所盛赞的"文景之治"时代,也能不加隐饰地揭示当时的弊政。《贾山传》引其《至言》,谏文帝"功业方就,遂耽逸乐。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路温舒传》讲景帝时冤狱遍地,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班固对宣帝时期吏治修明也是大加赞扬的,同时他对当时地方豪强作恶多端也如实记载。《酷吏列传》载:宣帝时涿郡豪强西高氏、东高氏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4. 班固还深刻地揭露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学进身任官制度,是打开为利禄奔竞之门:"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日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1]他还总结自武帝以后"以儒宗居宰相位"那班人物,如公孙弘、蔡义、韦贤、韦立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等,都是"服儒衣冠,传先王语","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2],尖锐地抨击这些以儒学大师进身的显赫人物,都

① 《汉书·儒林传》赞。

② 《汉书·公孙弘传》。

是庸碌自私、巧于饰己、专事谄媚之徒，根本不配居于宰相地位。在各人传记中，班固对他们的虚伪、贪婪多所揭露。如载公孙弘对武帝专事谄媚，对同僚则"外宽内深"，设计陷害，"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匡衡假报所封临淮郡地界，侵占田地四百顷。张禹"内殖货财"，"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①。《陈万年传》载，身为御史大夫的陈万年，病重时召其子咸至床前，教至半夜，咸睡着了，万年怒不可遏，咸忙"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对这位大官僚谄媚本质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独尊儒术"是西汉的国策，班固的这些记载，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对西汉政治状况和官场风气作严肃批评。班固具有这种见识和史德，是值得称赞的。

（三）实录精神和历史见识，使班固能够较深入考察历史进程，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阐述，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见解

《汉书》固然有浓厚的正宗思想和天命思想，这是时代打上的烙印。然而，我们又应肯定其中有重视历史时势的进步思想。

刘邦为什么能"无土而王"，迅速建立起汉朝，这是西汉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班固在《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中对此作了分析。他总结自虞夏至秦之得天下，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创业：虞、夏之兴，"积德累功"数十年；商汤、周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历十余世，而后成功；秦的帝业，先由襄公崛起，经过文公、穆公、献公、孝公、昭襄王、庄襄王历代经营，"稍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并天下。刘邦得天下却与历代君主相去天壤，"无尺土之阶，繇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

① 均见《汉书·匡张孔马传》。

书传所记,未尝有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大变局?班固认为,这是因为秦始皇的倒行逆施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为刘邦的迅速兴起准备了条件。秦始皇本来冀图以取消分封制、销毁天下兵器、禁绝儒学、大事征伐等等,巩固其统治,"用壹威权,为万世安",结果恰恰激起人民的反抗,"十余年间,猛敌横发乎不虞,適戍疆于五伯,闾阎逼于戎狄,响应瘮于谤议,奋臂威于甲兵。乡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而速自毙也"。这样,刘邦"无土而王"这一亘古未有的历史新格局,就完全可以用能够确切指明的时代条件来解释。班固用"势"的命题对此加以概括,云:"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业,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班固对于历史时势的看法,是在司马迁认识的基础加以发展的。司马迁极为重视秦亡汉兴的历史教训,《史记·秦汉之际月表》序中,他论述刘邦得天下的原因云:"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司马迁确已论及秦的暴政为汉的兴起准备了条件,表现出其卓识,他感慨"岂非天哉",其中也确有历史时势的意味。但是不能否认,司马迁讲的"天"又含有命定论的意味,所以他称刘邦为"受命而帝"的"大圣"。换言之,司马迁的议论中重视历史时势与命定论二者兼而有之。相比之下,班固的认识明显地提高了,他完全以历史时势来解释,摆脱了命定论的影响。这是观点上的一大进步。与此相联系的是,班固批评司马迁引用贾谊的一个论点:"向使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班固认为,这是对历史的客观趋势判断错了,

"不通时变",不知"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公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①。班固所论显然比较符合历史时势。

藩国问题是西汉史又一大问题。司马迁的时代,西汉朝廷与藩国斗争的过程尚未结束,过程中矛盾的各个侧面尚未充分暴露,因而他不可能作全面的总结。班固后来居上,他站在新的时代高度,能够俯瞰西汉初至武帝时朝廷与藩国斗争的全过程,从而在《史记》的基础上,对此做出较全面、深入的总结。这也是《汉书》的突出贡献。

《诸侯王表》序中肯地描述了藩国势力对西汉国家的危害,"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尾大不掉,构成对朝廷的严重威胁。对西汉朝廷与藩国势力作斗争所经主要阶段,班固也做出了正确总结:"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诸侯唯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标志着严重的藩国问题得到解决。这些论述提纲挈领,接触到历史的实际情形,向来成为后人论述西汉藩国问题最权威的依据。《汉书》贾谊、晁错两传,详载他们向文帝、景帝郑重提出的削藩主张,显然都是班固有意为之,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里还想讨论《汉书》有关篇章中所反映的藩国问题的曲折性、复杂性,限于篇幅不能展开,只能简略提出三点:1. 班固论及汉初分封同姓王,在一段时间内对于韩信、彭越等异姓王起到制约作用问题。如讲"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姓九国"。"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

① 《文选》卷四十八,班固《典引》序,并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附录。

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赖之于诸侯也"[1]。2. 贾谊反复陈述侯国必然造成祸乱,危害朝廷,"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臣窃言前事,大抵强者先反"。他所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实际上成为解决西汉藩国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而在具体做法上,贾谊甚至提出以藩国制藩国的策略。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后,贾谊建议文帝大封皇子武(淮阳王)为梁王,封国占有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大片地方,以起到"扞齐、赵"和"禁吴、楚"的作用。班固特别载明,至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乱时,"合从举兵,西乡京师,梁王扞之,卒破七国"。还在《叙传》中概括《贾谊传》的撰写意旨:"建设屏藩,以强守圉,吴、楚合从,赖谊之虑。"赞扬贾谊的预见性,同时反映出在一定时期内亲近封国对疏远的封国的制约作用。可见,《汉书》论述藩国问题,既从总体上看到藩国必乱的结局,又能有分寸地反映出特定时期特定封国的积极作用。包括藩国问题的解决在内,历史发展不可能是平坦的、笔直的,它只能走曲折的道路,这是历史辩证法的体现。笔者认为,《汉书》记载的这些问题,至今仍有丰富我们的认识、启发我们思维的作用。3.《汉书·晁错传》比《史记》更公正地评价了晁错主张削藩的贡献。晁错是景帝时期代表西汉朝廷对藩国坚决斗争的关键人物。他明知将由此立即引来杀身之祸,而毫不动摇。对于这样一个悲剧人物,班固作了公正评价:"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2]。肯定晁错为国尽忠,后人世代承认。比较《史》、《汉》对晁错的评价即可发现:班固的评价,采用了司马迁的正确部分,而纠正了《史记》中自相矛盾的见解。《史记·晁

---

① 均见《汉书·诸侯王表》。

② 《汉书·晁错传》序。

错传》赞曰："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耶！"并没有肯定他主张削藩的积极作用，相反地，责备他的动机是"为报私雠"，做法是"变古乱常"。这些都是不恰当的。然则，司马迁毕竟要写出忠实于客观历史的"实录"，因此他记载了邓公称颂晁错和批评景帝的话，称他建议"削地以尊京师"是"万世之利"，是一个"忠臣"。在《吴王濞列传》中，司马迁也称晁错"为国远虑"。这样，司马迁对晁错的评价就自相矛盾。班固纠正了《史记》的矛盾说法，把其中正确部分吸收过来，并加以提高。《汉书·晁错传》中详载其事迹，并将他施行于世的言论采辑于篇，客观上讲，是表现了封建阶级上升时期，这样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冒险患难的可贵精神。班固这样做，就为那个时代，同时也为《汉书》增添了光彩。

班固评论武帝时期人材之盛也很精彩。他认为，武帝时期大批人材的出现是由历史时势造成的。这一观点见于《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的论赞。班固讲，这三个人在武帝时分别身居丞相、御史大夫。可是他们都出身贫贱，或放猪，或放牛，或当伙头。这样低微的出身，"非遇其时"，能够上升到高位吗？班固认为，这正是时势造就人材的结果。汉初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代，已经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大有作为了。当时要做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开拓边境，奠定版图，二是需要建立一套礼仪、政治、法律等等制度。"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时代需要大量人材，人材便成批涌现出来。当时各方面都有不平常的人物施展才智，如儒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儿宽，荐贤的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令的赵禹、张汤，文学家司马迁、司马相如，天文历算家唐都、洛下闳，音乐家李延

年，理财家桑弘羊，外交家张骞、苏武，大将卫青、霍去病，一共举出十四个方面二十七个特殊人物。

依靠这些特殊人物，使武帝时代达到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这又寓含着杰出人材推动社会前进的可贵认识。班固认为，汉宣帝时代也颇有作为，“纂修洪业，亦讲论六经，招选茂异”，举出当时在儒学、文章、将相、治民等方面“有功迹见述于世”的人物，如萧望之、刘向、赵充国、龚遂等。总的讲，班固认识到时代的需要造就了有作为的人物，人物的作为又推动时代前进，不但论述问题完全从时势着眼，而且体现出从许多个别事例中概括出共性的道理，一点也没有掺入天命、迷信的意识。班固所论述的，自然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人物产生及其作用的原理无法相比，但其中有相通的地方，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一千九百年前的班固能达到这一认识高度，说明他有非凡的历史见识。

（四）《汉书》还具有一定的人民性

班固历史思想的人民性，首先表现在对西汉几个帝王功业的评论上。他最早提出“文景之治”这一著名的历史概念，此后一向成为恢复生产、爱惜民力、轻徭薄赋政治局面的象征。《文帝纪》赞语表彰文帝“敦朴为天下先”，不准在宫中建造费值百金的露台，从皇帝本人到宠爱的后妃都衣着简朴，是为历代帝王所罕见。班固特别强调文帝以“利民”、“恐烦百姓”为治国标准，他的不事征伐，采纳臣下谏议，都是由利民而不扰民的方针所支配，因此在位期间，出现了“海内殷富”的局面。《景帝纪》赞高度评价汉初以来与民休息政策的成效：“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对于景帝遵奉文帝“利民”的功业衷心地赞美。

班固推崇武帝的雄才大略,多所设施,奖拔人才,但又批评他连年用兵,造成人力物力的大量虚耗,沉重地增加了人民负担。内容见于《武帝纪》、《刑法志》、《循吏传》序等。从班固对武帝时期弊政一面的批评,也反映出他对民众利益的关心。

其次,班固历史思想的人民性,还表现在以赞赏态度记述宣帝时期的吏治和考察制度。对于出身贫贱的汉宣帝,如何"五日一听事",让丞相及各大臣报告履行职责情况;如何重视刺史一级地方官的任用,考察其政绩,了解其实情;对于好的地方官如何郑重赏赐表彰,并从中选拔征用朝廷大臣,班固都予以详载。这套办法确实奏效,出现了一批有名的良吏,"所居民富,所去见思"①。在位二十四年中,"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被称为西汉"中兴"时期。② 班固对宣帝时期如何任用、考察官吏的记载,今天看来,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有思想上的价值。

(五)《汉书》十志在史学上的突出贡献——"将书志体完善起来"

《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基础上发展的。根据白寿彝教授的研究,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具体来说有两大贡献。1. 十志"为史学上的有关学科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是很有地位的。有的为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学术史、历史地理各科的学术源流,提供了开创性的著作","好多分支学科都是从十志开始有记载"。2. "从十志中,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统治集团的作用"。"要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及封建国家的作用,班固

---

① 《汉书·循吏论》。
② 《汉书·宣帝纪》。

在十志中提供了很好的材料”[①]。发挥白寿彝教授上述论点,对十志作专题性探讨,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只能就《食货志》中班固如何论述经济生产活动谈点粗浅看法。

《食货志》中虽有生产活动是先王之教的唯心说法,但又认为:生产活动是社会生存的基础,食与货二者是“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借古今经济状况的变化,可以鉴知国家的“盈虚”。这些有唯物倾向的见解,后来明显地为杜佑等所发展。

全篇基本思想,则论述封建国家经济政策影响到生产的发展或破坏,决定了国家的盛衰。班固论秦的灭亡,实实在在地归结到经济上的原因:“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海内怨然,遂用溃畔。”他着意将汉初经济的凋敝与武帝初年的繁荣相对照,证明那些仿佛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财富,乃是由六七十年间连续执行“约法省禁”政策取得的。而这种雄厚的经济实力,则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提供了物质基础。又如论王莽的灭亡,班固认为,既有类似于秦亡的原因——王莽对匈奴征战,“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海内困矣”;又有不同于秦亡的原因——王莽由于慕古,任意变换各种“不度时宜”的措施,制造混乱,加上横征暴敛,刑罚严酷,造成“民愈穷困”,激起遍地农民起义。按照班固的论述,自战国至西汉末的历史变动,都可以用经济的升降、国家政策的成败得到确切的解释。这同历史唯物主义从经济条件去说明历史事变的终极原因,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其中确有某些萌芽意识。班固还记载宣帝时,“善为算能商功利”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从关内籴粟运京,以省关东漕

① 《司马迁和班固》,见《司马迁研究新论》一书“代序”。

运每年需卒六万的巨耗，大儒萧望之用阴阳感应说法反对。宣帝拒不采纳望之所议，结果“漕事果便”，耿寿昌并将籴粮筑仓之法推行到边郡。班固的记述，也是对唯物论主张的褒扬和对阴阳灾异唯心说法的深刻讽刺。

三　六百年间学者“共行钻研”

《汉书》成书后所经历的命运跟《史记》很不相同。《史记》著成后并未被人们重视，至宣帝时，才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①]。《史记》在东汉甚至被目为“谤书”。汉晋时期对它研究的学者很少。《汉书》成书后则受到普遍的推重，史称：“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②]邓太后临朝时，遍注群经、学生千人的经学大师马融，还“伏于阁下，从（班）昭就谈”。这说明当时学术极重专门传授，也证明《汉书》一出世就享有很高学术地位。至唐司马贞，对《史》、《汉》传习的不同情况这样作了总结：“《史记》汉晋名贤未见推重。”[③]“《汉书》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备至，故其旨富，其辞文，是以近代诸儒共行钻研”[④]。司马贞主要活动于唐贞观年间（714—741）。据此可知：《汉书》从东汉起备受推崇，长达六百余年。学者们“共行钻仰”的情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见到：

视为《五经》之亚，遵为修史法式。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

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后汉书·班固传》。

③ 《〈史记〉索隐》序。

④ 《〈史记〉索隐》后序。按，司马贞生卒年未详。他于贞观初任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晚年撰成《〈史记〉索隐》。

雕龙·史传》篇中称赞《汉书》:"宗经矩圣之典,端绪宏赡之功。""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余味"。与刘勰同时的萧统(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其中"史论"和"史述赞"所选的代表作,有《汉书》的《公孙弘传赞》、《高祖纪赞》、《成帝纪赞》、《韩彭英卢吴传赞》共四篇,《史记》却一篇未选。

刘知幾作为杰出的史评家,他对《史记》、《汉书》这两部巨著在史学上的贡献都有很高评价,而从编纂学角度和反映当时学者所喜爱说,他又较看重《汉书》。他认为,《史记》对纪传体有开创之功,诸体配合,优点很多;不过它是通史体裁,"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不易做好。《汉书》继承了《史记》体裁,又断代为史,实在优胜得多:"究西都之始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讫今,无改斯道。"[①]他还概述学者尊奉《汉书》的情况:"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②]可见《汉书》在当时的地位仅次于《五经》。继《汉书》而起,历代修成断代"正史"并流传下来的,先后有《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刘知幾所讲"自尔讫今,无改斯道",就是对这六百年间历史编纂上效法《汉书》的取向所作的概括。

传授注解的学者辈出。《汉书》在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等家注解。此后,历史专门研究的学者辈出,成为一门发达的学问。据《隋书·经籍志》著录,自汉至唐,注释《史记》的著作只有裴骃、徐野民、邹诞生三种。注《汉书》则多达十七种,作者有应

---

① 《史通·六家》。

② 《史通·古今正史》。

劭、服虔、韦昭、刘显、夏侯咏、萧该、包恺、晋灼、陆澄、韦棱、姚察、项岱等。姚察对《汉书》研究尤精，一人所撰即有《〈汉书〉训纂》、《〈汉书〉集解》、《定汉书疑》三种。因此《隋志》概述说："《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亦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

唐初颜师古撰《〈汉书〉注》，是对注释《汉书》一次集大成的工作。据他所撰《〈汉书〉叙例》所列，共综合了二十三家注解。其中确知时代的，荀悦、服虔、应劭是东汉人，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如淳、孟康是魏人，韦昭是吴人，晋灼、刘宝、郭璞、蔡谟是晋人，臣瓒、崔浩是北魏人。此外注家能见到姓名的，梁时有刘孝标、梁元帝，唐时有颜游秦、刘伯庄、李善。六百年间传习注释《汉书》的学者如此众多，尤其能说明其地位在当时确实超过《史记》。

被当作必读的历史教科书。这里有两个典型例证。一是《三国志·吴主五子传》载：孙权立孙登为太子，张休为太子师傅。"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汉书》所载是"近代史"，所以被这位江东霸主指定为太子必读的教科书。另一是《陈书·姚察传》所载，陈宣帝时，姚察任职史馆，以兼通直散骑常侍身份，出使北周。传中记载的这次出使的唯一史实，是"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亦为剖析，皆有经据"。由于当时双方是对立政权，官员之间的私人接触很受避忌。这位沛国人士竟为研读《汉书》而甘冒风险，偷偷前来找姚察请教，足见《汉书》对当时士大夫有何等的吸引力。

《汉书》如此盛行六个世纪，时间可谓漫长，究其原因，也应是多方面的。书中的正宗思想适合封建士大夫的胃口，自是重要一

项。此外，它所载“近代史”为人们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教科书，它包举一代的完整性，使研究汉史者极感方便，它开创的史书新格局成为后代修史“定式”，它囊括的丰富内容具有很高的、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些也都应该是重要的原因。

（《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

《汉书》的实录精神与正宗思想

许殿才

《汉书》作者班固曾推许《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以下凡引《汉书》者，只注篇名），其实这也是他对《汉书》的根本要求。他继承了古代史家不畏强御、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如实记录了封建统治者淫逸腐败，残害人民的罪行。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恶政，成帝宠信赵氏姐妹、毒杀亲子的罪行，书中都做了详细记述。文帝是汉代恭俭爱民的典型，是班固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家，可他仍逃不脱班固的笔伐。邓通是文帝男宠，此人“无他伎能，不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文帝一改俭朴作风，对他特别慷慨，曾赐他“钜万以十数”。有人给邓通相面，说他会因贫穷而饿死。文帝听说后竟大言：“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乃赐给邓通蜀严道铜山，让他自铸钱，结果“邓氏钱布天下”（《佞幸传》），邓通成了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富翁。这同文帝惜百金而罢筑台，“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纪赞》）的记载对比起来，真有绝大讽刺意味。班固通过这一事例告诉人们：即使是最有德、最恭俭的封建帝王，骨子里仍脱不掉自私、奢靡、矫饰的习性。这是《汉书》中

耐人寻味的史笔。

《汉书》对宗室外戚以及封建官吏的贪残本质也作了揭发批判。江都刘建是个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不但据父妾、淫胞妹，而且杀人如麻。《汉书》详记了他的罪行，“建游章台宫，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复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后游雷波，天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复，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皆死。宫人姬八子有过者，辄令裸立击鼓，或置树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钳以铅杵舂，不中程，辄掠；或纵狼令啮杀之，建观而大笑；或闭不食，令饿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景十三王传》)。这样的恶棍真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可却长期逍遥法外。最后死于非命也是因为犯了封建朝廷无法容忍的谋反罪，与暴殄人命竟无关涉。杜周这样的枉法杀人者，其酷自不待言，其贪《汉书》也作了披露：“始周为廷史，有一马，及久任事，为三公……家訾累巨万矣。”(《杜周传》)如果不是搜刮百姓血汗，哪得如许横财？封建官吏残杀民众的罪行，令人发指。王温舒作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余里”。义纵为定襄太守后，“掩定襄狱中重罪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余人。纵壹切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酷吏传》)。

我们把《汉书》中记述的帝王皇族、贪官污吏的罪行联系起来，就会对封建朝廷的统治群体和封建政权的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这个客观效果为班固始料所不及，但暴扬其罪恶，使他们的真实面目昭示于天下后世，这却是班固有意为之的。东、西汉统治者有着亲缘关系，班固能无所顾忌，奋笔直书，显示了他高尚的史家品德。

班固对于史学功能有着自觉的认识，他在《汉书》中不止一次

地指出自己的历史记述目的是“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百官公卿表序》),“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鉴戒焉”(《诸侯王表序》)。以史为鉴,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殷鉴”思想几乎与中国史学并生,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史著产生的重要动因。班固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发展。他的以史为鉴是建立在对古今的历史考察之上的,是在“究其终始强弱之变”基础上来总结经验教训,这就把历史当作一个发展运动的过程来看待,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他还明确提出要“告往知来”、“瞻前顾后”(《叙传》下),把以往同未来相联系。班固虽然还不能清晰地认识到考察历史就是为了总结过去,服务今天,展望未来,但他把以往、现实同未来作为历史发展连续过程来看待的思想是明确的。史学有总结以往,预示未来的作用,对这一点,他的认识也是很清楚的。可见他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认识较前人有了一些新意,这对历史教育思想的发展有所推动。

班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以对历史的准确记述为基础的。实录精神与鉴戒思想的结合,形成《汉书》的鲜明特色。

《汉书》如实记述了西汉一代的社会发展变化。班固不但通过历史记述,反映了西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而且对每一阶段内的细微历史变化也做出准确交待,从细致的历史考察中,总结出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昭宣中兴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时期通过霍光、宣帝、魏相、丙吉等人的努力,调整了统治政策,摆脱了因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兴功业造成的国力虚耗、民生危殆的统治危机,经济又有所振作,政治上也出现了承平景象。《汉书》对此作了详尽叙述。特别有价值的是,他在这一整个历史阶段中,看到了社

会和民情的前后变化，揭示出昭帝时霍光所执行的统治政策与宣帝的不同："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师旅之后，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至于始元、元凤之间，匈奴乡化，百姓益富，举贤良文学，问民疾苦，于是罢酒榷而议盐铁矣。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励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其罚，或抵罪诛。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循吏传》）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昭帝纪赞》），执行的是文景以来既定的黄老无为而治政策。这在海内虚耗余敝之后，是恢复经济的得宜措施，取得了很大效果，是汉初成功经验的再次搬用。宣帝则吸取了武帝有为政策中的积极因素，采取"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宣帝纪赞》），"以霸王道杂之"（《元帝纪》）的儒法结合方针。在经济有所恢复，民生稍为苏息之时，用教化与刑罚并行的办法治理国家，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是以对武帝统治方针的扬弃而奏效。

就是同样在宣帝时期，班固也通过《魏相丙吉传》写出他们秉政的各自特点。魏相、丙吉都是汉代的良相，班固对他们做出了"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的总体评价，肯定了

他们的共同政绩。同时也细述了他们的不同之处。魏相执政于宣帝亲政之初,时"宣帝始亲万机,励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而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是与宣帝同样以严猛为治的。"时丙吉为御史大夫,同心辅政,上皆重之,相为人严毅,不如吉宽"。二人宽猛相济,收到了良好治效。丙吉执政后,"以宽为治,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椽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于官属椽史,务掩过扬善"。在宣帝刻薄寡恩,严诛大臣,已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丙吉从中调停,猛则济之以宽,使"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昭宣中兴得到善始善终。

班固用对不同方针取得同样成功的记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复杂,揭示了昭宣中兴时社会、民情及统治政策的细微变化。用生动的事实说明统治政策并无万应灵方,只有随着不同历史变化,采取不同的政策,而且要用一张一弛的手法,不断进行政策调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同时《汉书》也交待出了在变化中有不变的东西在,抓住治民这一封建政治的关键环节,是霍光、宣帝和魏相、丙吉的共同成功经验。这又为封建统治者指明了治国的根本大计。《汉书》的这个记述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西汉社会,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显示出班固历史考察的深度,也证明了《汉书》珍贵的实录价值和鉴戒功能。

《汉书》还善于见盛观衰,能从繁荣兴旺的景象下,挖掘出潜藏的社会问题,并探明产生问题的历史原因。

文景时代是西汉的全盛时期,此时由于汉兴以来执行黄老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的成功,社会经济迅速步出"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窘况,出现了"非遇水旱,则

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食货志》上)的繁荣景象。同时,社会秩序安定,道德情操向善,刑法由密而疏。人们把这一时期当作汉代最理想的时代,班固也对此作了衷心的赞美。可是这并没有使他陶醉其中而忘乎所以。他和司马迁一样,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此时已积攒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出现了由盛而衰的征兆。他赞成司马迁对文景时期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揭示了很多社会问题是无为而治政策的副产品。这种既见其长,又见其短的历史研究,具有辩证因素。

他记录了诸侯王“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诸侯王表序》),终致引发吴、楚七国之乱,险些倾复中央政权的历史事实。班固详细记述了这一问题从产生到解决的历史过程,点明了文帝的姑息政策,客观上鼓励了诸侯的离心倾向。《汉书》也记录了贾谊、晁错等人对待属国问题的政治见解及解决主张,为人们提供了借鉴。

对当时暴露并不充分的问题,班固也作了准确记述。书中明言的“盛极而衰”表现是:“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食货志》上)这里所述问题有三:一是由富厚而奢侈,并渐萌不臣之心。这以侯王高官为甚。梁孝王“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杰……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文三王传》)。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二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汉初,地广人稀,土地问题并不严重。到了民众蕃息,豪富又争于奢侈之时,土地

就成了争夺对象。文帝时已有“卖田宅者”,到武帝初年则重现了秦时“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食货志》上)的情景,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成为流民。三是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严重破坏了民众的安定生活。灌夫“诸所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窦田灌韩传》),是典型写照。班固揭示出朝廷的放任姑息(即“网疏”),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汉书》还记录了汉初除盗铸钱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法令的颁布,给富商豪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货殖传》)。“商贾大者积贮倍息”,“乘上所急,所卖必倍”,这就造成了“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食货志》上)的严重后果。

剥削阶级的奢侈腐化是以掠夺劳动人民为前提的,他们武断于乡曲也是以普通民众为欺压对象的,再加上官府的盘剥,奸商的搜刮,此时农民的生活已相当艰难。他们“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食货志》上),这就引起了社会根本矛盾的尖锐化。《汉书》揭示出此时已出现“民不益富,盗贼不衰”(《爰盎晁错传》)的局面,农民反抗斗争的地火已成即将喷发之势。

班固对文景时期社会问题的揭露,是《汉书》实录精神的很好证明。它的见盛观衰的历史考察方法在史学上具有珍贵价值,为史书记载社会问题树立了典范。《汉书》的藏往具有较高层次,这是它方以智的体现,后作诸史大都只能得其方,而不能得其智,其

价值自然难与《汉书》相匹。能从盛世中揭示出蕴含的社会问题，点明盛极而衰的趋势，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班固能引《史记》的知来拟神为同调，从对问题的考察中，机敏地捕捉到产生问题的契机，在赞颂文景无为政策同时，揭出这一政策的内在弊病，把历史现象的丰富、复杂和历史经验的错综变化，摹写曲尽。这是他历史研究中的高明之处，也是《汉书》可以增益人们历史智慧的可贵之处。《汉书》能够使人百读不厌，是因为它具有内在的魅力。

当然，任何一部史著的真实都是有限度的。抛开对史实的客观再现程度不说，时代精神和史家主体意识都会在史书中留下印记。班固是二千年前的人物，是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的实录精神离不开为地主皇朝服务的根本目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偏见，决定了他对封建政权、统治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看法上的错误。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帝王及统治阶级中杰出人物的过分颂扬、粉饰甚至曲笔隐恶之处。对于劳动群众历史活动的记述也还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对此我们既要指出这是《汉书》中的不足，又要看到这是时代局限使然。如果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班固，就犯了割断历史的错误。

对于《汉书》的正宗思想问题，我们也应抱持同样态度。《汉书》中确实表现出了很强的正宗思想，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也是很正确的，但由此而诋毁班固，贬抑《汉书》就属过当之举了。按现在的标准衡量，正宗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当然很不好，但在历史上，它却起过积极的作用。异端思想有其特殊价值，它的价值在于跳出时代局限，放眼未来，以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批判来鼓舞人们奋发向上，使社会保持前进的动力。这一价值在社会衰败，亟需变革时弥足珍贵。正宗思想具有服务社会现实，切近治国体要的特点。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它对于建立

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推动历史前进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我们应把握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积极与消极的辩证关系。如果用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判断来论定复杂的、活生生的历史问题，就不免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其实，《史记》思想的主调也属于正宗儒家体系，只不过因所处时代和个人身世的不同，使马、班在撰史中表现出了一些思想上的歧异，这种差异是在为封建统治政权服务这个根本点一致基础上的差异。《史、汉》之间的同大于异，只见其异不见其同，这是史、汉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对《汉书》的宣汉，人们攻击较多，认为这反映了班固思想中保守的一面。我们只要把这一问题放到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里，就会得到公允一些的结论。首先，汉代处于社会上升时期，它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当时需要由封建地主政权领导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宣扬汉朝的历史功绩，增强社会凝聚力，鼓舞人们同心同德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另外，针对当时盛行的复古倒退思潮，宣汉也是社会前进的需要。不把那些怀古恋旧，总想把历史拖向后转的反动思想驳倒，让死的拖活的，历史就不会前进。其实，处在社会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每个对历史前途充满信心，具有责任感的思想家、史学家都会热情讴歌当今的。在司马迁、王充的著作里，都可体会出强烈的宣汉意味。那么，我们为什么厚此薄彼，褒美马、王，而诋责班固呢？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简单幼稚的逻辑：凡是揭露以往政权弊病的，就是进步的，就大力褒扬；凡是肯定以往政权中值得肯定的东西的，就是反动的，就极力贬低。这个逻辑的荒唐可笑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不值一驳。可惜的是它长期以来几乎形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式，至今还很有市场，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客观评价。

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司马迁传》赞)表明了他同司马迁思想的一些差异,是他正宗思想较浓的说明,其中确有一些消极因素。但对此我们也可通过客观分析得出一些新的看法。

关于"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笔者认为,其一,这句话不能说明他不赞成黄老思想,只能说他认为司马迁把黄老放在六经之前是不对的。其二,这个评价对于司马迁是冤枉的。司马迁在书中并没有把黄老摆在儒家之上,他的基本思想仍属于儒家,只是异端色彩要比班固强烈一些。如据此得出马、班思想有根本差异的结论,则是很不恰当的。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主要因《史记·货殖列传》而发,是马、班异趣的一个明显体现。司马迁对于富、利的认识与理解,较多摆脱了儒家正宗思想的束缚,体现了他的异端色彩,具有超前意识。班固对经贸活动的看法,则同整个社会的经济、礼仪、教化、治安等现实环节联系更为紧密,表现出更多的现实性。它们各有其独特的价值,肯定司马迁经济观点的思想价值是很正确的,但过分贬抑班固就不公平了。

对"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问题,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传》中对于游侠的个人节义行为作了热情赞颂,表达了他反传统的思想见解,这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司马迁往往在对个人行为过分关注之中,忽略了对社会的考虑,对于某些游侠的不当行为,他也做了不适当的宣扬,这就是通人之蔽了。班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出发,考察了游侠产生及演化的源流,肯定了游侠的一些可取之处,也揭示出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呼吁将游侠导入

道德轨道,这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对《史记》的指责有过当之处,但他立足于社会现实,明于国家大体的长处却是司马迁所不及的。

在对《汉书》思想的认识方面,还有一个传统偏见需要纠正,这就是《汉书》中的儒家思想成分,并不像人们估量得那样高。这可以举出几个例证。

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记载班固,“博览群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这告诉我们,班固的思想及学术构成,并非纯粹儒家学说,这和他的堂伯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有些相似,与其父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叙传》上),却有很大差别。如果把司马迁与班固父子的学术思想加以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司马迁的儒家思想比其父司马谈浓郁纯粹,而班固的思想较之儒家意味更浓的班彪却复杂、丰富一些。

《汉书》对汉代儒家学说的变质,作了准确揭露:一是儒家学说渐杂祥异,二是儒家学说逐步成为经生谋生手段,变为禄利之路。笔者对此另有文章论述(《〈汉书〉的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如果说这还只是君子儒对小人儒的批判,那么书中对其他学派的肯定,则表明班固已站在较为公正的立场上,而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成见。在《汉书·艺文志》对各家学派的评述中,班固一方面承认儒家“于道最为高”,另一方面却把道家学说作为最有效的治国指导思想而肯定之,“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书中对汉初统治者采用黄老之术而取得显著治绩的大量记述与肯定性评价,对此有参证之助。对于儒家思想的局限性,班固也有很好的认识,《汉书》载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

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元帝纪》)借宣帝之口指斥了儒家学说的弊端,揭示出汉家的统治是以儒法结合为根本方针的,告诉人们儒学只可用于教化,单纯用它来治国则是取败之道。这样一段对话安排在《元帝纪》之首,绝不是等闲之笔,这是在西汉由盛而衰的转关处,点明盛衰之由的肯綮之节。

在儒家思想已定一尊的情况下,能有这样清楚认识,并做出准确评价,这是很不容易的。在此,笔者绝不是要用削减班固儒家思想成分的办法来抬高《汉书》,只是客观指出,对班固思想的看法还应全面、准确些。在对《汉书》思想的研究中,忽视上述材料是个不小的失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 年第 1 期)

班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

施　丁

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撰的《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自其问世以来,很多学者悉心研究,论著颇多,可以说是文史方面的显学。近几十年,一些专家学者对班固和《汉书》的"正统思想"、"折中主义"、"宣扬汉德"等史学思想作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很大成绩。本文仅就班固与《汉书》史学思想中为皇世一统、究政治得失、评为人为政三方面的问题,略作探讨,欢迎方家和读者指正。

一　为皇世一统

两汉时代,继秦朝之后,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正在健全着封建制度,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振兴了学术文化,人心向上,社会向荣;同时,统一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经济出现波折,学术文化宗旨不一,社会时安时乱。西汉初年,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曾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时政画谋献策,有效地促使西汉社会的发展。汉武帝时,司马迁纵横古今,评论百代,重点撰述秦亡汉兴的历史,迄于太初、天汉。自武帝以后,虽有昭宣中兴,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致使西汉皇朝衰亡,社会动乱不已,王莽新朝匆匆过场,刘秀趁机打出刘汉旗帜,收拾局面,振作"纲纪"。东汉

的兴起,恢复了统一,社会重新安定,经济逐渐复苏,但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西汉早就出现了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气等问题,而且数十年后,显然有了发展的趋势。这时的哲人智士,如班彪、王充、班固之辈,面对现实,反省历史,主要不是去走汉初学者的老路,总结秦亡汉兴,而是着重探讨西汉衰败的历史教训,为皇世一统贡献通识和思路。

班彪(3—54),自幼经历大动乱,身寄江湖。当群雄割据的两汉之际,他曾投奔拥众割据于天水的隗嚣。两人讨论世务,隗嚣问他当今是不是群雄逐鹿的形势。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刘汉政权,深入人心,它的衰败,"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所以王莽篡位"不根于民",自大乱以来,"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今民皆讴吟思汉,乡(向)仰刘氏,已可知矣"①。隗嚣不信其论,顽持其拥众割据的立场。班彪面对群雄角逐的现实,乃著《王命论》,表达己见,"以救时难"。他论说刘汉之兴,涂上了浓重的天命论色彩,说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从哲学的观点去看,是毫不足取的。但其论落脚点是:"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②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强调统一,反对分裂,意义是重大的。同时,他离开隗嚣,投奔河西窦融,为其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河以拒隗嚣;继又受刘秀征用,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

班彪这种思想和行为,对其子班固有深刻的影响。班固于永

---

①② 《汉书·叙传》。

平十七年所作《典引》就是"述叙汉德"的。他说:"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是高(高祖)、光(光武)二圣,辰居其域。……胡(胡亥)缢、莽(王莽)分……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唐哉皇哉,皇哉唐哉!"①李贤对最后二句作注:"'唐哉',谓尧也;'皇哉',谓汉也。言唯唐与汉,唯汉与唐。"②足见班固是"宣汉"的,并有"大一统"之意。

班氏父子的"大一统"思想,不止于此,在史学上有更突出的表现。班彪所撰《后传》,班固所作《汉书》,都是专写西汉历史,而着意肯定统一皇朝的。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史书(后世称为《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武帝,后事缺而不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史事,或补或续之。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认为补续迁书之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采集西汉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③。此书是续《史记》之作,"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④。《后传》原书已佚,难以探知其原貌。但从它有几十篇纪、传,其中已写了元帝、成帝两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⑤这个情况来看,它可能已基本上写了西汉后期的帝王纪及公卿大臣后妃的传记。

建武三十年(54),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时年二十三岁,在乡为父守丧,检阅其父著作。他感到其父"所续前史

---

① 《后汉书·班彪传》。

② 《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

③ 参见《后汉书·班彪传》。《史通·古今正史》篇说,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

④ 《后汉书·班彪传》。

⑤ 今本《汉书》保留了二纪、三传的"赞"语。

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58—75)初年起，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编撰《汉书》，专写西汉一代230年的历史。给统一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其兴亡盛衰及成败得失，完全适应了统一的东汉皇朝欲参考历史经验教训和借助思想文化进行统治的需要。

为了“大一统”，如何写汉史，班氏父子都从反思史学史的得失入手，而明确自己著述的旨趣。班彪的著述义旨，范晔在《后汉书·班彪传》中有这样的论述：“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并引载班彪的《〈史学〉略论》。《略论》主要通过反省史学史及迁书思想，而表达自著的义旨。其中写道：“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作史)……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班彪对司马迁著作，肯定记事有“良史之才”，但认为“议论浅而不笃”，其症结就在于没有做到“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而表示自己当信奉“平易正直，《春秋》之义”。可惜班彪的《后传》早佚，已无法检讨其书与迁作思想上的分歧。

班固接受了其父的这个思想，在评论司马迁著作时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①]范晔说"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缪于圣人"[②],只是对班氏父子与司马迁的是非分歧未作具体分析。班固的著述旨趣,在其所写《汉书·叙传》中表述得很靖楚。他说:"(本人)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于是作《答宾戏》。这是班固表述其著述义旨的重要文章,着重谈了两点:一是批驳"处皇世而论战国"。论曰:"若宾之言,斯所谓见势利之华,暗道德之实,守突奥之荧烛,未卬(仰)天庭而睹白日也。曩者王途芜秽,周失其御,侯伯方轨,战国横骛,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龙战而虎争。游说之徒,风扬电激,并起而救之,其余飙飞景附,煜霅其间者,盖不可胜载。……是故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彼岂乐为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禀卬(仰)太和,枝附叶著,譬犹草木之殖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苓(零)落,参天地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处皇世而论战国,耀所闻而疑所觌,欲从旄敦而度高乎泰山,怀氿滥而测深乎重渊,亦未至也。"班固认为,战国纷争,游士驰说,但孔孟之道不可贰;今大汉盛世空前,处皇世不可纵横,而当宗汉。这与班彪《王命论》的思想是一致的。二是申论为当世皇权服务。"昔咎繇谟虞,箕子访周,言通帝王,谋合圣神;殷说梦发于傅岩,周望兆动于渭滨,齐宁激声于康衢,汉良受

---

① 《汉书·司马迁传》赞。

② 《后汉书·班彪传》论。

书于邳沂，皆俟命而神交，匪词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无穷之勋也。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听，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欤）！若乃夷抗行于首阳，惠降志于辱仕，颜耽乐于箪瓢，孔终篇于西狩，声盈塞于天渊，真吾徒之师表也”。意思是说，历来的圣哲，都建策树勋，为当世服务，流芳于后世；如今当师法先贤，尤其应以孔子修《春秋》为师表。可见班固的著述旨趣，是要效法孔子与《春秋》，为“皇世”效劳，为“圣听”进言。这与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是大异其趣的。

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实际上是责其“先黄老”、“进奸雄”、“崇势利”，有违于“皇世”准则，而对刘汉一统不利①。

“皇世”与“一统”，既区别又联系。司马迁对汉朝和统一都是肯定的，但他鉴于君主专制的过度强化，会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便发表了一些不同于当朝汉武帝和公孙弘辈的言论。班固鉴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初年的曲折道路和复杂形势，为了“皇世”利益，批评了司马迁的观点，实际上是要加强思想的统一。大史学家的用心，不在乎细枝末节，而着眼于天下大局；虽是在纸上“谈兵”，却心系于国家前途。

二 究政治得失

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班固注意发扬这

① 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有待具体分析，这里从略。

个传统，其《汉书》总结西汉历史，首先注意究政治得失。在他看来，皇朝的政治得失，关系国家兴衰，民生苦乐，不可不探究。他所究政治得失，主要表现于对西汉的政制、礼法、经济、用人、夷夏诸方面的评议。

在政制方面，肯定郡县制有利于国家统一。秦汉统一，推广郡县制；郡县制普行，巩固了统一。司马迁谈到汉代前期诸侯与郡国势力互为消长时，曾说：汉初郡国并行，至于武帝之时，郡县制发展，“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①。虽然已提到郡县制的发展，加强了皇朝的集权和统一，但是观点尚不鲜明。而且，还有疏失和遗漏。如，贾谊政论文以《陈政事疏》（即《治安策》）为代表，其中首要的建议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司马迁却未曾记载。

班彪对郡县制的历史作用颇具卓识。他在答隗嚣今是否复起纵横之问时说：“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纵）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方今雄桀（杰）带州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②意谓昔日周朝行分封制，诸侯擅权，以致天下分裂；如今汉承秦制，确立郡县，强化皇权，巩固统一，即使一时社会动乱，也不至于危害郡县制，而长远影响统一。这个观点，比司马迁要高一个层次。

班固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和班彪的观点。他记述并指出，汉初郡国并行，诸侯“骄蹇，数不奉法”，“率多骄淫失道”，是皇朝的离心势力，对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才有贾谊、晁错之议，削

①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② 《汉书·叙传》。

藩之举。他评论贾谊之议"通达国体","吴楚合从(纵),赖谊之虑";评论晁错削藩之策,"锐于为国远虑"①,比司马迁的观点显然正确。他还指出,景帝削藩,"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帝"推恩"而析藩国,"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于是"诸侯唯得衣食税租,贫者或乘牛车"②,说明诸侯大为削弱,分封制已名存实亡。他论道:"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横,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国,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矣。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③他还创设《地理志》,确定"(秦汉)革刬五等,制立郡县"④,为本志首要的记述重点,详载西汉郡县情况,是对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历史总结,郡县制的命运,固由历史所选择;然其价值,则由史学家所判定,班氏父子对此是早具慧眼的。

在礼法方面,认为礼乐政刑皆不可缺,但当以礼乐教化为先。古代统治者往往礼法并用,软硬兼施;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用法严酷,不择手段,草菅人命;礼教往往忽视,或徒具其名。故先贤如孔子大力提倡"仁"、"礼";司马迁讽刺汉世酷吏横行、苛暴残民,要求官吏"奉法循理"⑤,声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

① 以上分见《汉书》之《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赞、《景十三王传》赞、《贾谊传》赞、《叙传》、《晁错传》赞。

② 《汉书·高五王传》赞。

③ 《汉书·地理志》。

④ 《汉书·叙传》。

⑤ 《史记·循吏列传》。

之源也"[①]。班固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思想传统。

《汉书》的《礼乐志》、《刑法志》两志、《循吏传》《酷吏传》两传，是记述礼与法、论其孰先孰后的重要篇章。班固以为，在国家政治中，"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意谓礼乐政刑都不可或缺。他在《礼乐志》中，详记历来制礼作乐的情况，以及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等人有关礼乐的议论，强调"《礼》、《乐》之用为急"。"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②]。意谓若要统治稳定，秩序井然，莫大于先倡礼乐。当他接触现世时说："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③]这与《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的"人富而仁义附焉"[④]等说法有所不同。富庶不等于仁义。为富不仁，富者刻薄，汉时已成定识。班固认为关键在于"富而教之"[⑤]。

刑法，在班固看来固然必要，但问题是摆在什么位置，如何执行。《刑法志》前无成例，《汉书》新置。它专讲刑法史，然强调的是"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制礼作教，立法设刑"，"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意谓先礼教，后刑法，以文德为主，以威武为辅。班固对尚刑法是否定的。写子产铸刑书，引用叔向的批评，又转叙孔子之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① 《史记·酷吏列传》。
②③ 《汉书·礼乐志》。
④ 《史记·货殖列传》。
⑤ 《汉书·食货志》。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写秦朝“专任刑罚”，指出“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写到汉初“无为”而治，则“刑罚用稀”，后又补论“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写到文帝用执法持平的张释之，“是以刑罚大省”，但又指出，是时除肉刑，“犹有过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写到武帝用酷吏，严用刑，则“禁罔(网)浸密”，“奸吏因缘为市”，“议者咸冤伤之”。写到宣帝时“狱刑号为平”，则指出是时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①。这是借秦讽汉的。写到元帝、成帝都下诏要求议法省刑，但只是具文，敷衍塞责而已。此处附加一句：“是以大议不立，遂至于今。”②这就带刺及班氏当世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认为西汉时狱刑繁重：“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其原因是因存在“五疾”：一是“礼教不立”；二是“刑法不明”；三是“民多贫穷”；四是“豪桀务私”而匿奸；五是“狱犴不平”③。这“五疾”之论很有见识，意味深长。

班固所写《酷吏传》，其议与《史记·酷吏列传》大略相同，论旨不出《刑法志》的范围。他所写的《循吏传》，记事与议论都比《史记·循吏列传》丰富深刻一些。司马迁写循吏，列举的是先秦人物，标榜“奉法循理”，有以身作则的特点。班固传循吏，写的都是汉代人物，而以宣帝时人居多，其业绩是务农桑，兴学校，“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有先礼教的特点。

---

① 《汉书·路温舒传》。

②③ 《汉书·刑法志》。

在经济方面，强调四民各安其业，重视农业、土地和水利问题。在《食货志》中，班固强调“食足货通”、“四民有业”，所谓“食足货通”，就是足衣足食，互通有无。所谓“四民有业”，就是士农工商各务其业，各尽其职。总的要求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富足而井然有序。

在《货殖传》中，班固认为，自天子至于平民，爵禄富贵及生活日用各有等级，大小贵贱不能逾越，这样才能上下有序，百姓安分守己。只有“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①，要求为商不奸诈，富者不淫侈兼并，贫者得温饱，遵守法纪，社会才能安宁。他对春秋以来“奸夫犯害而求利”深恶痛绝，以为唯利是图，世风日下，不可听之任之，而要提倡和宣扬“贵谊（义）而贱利”，这与“富而教之”是一致的。

《食货志》首先是“食”，其上篇记述先秦至汉代的农政，其中详载了贾谊、晁错等人的重农言论，可察见其重农倾向；尤可注意者，是其“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思想。强调“地著”，即要使农民有地可耕种，安附于一地而不流窜。重点论述了先秦井田制至汉代的土地问题，以及乡里之制及庠序礼教，结论为“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谈周衰之后，则先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然后“徭役横作”、“初税亩”，李悝“作地力之教”，商鞅“坏井田，开仟佰（阡陌），急耕战之赏”；论及汉代，则记载了董仲舒“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之议，哀帝时限田的办法与不了了之，王莽的王田制及其惨败。战国以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往往因此流离失所，以致酿成严重的社会矛盾。西汉末年的农

① 《汉书·叙传》。

民大起义，就与土地兼并大有关系，至东汉初年，仍然存在土地不均、占地不实的情况，故有“度田”措施。可见班固注重土地问题，是有历史见识和现实意义的。

班固与司马迁一样，很重视水利事业。司马迁游历各地时，很注意考察水利事业，还曾在武帝指挥下，参与治理黄河。他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①班固继承了这个传统，在《汉书》中写了《沟洫志》。此志名曰“沟洫”，主要是写治河。汉代以农业为基础，国家经常“劝农”，注意兴修水利；水利的得失，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尤其是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否，同国家盛衰有直接关系；汉代武帝时之强盛而汉末之衰败，同黄河的治理与失修关系甚大。

在用人方面，强调任贤使能。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哲人学者议论的老问题，而多主张任贤使能。班固写西汉的政治与人物，处处接触到这个问题，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思想是任贤使能。对于汉初使用智士，曾经发议：“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智）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②这里所谓“语”，是当时的俗谚。可见“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已为人们共同接受的认识。

对于西汉一代用人，班固以为武帝时代为“盛”。他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缺）。……上（指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

① 《史记·河渠书》。

②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赞。

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武帝使用人才，不拘一格。当时虽然崇儒，并不皆用儒生，也不大讲究资历，而是依据实际需要选用人才，所重用的卜式、桑弘羊、卫青等人确是出身于下层，受到武帝青睐而施展其才的。"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尽管所列的人物不无缺点，但他们在当时确实各显才能，可谓群星灿烂。于是得出结论："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在夷夏方面，强调汉与各族各国通使和好。《汉书》中《匈奴传》上、下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上、下卷，写周边各族及外国的历史，比《史记》翔实。《西域传》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天山南北、帕米尔东西各族的情况，其中有不少各族风习特点、道里和户口之数的记载，反映了汉代人的开放精神和世界意识。班固信奉"《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他说："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①]其强调夷夏之别，鄙视匈奴族的思想需要批判；但其反对攻伐，强调守御，主张礼待友好者，值得肯定。他对汉文帝遗南越赵

---

① 《汉书·匈奴传》赞。

佗书所强调两族间“通使”而不相争的态度，非常赞赏，感叹“岂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①

《西域传·赞》是篇重要的议论文。武帝为“断匈奴右臂”，凭丰厚的物质条件，穷兵侈欲，以致赋繁而导致民众起事，“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班固认为汉朝对西域，“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然其中有点大汉思想，但反对索取、奴役各族，而主张以德服人，各族自愿通好，仍不失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班固究政治得失，权衡的标准是视民生如何。“要在安民，富而教之”②八个字是政治大纲。首先是安民，使百姓安居乐业；其次是富民，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实；再次是教化，使民知礼守法，社会臻于文明。

三　评为人为政

如何为人为政，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思想内容。自古以来，人们常议善恶贤奸，常谈如何为人处世。史学家对此最能理解，所写历史很注意述评人物，通过写人物言行以反映历史，使善者、恶者、贤者、奸者都载入史册，以供后人审判及引为鉴戒。《汉书》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

《汉书》一百卷，其中列传七十卷，记载了西汉王朝众多的历史人物。本文仅就儒生、儒相如何为人为政，略抒己见。

自汉武帝起，尊崇儒学，设立学校，培养儒生，任用儒者为官

①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赞。

② 《汉书·食货志》上。

吏，故产生了一大批儒生，不少儒者进入了仕途。《汉书》的《儒林传》，叙述儒学发展的历史及《五经》传授的儒林人物。所写儒学史，大致本于《史记·儒林列传》，而述汉代儒学及《五经》授受次第，较《史记》详密而有条理，除了本书已有专传者如董仲舒、公孙弘、萧望之等人外，重点介绍了27位经师。细读本传，可以了解到汉代经师如何穷经立说，博士弟子如何埋首诵经读注，还可了解到他们如何学而优则仕。《书》学大家夏侯胜就曾坦然地教导弟子："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①]

夏侯胜的话并非吹嘘。以汉相为例，自武帝兴学，以公孙弘为相至于汉末（元朔五年至元始五年，前124—5）129年间，共有丞相（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29人，其中儒者为相占了大多数，"儒宗"（大儒）为相者就有11人，占丞相数的五分之二多[②]。

班氏父子曾论及儒相的特点和作用。班彪说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③]颜师古于"贡、薛、韦、匡迭为宰相"作注："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互而为宰相也。"[④]这里有点小误，班彪所谓"韦"，不是指"韦贤"，贤为相于本始三年六月至地节三年正月间，是在宣帝之时；当是指韦玄成，玄成为相于永光二年二月至建昭三年六月，正是元帝之时[⑤]。还要说明的是，

① 《汉书·夏侯胜传》。
② 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 《汉书·元帝纪》赞。
④ 《汉书·元帝纪》颜师古注。
⑤ 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贡禹传》、《薛广德传》。

贡禹、薛广德两人在元帝时只做过御史大夫,即所谓“副丞相”;为相的 11 位“儒宗”,并未将这两人计算在内。

班固说:“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借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①这里指出,公孙弘等“以儒宗居宰相位”者 11 人,特点是衣冠整齐,言谈正经,举止文雅;但都持禄保位,有阿谀之嫌。若以古人直道而行的标准衡量,差距甚大。他们为人为政的特点,主要是:1. 好学,“明经”,享有声誉。故君主擢其为相,以为辅佐或摆设。2. 从政多无建树,而有阿顺君主、畏惧权贵之嫌。故大多尸位素餐。3. 贪图利禄有术,而兴国安民少方。班固所论并不失实,也不偏激。

班固如此述评儒生和儒相,是否存在偏见?汉代独尊儒术,任用儒相乃时代特点。史学家写历史,抓住时代特点,说明其史识卓越。而且,班固出身于儒学世家,本身又是大儒,不可能有意讥贬儒生和儒相。如此述评,确为实录精神的体现。同时,他还有意于使后世儒者引为鉴戒。

班固决非一概贬斥汉儒。汉儒中不乏深学有道之士。在他笔下,董仲舒是“潜心大业”,颇有识见的大儒,实为群儒之“首”②;魏相“少学《易》”,丙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两人为人为政都值得称道,誉为“丙、魏有声”③;盖宽饶、诸葛丰、孙

① 《汉书·匡张孔马传》赞。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 《汉书·魏相丙吉传》。

宝皆为官“刚直”,敢于谏诤、举劾权贵豪强,允为“邦之司直”[①];王吉“少好学明经”,贡禹“以明经絜(洁)行著闻”,龚胜、龚舍“少皆好学明经”,鲍宣“好学明经”,五人皆为人质直,敢于谏诤,揭露世弊,宁可被贬退或致死,不怀禄耽宠,称为“清节之士”[②];文翁“少好学,通于《春秋》”,龚遂“以明经为官”,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三人都曾为地方长官,治民有方,重视农桑,兴办学校,做到“所居民富,所去民思”[③];名儒萧望之反对中书宦者弘恭、石显等弄权为奸,以致被害[④];刘向“忠直,明经有行”,拳拳于国家,敢言时政得失,反对宦者和外戚弄权为恶,屡遭排挤和挫折,“其言有补于世”[⑤];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好辞赋,官职小,“恬于势利”,“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⑥]。可惜这些儒者在政治上并不得意,而且多遭昏君权贵贬退压抑。故班固写如此人物,多慨乎言之。

班固推崇儒学,欲以儒学统一思想。上述为皇世一统,究政治得失、评为人为政三个方面,说明他治历史、评人物、为皇世的史学思想深具特点。儒学思想,自汉武帝尊儒伊始,是汉代的统治思想,然并未立即做到以儒学统一思想,也未在政治上普遍实行,一些儒者也未起到骨干作用。这是班固所深思的问题。故他在史学上强调儒家思想,要求在诸方面一以贯之。

鉴于班固与《汉书》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正当中国统一正在

---

① 《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②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③ 《汉书·循吏传》。
④ 《汉书·萧望之传》。
⑤ 《汉书·楚元王附刘向传》。
⑥ 《汉书·扬雄传》。

发展，皇权问世不久，儒学方兴未艾之际。不能无视其特定的时代性，也不可否认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对待班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只能剔其糟粕，取其精华。

(《历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汉书》释例

杨树达

一　较量例

陈咸传云:其治放严延年,其廉不如(虚受堂补注本六十六卷十五页上)。

平当传云:每有灾异,当辄傅经术言得失;文雅虽不能及萧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七十一卷九页下)。

张敞传云: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七十六卷十六页下)。

朱博传云:其治左冯翊,文理聪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谲(八十三卷十二页上)。

谷永传云: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八十五卷十八页下)。

何武传云: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经术正直过之。(八十六卷四页上)。

黄霸传云: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总纲纪号令,风采不及丙、魏、于定国,功名损于治郡(八十九卷六页下)。

酷吏宁成传云: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九十卷四页上)。

又义纵传云:纵廉,其治效郅都(九十卷七页上)。

又尹齐传云:迁关都尉,声甚于宁成(九十卷十页上)。

游侠原涉传云:涉性略似郭解(九十二卷十四页下)。

佞幸传云:趋谈者,以星气幸,北宫伯子,长者,爱人,故亲近;然皆不比邓通(九十三卷三页上)。

又韩嫣传云:赏赐儗邓通(九十三卷三页下)。

又李延年传云:其爱幸埒韩嫣(九十三卷四页上)。

又淳于长传云:其爱幸不及富平侯张放(九十三卷八页上)。

按以上所举,皆明指其人互为比较者也。以此知孟坚于汉代人物高下在心,其书之非苟作,亦可以见矣。此外又有文中绝不指明,而实是暗为比较者,非细心读书心知其意者往往滑过,此尤足以窥班书之精密矣。例如:

张汤传云:间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监掾史某所为。"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解人之过如此。(五十九卷三页上)。

赵广汉传云:广汉为二千石,以和颜接士,其尉荐待遇吏殷勤甚备。事推功善,归之旧下,曰:"某掾卿所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发于至诚(七十六卷二页下)。

按言:"广漢行之发于至诚。"即所以反言张汤之矫伪也。盖张汤之后,东漠时犹盛,故孟坚不直指比较而第于广漠传反言以明之。呜呼!此马班之所以为良史欤!

二　附记例

申屠嘉传云,自嘉死后,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皆以列侯继踵,龊龊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著于世者(四十二卷八

页上）。

公孙弘传云：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廐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五十八卷八页上）。

王贡两龚鲍宣传云：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自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七十二卷一页下）。

又传末云：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纪逡王思，齐则薛方子容，太原则郇越臣仲，郇相稚宾，沛郡则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七十二卷二十五页上）。

汲黯传云：黯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官亦再至九卿（五十卷十四页上）。

货殖传云：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隃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锺，皆越法矣（九十一卷十二页上）。

游侠剧孟传云：及孟死，家无十金之财；而符离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是时济南瞯氏，陈周肤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毋辟、阳翟薛况、陕寒孺，纷纷复出焉（九十二卷三页下）。

又郭解传云：自是之后，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中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鲁翁孺临淮儿长卿东阳陈君孺，虽为侠而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佗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盗跖而居民闲者耳，曷足道哉(九十二卷六页上)！

又原涉传云：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杰，然莫足数。其名闻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皆有谦退之风(九十二卷十五页上)。

佞幸传云：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时驸马都尉秺侯金赏嗣父车骑将军日磾爵为侯……宣帝时，侍中中郎将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研书；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出常参乘，号为爱幸(九十三卷一页上)。

三　互文相足例

宣帝纪云：诏曰：……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封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八卷十四页下)。

张安世传云：明年，复下诏曰：……诗云：无言不雠，无德不报。其封贺弟子侍中关内侯彭祖为阳都侯(五十九卷十页下)。

按周寿昌云：安世传封关内侯彭祖，无中郎将三字；宣纪无关内侯三字。所谓互文以征实也。

宣帝纪云：元康元年夏五月，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祀(八卷十二页上)。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绛武侯周勃，元康四年，勃曾孙槐里公乘广汉诏复家(十六卷十三页下)。

通监考异云：功臣表诏复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数非一，不容尽讹，盖纪讹耳。钱大昕云：表称元康四年，而纪书于元年，盖有司奉诏检校得实请于朝而复之，非一时所易了。纪所书者下诏之

岁;表所书者赐复之岁也。今按钱说郅确。持此识读史,史文之差互者皆可以意会矣。

宣帝纪云: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辜,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八卷一页下)。

丙吉传云:掖庭令将则诣御史府以视吉。吉识,谓则曰:汝尝坐养皇曾孙不谨督笞,汝安得有功?独渭城胡组淮阳郭征卿有功耳(七十四卷八页下)。

颜注:宣纪云赵征卿,邴吉传云郭征卿。纪传不同,未知孰是。周寿昌云:此复作女徒或传其家姓,或传其夫姓,故纪传有异同也。

杜延年传云: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主燕王谋为逆乱,假稻田使者燕仓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六十卷三页上)。

燕王旦传云: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告之,由是发觉(六十三卷十二页下)。

按杜延年传记燕仓之官职,燕王传记其关系,互文以相足也。

项籍传云: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俱西。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闲乃发兵。梁曰: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不忍杀(三十一卷十二页上)。

田儋传云:项梁使使趣齐兵击章邯。荣曰:楚杀田假,赵杀角闲,乃出兵。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谊(三十三卷二页下)。

按时项梁臣于怀王,田儋传作怀王语者,据其名也;项籍传作项梁语者,纪其实也。此亦互文以相足也。

项籍传云:荣……自立为齐王,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越乃击杀济北王田安(三十一卷十八页下)。

田儋传云:荣……攻杀济北王安,自立为王(三十三卷四页

上）。

按何焯校项籍传云：田儋传荣还攻杀安，与异姓诸侯王表同。此云越杀，误也。树达按此时越既属荣，则越杀即荣杀也。田儋传及诸侯王表据其名，项籍传纪其实耳。何以为籍传之误，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也。

四 微词例

武帝纪赞云：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六卷三十九页下）。

按师古注云：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

成帝纪赞云：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十卷十六页上）。

按何焯云：谓有其容，爽其德也。

张释之传云：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疾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释之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相，犹尚以前过也（五十卷二页下及五页上）。

西南夷传赞云：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观太宗填抚尉佗，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九十五卷二十二页上）。

按此以文帝之填抚南越刺武帝之用兵也。托讽之旨甚显。

五 记始例

陈胜传云:初为王,其故人尝与傭耕者闻之,乃之陈,叩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胜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见,载与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涉之为王沉沉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三十一卷七页下)。

按,此记"俗言"之始。

萧何传云: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东陵瓜",从召平始也(三十九卷五页上)。

按此记"名物"之始。

叔孙通传云:惠帝常出游离宫,通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许之。诸果献由此兴(四十三卷十八页上)。

贡禹传云: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禹以为"古民无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七十二卷十五页下)。

儒林传梁丘贺传云:会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坠,首垂泥中,刃乡乘舆车,马惊。于是召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闲,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故事,上尝夜入庙,其后待明而入,自此始也(八十八卷九页上)。

循吏传文翁传云: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八十九卷二页下及三页上)。

酷吏传赵禹传云:禹与张汤论定律令,作见知。吏传相监司以法,盖自此始(九十卷五页上)。

食货志云: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二十四卷下七页下)。

公孙弘传云: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五十八卷五页下及六页)。

按以上记"政治"之始。

西域传云: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九十六卷上七页下)。

又鄯善国传云: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九十六卷上十四页上)。

按以上记"官制"之始。

王莽传云:前挥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上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九十九卷上二十五页上)。

按以上记"祸变"之始。

贾谊传云: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宁成始(四十八卷三十页下)。

按以上记"弊政"之始。

按记始乃春秋遗法:如书"初作税亩"是也。

六　自注例

淮南厉王长传云:淮南厉王长,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赵王敖美人。高帝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美人——厉王母也,——幸有身(四十四卷一页上)。

按此文当以"赵王献美人,幸有身"连读。"厉王母也",四字乃插注之词。否则文气不属。

又同传云: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诸从蛮夷来归谊及以无名数自占者,内史县令主。——相欲委下吏无与其祸,不可得也(四十四卷四页上)

按"其在王所,吏主者坐",谓诸侯王之吏也。"今诸侯子"以下云云,则以中朝之制说明"吏主者坐"者,故亦为注文。如淳谓御史以下至县令主皆谓王官属,非也。

又同传云:十六年,上怜淮南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复王故城阳,而立厉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东城侯良前薨,无后。——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

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四十四卷八页上)。

儒林传王式传云: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八十八卷十七页下)。

货殖传云: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钜万(九十一卷十一页下)。

匈奴传云:于是冒顿阳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高帝乃使使厚遗阏氏,关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子察之(九十四卷上八页下)。

按"多步兵,三十二万",所以注明"汉悉兵"者也。"匈奴骑"云云,所以注明上文"精兵三十余万骑"者也。

两粤传云: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所谓番君者也。——从诸侯灭秦(九十五卷十五页下)

王莽传云:以故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皆置门卫,使者监领,敕阿保乳母不得与语。常在四壁中,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后莽以女孙——宇子——妻之(九十九卷中二页下)。

按宇为莽之长子"宇子"所以详说"女孙"二字者也。

七 终言例

高祖纪云:高祖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铺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

两子，见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公主，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一卷上五页）。

张良传云：五日，良夜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不见。……良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书者，后十三岁，从高帝过济北，果得谷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四十卷三页上及十一页下）。

八　一人再见例

夏侯胜已见卷七十五两夏侯传，又见儒林传。

京房有传，见卷七十五，儒林传又见。

吕后有纪，外戚传又有传。

按一人二见，本于史记。子贡已见仲尼弟子列传，又见货殖传，是其例也。

九　阙文例

卢绾传云：陈豨者，宛句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三十四卷二十二页上）。

荆燕吴传云：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时（三十五卷一页上）。

刘屈氂传云：刘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不知其始所以进（六十六卷二页上）。

循吏传云:王成,不知何郡人也(八十九卷三页下)。

匈奴传云: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离分散,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九十四卷上六页下)。

按此古史阙文之遗法。

十 说明作意例

张良传云:良从上击代,出奇计下马邑,及立萧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四十卷十一页上)。

东方朔传云: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燿,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六十五卷二十三页上)。

酷吏传云:汤周子孙贵盛,故别传(九十卷二十一页上)。

西域鄯善传云: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九十六卷上十四页上)。

(原载《燕京学报》第2期,1928年6月。
今选自杜维运《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册)

《汉书》所据史料考

杨树达

《汉书》百卷，自武帝以前全本《史记》，此人人所知也。然其他率皆出于采获，不必尽出孟坚之手。今讨核本书，细为搜校，虽叔皮创业，孟坚承父，一家之学，与因袭他人者不同，然欲详考《汉书》之源流，固不能不论及也。

一　本之父业

《后汉书》卷四十二《班彪传》云："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史通·正史篇》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杨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按《汉书》百卷，除《志》、《表》不计外，以《纪》及《传》之人计数，凡得三百人之谱，其中因袭《史记》者九十余篇，[1]合之班彪所撰六十五篇，约得百五十

[1] 此据《班马异同》及《史汉方驾》所载计之。

余篇，已占《汉书》纪传人数之半矣。

今此六十五篇可考见者，卷九《元帝纪赞》云："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注》引应劭曰："《元成帝纪》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则彪自说也。外祖，金敞也。"卷十《成帝纪赞》云："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注》引晋灼曰，班彪之姑也。又《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皆称"司徒掾班彪曰。"以《元、成纪》例推之，则三传自为彪作。按彪撰实六十五篇，惟此三传《赞》明称"司徒掾班彪曰"，《元成纪赞》则但称"赞曰"，并未标署彪名，苟非《赞》文有"臣外祖、臣之姑"等文及应劭注释说明，则人亦竟不知其为彪作矣。师古注《韦贤传赞》云："《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具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树达按颜籀意袒孟坚，绝非笃论。观固《叙传》中于彪续《史记》六十五篇事绝不叙及，而记己撰《汉书》事，亦绝不言秉承先志，与太史公《自序》迥乎不同，则固之攘善盗名，殆无可逭。且据颜说求之，《元》、《成》二《纪赞》即不署彪名，其说尤不攻自破。况彪撰《后传》有六十五篇之多，赞岂止三五首而已。此知固没而不言者甚多，彰彰明矣。[①]《元纪》应劭《注》谓彪外祖为金敞，按敞为金日磾弟伦之孙，伦子安上之子，观《安上传》记述子孙特详，《日磾安上传》疑当为彪作矣。又《外戚传·班婕妤篇》疑亦彪作。

二　本之刘向、歆父子

《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云："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

---

① 颜籀盗袭游秦，攘父兄之美，事正类孟坚，则其左袒孟坚，宜也。

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树达按《艺文志》书家有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即《五行志》所称数其祸福传以《洪范》者也。今《五行志》除仲舒说外,向、歆之说最多,盖此十一卷之书已全采入矣。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云:“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艺文志》本之向、歆,孟坚已明言之矣。

《史通》卷五《采撰篇》云:“班固《汉书》,全同太史。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按引《七略》者,谓《艺文志》,前条已言之。近人姚振宗谓《汉书·儒林传》所载经师授受多本《七略》,其说亦信而有征。其杂引《说苑》今可考见者,《路温舒》、《于定国》二传出《贵德篇》,《丙吉》、《袁盎》二传本《复恩篇》,《枚乘传》本《正谏篇》,《吾丘寿王传》本《善说篇》,《霍光传》茂陵徐生事出《权谋篇》,《胡建传》本《指武篇》,《杨王孙传》本《反质篇》,凡九事。其杂引《新序》者,按《新序》本三十卷,今仅存十卷,故多不可考。然马邑诱匈奴之事,《史记·韩安国传》不载安国王恢二人辩论之辞,而《汉书·安国传》载之独备,则全本《新序·善谋篇》也。又《赵广汉传》赞云:“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注》引张晏曰:刘向作《新序》,不道王尊,冯商续《史记》为作传。按晏为魏晋间人,所

见《新序》自为全本，其言如此。然则赵尹韩三传当本《新序》之文，殆无疑义。①

《史记》卷五十《楚元王世家》叙元王交之事甚略，似交为一绝无所表见之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则不然。首叙其好书多才艺，少时与穆生白生申公等受《诗》于浮邱伯。伯为孙卿门人云云。后叙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竟以元王与《鲁诗》之祖师申公并列，此推重其学术也。又叙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共立楚怀王，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云云。又云，高祖即帝位后，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及内事隐谋云云，而于"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之下，又缀"先有功也"一语，此推交之功业也。又叙王子富、富子辟强、辟强子德，皆颇详悉，略无贬辞。盖向为德之子，愚疑此文盖亦向、歆父子之文。文出《续补史记》，或本之《自序》，则无可考矣。②

三　本之褚少孙

班氏书有本之褚少孙者，如《卫青传》尚主一事，本褚补《外戚世家》；《武五子传》燕齐广陵三王策书本褚补《三王世家》，是也。

四　本之冯商

《艺文志》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注》引韦昭

① 按，《说苑·奉使篇》有陆贾事，今《新序》卷十《善谋篇》载汉事若干事，《汉书》皆同。然此乃刘向与孟坚同录自《史记》，非《汉书》本二书，故置不论。

② 《董仲舒传》赞引向、歆父子之辞，以系评论之语，非史实，故不具述。

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师古引《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与孟柳俱待诏,颇叙列传,未卒,病死。"《张汤传》赞注引如淳云:"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按韦昭记商续《史记》篇数为十余篇,与《志》文违异。然昭云在班彪《别录》,则昭自当目睹其书,殆无差误。且如淳引班固《目录》亦云十余篇,知十余篇之说为信。《志》记止七篇者,班仍用《七略》之文,未及改正耳。今冯商之《续传》可推见者有二篇,其一为《张汤》。《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赞》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据此,商当有《张汤传》也。其二为王尊。《汉书》卷七十六《赵尹王张传赞》云:"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扬雄亦如之。"《注》引张晏曰:"刘向作《新序》不道王尊,冯商《续史记》为作传,扬雄作《法言》,亦称尊之美也。"树达按:雄既曾续《史记》,则所谓扬雄亦如之者,正谓雄尝作《王尊传》也。张晏举《法言》为说,非是。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谓《汉书·王尊传》当是商作原文。树达按冯商、扬雄既皆同作《王尊传》,则班采商或采雄,或二人兼采,皆不可知,不可遽定为商一人之作也。至钱大昕谓《冯奉世传》当是冯商之文,其说非是。说见下冯衍条。又所谓《续太史公》者,似当谓续太史公所无,若太史公所已有者,则不必续。然《史记》已有《张汤传》,而冯商复为之,《史记》已有《楚元王世家》,而向、歆复补之,然则据已有之文而增补其所未备,今人当称为补者,古人亦称为续也。

五 本之扬雄

《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赞云:"雄之《自序》云尔。"此班采

扬雄明见于本书者也。又扬雄曾作《王尊传》,班或采用其文,说见前条,不复述。[①]

六 本之冯衍

《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叙冯氏世系百余言,与司马迁扬雄《自序》绝相类。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及《三史拾遗》并云:"窃意冯商《续太史公书》,亦当有《自序》,而班史采用之,故与他传不同。"按钱氏此说虽具妙悟,而断案则非。冯奉世为杜陵人,而商为阳陵人,与奉世殆不相涉。据《史通·正史篇》,续《史记》者有冯衍,衍为奉世后人,《后汉书》卷二十八《衍传》载衍所著有《自序》,又《衍传》中引《自论》,盖即其自序,此正衍《自序》之文而班采用之耳。《传》云,"其先冯亭为上党守,秦攻上党,绝太行道,韩不能守,冯亭乃入上党于赵。"按亭为上党守,则当守上党之任者亭也。文乃不云亭不能守,而云"韩不能守,亭乃入上党于赵,一抑若亭毫不任其责焉者"。此非子孙叙其先祖,决不当有此曲笔。此又从本文纳绎可断知其为衍作者也。

七 本之韦融

《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叙与贤相距五世之先祖韦孟事,又详载孟谏楚王戊之诗及在邹之诗,而终乃云: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盖既采其事而又疑之。又《韦玄成传》详载毁庙奏文,与他传不类。故东汉胡广即谓此等应载入《郊祀志》,不当在《玄成传》。树达按:《史通·正史篇》记续《史记》者

① 《东方朔传》赞全采《法言》之文,此批评之词,非史实,故不述。

有韦融,班之此传盖采自融。其引或说谓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即疑其融所为也。《班彪传》称续《史记》诸人为好事者,此亦云其子孙好事者所作,尤足互相印证矣。

八　本之班昭、马续等

固著《汉书》八《表》、《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事具《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曹世叔妻传》。后又由王绍、马续继昭撰成。袁宏《后汉纪》云:马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百篇,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后书未及。

九　余论

《后汉书·班彪传》云:"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李《注》云:"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歆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按李《注》举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五人,刘子元所举者凡十五人,李《注》之史孝山即《史通》之史岑,《史通》之卫衡与李《注》之阳城卫殆系一人而文有误衍。考《太平御览》八百十五引桓谭《新论》云:"阳城子张名衡。"《通志略》引《风俗通》云:"汉有议大夫阳成公衡。"假定二说无误,则李《注》之阳城卫当作阳城衡,《史通》之卫衡,卫乃衡之误衍,衡上又当夺阳城二字。综合李、刘二说,二家同举者凡四人。即一扬雄,二刘歆,三阳城卫,四史岑,即史孝山,是也。如此则续《史记》者实得十六人。据李《注》则刘歆亦在好事者之

内，而《史通》则向、歆父子别出，而以冯商以下十三人为好事者，此则两家见解略有不同者也。人或疑：续《史》诸家既以鄙俗见讥，则班氏不当采用其书，其说非也。试观彪评量《史记》，谓其采摭经传，分散百家，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彪历诋迁书如此，而班书之因仍《史记》自若也。况其仍用向歆父子、扬雄、冯衍之著作者，历有明征，而谓其不肯采用，不亦诬乎！

班氏采摭前修，成为杰著，人或以此少班氏，宋代郑渔仲则竟肆其丑诋，谓固于孝武以前全袭迁书，为盗袭而无耻，此则不通之论也。叙述史事，岂能凭空结撰！说本章实斋苟以此为班罪，则史迁之采摭《尚书》、《左氏》、《国语》、《国策》、《世本》及《楚汉春秋》者不亦同为袭取乎？而郑氏不讥，抑又何也？愚谓班氏采摭之弘，不惟不当为罪，而其书之所以杰出正在乎此。何以明之？据《后汉书·班固传》固除兰台令史，曾与陈宗等共撰《世祖本纪》，及为郎，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晋傅玄《书事篇》曰："观孟坚《汉书》，实命世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何不类之甚者也！"今观《东观汉记》诸纪传，为文不类，确如傅子所言。盖前书所据，材料丰盈，犹之渔人入海，薪者登山，可以恣其采择。而中兴以后事则大不然，此二者优劣所由分也。盖因人易美，创业难工，今古同然，非独一人一事矣。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29期，1932年5月23日）

班固窃父书

顾颉刚

《太史公书》,已知其为谈、迁父子合撰矣,而《汉书》亦有类似之问题,兹一陈之。

班固作史,模仿史迁《自序》,作《叙传》一篇以述其家世及著作之意。其叙父彪事甚简,止录其《王命论》全文,并记其避地河西与举茂才,为徐令数事,又总论之曰“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未尝一字道其作史也。至自述作史之故,则曰:“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则《汉书》之作,发意由己,成事由己,绝无可疑也。

然读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则有异焉。传之言曰:“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文而讥正得失。”然则班固之业已创始于彪,且已成《后传》数十篇,彪实为东汉初年一极有成就之史学家,何固之《叙传》绝不及之乎!范史又载彪之略论曰:“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

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此段为《后传》定体例,又云“今此后篇”,疑即《后传》之序。文谓迁既以公侯为世家而淮南、衡山乃转入列传,既以特起者置列传而项羽、陈涉乃厕于本纪、世家,故斥之为不经;其自定体例遂废世家而存纪、传。今《汉书》亦如此,陈涉、项羽并列于传,是固诚遵父之教矣。

彪书流传,曾历相当时间。《论衡·超奇篇》曰:“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是其书颇博得读者好评,以为在《史记》上。又《佚文篇》曰:“叔皮载乡里人为恶戒,邪人枉道绳墨所弹,安得避讳!”是其书又甚彰直笔。《后汉书·王充传》谓充“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故得见其书。其后刘勰作《文心雕龙》于《史传篇》论《史记》曰:“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宏辨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及刘知幾作《史通》,又时称道之。《六家篇》曰:“迁撰《史记》……自太初以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篇。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目为《汉书》。”又《古今正史篇》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冯商、卫衡、扬雄……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继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观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自有此说,而班彪在史学上之地位乃定,班固《汉书》与班彪之关系亦定。按《后传》一书,《隋书·经籍志》未著录,疑刘知幾未必能见,而谢承、薛莹、司马彪诸家之《后汉书》所记必有轶出范书外者,故得陶冶以入文。惟

范晔谓《后传》数十篇，而《论衡》谓百篇以上，《史通》又谓六十五篇，所载互异，未详孰是。王充与彪并世，所记较可信据，或本有百余篇，后亡佚其半，仅存六十五篇耶？

固书之袭彪文尚有可见者。《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应劭注："臣，彪自说也。外祖，金敞也"。《成帝纪·赞》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晋灼注："班彪之姑也"。此二事之时代与行辈甚显著，其非固所作至明。应劭又曰："《元》、《成帝纪》皆班固父彪所作。"明固之袭彪非第《赞》也。劭生汉末，彪书尚存，若一校勘，可指出者何限，惜其未尽为耳。又《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三篇赞语，并冠以"司徒掾班彪曰"，足见此三传亦成于彪。颜师古《注》："《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具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盗窃父名，观此可以免矣。"案，此说似是而实非。《元》、《成帝纪》之《赞》明出彪手，何以不具显彪名？可见固史未成而卒，此三传之犹留彪名者乃其刊落未尽者耳。不信，试观《司马迁传赞》。

范书谓彪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

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而《汉书·司马迁传》则云："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是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按其后事，讫于大(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两文对照，绝无差爽，固仅点定数字而已。若如师古所言，此固叔皮之所论述，其应冠以"司徒掾班彪曰"无疑，又何以书为"赞曰"，若固所自造耶？何以叔皮"善序事理……"之评，固乃不归之其父而归之刘向、扬雄耶？然则固之作史，接受父之遗产而欲湮灭父名，攘为己作，故《叙传》之中于彪之史学及其著书遂不道其一字也。浦起龙评之曰"欺所生，欺万世"(《史通通释·六家篇》)信矣。至于固用彪说，斥迁之先《黄》、《老》及序游侠、货殖，按先《黄》、《老》乃司马谈事，与迁无干，而序游侠与货殖，则固书之听因承于迁者也。呜呼！袭父说则非之，自为史则受之，其进退无据一至是乎！此则勇于剿窃而未之思之过耳！

夫司马迁作通史，班固作断代史，皆一代之大业，非一手一足之烈所可成，其接受他人成品于事为当然；而父、子继承，前邪后许，一门文学，更属美谈。迁书虽未明著谈之作史，而谈有作史之意则发挥弥畅，有此意则即有其文矣，故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若彪则著述已成，且已流通，固乃不但不举其书，且不言其有作史之意，假使《后汉书》不言之者，直将无迹可寻，其为贪忮，宁可言说。颜氏谓人讥其“盗窃父名”，知昔人已见及此，盖但将两《汉书》合读，痕迹宛然，自非椎鲁颛蒙之伦，必不至视而不见。按魏文帝作《典论》，其《论文》之篇首言“文人相轻”，而特举班固之鄙薄傅毅为喻。其胸怀窄隘，即此可见。无怪乎傲而且很，有如是也！

（《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张孟伦

中国地理之学，虽然发达得很早，但迄未成为一种独立性的学科。班固是东汉时代的人，毋怪作《地理志》，只附在《汉书》里面——从《隋书·经籍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都是把地理著作附入史部，而不曾把它看做独立性的专著的。现将《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介绍于下。

一 撰修最难撰修的《地理志》及其影响

《禹贡》，是中国古代地理志的权舆；职方，是中国古代掌天下地图，管四方职贡的官名，这因"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①。所以西汉初年，萧何得着秦所藏的图书，因而知道了天下的要塞。以后，汉政府又得到了《山海经》，当更有助于了解各地区的地理情况。武帝时代，有关天下的财政计书，既上之于太史，郡国地志也就包括在内了。从而也就给汉代史家写作地理志，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然而志，终究是难写作的。这因志所叙述，是乃历代典章制度、经济文化沿革的大端，非是老于典故，博观文物，是很难提要

① 《宋史》卷四十四《吴淑传》。

钩玄而着笔墨的。而班固则是个"博观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所不究、所学无常师"①,而深明会通因仍之义的博学通才。他所著的《汉书》,虽因体裁关系,所有纪传,只以西汉一代为限,却扩大了《史记》八书的范围而撰十志,穷古至今,将所述的典章制度、经济文化,会通其历代因仍损益的关键所在。这就是史学理论名家章学诚也不得不说:"凡司马迁所辟门类,(班)固则补之。非如纪、传所列事迹,但画西京为界也。是以《地理》及于《禹贡》、《周官》,《五行》罗列《春秋》、《战国》。八表之例,可类推矣。"②"后世因之,互有损益,遂为史家一定法矣"③。是班固修《汉书》之纪、传限于一代,表、志穷古至今的体裁,实给后世修断代史的史家,奠定了一定的成法。

然而,《地理志》在各志里面,又是较难纂修的。举个例子说:"本(宋)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1008)修定,至熙宁八年(1065)都员外郎刘师旦且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载古迹有出于俚俗不经者,乞选有地理学者重修之。乃命赵彦若、曾肇就秘省置局删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宁末(1106),诏置局编修,前后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④这就可见《地理志》因为州县废置等的时有改变,过了几十年,就得重新改修一次。又因改修不易,也又不是每次都能改修成功的。从而到了南宋晚年,王应麟总结出一条经验说:"言地理者,难于言人。何为其然也?日月星辰之变,终古而不

---

① 《后汉书·班固传》。
②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
③ 《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④ 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易;郡国山川之名,屡变而无穷。"[①]加以户口有变,赋役不一。所以就是史学权威司马迁著《史记》,也只述《河渠》,而未修《地理》。

然而西汉王朝,实是中国封建专制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海内混一,郡县增置很多;统治期长,户口增加不少。然而从褚少孙、刘向父子以至班彪所写西汉一代的史事,都只能依傍司马迁的《史记》而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做一些续补工作。只有班固才具有雄伟的思想,将昭、宣、哀、平四帝时代的历史继续写了下去,完成了一部整个西汉一代的断代史——《汉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结合现实的需要,而在刘向所言地域,朱赣所条风俗的基础上,加以增补扩充,写成了《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②],实为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较为完美的地理专著。

从而一方面使得以后修史书的赞叹敬佩,至有一种仰止高山而趋步难至之感。如范晔著《后汉书》,虽然很是自负,认为他这部史书,是"实天下之奇作"[③]。但究不得不称"《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蔑以加矣!因而使得他"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易"[④]而修《郡国志》,不敢再作全面性的《地理志》。又如司马彪自命为一代"良史",而特修《续汉

① 《通鉴地理通释·自序》。
② 《隋书·经籍志》。
③ 《宋书·范晔传》。
④ 《后汉书·郡国志》序。

书》[1],但亦仅志郡国罢了！沈约"博物洽闻,自负高才"[2]。然他受命而撰《宋书》,亦是只能志郡县而已！这就可见从司马迁、范晔、司马彪,以至沈约都是不敢、不曾写《地理志》。反过来,也就足以说明班固写《汉书·地理志》的不易,而弥足珍贵了。

一方面使得后代的统治者,越加感到职方图籍之为统治天下所必需的常经大典。于是官修地书:在唐而有《元和郡县志》,在宋而有《元丰九域志》,在元、明、清都有《一统志》;而《晋书》、《隋书》、《唐书》、《辽史》、《金史》、《明史》,都修《地理志》。同时,清人洪颐煊,因为班固所修的《地理志》,"约而能该,详而有法……精审不苟,取重后世",乃取班固所说,以推究汉代的水道,而作《汉水道疏证》。清人陈沣因为班固生当东汉统一的强盛时代,得见皇家兰台所藏的图书[3],所修《地理志》,也就简明周悉,以故大川所经过的地区,也都记载了精确的里数。便取清代地图,以稽考《汉志》的水道,做出了《〈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总之,班固的修《地理志》,不但引起了后代统治者,更加知道撰修地理书的重要性;且给后代修地理志的得着了一种最有价值的参考材料[4],促进了中国地理典籍纂修事业的发展。所以清代治《汉书》极有成绩的王先谦说:"班志地理,存前古之轨迹,立来史之准绳;兼详水道源流,使后人水地相资,以求往迹,可谓功存千古者也!"[5]

---

① 《晋书·司马彪传》。
② 《梁书·沈约传》。
③ 参见《日知录·秘书国史》。
④ 《宋书·州郡志》、《北魏书·地形志》都说明了这一点。
⑤ 《〈汉书·补注〉序例》。

二 《汉书·地理志》的特点

《汉书·地理志》,在我们初步看来,有下列几种特点:

1. 正因为班固是个博古通今的史家,所以《汉书》虽是一部西汉的断代史,而在《地理志》里,却详尽地讲述了自三代以至秦、汉的星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实是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部重要而大有裨益于文献掌故的历史地理。

2. 班固撰修《汉书》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就《地理志》说,对于所收的资料中的穿凿附会,诡辨不经的说法,都是经过严密的审核。难信的给以剔除,可靠的才加录用,而为后人所赞美、所学习的。包慎言说得好,班固著《地理志》"刊落诡僻,摭摘详慎,是以后世言地理者,莫不祖述班氏,挨代缀统"①。这就可见班固修《地理志》,对于录用的资料,是经过严密辨别真伪的功夫,力求保存它的真实性,而给后代史家起了一种典范作用。

3. 正因为班固对于所录用的史料,是经过严密审订的,所以也就深深地知道说经应以近于古代为得真实的道理。从而他著《地理志》,对于《禹贡》里的山川,都采用了西汉今、古文家的说法。这因地理有沿革,陵谷有变迁。如其用后代人的舆地知识,去解释《禹贡》,那就好像用水平的《官韵》去叶《毛诗》,以王安石的《字说》去训《尔雅》,哪有不穿凿附会的呢。清代研究《禹贡》的名家,当推胡渭为第一。但他却昧于经学的限断,只沿史学的地志,而溺于宋以后的臆说,以致所考江、汉、弱、黑诸水,也就错误百出。是知后人之为《禹贡》之学的,尚得一凭班固的《地理

① 《校刊〈汉书·地理志·补注〉序》。

志》,而不能悠逞自己的臆见,而说《禹贡》中的地理不同于今天的地理,就不相信呀[1]。

4. 郡县的下面,自加详细注脚[2]。因而起了一种保存作者的原意的正确作用。这因作者著书不自作注,而让后人去解释,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个对于古代典籍做过一番考订、注释工夫的朱熹,就曾因为"'春王正月'四个字之有各家不同的解说说:"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3]何况更有许多注解家,故意穿凿附会,借古人的说法,企图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种种目的呢。从而只有作者自作自注,既免去了笺注者的许多精神,且又保存了原来的正确意义。洪容斋说的好,"经典义理之说,最为无穷,以故解释传疏,自汉至今,不可概举。至有一字而数说者"[4],又叫读者何去何从呢。然从班固以后,史家著书,往往有手自刊补,列成子注的。诸如:肖大圜著《淮海乱杂志》,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王邵著《齐志》,莫不都是自撰自注。饮水思源,这当要推美于班固了。但陈寅恪先生的《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却说杨衒之因染习了佛法,乃仿当时僧人合本子注的体裁,故所著于正文之外,复有子注[5]。这就未免有失考据了!

5. 班固写《地理志》,以各地风俗为主要题材。一方面郡邑的名字,有的因为土俗的关系,往往有一种方言上的别种称谓。

---

① 本《魏源集·通释禹贡》。
② 凡在郡县下面的注释,不曾书何人姓名的,都是班固的原注。
③ 盛如梓·《庶斋老学笔谈》卷一。
④ 《容斋续笔·义理之说无穷》。
⑤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本二分。

为了整齐划一，都去掉它们原来的俗称，而另用一种新的名字。如改豫章的余干为余汗，梓潼的十方为什方，南海的潘隅为番禺，苍梧的肆浦为荔浦，九贞的都龙为都庞等等。从此，全国的郡县称谓，不因他们的习俗方言的差别而有一种不统一的名称。这对促进政治统一，思想交流，情感传播，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记述四方风俗习惯的差异，都能从经济状况，居民成分的变化出发，说明不同的社会意识是不同的经济反映。这种对世界的了解是唯物的。班固又主张因俗施政。诸如："秦之地险，其俗杂，其政宜绥。巴蜀之地，其俗琐，其政宜拓。魏之地阻，其俗儇，其政宜忠。晋韩之地瘠，其俗啬，其政宜浃。"①；并赞美了文翁开化偏远落后地区治蜀的成绩。这固然是给统治者从意识形态上提供统治天下的借鉴，但主张结合具体的地方习俗去办理政治、赞扬发展偏远地区的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还有进步意义的。

6. 黄履翁说："观班孟坚之志地理，论吴严助、朱买臣之贵显，则继以章山之铜，豫章之金，则吴之人材，其亦三吴之钟欤？"②总之，《汉书·地理志》叙枚乘、邹阳、严助、朱买臣等之群集吴地，致一时"文辞并发"，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开发，次则是因吴王招集宾客而给以禄位的政治作用。班固在这里是又不曾自觉而天才地意识到文化本身是受着经济发展和政治作用的支配的。从而他虽是个唯心主义史学家，却仍具有朴素自发的唯物主义因素。

7. 班固撰《地理志》，往往"采获旧闻，考迹诗书"；而行文又复结构严密，炼词雅洁，而给后人写地理书的，起了一定的典范作用。试看郦道元注《水经注》，采集旧著菁英，录用诗歌掌故，而将

---

① 卢志庵《〈汉书〉评抄》。

② 《源流至论》。

各地山川，作了一个细腻而生动的叙述，致成为一部历史地理名著。推本穷源，也还是向班固学习来的。

然而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班固谈地理，诚然优点很多，但缺点又何尝没有？西汉古、今文家，多见先秦一些古书，多闻当时师传的说法，其立说则有所的根本，而较后人以意度的臆说自当可靠。所以他认为东汉较西汉去古为远，释《禹贡》而采西汉经师的说法，自然有一定的理由。但信古太过，则也是有泥古不通之弊的。比如司马迁按古代的《禹本纪》而说黄河出于昆仑，班固也就据之而有同样的说法。然后人按“佛书考之。河出昆仑者，此即雪山。而所谓昆仑者，自须弥山也”。班固又复承袭司马迁之说，“且言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乌得所谓昆仑者？此是未知昆仑山所在耳”①。总之，信古太过，则难免有执文害理的弊病。即以经学大师的郑康成注《毛诗》，因为长于礼学，一一都牵台于《周礼》，也就束缚得厉害，而不免以辞害意。欧阳修博情通群书，而好古信经，以至学术议论，一本于经，废弃三传而不顾。然而三传也并非全以私意而穿凿附会的产物，而是有凭师传之说，有赖简牍之文所写成的，岂可废弃而不一顾吗？那么，信经而废传，据《礼》而谈诗的拘泥不通的害处，穷根追底地说来，又何尝不是从班固而来的呢。

（《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① 《扪虱新话·马迁班固言河出昆仑》。

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

史念海

班固是名彪千古的史家，媲美司马迁。范晔撰《后汉书》，称道司马迁，说是“文直而事核”，称道班固，则是“文赡而事详”。可谓是相伯仲了。范晔还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①]。这样的称道备至，也只有像班固这样的史学家才足以当之。

一 《汉书·地理志》远绍《禹贡》和《周官》

这样有名的史家，也是精通于地理的，而且创始了沿革地理学，成了斯学不祧的鼻祖。这样说来好像奇突，其实也是事理的必然。现代地理学和历史学是迥然不同的学科，但在古代，地理学却长期是历史学的附庸。《隋书·艺文志》以四部分类，地理类诸书即列在史部之中，其间的关系就是显而易见的。

班固于所撰的《汉书》之中，特列了一篇《地理志》，记述西汉一代的版图，也兼记述前代的地理。追溯沿革地理学的渊源，就在这篇《地理志》。班固是如何撰著《汉书·地理志》的？这在《隋书·经籍志》有明确的论述。据说：“（汉）武帝时，计书既上

① 《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

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序,与古《禹贡》、《周官》相埒。"这样的论述是不错的,但却未尽其全貌。《地理志》的撰述诚然是要凭借郡国地志的,或者也是得力于刘向所言和朱贡所记,不过还应该添上地理学的渊源。他所撰述不仅仅是"与古《禹贡》、《周官》相埒",而是和《禹贡》、《周官》一脉相承的。《禹贡》和《周官》的记载虽也涉及到地理,却皆记当世,未载前代。《汉书》为西汉一代的史籍,《地理志》也应只记载西汉一代的地理。作为最早一部断代史,这种体例是不应该有所改变的。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它是有了改变。实际上它不仅兼记前代,而且还追溯到远古。班固和后来相当长久时期的学者一样,都认为《禹贡》作为《尚书》的一篇,乃是大禹治水之后撰著的鸿文,而且所记载的就是夏时的典章制度和夏时的地理。因而它于篇首就征引了《禹贡》和《职方》。它是以《禹贡》所述为夏代的地理,《职方》所述为周代的地理。至于殷代,则因为"殷因于夏,亡所变更",故未有所征引,这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地理,全都有了记载。

忖度班固撰述的意思,征引了《禹贡》和《职方》,可以备见三代地理的全貌,也可以细觇其间演变的过程。如果《禹贡》所记真的就是夏代的地理,《职方》所记真的就是周代的地理,虽同为九州,具体却有差异。九州之中,只有七州前后相同,其余两州却有了变迁。不仅名称改变,区划也就因之而异。这就不能不说是一宗巨大的变迁,其间沿革是应该追究明确的。这是回溯以往的一个方面。不仅回溯以往,还应该开拓后来。班固明确指出:"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

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虽说汉因秦制，其实在汉人看来，秦以暴虐灭亡，是不足为法的。汉人所可以取以为法的，只有是三代的往迹了。画土分州是一代的大事。汉代的版图远较三代为广大，核实而论，只是边远徼外的若干部分。中间各处依然是三代旧有的版图。这样而欲求画土分州就不能不上承三代的故实了。三代实际都未设州，好在《禹贡》和《职方》都已成为儒家经典著作，是可以依据的。因而就兼夏、周之制，不过稍有改易，改雍曰凉，改梁曰益。班固绍述《禹贡》和《职方》，固然借此可见夏、周地理的全貌，也可以显示出汉代制度是有深远的渊源的。

二　有关战国时地理的记载

其实，班固所论述的不仅是夏、商、周三代，还兼论述了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全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班固自己也说：“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

这里不妨接着就由战国说起。《地理志》在《后序》中，对于战国时各国的地理，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甚至其时已灭亡的陈和吴越诸国也在论述之列。只是各国的疆土都是用汉代的郡国以及县邑论述的。

据所论述：

秦地：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①]，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②]。

魏地：其界自高陵以东[③]，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濦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傿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④]。

周地：今之河南雒阳、谷成、平阴、偃师、巩、缑氏[⑤]。

---

① 弘农故关即古函谷关。这座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涧河（弘农河）左岸王垛村。关于古代地名相当于今地的所在，即取通用的说法，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② 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于汉时称为三辅，皆治长安城中，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北地郡治所今甘肃环县东南。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南。西河郡治所在陕西府谷县西北。安定郡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天水郡治所在今甘肃通渭县西北。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巴郡治所在今四川重庆市。蜀郡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广汉郡治所在今四川梓潼县。犍为郡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市。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

③ 汉高陵县今仍为陕西高陵县。

④ 河东郡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陈留郡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汝南郡治所在今河南平舆县北。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召陵县在今河南郾城县东。濦强县在今河南临颍县东南。新汲县在今河南扶沟县西南。西华县在今河南西华县西南。长平县在今河南西华县东北。舞阳县在今河南舞阳县西北。郾县在今河南郾城县南。许县在今河南许昌市东。傿陵县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开封县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南。中牟县在今河南中牟县西。阳武县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酸枣县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卷县在今河南原阳县西。

⑤ 雒阳县在今河南洛阳市东。谷成县在今洛阳市西北。平阴县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偃师县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巩县在今河南巩县东北。缑氏县在今偃师县东南。

韩地：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①。

郑国：今河南之新郑及成皋、荥阳，颍川之崇高、阳城②。

陈国：今淮阳之地③。

赵地：赵分晋，得赵国④。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⑤；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勃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⑥；

---

① 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弘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父城县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南。定陵县在今河南郾城县西北。襄城县在今河南襄城县。颍阳县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南。颍阴县在今河南许昌市。长社县在今河南长葛县东北。阳翟县在今河南禹县。郏县在今河南郏县。新安县在今河南渑池县东北。宜阳县在今河南宜阳县东南。

② 新郑县在今河南新郑县。成皋县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荥阳县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崇高县在今河南登封县。阳城县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

③ 淮阳国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

④ 赵国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市。

⑤ 信都国治所在今河北冀县。真定国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东南。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中山国治所在河北定县。涿郡治所在河北涿县。高阳县在今河北高阳县东。鄚县在今河北任邱县北。州乡县在今河北河间县东北。

⑥ 广平国治所在今河北鸡泽县东。巨鹿郡治所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清河郡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河间国治所在今河北献县东南。勃海郡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东平舒县在今河北大城县。中邑县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北。文安县在今河北文安县东北。束州县在今河北河间县东北。成平县在今河北交河县东。章武县在今河北黄骅县北。

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①;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②。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

燕地:东有渔阳,在右北平、辽西、辽东③,西有上谷、代郡、雁门④,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⑤,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⑥。

---

① 按:汉无浮水县。此浮水当即由河水分出的浮水。《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北迳委粟津。大河之北即东武阳县也。左会浮水故渎。故渎上承大河于顿邱县而北出,东经繁阳县故城南。应劭曰:'县在繁水之阳'。张晏曰:'县有繁渊。'……亦谓之浮水焉,昔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赵南至浮水繁阳。'即是渎也"。繁阳县故城在今河南内黄县西北。则浮水故渎当在今浚县、内黄之间。内黄县在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斥丘在今河北魏县西北。

② 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河西岸。定襄郡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上党郡治所在今山西长子县。

③ 渔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密云县西南。右北平郡治所在今河北宁城县西。辽西郡治所在今辽宁义县西。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

④ 上谷郡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县南。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郡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易县在今河北雄县西。容城县在今河北容城县北。范阳县在今河北定兴县南。北新城县在今河北徐水县东北。故安县在今河北易县东南。涿县今仍为河北涿县。良乡县今为河北良乡县、新昌县在今河北新城县东南。安次县在今河北廊坊市。

⑤ 易县在今河北雄县西。容城县在今河北容城县北。范阳县在今河北定兴县南。北新城县在今河北徐水县东北,故安县在今河北易县东南。涿县今仍为河北涿县。良乡县今为河北良乡县。新昌县在今河北新城县东南。安次县在今河北廊坊市。

⑥ 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国平壤。玄菟郡治所在今辽宁新宾县西。

齐地：东有菑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①，南有泰山、城阳②，北有千乘③，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④，西有济南、平原⑤。

鲁地：东至东海，南有泗水⑥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⑦。

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⑧。

卫地：今之东郡及魏郡黎阳，河内之野王、朝歌⑨。

楚地：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

---

① 菑川国治所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南。东莱郡治所在今山东掖县。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南。高密国治所在今山东高密县西南。胶东国治所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② 泰山郡治所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北。城阳国治所在今山东莒县。

③ 千乘郡治所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北。

④ 高乐县在今河北南皮县东南。高城县在今河北盐山县东南。重合县在今山东乐陵县西。阳信县在今山东阳信县南。

⑤ 济南郡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东。平原郡治所在今山东平原县南。

⑥ 东海郡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县。泗水国治所在今江苏泗阳县北。

⑦ 临淮郡治所在今江苏泗洪县南。下相县在今江苏宿迁县西。睢陵县在今江苏睢宁县。僮县在今江苏泗洪县北。取虑县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南。

⑧ 沛郡治所在今安徽睢溪县西北。梁国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楚国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山阳郡治所在今山东巨野县南。济阴郡治所在今山东定陶县西。东平国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东。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须昌县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寿张县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

⑨ 黎阳县在今河南浚县东。野王县在今河南沁阳县北。朝歌县在今河南淇县。

南郡[①]。

吴地：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②]。

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③]。

《地理志》论述了各国的疆土，又进而论述各国在其立国以来地理的变迁。他叙述秦国，远溯至秦的先祖柏益。秦国始有国土，乃在非子之时，非子受封为周的附庸，以秦为国号，其地在汉的陇西秦亭秦谷。庄公时，破西戎，扩大了疆土。襄公将兵救周有功，赐受岐、丰之地，并得列为诸侯。至穆公时，秦地东至河。惠公初称王，得上郡、西河。昭王开巴蜀，灭周。至始皇时遂并六国，统一天下。可是他还接着说："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从后稷到武王，都城虽不断有所迁徙，但总未曾离开过后来的秦国疆土。这种论述方法从秦国以至吴越各

① 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江夏郡治所在今湖北新洲县西。零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兴安县东北。桂阳郡治所在今湖北郴州市。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北溆浦县。长沙国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汉中郡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汝南郡治所见前文。

② 会稽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九江郡治所在今安徽寿县。丹阳郡治所在今江苏宣城县。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庐江郡治所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广陵国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北。六安国治所在今安徽六安市。临淮郡治所见前文。

③ 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郁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合浦郡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交阯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九真郡治所在今越南清化西北。南海郡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广治。

国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仅论述战国之时，而是追溯到以前更早的年代。

三 关于春秋时诸侯封国的记载

《地理志》中没有像论述战国时各国那样论述春秋时诸侯封国和杂居于其间的非华族部落，但在论述各郡国时却多有涉及，而且多到70国：

京兆尹：骊戎国（汉新丰县），郑国（汉郑县），杜伯国（汉杜陵县）[①]。

左冯翊：大荔国（汉临晋县），芮国（汉临晋县芮乡）[②]。

右扶风：豳国（汉栒邑县豳乡）[③]。

弘农郡：虢国（汉陕县），焦国（汉陕县焦城），陆浑戎国（汉陆浑县）[④]。

河东郡：虞国（汉大阳县），魏国（汉河北县），耿国（汉皮氏县耿乡）[⑤]。

太原郡：唐国（汉晋阳县），晋国（同上）[⑥]。

---

① 新丰县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郑县在今陕西华阴县东。杜陵县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

② 临晋县在今陕西大荔县东。

③ 栒邑县在今陕西旬邑县东北。

④ 陕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陆浑县在今河南嵩县东北。

⑤ 大阳县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河北县在今山西芮城县西。皮氏县在今山西河津县东。

⑥ 晋阳县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水西。按：唐国、晋国所封皆在河东郡，非太原郡。班氏此说未为妥当。

上党郡:潞子国(汉潞县)①。

河内郡:共国(汉共县),卫国(汉朝歌县),温国(汉温县)②。

河南郡:密国(汉密县),戎蛮子国(汉新成县),郑国(汉新郑县)③。

东郡:须句国(汉须昌县),南燕国(汉南燕县)④。

陈留郡:杞国(汉雍丘县)⑤。

颍川郡:许国(汉许县),应国(汉父城县应乡)⑥。

汝南郡:顿子国(汉南顿县),胡国(汉女阴县),蔡国(汉上蔡县),项国(汉项县)⑦。

南阳郡:申国(汉宛县),谷国(汉筑阳县),随国(汉随县),厉国(汉随县厉乡),邓(汉邓县),唐国(汉舂陵县上唐乡),廖国(汉湖阳县)⑧。

南郡:罗国(汉枝江县),归国(汉秭归县归乡)⑨。

---

① 潞县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

② 共县在今河南辉县。朝歌县见前。温县在今河南温县东。

③ 密县在今河南密县东南。新成县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新郑县在今河南新郑县。

④ 须昌县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南燕县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⑤ 雍丘县在今河南杞县。

⑥ 许县在今河南许昌市东。父城县在今河南宝丰县东。

⑦ 南顿县在今河南项城县西。女阴县在今安徽阜阳市。上蔡县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项县在今河南沈丘县。

⑧ 宛县在今河南南阳市。筑阳县在今湖北谷城县东北。随县在今湖北随州市。邓县在今湖北襄樊市北。舂陵县在今湖北枣阳县南。湖阳县在今河南唐河县南。

⑨ 枝江县在今湖北枝江县东北。秭归县在今湖北秭归县。

江夏郡：弦子国（汉轪县）①。

庐江郡：舒国（汉舒县）②。

济阳郡：曹国（汉定陶县）③。

沛郡：萧国（汉萧县），向国（汉向县），州来周（汉下蔡县），滕国（汉公丘县）④。

常山郡：中山国（汉灵寿县）⑤。

泰山郡：隧国（汉蛇立县隧争），牟国（汉牟县），颛臾国（汉蒙阴县蒙山下）⑥。

齐郡：齐国（汉临淄县）⑦。

北海郡：斟国（汉斟县）⑧。

琅邪郡：介国（汉黔陬县）⑨。

东海郡：郯国（汉郎县），郁国（汉开阳县），缯国（汉缯县）⑩。

临淮郡：徐国（汉徐县）⑪。

---

① 轪县在今湖北蕲水县西。

② 舒县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③ 定陶县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④ 萧县在今安徽萧县西北。向县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下蔡县在今安徽凤台县。公丘县在今山东滕县西南。

⑤ 灵寿县在今河北灵寿县西北。中山国春秋时为鲜虏国。

⑥ 蛇丘县在今山东肥城县南。牟县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南。蒙阴县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南。蒙山在今蒙阴县南。

⑦ 临淄县在今山东淄博市东。

⑧ 斟县在今山东潍县南。

⑨ 黔陬县在今山东胶县西南。

⑩ 郯县在今山东郯城县。开阳县在今山东临沂县北。缯县在今山东枣庄市东北。

⑪ 徐县在今江苏泗洪县南。

会稽郡:吴国(汉吴县),越国(汉山阴县)[①]。

丹阳郡:楚国(汉丹阳县)[②]。

右北平郡:无终子国(汉无终县)[③]。

赵国:邢国(汉襄国县)[④]。

真定国:肥子国(汉肥累县)[⑤]。

广阳国:燕国(汉蓟县)[⑥]。

城阳国:莒国(汉莒县)[⑦]。

淮阳国:陈国(汉陈县)[⑧]。

梁国:戴国(汉甾县),宋国(汉睢阳县)[⑨]。

东平国:任国(汉任城县),诗国(汉亢父县诗亭)[⑩]。

鲁国:鲁国(汉鲁县),邾国(汉邹县),薛国(汉薛县)[⑪]。

楚国:偪阳国(汉傅阳县)[⑫]。

六安国、六国(汉六县):蓼国(汉蓼县)[⑬]。

---

① 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市。山阴县在今浙江绍兴市。

② 丹阳县在今安徽当涂县东。

③ 无终县在今河北蓟县。

④ 襄国县在今河北邢台市。

⑤ 肥累县在今河北藁城县西。

⑥ 蓟县在今北京市。

⑦ 莒县在今山东莒县。

⑧ 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

⑨ 甾县在今安徽砀山县东。睢阳县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⑩ 任城县在今山东济宁县东南。亢父县在今济宁县南。

⑪ 鲁县在今山东曲阜县。邹县在今山东邹县东南。薛县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⑫ 傅阳县在今山东枣庄市南。

⑬ 六县在今安徽六安市。蓼县在今河南固始县北。

四　关于春秋战国时诸侯封国都城迁徙的记载

还应该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封国的都城都曾经有过迁徙，这在《地理志》中也都有所记载。可以在这里提到的有秦、晋、楚、卫、蔡，以及韩、赵、魏等国。《地理志》在河东郡闻喜县下指出："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又在绛县下指出："晋武公自曲沃徙此。"按之《史记·晋本纪》，周初，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称为唐叔虞。唐在河汾之东，而未著其确地。唐叔之子始称晋侯。入春秋后，晋侯都于翼。晋侯别支曲沃武公取翼，遂为晋君，其后乃迁于绛。《地理志》所载，虽与史文不尽相合，却是自成体例的。秦国亦曾迁都，见于《地理志》的右扶风雍县下说："秦惠公都之。"左冯翊栎阳县下说："秦献公自雍徙。"不过在右扶风渭城县下，却只说"故咸阳"，而未说秦孝公自栎阳徙。对于楚国的都城，记载较为详备。丹扬郡丹阳县下说："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南郡江陵县下说："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州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徙陈。"若县下还说："楚昭王畏吴，自郢徙此，后复还郢。"淮阳国陈县下说："楚顷襄王自郢徙此。"九江郡寿春邑下又说："楚考烈王自陈徙此。"楚国先世所都的丹阳，实在丹水之阳，而丹水为汉水支流，流经今陕西东南部及河南西南部，至湖北丹江口入汉，与丹阳郡无关。班氏这一条显系误记，除此之外，楚都迁徙之迹是历历可见的。

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卫与鲁国为大国，卫国的都城在朝歌。《地理志》河内郡朝歌县下说："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卫于春秋时曾一再迁都，《地理志》山阳郡成武县下说："有楚丘亭。齐桓公所城，迁卫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阳。"东郡濮阳县下也

说:“卫成公自楚丘徙此”。卫自楚丘徙濮阳是不错的,楚丘实在濮阳之西,并非成武县的楚丘,班固在这一点也稍有些不慎审之处。河内郡野王县下又说:“卫元君为秦所夺,自濮阳徙此。”则已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了,蔡国受封也最早,还早在卫国之前。周初经过一段挫折,始定封于汝水流域。《地理志》汝南郡上蔡县下说:“故蔡国,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新蔡县下说:“蔡平侯自上蔡徙此,后二世徙下蔡。”沛郡下蔡县也说:“故州来国,为楚所灭,后吴取之,至夫差迁昭侯于此。后四世侯齐竟为楚所灭。”这里所说的昭侯,就是蔡昭侯。这不仅记载了迁都,而且记载了蔡国的灭亡。

战国时,韩、赵、魏三国并列为诸侯。三国也皆各自迁都。韩始都于平阳。《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县下说:“韩武子玄孙贞子居此。”河南郡新郑县下说:“韩自平阳徙都之。”颍川郡阳翟县下又说:“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韩国固曾都于新郑和阳翟,然孰先孰后,后来学者间有争论,班氏所记仍不失为一说。赵国的都城,据班氏所记,是始都于耿。《地理志》河东郡皮氏县下说:“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以赐大夫赵夙。后十世,献侯徙中牟。”河南郡中牟县下说:“赵献侯自耿徙此。”赵国邯郸县下也说:“赵敬侯自中牟徙此。”至于魏国的都城,则《地理志》河东郡河北县下说:“《诗》魏国,晋献公灭之,以封大夫毕万,曾孙绛徙安邑也。”安邑县下说:“魏绛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陈留郡浚仪县下也说:“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

这些都是当时的大国。一些小国的徙都也有被道及的。杞、莒等国就是具体的例证。《地理志》陈留郡雍丘县下说:“故杞国也,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先春秋时徙鲁东北,二十一世简公为楚所灭。”琅琊郡计斤县下说:“莒子始起此,后徙莒。”城阳国莒县

下也说："莒，故国，盈姓，三十世为楚所灭，少昊后。"有些封国虽未具体说明其都城迁徙过程，但由所记载的事迹还可以显示出是曾经有过迁徙的。会稽郡山阴县下说："越王勾践本国。"可是在琅邪郡琅邪县下又说："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显然可见越国在勾践时是曾经迁都到琅邪，后来又离开琅邪南迁的。

五　关于春秋以前各时期古都的记载

《地理志》对于春秋以前更为远古的都城也有所记载。它所记载的最早的都城，是相当于汉东郡濮阳县的帝丘，并且指出这是颛顼虚。按照古史的撰述通例，所谓虚者，就是古都的旧址。这是说，帝丘曾经作过颛顼的都城。至于三代的都城，它举出了夏禹所都的阳翟。阳翟于汉时属颍川郡。它还指出殷汤的都城在汉时河南郡偃师的尸乡。而纣的都城则在汉时河内郡的朝歌县。夏、商两代都曾频繁迁徙都城，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全貌，虽非全貌，亦可见它对于这两代的都城并没有完全忽略。周人起于岐下，灭商以前以丰为都，灭商以后又经营镐京。丰镐近于长安，而长安又为汉都所在。《地理志》未于长安县下注出丰镐为周都，大概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好在《后序》已经具体指出："后稷封邰，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较之所叙夏商都城仅限于阳翟、偃师、朝歌为详细多了。其实，《地理志》所记载的周都还不仅止于此。右扶风槐里县下说："周曰犬丘，懿王都之。"周东迁之后，居于雒邑。由于历年长久，都城亦小有变更。这在《地理志》中也曾详细载及。河南郡河南县下说："故郏鄏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雒阳县下又说："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晋合诸侯于

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①]就在巩县之下,也还特补了一笔:"东周所居。"这就相当清晰明白了。甚至在周灭之后,对于它的故君所居地,也还有所记载。河南郡梁县下说:"𢘆狐聚,秦灭西周徙其君于此。阳人聚,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

三代之时,部落杂居,小国林立,亦前后相继夷灭,不易稽考。其中有些古国,《地理志》也还间有所记载。右扶风鄠县下说:"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楚国彭城县下也说:"古彭祖国。"这样的小国都能见于记载,更可以说明《地理志》所记虽以西汉一代为主,但并不限于西汉两百年间的地理。

六 《汉书·地理志》中所见的秦的疆域区划

至于秦的疆域,《地理志·后序》曾经有过概括的说明。它说:"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秦内史于汉为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三十六郡的名称据《志》文所载,可列为如下三部分:

1. 称秦置的郡,而汉时仍用故名的:河东、太原、上党、东郡、颍川、南阳、南郡、九江、巨鹿、齐郡、琅邪、会稽、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南海。

2. 称故秦郡,汉时另称新名的:三川(汉河南郡)、泗水(汉沛郡)、九原(汉五原郡)、桂林(汉郁林郡)、象郡(汉日南郡)、邯郸(汉赵国)、砀郡(汉梁国)、薛郡(汉鲁国)。

3. 称秦郡,而汉时改郡为国的:长沙。

---

① 这里所说的"昭公二十一年"乃是误文,应作"昭公三十二年"。

嬴秦制度，郡之下皆有属县。这样的制度战国时即已有之。秦人设县远在春秋之时，据《史记》所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①]邽、冀两县在今甘肃天水市和甘谷县，杜、郑两县在今陕西长安县和华县。秦统一六国后，设县更多。盖每郡所统之县，绝不会少至两三个。如以每郡三县合计，当时全国设县，亦应在百数以上。拙著《秦县考》对此曾做出考核，虽尚未臻了无遗漏的地步[②]，为数也已不少。《地理志》所列举的，却只有酆邑（汉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蓝田（汉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宁秦（汉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东南）、栎阳（汉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夏阳（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频阳（汉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临晋（汉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咸阳（汉渭城，今陕西咸阳市东）、废丘（汉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东南）、雍（汉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蒲反（汉蒲反，今山西永济县西南）、曲沃（汉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东北）、鄢（汉宜城，今湖北宜城县南）、郢（汉郢县，今湖北江陵县）、班氏（汉班氏县）、东垣（汉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16县。

或谓秦县应该更多，《地理志》下载有始置之年之县，皆当为汉初所承秦的故县。这样的说法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其实却未必尽然。汉武帝时设郡不少，且多轶出于秦郡之外，《地理志》于这些新郡所辖的县，皆未能一一尽注明其设置之年，这将又如何做出解释？《地理志》不备注秦县，亦非偶然疏漏。这可以丰、沛两县的关系作为说明。丰、沛两县皆沛郡属县，其地位应该是同等的。不过这中间还有些曲折。这里是汉高祖的故里。《史记·高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② 《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6、7合期。

祖纪》和《汉书·高祖纪》都说："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可见丰原来并未设县。应劭解释说："沛，县也，丰其乡也。"孟康解释说："后沛为郡，而丰为县。"师古也说："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耳。"这是说，沛应该是县名，而且是秦时的县名。可是《地理志》沛郡沛县之下，并没有注明这是秦县。沛县犹且如此，其他就更不必说了。可见班固撰述《地理志》时，重视郡的一级，对于郡下的属县就不免忽略。不过这于一代的地理沿革还不至于产生若何的错觉。

七　《汉书·地理志》中所见的新莽的疆域区划

《地理志》是记载西汉一代的地理和有关的制度的，它可以追溯既往，似与王莽的新朝无关。可是《地理志》于新莽一朝的地理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也许是因为新朝历年短暂，王莽又本是汉室的重臣，故随笔记下。不论其起因为何，新朝一代的地理却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王莽当政后，对于汉制多所改易，于郡国建置也多有变动。《汉书·王莽传》对此曾有详细的记载：

>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其无爵者为尹。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六郊州长各一人，人主五县。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为五。

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也。缘边又置竟尉，以男为之。诸侯国闲田，为黜陟增减云。莽下书曰："常安西都曰六乡，众县曰六尉。义阳东都曰六州，众县曰六队。粟米之内曰内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边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

这样的变动是相当巨大的，仅以郡国数目来说，其间相差也是很多的。《地理志》记载西汉一代的疆域，不可能把这样的变动都记载下来，可是王莽所建置的郡县，见于《地理志》中的还非少数。这在一般撰述中应该是一个特例。

按照《汉书·地理志》编撰的体例，无论郡国县邑，凡王莽所改变的，皆于其下注"莽曰"，以示与汉制不同。其所未注的，则是仍依汉旧，没有什么改易。今按《地理志》叙述次序，分列于下，以略见其轮廓。

《地理志》的叙述最先是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就是所谓三辅。三辅之下皆未注"莽曰"。是否由于是都城所在，故未一一注明，亦未可知。但不能因此而谓莽时仍有三辅郡名。前引《王莽传》，已知莽时分三辅为六尉郡。颜师古据《三辅黄图》之说，谓此六尉郡为京尉、师尉、翊尉、光尉、扶尉、列尉。其他各郡经王莽改名或分置者列举如下：

弘农郡（莽右队郡），河东郡（莽兆阳郡），河内郡（莽后队郡），河南郡（莽保忠信卿），东郡（莽治亭郡），颍川郡（莽左队郡），汝南郡（莽汝汾郡，分为赏都），南阳郡（莽曰前队），南郡（莽南顺郡）、九江郡（莽延平郡）；山阳南（莽巨野郡），沛郡（莽吾符郡），魏郡（莽魏城郡），常山郡（莽井关

郡),清河郡(莽平河郡),涿郡(莽垣翰郡),勃海郡(莽迎河郡),平原郡(莽河平郡),千乘郡(莽建信郡),济南郡(莽乐安郡),齐郡(莽济南郡),琅邪郡(莽填夷郡),东海郡(莽曰沂平郡),临淮郡(莽曰淮平郡),豫章(莽九江郡),桂阳郡(莽南平郡),武陵郡(莽曰建平郡),零陵郡(莽九疑郡),汉中郡(莽新成郡),广汉郡(莽就都郡),犍为郡(莽西顺郡),越巂郡(莽集巂郡,益州郡(莽就新郡),牂柯郡(莽同亭郡),武都郡(莽乐平郡),陇西郡(莽厌戎郡),金城郡(莽西海郡),武威郡(莽张掖郡),张掖郡(莽设屏郡),酒泉郡(莽辅平郡),敦煌郡(莽敦德郡),北地郡(莽威成郡),西河郡(莽归新郡),朔方郡(莽沟搜郡),五原郡(莽获降郡),云中郡(莽受降郡),定襄郡(莽得降郡),雁门郡(莽填狄郡),代郡(莽厌狄郡),上谷郡(莽朔调郡),渔阳郡(莽通路郡),右北平郡(莽北顺郡),玄菟郡(莽下句骊郡),乐浪郡(莽乐鲜郡),苍梧郡,(莽新广郡),合浦郡(莽桓合郡),赵国(莽桓亭郡),广平国(莽富昌郡),中山国(莽常山郡),信都国(莽新博郡),河间国(莽朔定郡),广阳国(莽广有郡),胶东国(莽郁秩郡),城阳国(莽莒陵郡),淮阳国(莽新平郡),梁国(莽陈定郡),东平国(莽有盐郡),楚国(莽和乐郡);泗水国(莽水顺郡),广陵国(莽江平郡),六安国(莽安风郡),长沙国(莽填蛮郡)。

另有太原、上党、东郡、陕留、江夏、庐江、济阴、巨鹿、泰山、北海、东莱、会稽、丹阳、豫章、蜀郡、巴郡、安定、上郡、辽西、辽东、南海、郁林、交趾、九真、日南25郡和真定、高密、鲁3国,皆仍沿用汉时旧名,未有改变。

西汉一代原有103郡国。上面所列的,王莽改名的郡国为72处,沿用汉代旧名的郡国为28处。王莽分置的新郡1处,分三辅为六尉郡6处,共107处。按《王莽传》所说莽所置的郡共有125处,班氏所载尚差18处。又按扬雄于王莽时撰有《十二州箴》。这是扬雄对于王莽的歌功颂德。暂不论其内容如何,当是王莽时曾经建置十二州的佐证。《地理志》的撰述未能依据西汉时十三刺史部及司隶校尉部的次序及区划,故亦未能在各州之下标出莽曰何州的字样,因而就未能显示出王莽时的州制。这当然是一些不足之处,但不能因此而谓其和新莽制度就了无关系。

根据这样的论述,可见这篇《地理志》虽说是西汉一代的典籍,实际上却是起到了沿革地理的作用,它应是由夏商肇始,历经春秋、战国、秦、汉,而至于王莽新朝的沿革地理。班固所说的"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是完全与实际相符,一点也不夸张,不过下面还应该添上"新朝"的字样。就班固所在的时代来说,可以说这是一部"自古迄今"的沿革地理书了。

八 《汉书·地理志》兼重自然地理的演变

应该指出,在更远的后世,言沿革地理学的,多偏重于疆域区划的变迁、有关制度的改易和地名的差异。重视这些是应该的,这都是属于沿革地理学的范畴之内的部分,而不是沿革地理学的全貌。说这些是在沿革地理范畴之内的,因为这是人为的作用,促成地理的变迁。促成地理的变迁,人为的作用只是一个方面,还应该有自然的作用的一个方面。人为的作用固然可以促成地理的变迁,如果没有人为的作用,地理的变迁还是可以发生的。

研究地理的变迁都是沿革地理学的学者所不能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不能说自然的作用促成地理的变迁就可以不算是沿革。实际上促成地理的变迁的,其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作用再加上人为的作用,不可截然分开的。分开了就不能说明问题。

如果强要分开,以为沿革地理学只能是研究人为的作用所促成的地理的变迁的,那是和班固创始沿革地理学的初意不相符合的。班固曾经明白说过:"考迹《诗》、《书》,推表山川。"这句话就有两方面的含义:既要探究促成地理变迁的人为作用,还要探究促成地理变迁的自然作用。前面曾经说到班固撰述《地理志》时的承受,是《禹贡》和《周官》。《禹贡》和《周官》都是于典章制度之外,兼重自然地理现象,而《禹贡》更为明显。《禹贡》用了很多篇幅来说道山和道水。"道"是什么意思?旧说是"治水通水"。这样说是不是过分强大了人为的作用?就是仅仅走去看一番,也是了不起的。因为究竟掌握了一些自然作用的特点。弱水是余波入于流沙的①,怎么才算是余波?河水是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的,是怎样播的,又是怎样才能成为逆河的?沇水是东流为济,入于河、轶为荥的②,入河是容易看到的,入河之后怎样轶出而为荥的?这些都是自然的作用,不了解这些自然的作用,是难于说明当时的地理的。

班固承受了《禹贡》和《周官》的衣钵,对于促成地理变迁的

---

① 弱水,今为黑河,流经甘肃张掖、高台等县。流沙即居延海,今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比苏古诺尔和嘎顺诺尔。

② 沇水即济水,由今河南济源县东南流,经今河南郑州市和开封市北,又经今山东济南市北,东北入海。故道久已湮没。荥泽在今郑州市西北,亦已湮没。

人为作用和自然作用还是都能照顾得到的。这里不妨略举一些事例来作说明。当时在扶风汧县之西有一座吴山[①],《地理志》不仅记载了吴山的所在,还特别指出:"古文以为汧山。"武威郡武威县东北的休屠泽[②],也指出:"古文以为猪野泽。"豫章郡历陵县南的傅易山和傅易川[③],也是古文所说的傅浅原。这些名称和以前有所不向,当然是变迁,但这是人为的变迁,与自然的变迁并不完全一样。在自然变迁方面,河流的变迁远比山岳的变迁更为迅速和易于被发现。《地理志》因之作了重要的记载。以河流来说,河水是一条大川。最早对河水作全面记载的,应该是《尚书·禹贡》了。《禹贡》说河水,是"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地理志》说河水,是在金城郡河关县下[④]。据说:"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⑤],过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这样记载是否和《禹贡》相同?首先要问河水流经的十六郡的名称和所在地。这在后来的学者中就有不同的解释。不过《地理志》还有一些重要的记载,实际上对此作了说明。它在常山郡元氏县下说:"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堂阳为当时巨鹿郡属县,在今河北新河县西北。其地距当时黄河流经的地方相当远,沮水怎能在那里流入黄河?《地理志》上党郡沾县下说:"大黾谷,清漳

---

① 右扶风治所在长安城中。汧县在今陕西陇县。

② 武威郡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武威县今在甘肃民勤县南。休屠泽今为白亭海,近年已湮塞。

③ 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历陵县在今江西德安县东北。

④ 金城郡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北。河关县在今青海同仁县境。

⑤ 章武县在今河北黄骅县北,汉时为勃海郡属县。

水所出，东至邑城入大河。"汉时无邑城县。邑城县应是阜城县之讹。阜城县在今河北阜城县东北。阜城县距当时河水入海处的章武县不远。章武县在今河北黄骅县北，位于阜城的东北。阜城县于堂阳县为东北，虽其间尚有相当远的距离，河水如经过阜城县，也就有可能经过堂阳县。这样沮水入黄河也就有了着落。漳水能在阜成县入于河水，就必然会流经大陆泽的。可是《禹贡》所说的河水也是要经过大陆泽的。如果漳水和河水都经过大陆泽，这两条河流就应该在大陆泽或其附近相会合，不必等到流至阜成县。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河水已经改道了。在那时以前，河水可能还不是只有一次改道。《地理志》涿郡下说："桃水首受涞水。入东至安次入河。"中山国北平县下说："徐水东至高阳入博。又有卢水，亦至高阳入河。"中山国望都县下说："博水东至高阳入河。"安次县在今河北廊坊市，高阳县在今河北高阳县东。而安次更在高阳东北。如上所说，黄河曾经流经堂阳、阜城两县，而东至章武入海，那就不能再绕流到高阳和安次两县。安次在今天津市西北，章武则在今天津市东南。如果黄河确曾流经安次县，那就绝对不会再东南流至章武入海的。可见流经高阳和安次两县的黄河，又另是一条河道，是流经堂阳和阜城两县以前的黄河故道了。其实，《地理志》在魏郡邺县[①]下，已经说过："故大河在东北。"既然故大河的遗迹都还存在，当然是河水曾经改过道，和其以前不同了。

如上所说，《禹贡》和《周官》由于兼重促成地理变迁的人为作用和自然作用，因而都能较多地记载当时已知的自然现象。班固既然绍述《禹贡》和《周官》的成就，他不仅记载了《禹贡》和《周

---

① 魏郡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县当时为魏郡的治所。

官》所已记载过的自然现象，而且还有更多的增益。就以《地理志》所记载的全国水道来说，就多达440条，这应该说是空前的。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班固撰述《地理志》，就是不仅注重人文地理，而且也兼重自然地理，其重视的程度，不仅超过了《周官》，而且更超过了《禹贡》。这里所说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应该是和现在所说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是相同的概念。但不能用现在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水平去衡量《地理志》，也不能用之去衡量《禹贡》和《周官》。科学的发展和成就，在现在是会日新月异的。用现在的水平去衡量距今两千年前，甚或更古的成就，那是不公平的。

九 《汉书·地理志》与沿革地理学的定名

不论《禹贡》或《周官》，都是记载当时的地理，《地理志》却迈进了一大步，不仅记载当时的地理，而且兼记载以前各代的沿革地理。上面曾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根据《地理志》的论述，列举了相当多的具体例证，都可以作为证明。这样记载全国地理的沿革，是以前所没有的。应该说这是班固的首创。这样的记载方式，从此就长期为后世所遵循。不过《地理志》只是《汉书》的一篇，而《汉书》却并非专论沿革地理的著作。

应该指出，班固所首创的记载方式，尚未以沿革的名称相称。后来在方志的撰述中，始有以建置沿革为篇名的。今传世的《三辅黄图》，开篇之后，就显然以《三辅沿革》为标题，即其一例。寖假遂成为定规，而方志以外的撰著也颇有沿用，遂成为这样一门学科的专称。

十 《史记·河渠书》与沿革地理学

诚然,班固首创沿革地理学,就在他的前后,也还有人在这方面多所致力,取得了成就。司马迁所撰的《河渠书》就是首先应该值得称道的。《河渠书》为《史记》八书之一。这篇书中记载黄河的变迁,实为前所未有的绝作。黄河易溃易决,自古已然。《禹贡》首记黄河,自积石历龙门、华阴,过砥柱、孟津,再经洛汭、大伾,而至于大陆,以下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这是见于史篇最早的黄河所行的河道。历秦至汉,黄河一再溃决,甚至改道。《河渠书》备载其溃决的过程。这应是一篇最早记载黄河水道变迁沿革的史籍,堪与《禹贡》媲美。

《河渠书》不仅记载了黄河水道的变迁,还记载了其他水道的变迁。而鸿沟乃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鸿沟为由荥阳引黄河水东南行的人工水道。其下游和济、汝、淮、泗等几条河流相汇合。能够和济、汝、淮、泗几条河流相汇合,可见鸿沟的分叉很多,并非只是一条水道。也由于几条水道交错,所以能够通到宋、郑、陈、蔡、曹、卫诸国。用现在地理来说,是西起河南郑州市,东至江苏徐州市,有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山东西南部和江苏西北部。鸿沟的开凿成功,使这一地区的自然面貌有所改变。《河渠书》记载了鸿沟的原委,也使这一地区的水道变迁沿革能为后世所知悉。这应该是司马迁对于沿革地理的又一贡献。在此之外,《河渠书》还记载了其他水利设施。虽然规模大小不一,都能使有关地区的自然面貌有所改变。

前文曾经征引过《隋书·经籍志》一段有关的论述,今不惮繁琐,再次道及。《经籍志》说:“(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

地志国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在《经籍志》的撰者看来,似对史迁仅以郡国地志用之于记述河渠,稍有不足之感,但《河渠书》究竟是能和《地理志》居于同等的地位,却是显然可见的。应该指出,司马迁撰述《河渠书》并非仅利用郡国地志的记载,而是实地考察的结果。那时,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县南)决口,二十余年未能堵塞,后来汉武帝亲临其地,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堵口合龙后,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这一役是司马迁曾经参加的,所以他的感触很深。司马迁也曾周览各地山川,见闻博广,所以他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伾,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可以说,《河渠书》也应该是一篇沿革地理的著作。只是它仅记水道的沿革,不及《地理志》的更为全面,在沿革地理学方面来说,其盛名遂为《地理志》所掩盖。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年第 3 期)

对《汉书》十志的总体考察

陈其泰

《汉书》的十篇志①,在传统史学中历来被视为精华之作,对于后世典志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十篇志的内容涉及到诸多专门的学术领域。清代以前,学者多限于对它们作疏证考订的工作。近代以来,随着各个专门学科的出现,研究者也大多就本身的学术领域,如天文,历法等,利用其中的资料而加以诠释;而对这十篇志作综合的研究却未予足够重视,在发掘其中的思想价值方面尤其显得薄弱,这跟《汉书》十志在学术史上所具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我国古代优秀史家有通晓多种学科门类的传统,《汉书》十志既为经济史、法制史,地理学史、水利工程史、文献学史等分支学科的产生开了先河,向来被视为"博洽"的典范。因此研究《汉书》十志的成就,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改变旧日存在的以本学科范围局限的倾向,用相关学科的知识丰富自己,进行交叉的研究,也极有启发。本文试图在以往学者所论及的基础上,对这十篇志作总体考察,对其宝贵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做出评价,以下分五个问题提出初步看法。

---

① 这十篇志依次是《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

一　反映社会生活与贯通古今

《汉书》十志完善了史书中的典志体，使历史学家描绘人类社会生活的能力增强了；班固又有意识地克服了断代史体制的局限，以典志体贯通古今。从现代观点看，这两项都是史家在历史视角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在今天也仍有启示的作用。

《汉书》十志对《史记》八书的发展，首先是调整了篇目，增写了内容。班固合《礼书》、《乐书》为《礼乐志》，合《律书》、《历书》为《律历志》，改《天官书》、《河渠书》、《平准书》、《封禅书》为《天文志》、《沟洫志》、《食货志》、《郊祀志》。班固在这些篇目中都增加了重要的新内容。《礼乐志》和《律历志》内容完全重写，《礼乐志》记载了汉初叔孙通以下有关制礼的重要言论、汉初的郊庙诗歌《安世房中歌》十七首和武帝时的乐府歌曲《郊祀歌》十九首，《律历志》记载音律和度、量、衡单位的制定，历法的演变。《郊祀志》续载了昭、宣以后帝王的封禅祭祀活动，批评统治者的迷信思想，记载了谷永等人谏议废除淫祀的进步言论。其次，《汉书》新创了《五行志》、《地理志》、《刑法志》、《艺文志》，扩大了典志体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范围。后出的二十二部"正史"，加上《清史稿》，除了《三国志》等八部未设典志以外，其余十五部所设立的典志基本不出《汉书》十志的范围。只是或者个别篇目略有增减，如《后汉书》、《晋书》等设立《百官志》①、《舆服志》，《新唐书》、《宋史》等设有《仪卫志》、《选举志》、《兵志》；或者内容相类而篇名稍异，如《地理志》，《后汉书》改为《郡国志》，《宋书》、《齐书》改称

① 《汉书》有《百官公卿表》，兼具表和志的功用，《百官志》即由它演化而来。

为《州郡志》,《魏书》改称为《地形志》,又如《艺文志》,《隋书》、《旧唐书》改称为《经籍志》。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十志规模宏大……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有所增减"①。不仅如此,在《汉书》十志的基础上,典志体更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其代表作是《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还有继出的《续三通》和《清三通》,俨然成为传统史书体裁中地位仅次于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又一重要史书体裁。

典志体由纪传体史书诸体中之一体,至发展成为史书中独立的一大门类,这个事实说明了:选取记载典章制度在内的社会生活作为记载历史的一个视角,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很有必要。人们熟知时间、人物和事件是历史演进的三个要素,它们都可构成记载历史的视角。以时间为主要视角,故有纪传体中的"本纪"和编年体史书;以人物为主要视角,故有纪传体中的"列传";以事件为视角,则原先糅合在"本纪"与"列传"之中,事件的纲载于"本纪",事件的具体进程载于"列传",后代还发展为独立的纪事本末体裁。记载了时间、人物、事件,可以说一个时期的历史已具备主干或筋脉;但是还有大量有关典章制度或经济、文化等项社会活动的内容,选取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作为视角,才能填补主干之间的空间地带,历史著作才做到既有骨骼筋脉,而又血肉饱满。唯其如此,《汉书》十志才一向备受重视,典志体在长期史学演进中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再发出加强社会史研究的呼吁,实际上即反映了多视角反映历史和"改变多年来形

①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第24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成的历史著作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①]这一迫切要求，《汉书》十志在这方面无疑包含有真理的因素，因而值得我们重视。

《汉书》叙述西汉一代的终始，起自高祖，终于王莽，开创了断代历史的体制。这种编撰形式也一直被后代沿用，证明断代史体制与封建皇朝周期性更迭的现象正相适应。记载历史事件、人物可以一个朝代为终始，而有关社会生活的内容却往往是上下贯通的，不能割断前后的联系。班固著史恰当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他在全书"断汉为史"的同时，对典志体（还有兼具志书功能的《百官公卿表》）却别具特识心裁，做到了"通古今"[②]。这无论从考察历史的角度说，或是从史书形式的灵活运用说，都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创造，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其中，尤以《刑法》、《食货》、《艺文》三志最为突出。

《刑法志》前面附有兵制的内容，这是儒家"大刑用甲兵"观点的体现，交待了周秦兵制的渊源。这篇志的主要部分，是纵向论述中国刑法的源流，开我国法制史之先河。班固初步理出了古代刑法演变的线索：周代立五刑（墨；劓；膑，即砍脚；宫，阉割生殖器；大辟）；郑子产铸刑书；战国申不害、商鞅实行连坐法，夷三族，还增加凿头胪、投入油锅等惨酷的刑罚；秦始皇专任狱吏，造成囚徒塞路，监狱遍地。显然，《刑法志》这样作了"通古今"的追述，此后记载汉初扫除秦朝烦苛的法律、实行简法省刑，才有所本，中国法制史上这一次重大变革的意义，才能清楚地显示出来。《食货志》是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发展的。班固把全志扩充为

①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评论员文章），《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② 《汉书·叙传》。

“食”和“货”两大部分，他论《食货志》的撰述义旨说：“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割制庐井，定尔土田，什一供贡，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贸)迁有无。货自龟贝，至此五铢。杨榷古今，监世盈虚。”[①]又说：“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②]认为农业生产(包括土地问题)和商业交换活动是人类生活的根本，也是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食货志》为了显示出汉代各种经济制度的渊源所自，上篇首先叙述了先秦的井田制度，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管仲行“轻重之法”等经济措施，下篇开头也先记载周、秦的币制。而在《艺文志》中，班固把西汉时所收集到的自古以来的典籍整理为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并分为六大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每一大类又区分为若干种，共三十八种。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各大类都论述其源流，总结其优缺点。又将先秦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③]、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完成对先秦学术的分类工作。《艺文志》在学术文化方面贯彻了“通古今”的要求，因而成为目录学史上的典范作品。他如《律历》、《地理》、《河渠》诸志，也都保留了汉代以前的有关记载。

史书的编撰形式同史家的观点是密切相联系的。过去有一种看法，似乎体裁体例都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与史学观点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历史学家采取何种编撰形式，是为了同他所表述的内容相适应，因而也能体现出史家的观点。《汉书》十志突破了断代史的局限，自觉地做到“通古今”，这是班固在记载社会生

① 《汉书·叙传》。

② 《汉书·食货志》(上)。

③ 此六家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同，而顺序略作调整。

活和典章制度方面追求贯通古今的可贵努力，也是古代史家的一种“通识”。若果班固缺乏这种通识，对十篇志也刻板地按“究西都之始末”去做，结果只能是割断必要的历史联系，这十篇志以至整部《汉书》也将大为逊色。

二　科学技术史的珍贵资料

《汉书》的《天文志》、《律历志》，还有《五行志》，包含有关于古代天文、历法和其他自然现象的珍贵史料。这些记载证明汉代的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其中有关日食、太阳黑子、哈雷慧星等项记载，在近代以来尤为中外自然科学家所重视。

（一）对古代天象观测的总结

《汉书·天文志》是对汉代以前天文学家观测天象成就的总结，此外《律历志》和《五行志》也包含有这方面的珍贵内容。《天文志》继承了《史记·天官书》的传统，首先详细记载汉代已观测到的恒星，将全天分为紫宫、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五大区域，东西南北四宫各包括二十八宿的七宿，如东宫苍龙包括房、心、角、亢、氐、尾、箕，南宫朱鸟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史记·天官书》列有九十一星组，包括五百多颗恒星。由于观测的进步，《汉书·天文志》所列多了十七个星组，二百多颗恒星。其次，《天文志》记载了对五大行星运行的观测，它们是岁星、荧惑、太白、辰星、填星，即木、火，金、水、土五星。《天文志》所载还以二十八宿对应地面的分野，介绍古人常用的候、望说法，即借观测云气、天象预测吉凶，反映了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流行。志的最后部分记载自春秋至西汉末对异常天象的观测，包括日食、月食、彗星、陨石，五大行星运行的守、孛、逾、逆，流星，客星

等,其中也包含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可与《律历志》、《五行志》互相印证、发明,故也甚为自然科学史研究者所重视。

历法的推算离不开对天象的观测。故《律历志》中记载的刘歆《三统历》的一系列的基本数据,即为重要的天文学史资料,同样反映了汉代对日、月、行星运行观测的成就。如:

一日分为八十一分,称“日法”。

十九年中置七个闰月,称为“章法”。每十九年中有完整的月份二三五月,称为“章月”。

一月为二三九二分,称“月法”。

日月交食周期为一三五月,称为“朔望之会”。

这些数据都是由实际观测和相当周密的计算得来,尽管其数值与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观测得到的数值尚有误差,如日月交食周期一三五月与实际交食周期二三五月之间误差还较大,但这一测定却标志着探索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阅读《律历志》还应注意,《三统历》有意把具有科学价值的数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必须透过这些比附和神秘的说法,才能掌握其有价值的内容。如朔望之会(日月交食周期)一三五

---

① 汉初使用四分历,以一回归年为 $365\frac{1}{4}$ 日,一朔望月为 $29\frac{499}{940}$ 日。《太初历》将一朔望月的日数简化为 $29\frac{43}{81}$ 日,一回归年为 $365\frac{385}{1539}$ 日。因将一日分为八十分,故又称为“八十一分历”。《律历志》称:“太初术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之四十三。”《三统历》即完全袭用《太初历》所规定的数值。

② 《三统历》的月法是由推算得来。即1朔望月为 $29\frac{43}{81}$ 日,按每日分为八十一分,即1月为 $29 \times 81 + 43 = 2392$(分)。

月，本是由观测、计算所得，《三统历》却作数字的假托："朔望之会百三十五。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得朔望之会。"里的"天数"、"地数"，是比附《易经·系辞》所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据此而比附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换成现在的明白说法，把十位数内五个奇数(1,3,5,7,9)之和(25)称为天数，把五个偶数(2,4,6,8,10)之和(30)称为地数。于是假托为参天数二十五(3×25)加上两地数三十(2×30)，得会数(75+60=135)。关于"章月"，《三统历》也故意用了比附的说法①。

这种故意比附的说法，是当时迷信思想盛行的反映。近代天文学家朱文鑫说得好：《三统历》玄妙其说，附会《易象》以为月法，假托钟律以为"日法"，又故意讲历法的得来是推"大衍术"，反使人不可解。"后汉、晋、隋沿袭相承，至唐开元，直以'大衍'名历，致使天文之学误入歧途，而西人之术，遂得专美于前。"②本来汉代天文观测和历法已达到很高的成就，但使用迷信说法恰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是科学史上的深刻教训。

《律历志》详细记载了五大行星在运行轨道上作顺行、留、逆行、复留、疾行及其度数，记录的资料周备，故为历代历法家所遵奉和继承。木星合日三十三日间，位于太阳近旁，无法观测，过了

---

① 关于章月，《三统历》说："会数四十七。参天九，两地十，得会数。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会数，得章月。"实际上，章月数二百三十五，是由一章十九年置七个闰月，化成月数直接得到，即19×12+7=235(月)。但《三统历》为了说得玄妙，却故意掩盖起来，先将235化为47和5两个因子。再分为两步作数字的伪托：把47称为"会数"，说是"参天九，两地十，得会数。"(3×9+2×10=47)然后又说"五位乘会数，得章月"(5×47=235)。

② 《历法通志》，第70—71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这期间，木星在日出前，出现于东方天空中，叫做“晨始见”。这是隔约三九九日所发生的现象。《律历志》记载了这个周期。同时记载了金星两次“晨始见”周期约为五八四日。土星两次“晨始见”的周期约为三七八日。火星两次“晨始见”的日数为七十八日。水星两次“晨始见”约一一六日[①]。

《律历志》还告诉我们：汉代天文学家对五大行星运行一周天的周期已有相当准确的记载。如：木星以十一·九二年为周期[②]。在此基础上，《后汉书·律历志》则以十一·八九年为周期，与现今用科学手段观测得出的精密数值（十一·八六年）已很接近。土星运行一周天的周期为二九年半。火星运行一周天的周期为五八四日。

（二）音律、计量和历法的制定

《汉书·律历志》虽得名于《史记》的《律书》和《历书》，而内容完全新撰，根据王莽于元始年间征集天下通晓律历者百余人讨论，刘歆等负责上奏，班固加以删节而成。《律历志》前一部分讲音律及度、量、衡制度，包括：

---

① 朱文鑫对《律历志》记载五星运行规律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五星行度始见于《史记·天官书》，至《三统历》而大备。五步之法，为后世历法家所宗。其言五星‘见’、‘复’之期，多与今测密近。可见古人观测之精。《三统》以土、木、火之周期曰‘一见’，金、水之周期曰‘一复’。盖土、木、火之轨道，在地球轨道之外，今谓之外行星。当地在星与日之间谓之冲日，与日相冲，如月之望，故《三统历》曰‘一见’；金、水之轨道，在地球轨道之内，今谓之内行星，当星在地与日之间，或日在星与天之间，谓之合日，与日相伏，故《三统历》曰‘一复’，区别甚明也。”（《历法通志》第47页）

② 木星在五星中，一年可看到的时间特别长而且较亮，因它大约12年绕天一周，古人遂用它来记岁，故称为“岁星”。创十二次之法，一年在一次。

算术单位个、十、百、千、万的确定。

音律的确定。五声:宫,商,角,徵,羽。六律:黄钟,泰族,姑洗,蕤宾,夷则,亡射。六吕: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

度、量、衡制度。度的单位:分,寸,尺,丈,引。量的单位:龠,合,升,斗,斛。权衡单位:铢,两,斤,钧,石。

后一部分,对历法作具体论列。概述了历法的起源,从古代观象授时,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的存在,到秦以十月为岁首。重点是论述汉代历法的演变。汉初袭用秦朝正朔,用《颛顼历》。武帝元封七年(前106),诏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议造汉历。于是武帝颁行《太初历》。又经过元凤三年(前78)太史令引起的应该改历与否的辩论,才达到"是非坚定",《太初历》的进步意义被人们所确认。有关刘歆《三统历》所提供的数据记载尤详。《三统历》产生于两汉之际迷信思想泛滥的时代,我们应剔除其中附会迷信的说法,撷取其中有科学价值的成分。

《律历志》所载"次度"和刘歆《世经》也很有意义。当代天文学史家认为:《律历志》中保存的"次度",与《史记·历书》中的《历术甲子篇》,"堪称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双璧"。它说明中国天文之与历法密切配合,所以是一部"宝典"。[1] "次度"根据对二十八宿的长期观察,记载了一年十二个月的节气,注明二十八

① 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第33、3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宿的距度。十二次[1]的每一次,等于阴历一个月,每月中有两个节气。如说:

> 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原注:于夏为十一月,商为十二月,周为正月)终于婺女七度。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星纪"次,斗十二度,就是大雪的节气;到牵牛初,便是冬至节气。这个月夏历为十一月,殷历为十二月,周历为正月。"初"指"节","中"指"中气"[2]。由于汉代二十四节气的定名和顺序规定得恰当,因此从那时起一直沿用到今天。

《世经》是一部将传说中的太昊到东汉光武,都按五德终始说排列起来的正统表,准确性不很大,有关远古的年代则出于推测。但这部《世经》在史学上又有重要贡献,是刘歆用《三统历》将经传所纪古史大事的年月日一一推算出来的成果。经过班固的补充,成为对古史年代的总结。故范文澜先生认为《世经》"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并称董仲舒今文经学、司马迁著《史记》、邓平等人造《太初历》和刘歆的古文经学及年代学,都是西汉在文化史上的杰出成就,"充分表现出西汉一朝的伟大气象"[3]。

(三)日食·太阳黑子·哈雷彗星

---

① 古代天文学家分黄道周天为十二段,每段三十度,称为"十二宫"或"十二次"。按斗柄所指依次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② 后代将"节"和"中气"二者合起来,通称"节气"。

③ 《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128页。

我国有世界上最早和最完整的日食记事。《春秋》所记 36 次日食,已为近代科学方法所验证。《汉书》继承了这一传统,详细记载了西汉 212 年的 53 次日食,这份完整的纪录,即见于《五行志》。这是班固对自然科学史的一项贡献。当代学者用近代天文学知识进行推算,列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日食,《汉书》上的记载与之完全符合,足见《汉书》记载之完整①。此后的史书历代相承,其中偶有误记,但基本上是正确可靠的②。

我国关于太阳黑子活动的最早记载也见于《汉书·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是公元前 28 年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比起外国的记载早了一千几百年。关于哈雷彗星,《汉书》提供了自春秋至西汉末五次活动的记录③。

三 如何评价《五行志》

以上讨论《汉书》中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宝贵记载,已把《五行志》中一些内容与《天文志》、《律历志》联系起来论列了。现在要进而讨论《五行志》的价值问题。

《五行志》是《汉书》中最受后人责备的篇章。刘知幾著《史通》,其中有《〈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但我们

---

① 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 3 册《日食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从先秦至清末,我国史书上所见历代日食共有 1124 次。

③ 这 5 次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分别在鲁定公十四年、秦始皇七年、汉文帝后元二年、武帝后元二年及昭帝始元中、成帝元延元年,见于《汉书》之《五行志》、《天文志》、《律历志》及《昭帝纪》。

对《五行志》的内容却仍要作具体分析:其中确有许多属于迷信和附会的成分,但它又是一篇反映汉代学术思潮和社会生活的"志",从今天眼光看,此篇包含有不少关于科技史、自然史和灾荒史的材料。

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看,《汉书·五行志》的设立,其基本出发点是由于"志"本身应该广泛记载社会生活、学术文化这一特点所决定的。既然阴阳五行说在西汉流行,那么就应在"志"中反映。从典志体的性质、作用看,《五行志》的设立本身并不错。问题是班固用什么态度对待迷信说法。班固的态度是,一方面他有天人感应的神秘迷信观点①。又一方面,《五行志》所载是班固有意地汇集自《春秋》三传至董仲舒等人对于"灾异"的各种说法。故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迄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②这是说,从董仲舒到刘歆论"灾异"的说法互相乖异,《五行志》则是将各种说法纂辑起来。凡是引录在《五行志》中各家的说法,并非都代表班固本人的思想。更何况,班固对于灾异之说曾有直接的批评。《汉书》专设了一篇合传,记载眭孟、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这些阴阳灾异家的言行。最

① 《汉书·天文志》序说:"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同影)之象形,乡(同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悟,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② 《汉书·五行志》序。

后画龙点睛加以评论,很不客气地批评他们都是为了讨好皇帝:"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億(同臆)则屡中'。"[1]深刻地指出自董仲舒以下,这些阴阳灾异家的共同特点是牵强附会,任意臆测,即使有一二次说中了,也只是侥幸碰上,确实是打中了善推阴阳灾异者的要害。

对《史通》中批驳《五行志》的两篇,我们作一番认真辨析之后即可得出这样的总看法:刘知幾的言论有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对阴阳灾异的附会说法提出怀疑和批评;但刘知幾也有指责失当的,关键又在于他不了解《五行志》的内容具有既讲阴阳灾异、又提供自然灾害史等项资料的双重性质。譬如,刘知幾批评说:"春秋以还,汉代而往,其间日蚀、地震、石陨、山崩、雨雹、雨鱼、大旱、大水、犬豕为祸,桃李冬花,多直叙其灾,而不言其应。"[2]并举出《五行志》记载汉代日蚀等,皆不言其应。那么,"直叙其灾,而不言其应",难道真的是班固错了吗?不对。班固能够这样做,是免去附会、少言迷信的求实态度,是进步的,应予肯定。而若按刘知幾说的那样去做,凡是日食、地震、石陨、雨雹,件件都要找政治人事上的报应,恰恰将增加大量的附会。进一步说,《错误》、《杂驳》两篇所指责的条目虽多,但属于直接批评班固的条目却仅占少数。《错误》举出释灾过滥的共9条,只有两条批评班固。《杂驳》所辨驳的共12条,属于班固附会的仅1条。长期以来人们以

---

① 《眭西夏侯京翼李传》赞。

② 《〈史通·五行志〉错误》。

为《史通》有关《五行志》的两篇，所指责的都是班固本人的附会说法，对此必须予以澄清。

对于今天的自然科学史研究者来说，《汉书·五行志》中保存的有关自然现象的资料是很有价值的。志中详细记载的西汉 53 次日食，及有关太阳黑子、哈雷慧星的史料，已如前述。此外，志中所载有关毛孩、连体婴儿、男女性别转化、老人头上生“角”、马生角一类特异现象，以及地震、蝗灾、旱灾和其他天象、气象学的资料，都对有关学科的研究具有参考的价值。

四　有关封建国家职能的论述

研读《汉书》十志，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国家的职能及行使这种职能的经验教训。以往长时间中，我们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压迫，是专政机关。这是有道理的。但国家机关，从社会内部分出来之后，它还有管理的职能。这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也一再说到。恩格斯在 1890 年 10 月致康·施米特的信和 1892 年 6 月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曾一再讲到国家对经济的发展有“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三种作用，“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的发展”①。讲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能起加速发展的作用，那当然指它具有管理的职能。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提出《史记》八书和《汉书》十志基本上讲的是国家的职能②，这一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就《汉书》十志言，《礼乐志》讲制订礼乐以施教化，《天文志》、《律历志》讲观测天象以制定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95 页。

②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第 5 章“国家和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法，使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有所遵循，《郊祀志》讲祭神祀祖，《刑法志》讲法律制定和刑狱治理，《艺文志》讲掌管国家典籍即文化事业，这些都属于封建国家对各部门的管理。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则见于《食货志》、《地理志》、《沟洫志》三志中。

《食货志》上下两篇，重点记载西汉一代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引述了自贾谊、晁错、董仲舒至西汉末萧望之、师丹、孔光等人的重要论议，记载了历朝实行的经济措施及其效果。总括起来，全志从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的角度，阶段分明地划分为汉初国力上升、武帝盛世和晚年政策转变、两汉后期至王莽灭亡三个时期，很有说服力地论证经济政策正确与否如何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

在西汉初期国力上升过程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史实是：汉初经济凋敝，而经过六七十年的恢复，到武帝初年，财富充溢，国家谷仓里的粮食堆放不下，国库里铜钱堆积成山。这种在历史上罕见的巨额财富的积蓄，主要在文、景时期，而一般解释，是靠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和文帝躬行节俭所得。那么，国家真的是无所作为吗？《食货志》告诉我们，汉文帝采取了重要的行政措施，并且获得巨大的成效。事情的引起是贾谊和晁错的建议。贾谊先向文帝上《论积贮疏》，指出当时天下“背本而趋末”和“淫侈之俗”都很严重，致使“汉之为汉凡十年矣，公私之积就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他要求朝廷重视积贮以改变这种状况，“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富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晁错也向文帝上《论贵粟疏》，提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主张招募天下民众，凡是能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以赐爵或赎罪，这样“主用足”、“民赋

少”、“劝农桑”三个目的都能达到。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是令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能运到六百石的赐二等爵,逐一增加,运到四千石的赐第九等爵(五大夫),运到万二千石的赐十八等爵(大庶长)。晁错又提出建议:边塞粮食充足,可以储备在郡县;郡县储足一年所需要的粮食,即可免收田租。文帝采纳他的建议,下令减收天下田租之半(由汉初原来实行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这说明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已拥有相当的粮食储备。文帝十三年,又下令免收天下田租。《食货志》所记载的史实突出地证明:国家实行正确的政策,就能迅速地产生巨大成效。可以想见,文帝的法令一经颁布,即普遍引起民间为了求赏而竞相运粮、购粮,因而有效地刺激了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当我们讲到汉初经济恢复、国力走向强盛的时候,对于文帝时经济措施所起的作用是应予充分估计的。

至武帝初年,财富充溢,国力强盛:“都鄙廪庾都满,而府库余财。”可是由于武帝连年征伐,及对内兴造制度,多所设施,加上为祠神、封禅和赏赐神仙方士而大肆挥霍,数十年间,耗尽了文、景时期积累的巨量财富,造成国库空虚。旧史家认为武帝晚年出现的社会动荡与秦朝灭亡前的情景很相像,因而批评武帝“有亡秦之失”,与此同时,又称武帝能“免亡秦之祸”①。其原因,是武帝晚年转变了政策,下轮台诏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下令不复出军,实行罢兵力农。《食货志》详细记载武帝晚年奖励生产的“富民”措施,予以充分的肯定:“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赵过先在太常、三辅作示

① 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后元二年”。

范,“大农置工巧奴以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又因耕牛缺乏,“教民相与庸挽犁”。于是“田多垦辟”,“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新的耕作方法推广到边郡一带,“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武帝晚年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确实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昭、宣时期继续沿着这一罢兵力农的路线走下去,重视农业生产,故又出现“田野益辟”、“岁数千穰”[①]的局面,号称“中兴”。

《食货志》还论述:到了西汉晚期,土地兼并问题愈加严重,哀帝时,大司马师丹、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先后上奏建议“限田”,但只流于空论,根本无法实行。王莽利用西汉末社会陷入严重危机的局面篡汉自立,建立了短命的“新”朝。《食货志》以确切的史实记载表明,王莽灭亡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其经济措施造成了更大混乱,使人民无法生存。王莽实行“五均”、“六管”: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定期评定本地物价,企图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和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还规定民众如因丧葬需钱或经营缺乏本钱的,可以免息或低利息向政府借贷。六管指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王莽任用来推行这些政策的,多是一些大商贾,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王莽三次改变币制,骤行骤废。居摄二年(7),王莽先发行错刀、契刀、大钱三种钱币,规定错刀面值五千,契刀面值四百,大钱面值五十,与原来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9),王

① 此段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汉书·食货志》(上)。

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保留一枚面值为五十的大钱,又另铸小钱,两种钱币并行。次年,王莽又改作金、银、龟、贝、钱、布,称做"宝货"。黄金以一斤值一万钱为标准。钱货按白银成色高下分为二品。龟货按大小分为四品。贝货分为五品。布货、钱货都用铜铸。布货称大布、次布、壮布、中布、幺布、小布等,共十品。钱货称大钱、壮钱、幼钱、幺钱、小钱等,共六品。合共"宝货"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名目繁多,混乱至极:"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商业交易无法进行,农民也不能从事生产,社会经济生活陷于停滞。老百姓只好坐在街头哭泣,又被陷害为买卖田宅奴婢和私铸钱币,被当作罪犯监禁起来。大批罪犯戴着缭铐,用槛车送到长市,十有六七都受折磨致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①。王莽把全国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人民必然要奋起埋葬他的罪恶统治。

以上分析说明:《食货志》以其翔实的记载,为研究古代经济史、土地制度史、商业史、货币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而且,它证明不同时期封建政权的经济措施是造成社会治乱兴衰最为根本的原因,因而对我们认识封建国家行使经济管理职能及其历史教训具有重要价值。

《汉书·地理志》在我国历史沿革地理学中有很高地位。它的创立,体现出封建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能,因为从历史的

---

① 均见《汉书·食货志》(下)。

发展看,国家的特点之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①。志的开头总述全国地理概况,而以重点部分记载西汉行政区划。它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细记载汉成帝元延、绥和年间全国疆域和行政区划,志中的户口数则是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数字。② 这正是西汉封建国家对全国实行有效管理体制的具体反映。记载的方法,是先述各郡建置沿革、户口统计,然后逐一列举所属各县,载明境内的山川泽薮、仓储、水利设施、著名的历史遗迹、要邑关隘,以至物产、工矿、垦地亩数等。总计记载郡国103,辖县1578(县1356,相当于县的道29,侯国193)③。这样,就做到了把叙述西汉当日的行政区划和记载历史遗迹二者结合起来,不仅对于研究西汉史不可缺少,而且对于阅读先秦典籍、了解上古时代的历史和文化遗留也甚足珍贵。所以“不读《汉志》,简直无法从事沿革地理的研究”④。还应看到,由于西汉是强盛的朝代,疆域辽阔,所以《汉书·地理志》所囊括的边疆史地材料,又为后代地理志所不及。志中所载,东北有辽东郡,乐浪郡,北方有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西北有河西四郡,西南有益州郡,东南有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等,对于研究边疆历史地理有重要价值。如,班固所载武帝新开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可以了解到西汉时河西走廊有良好的水利条件。自武威向西,有谷水、千金渠、羌谷

---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参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侯国考》,及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北据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的统计,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见《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

水、弱水、呼蚕水、籍端水等八条河流，发源于祁连山下，灌溉着河西的良田。其中羌谷水流经二郡，注入居延海、蒲昌海、冥泽等内陆太湖。由于利用祁连山雪水灌溉，为河西地区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故志中称河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风雨时节，谷籴常贱”①。西汉朝廷重视在这一地区实行屯田，在张掖番和设农都尉，在敦煌广至设宜禾都尉，都是管理屯垦的机构。西汉朝廷为了保卫西北边境和西域的交通，在河西四郡一共设置了九个都尉，著名的有北部都尉（休屠城）、居延都尉、阳关都尉、玉门都尉等。由于西汉王朝的苦心经营，才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

《地理志》末尾部分综论各地区的物产和习俗，在分析各地区的地理条件对民俗的影响方面很有特色，故被当代地理学者称誉为：“可视为现代区划地理的雏形。”②《史记·货殖列传》已论及各地物产与民俗的关系。至成帝时，刘向对各个区域作过概述，同时，丞相张禹委托属官朱赣归纳各地区风俗。班固依据上述材料加以补充，整理成文。他参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旧名，分述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各地区的概况。而班固记载民风民情，又往往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吏治、边防等相联系，如论述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

① 历史上有利用《汉志》这一记载在战争中取胜的著名例子。《魏书·崔浩传》载：太武帝将征伐怀有贰心的河西王沮渠牧犍，弘农王奚斤等反对，理由是河西“无水草，大军统到，不得久停”。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太武帝从浩议，遂讨平凉州。“多饶水草，如浩所言”。

②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郡地区，由于迫近强悍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独特的习俗，说："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又论及阿西四郡，由于保卫边塞的需要，地方长官把练兵习战作为头等大事，"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所致也"。这些论述都与书中其他篇章相印证并加以深化，丰富了史书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

《地理志》显示出开阔的视野，材料丰富可靠，特别是它记载行政区划和民情风俗的方法，更被后来的正史地理志视为典范，而后出的地理志，除地名和数目字有所增添外，在体例上绝少超过它。《隋书·经籍志》评论说，《汉书·地理志》的价值可与《禹贡》、《职方》相比拟，"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①]。认为后代的一些记载，无论从眼界、学识或内容说，都无法跟《汉志》相比。

与记载行政区划的《地理志》密切相联系的，是记载国家水利事业的《沟洫志》。管理水利灌溉工程是东方国家的大事。班固就十分重视水利对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沟洫志·赞》引用《左传》所载周大夫刘定公的话："微禹之功，吾其鱼乎！"又称水利是"国之利害"，即国家和人民利益攸关的大事。故《沟洫志》也是反映封建国家一个方面的职能。

这篇志的重点是记述对黄河的治理。班固总结了西汉一代的历史经验，认为它是历朝大事。黄河自武帝元光中在瓠子决

① 《隋书·经籍志·地理记》。

口，至平帝时，先后酿成七次大灾[1]，为害严重。瓠子决口，一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才堵住，洪水肆虐达二十多年之久！至成帝建始五年（前28）和鸿嘉四年（前17），十一年间黄河又决口三次，其中两次受淹县份都在三十县以上。为了给后人积累制服黄河的经验，班固很重视记载的成功办法和有价值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帝时王延世治河和平帝时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王延是河堤使者，时黄河从馆陶及东郡决口，为了堵塞决口，他命人“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连续奋战三十六日，终于堵住决口，受到成帝嘉奖，并特为此改元为“河平元年”。两年后黄河又在平原决口，王延世与丞相府属官杨焉协力负责，再次堵住决口。贾让《治河三策》被认为是“上古（按，这里指两汉以前）治河最详细的方案”[2]。贾让不同于一般儒生搬用过时的“经义”发发空论，而能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主张。他对于下游防洪的历史和现状都有比较确切的了解。提出战国时期齐、韩、魏三国为本身私利，不顾防洪大局，随便围堤堵水，以邻为壑。以后，在堤外又陆续形成新的居民点，于是层层向外筑堤，原先河道宽阔，洪水期不致发生险情，如今因为层层堤防围堵，河道狭小，且又迂回曲折，“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阨如此，不得安息”，遇到汛期，必然容易决口。再者，濒河附近本来有低洼地带，可以泄洪，后人却修起堤围，排去积水，建起庐舍，洪水

---

① 这一时期黄河的7次泛滥是：武帝元光中，河决瓠子。元封二年堵塞决口不久，又从北面馆陶附近决口，分为屯氏河。元帝永元五年，河决灵县鸣犊口。成帝建始五年，河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淹地十五万顷，九万七千多人无家可归。河平二年，河决入平原。鸿嘉四年，渤海、清河、信都黄河泛滥。平帝时，河、汴决坏。

②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8章，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不得分泄，增加黄河汛期险情，居民也处于危险的堤防之下。贾让深知为求眼前利益壅堵河川的危害，因而总结山一条深刻的道理："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犹其死可立而待也。"不与水争地，是贾让治河的基本主张，它被古今水利工程大量正反经验证明是正确的，所以被近代学者称誉为："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日，依然是不磨的真理。"[①]由于班固把贾让《治河三策》这一重要的治河文献载入《沟洫志》中，后人不论作正面的引申，或作反面的驳难，都由此引发，因而推进了对治理黄河这一各个时期国家大政的认识。

五 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

十志突出地体现出《汉书》的"博洽"，具有高度的文献价值。历代学者对此是屡屡称道的，《天文》诸志记载了有关天象观测、历法制定、经济政策的演变、行政区划、治河方案等，确实显示出《汉书》材料丰富的特点，成为多种专门史的创始之作。但笔者认为，光是称誉《汉书》的文献价值，是不够的，因为公平地说，十志还有高度的思想价值。如前述《食货志》的基本思想，是论述封建国家经济政策影响到生产的发展或破坏，决定了国家的盛衰。按照班固的论述，自战国至西汉末的历史变动，都可以用经济的升降，国家政策的成败得到确切的解释。这同历史唯物主义从经济条件去说明历史事变的终极原因，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其中确有某些萌芽意识。班固还记载宣帝时，"善为算能商功利"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从关内籴粮运京，以省关东漕运每年需卒六

① 《黄河变迁史》第8章。

万的巨耗，大儒萧望之用阴阳感应说反对。宣帝拒不采纳望之所议，结果“漕事果便”，耿寿昌并将籴粮筑仓之法推行到边郡。班固的记述，其实是对求实主张的褒扬和对阴阳灾异说的深刻讽刺。在两汉之际，《食货志》的这些观点体现出与迷信思潮相对立的朴素理性精神，是很可贵的。不仅如此，在《刑法》、《郊祀》、《艺文》三篇志中同样蕴含着班固的进步史识，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刑法志》开创了我国法制史之先河。班固写这篇志，并不满足于将有关刑法的材料排比连缀在一起，而是通篇表达出鲜明的观点，做到褒贬分明，议论风发。全篇的主要内容，是概述秦汉刑法的演变，赞扬已经取得的进步，又据实批评封建皇朝法律的残酷。班固总结和肯定汉朝的刑法有过三次大的进步：汉初约法省刑；宣帝时平议案件，清查全国积案；东汉初打击豪强，使全国冤狱案件大为减少。班固又举出大量事实抨击汉朝法律的苛滥，批评文帝之时“外有轻罪之名，内实杀人”。文帝下诏废除肉刑，却又用笞三百代替劓刑、用笞五百代替砍左趾，结果改判笞刑的犯人多被活活打死！武帝时号称盛世，而实际情形是法律严酷，“禁网寖密”，犯罪案件更多。武帝任用张汤、赵禹一类酷吏定出“见知故纵”一类罪名，锻炼人罪。当时律令多达三五九章；仅规定砍头之罪就有四〇九条，一八八二款，规定同样应判死罪的条文堆满屋子，连主管的官吏也无法通看一遍。结果是，各地方判案五花八门，有时案情相同，而判罪各异。奸猾的官吏更从中捣鬼，对于欲加包庇的便引用从轻判决的条文，而对欲加陷害的便引用判处死罪的条文，造成无数冤案。正直的人士对此无不感到沉痛。至成帝时，规定处以大辟之罪又增加到一千多条！

以上论述，确已相当深刻地暴露出封建刑法残酷、黑暗的实

际。《刑法志》的篇末，又用长段议论，强调刑律不公是关系到封建政治全局的严重问题，提出要根据现实情况，删除繁苛的旧刑律，制定简明而能“便民”的新律令。班固总结说，从西汉立国到东汉初年，历时二百余年，据有案可稽的数字，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中，每年判处死刑的达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判处长期监禁至砍去脚趾一类重刑的，竟达千分之三以上。直至东汉初，每年被判处死刑的数以万计，全国的监狱多达二千多所，成批成批的人被冤枉致死。国家要达到政治清明，刑狱如此不平早已成为严重的障碍了。班固还把冤狱众多的原因概括为“五疾”：礼制未立，没有重视教化这一根本问题，做到防范于未然；判处死刑的太多，其他治罪判刑也太滥；百姓穷困没有活路，只有铤而走险，以致犯法；豪强坏人包庇，等于纵容犯罪；罪案得不到及时揭露，以致卷入人数更多。而为害最大的问题是：治狱风气极坏，把判重罪、多判罪当做狱吏能干的标准，狱吏上下互相驱使，加害于无辜者，能够公平执法的人，反而遭祸。“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因此，历来明君贤臣已一再提出要删去烦苛、从轻量罪、使之“便民”的主张，应该付诸实行。读着班固这些痛切的言论，我们不禁为他的深刻的观察力而感到肃然起敬。

《郊祀志》和《艺文志》也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朴素的理性精神。《郊祀志》的大部分内容系抄录《史记·封禅书》所载三代至汉武帝祭祀、封禅活动而来，而同时也继承了司马迁批评封建帝王耽于迷信鬼神的进步思想，以往有的论者认为它与《封禅书》思想倾向不同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此篇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这篇志本为记朝廷祀神、祭祖的专篇，但班固在篇首即提出“民神异业”的论点，认为“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

之";"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神异业,敬而不赎"。反复强调民神之分,明显地对神抱保留态度。二是,此篇昭、宣以下的材料为班固新增,其中也有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料。如,成帝时,颇好鬼神,方士乘机四处活动,致使宣帝时期一度有所抑制的淫祀迷信行为又盛行起来。谷永针对这种情况上书皇帝,指出"盛称奇怪鬼神"是"背仁义之正道",他历举自周秦以来凡耽于迷信者,都求福不成反遭祸殃,"旷日经年,靡有毫厘之验,足以揆今"。要求成帝"距此类矣"! 在篇末赞语中,班固画龙点睛,充分肯定谷永的言论,说:"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认为谷永严正的批评揭穿了方士们变换种种花样的欺骗本质,也间接道出封建帝王沉迷于祭神仙,无异是受尽欺骗而执迷不悟的愚昧行为。可见班固在东汉初迷信邪说猖獗的情况下却能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

《艺文志》,"艺"指儒家经典(当时六经称"六艺"),"文"包括诸子、诗赋和其他著作,合起来,就是以儒家为主导的现有全部典籍的总著录。班固以刘向、歆校书成果《七略》为基础而有所调整出入,按不同门类、不同学派对所有典籍作系统的区分,分别论述其学术源流,总结其得失,不仅对古代典籍作了全面著录,而且其中贯穿着很高明的学术眼光。他对各家、各派学术的传授有清楚的记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而为我国学术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譬如关于《尚书》学的源流,他载明:《尚书》是由孔子编成,以后因秦朝焚书禁止传授,济南伏生藏于壁中。"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至宣帝时,形成欧阳、大小夏侯三个学派,立于学官。汉代又有另一本子的《古文尚书》,是成帝

时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时所发现的。[1]“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立于学官”。班固上述简洁的记载,就是后人研究《尚书》今文、古文学派传授关系的根据。对于其他儒家经典,《艺文志》也载明其传授源流。班固的可贵处,还在于:他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分别指明各学派的长处和短处,启示后人治学的门径。对于当时拥有绝对权威地位的儒家,班固自然加以推崇,称他“于道此最高”,但他又不盲从,故能严肃地批评俗儒不求儒学精神实质和趋时投机两种弊病:“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说明班固明确主张矫除儒学独尊以后追求禄利和烦琐主义两种恶劣的作风。对于诸子学说,班固也作适当的肯定:“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创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主张对诸子学说要舍弃其短处,吸收其长处。这说明他跟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的严重偏见和文化专制态度明显地不同,更多地具有尊重历史的态度和朴素理性的观点。

(《汉中师院学报》1993 年第 4 期、1994 年第 2 期)

---

① 同时发现的还有《礼记》、《论语》、《孝经》。

试为《汉书·五行志》拭尘

彭　曦

班氏一家父子兄妹历时三四十载撰成的《汉书》,对我国传统史学的巨大贡献,古今皆有肯定。现代史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汉书》,成就远远超过前人。略嫌不足的是对它的十《志》部分,除《食货志》外,甚少专文探究。特别是其中的《五行志》,评论《汉书》者大多以之作为作者"五德相生"、"天人感应"唯心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予以否定。这是值得研究的。确实,《汉书》作者把儒家经典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制造了一种准宗教式的油彩,这层油彩特别使《五行志》神秘化了。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在这神秘化的外壳之内,它还包藏着许多对我们今天颇有价值的多方面的古代信息,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

《五行志》为我们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古代科学资料和有用的信息。按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分析,它包括(其中所引汉以前诸书中的资料不计):冶铁技术 2 则,水灾 8 则,旱灾 13 则,异常天气变化 12 则,怪雨 7 则,地震山崩 9 则,蝗螟灾害和蝗虫迁徙 11 则,生物、生命科学 14 则,日蚀 53 则,太阳黑子 1 则;此外应列为因火山爆发而引起的夏寒 1 则,属于所谓不明飞行物(UFO)者 1 则,陨星、孛星、长星 20 则,广泛涉及天学、地学、生物、生命科学及技术史等。例如,"成帝河平元年(前 28)三月乙未,日出黄,有

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①,这是世界一致公认的天文学中第一次太阳黑子的记录,受到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其他如有关日蚀、地震、旱涝等记录,亦早为中外有关学科的科学家们所考证、利用,兹不赘述。现择其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荒诞迷信的数则,加以初步探讨。

第一,关于冶铁史上两条炼炉爆炸记录。一是"武帝征和二年(前91),涿郡铁官铸铁,铁销,皆飞上去"。二是"成帝河平二年(前27)正月,沛郡铁官铸铁,铁不下,隆隆如雷声,又如鼓音,工十三人警走。音止,还视地,地陷数尺,炉分为十,一炉中销铁散如流星,皆上去。与征和二年同象"。

这两条是被当作五行之一的火灾灾异而加以记录的。我们认为它的科学价值在于摘清其爆炸原因。我国冶铁业经战国至西汉,达到历史上一个明显的跃进期。汉统一政权形成并得到巩固之后,小农经济在西汉前期得到相对稳定与发展,对铁制农具需求量迅猛增加;西汉在与匈奴等族的军事斗争和贸易等方面对铁制品的需求量也数倍于战国。面对这种迅猛增加的社会需求量,亟需扩大铁的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一系列经济上、技术上的问题,是个体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者无力解决的。于是才有武帝元狩四年(前113)"笼盐铁"政策的出现(这里我也不否认同时出于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只有用国家的力量,才能集中人力、物力、智力创造冶铁业在物质、技术方面需要突破的条件。所以,"笼盐铁"实质上是整个社会的需要,是武帝采取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积极政策。自"笼盐铁"之后,也确实大大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古荥镇等汉代冶铁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西汉冶铁熔炉

① 引文均据《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竖炉)的容积"可达10—50立方米或更大一些","大体上可以认为,我国古代炼铁竖炉的容积到汉代已达到一个高峰"①。铁的生产要在数量、质量上取得突破前代的成绩,除了要解决选矿、炼炉、鼓风等技术问题外,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燃料。目前资料证明,汉代炼铁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但木炭是二次加工燃料,所耗木材量很大。据计算,古代每炼一吨生铁需耗木炭4—5吨或更多些②,而一吨木炭的烧成又需三倍多的木材。这样,炼一吨生铁便要耗去十多吨木材,这不仅对森林的破坏很大,而且成本很高。故此,汉代冶铁事业便不得不寻找可以降低成本的燃料,这是必然趋势。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大多数古代冶铁中心附近都有煤矿,这自然会促使人们逐渐认识煤的性质。现在我们虽然还不能十分肯定西汉已开始用煤作为炼铁燃料,但在汉代冶铁遗址中多次发现人工加工的煤饼、原煤、木炭三种燃料,特别是像巩县铁生沟遗址中在各个炼炉附近都发现了原煤和煤饼③,因此说西汉已进入用煤作为炼铁燃料的试验性阶段,应是完全可信的。而在人们对煤的性质还未达到科学认识而仅凭经验认识为基础时,用煤代替木炭作燃料便极可能发生炼炉的爆炸事故。这是因为木炭是纯碳元素燃料,而煤是碳氢化合物燃料,故在燃烧时它要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CO_2)、一氧化碳(CO)以及易燃易爆的天然气体甲烷(CH_4)等成分。特别是当矿石、燃料中含水率稍大或过大时,在炼铁炉的高温中便要迅速产生水蒸气。而水蒸气又能与高温铁迅速置换出氢气来,并生成四氧化三铁。氢是强烈的还原

① 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第59~60页

② 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第61~62页。

③ 河南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

剂,导热能力特别强,它可以促使炼炉内气压迅猛增大,在鼓风输氧技术配合不佳而炉容积过大时,就会导致炼炉发生爆炸。所以,《汉书·五行志》所载炼铁炉爆炸事故,最可以解释通的原因是因用未焦化的煤作燃料而导致。我们推测,汉代因此而引起的炼铁炉爆炸事故,当不止此二例,在报喜不报忧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全部上奏中央。《五行志》是用此种材料作为火灾灾异记录下来的,但在客观上却为我们提供了西汉炼铁技术中开始用煤的科学旁证。古代冶金者正是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加深了对煤的认识,从而才导致于明代出现早于西方的炼焦技术。

第二,有关天文气象方面的资料,包括水灾、旱灾、异常天气、怪雨等。这些记录资料,有少部分已为中外气象家重视,而大部则还未被重视和研究。如几例怪雨中的雨毛、雨草、雨尘,都可能与我国西北游牧民族所处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近年来西北不少地方下过黄土尘埃,有人即以为这是现代在西北地区毁林毁草轻牧滥垦所致。其实这个问题不自今日始。《汉书·五行志》:"成帝建始元年(前32)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可见距今二千多年前,西北即下过特大尘埃。对这些古代信息的研究,将使我们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时间、范围得出更全面的科学认识,这对我们现在综合治理改善大西北生态环境会有所裨益。再如现代气象科学十分重视火山爆发所引起的整个地球大气变化,事实证明每次大的火山爆发,都给地球大气带来严重影响。如1982年3月和4月墨西哥的埃尔奇琼火山先后七次大爆发,它的喷射物质给整个北半球形成了一个云带,厚达三千米。它使日光变色,地面温度降低,时间可达半年甚至一年。西方有

的学者正在到处寻觅上下数千年中的此类信息①。有趣的是《汉书·五行志》中记有一条说:"元帝永光元年(前43)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时有景无光。是夏寒,至九月乃有光。"每次火山大爆发都会把千万吨的火山灰尘喷至数十公里的高空,形成的云带则要吸收太阳射线,削弱太阳对地面的直射,因此必然要造成太阳"色青白",无影及夏寒等现象。根据上条记述的内容分析,看来只有一次巨大能量的火山爆发才会产生这种特殊的天气现象。公元前43年的这次天气变异,应是公元前44年的火山爆发所致。究竟是什么地方的火山爆发所造成?是美洲地区的或是亚洲印度尼西亚的克拉卡陶和阿根火山?则是很值得有关专家研究的颇有价值的问题。

第三,有关生命科学的记录14则。其中包括鸡的雌雄转化,人的男女转化,人生角,牛五足,畸形胎儿,死后复生,孕妇自闻胎儿于腹中啼音等。这些长期以来被认为荒诞可笑的记录,有很多已被现代科学的研究和发现所证实并得到科学解释。如鸡的雌雄转化,人的男女性别转化,仅近年来见于报道的国内外实例即已不鲜。它在古代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阴阳倒置或甚至是国家将要发生灾难的不祥预兆。其实,用现代遗传学说中的有关性反转的理论解释,它不过是高等动物生命中的变异而已,与国家的兴衰祸福丝毫无关。"人头上长角"的事仅近年《光明日报》就报道过两例。其一是1983年7月3日,报道了四川省广安县人民医院为妇女黎永珍成功取掉头上生长的双角。经诊断,属颅顶部皮质角化症。由此可见,班氏笔下所录并非妄诞。我们还可摘引一条奇而有趣者,《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前3)四月,山阳方与

① 参见《自然杂志》1983年第4期,第312页。

女子田无啬生子。先未生二月,儿嗁腹中。"孕妇于产前两个月内可以听到胎儿在自己腹内啼音,真乃古今中外罕见之谜。谁个相信?但无巧不成书,1983年5月29日的《健康报》上就有一条新闻:《宫内婴儿啼不住,孕妇右耳闻哭声——发生在启东县的一种医学上罕见现象》,其中说江苏省启东县大丰公社社员朱正芳产前数日,可以听到自己腹中有两个婴儿的啼声,经大队、公社、启东县医院的许多大夫会诊检查所证实。只是用听诊器听不到,而在孕妇的右耳中可闻。剖腹产后果然是一对孪生男婴。医学界正在研究这一奇异之谜。在这种类似的报道中,往往把这些当成罕例奇闻,其实古代早已有之,不仅《汉书·五行志》及他史《五行志》中有,在一些方志、野史、笔记中亦不乏此类记载。我国古籍中所记录的相当多的有关生命科学的资料,因为长期以来被它的封建迷信外壳所包围,因而还很少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第四,《五行志》中还有一些诸如鼠患、蛇斗、蛙战、雉异、鸟击、鱼死、蝗灾之类的记载,大多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其实这些大都是研究古代生物学和生态学等问题十分有用的材料。例如,"成帝永始元年(前16)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前4),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这种长六丈、八丈,高达一丈多的鱼,是什么鱼?不用说是鲸鱼。这记录说明我国今山东半岛沿海一带,在西汉甚至更早的古代就是鲸鱼经常游栖的海域。至于哀帝建平三年七鱼皆死,看来正是现代人们经常说的鲸鱼集体自杀的实例。西方学者研究鲸集体自杀最早的记录是1784年3月13日法国奥栋港32条抹香鲸的集体自杀①。以后引起人们的注意,此类记录渐多。近

① 《大自然的趣闻》第2集,第102页,新华出版社。

年来不少专家苦心寻求鲸类集体自杀的原因,迄今尚未得出一满意答案。我国此类记录比西方早了一千七百多年。遗憾的是我国不少生物学家、鱼类学家还很少知道和利用这则珍贵的记录。再如,《五行志》中从景帝三年(前154)至平帝元始二年(2)期间有九次大的蝗灾记录,其中"太初元年(前104)蝗从东方蜚至敦煌"条,应是蝗虫飞迁的最早记录。

第五,有一条十分奇怪的记录,令人十分费解而成千古之谜。这就是"成帝建始元年(前32)八月戊午,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两月重见即两月重现,这对稍具天文知识者来说,当然是不能相信的。但汉代太史们对观测、记录天象十分尽职守责,说它有意或无意误记,又似不可能。西汉的刘歆等人曾用月行疾来解释这种现象,就是说月球在八月戊午日这天运行速度突然加快,以至绕地球运行了两周。这种解释的确荒诞可笑。他们又用《京房〈易传〉》之类的谶纬书籍找"理论",说这是"君弱而妇强,为阴所乘,则月并出",这纯属迷信附会。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今尚无人解释。在我看来,现在只能用UFO即所谓"不明飞行物"或"飞碟",来解释了。尽管目前世界上对UFO的看法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但关于UFO的报道愈来愈多,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广大群众近些年来对它的兴趣与关心也与日俱增,不少人还从我国古籍中找到了一些可能属于UFO的记载。现在看,《汉书·五行志》中的"两月并见"或可算比较可信的一条,而且应是最早的一条了。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这是班固写《五行志》的目的。这些话表明他忠实地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他对"河出图,洛

出书，圣人则之”是坚信不疑的。他不但把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给予了发挥，而且更加具体化了。他对“五德相生”的循环论，以及一个具有人格意志的“天”的信仰达到了虔诚宗教徒的程度，以至于在班固的头脑中“五德相生”、“天垂昭示”等概念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宗教式凝固化的模式，他坚信这种模式的存在和发明对世间人主及整个统治集团可以起到一种“警诫”的作用。正是出于这种信仰，他才能别于《史记》而首创《五行志》。也正是出于这种信仰，班氏对《五行志》中所引用的大量材料是下了一番认真选择分类的工夫的。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应当是可信的。为了说明这些材料具有经典性、系统性和继承性，他又把汉以前《春秋》等书中的有关材料置于西汉以后各材料之前。这样就使《汉书·五行志》的材料上自春秋下至西汉，前后共七百余年，远远超过西汉一代“断代”史的范围。总之，从《汉书·五行志》所录材料的时间之久、范围之广、性质之杂来说，它不失为一部古代百科性的、富有价值的有关古代科学技术及自然现象的记录簿，其中有些问题是要我们今人去探索、研究和揭开的“谜”。

任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前代资料、成果以及相关信息的考察、批判和继承。对前代考察的时间愈久，范围愈广，对问题的全貌、规律看得愈加清晰。《汉书·五行志》及以后各《史》的《五行志》所记录的大量资料，是一笔很有价值的遗产，如果我们对这笔遗产仍简单斥之为“荒诞迷信”而不予重视，那将使大批珍珠继续湮没于班固等所撒下的历史尘垢之中！让我们把尘垢拭去使珍珠熠熠发光吧。

（《天津师大学报》1984 年第 4 期）

《汉书·五行志》平议

陈其泰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传统史学中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其中的十篇志，从总体说，历来备受学者们所推重。清代以前，对十志进行考订注释之作前后继出。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注重用近代眼光加以诠释，阐发其中的价值。故当代著名史学家对这十篇志给以极高的评价，称"《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十志规模宏大……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有所增减"[①]。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②]。唯独其中《五行志》一篇，却是颇受讥议。唐代刘知幾著《史通》，专门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也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③]今人论著中有的也视《五行志》是宣扬灾异迷信之作。那么，《五行志》设置的性质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对于刘知幾的批评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第24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 白寿彝：《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研究新论》一书"代序"。

③ 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之《与陈博士笺》。

一 《五行志》的性质

《五行志》是不是一篇集中地宣扬迷信思想之作？这个问题需从三个层次来分析。

首先，应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分析“志”的作用。

纪传体史书中的“典志”，创始于《史记》，完善于《汉书》。这种纪传体史书，何以在设立“本纪”、“列传”（有的还有“表”、“世家”）之外，还要设置“典志”一体呢？这是因为，它们各有功用，互相配合。“本纪”是记载一朝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等大事的纲目（当然“本纪”也表示帝王地位至尊）；“列传”记载有代表性人物的活动，并对“本纪”所记大事作具体说明。除了“本纪”、“列传”中已有的年代、事件、人物之外，各个时代还有典章制度、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等也需要记载，这些内容就包括在“典志”之中，与“本纪”、“列传”互相配合，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在西汉，阴阳五行思想流行，经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说，将儒学与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之后，自宣、元起，至成、哀年间，皇帝的诏令、大臣的更换，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攻击，都要引用阴阳灾异，许多儒家人物，还写了大量有关阴阳五行的著作。既然阴阳五行说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的特殊现象，那么，作为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的“志”就理当记载。故从典志体的性质、作用说，《五行志》的设立是符合情理的，设立它的本身不等于表明班固有意识提倡迷信思想。

其次，《五行志》又是汇编纂辑的性质，这是班固在这篇志中明言的。班固有如下交待：“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左氏

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迄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这段话,概括了西汉主要的阴阳灾异家有哪些人物,并指出他们言灾异的特点:各自比附推演,各有一套说法,互相乖错分歧。"揽",同"揽",是撮取、采撷之意;"别",是区别、分列之意;"传载",即记载之意。班固连用这几个提法,强调《五行志》是将董仲舒、刘向、刘歆等各不相同的说法,汇编纂辑在一起。既然如此,志中所引录的附会灾异的话,就不能认为都代表了班固本人的思想。

复次,还应当联系《汉书》中的其他篇章,分析班固对阴阳五行说的态度。

前文已述,设立《五行志》本身并不算错,问题是班固用什么态度对待迷信说法。班固的态度是,一方面他有天人感应的神秘观点,在《汉书·天文志》序中说:"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同影)之象形,乡(同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悟,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批评阴阳灾异家的随意比附。《汉书》中有一篇阴阳灾异家的合传——《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在全篇末尾赞语中,他画龙点睛,很不客气地批评他们都是讨好皇帝:"汉兴推言阴阳灾异者,汉武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径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同臆)则屡中'。"深刻地指出自董仲舒以下,这些阴阳灾异家的共同特点是牵强附会,任意臆测,即使有一二次说中了,也只是侥幸碰上,确实是击中了善推阴阳灾异者的要害。

二 《五行志》的文献价值

“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古代思想家企图用日常生活习见的这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的起源和各种自然现象。战国时代，“五行”说颇为盛行，并出现了“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阴阳家邹衍又把它附会到社会历史范围，提出“五德终始说”，借用五行相生相胜、终而复始的循环变化相比附，用来说明国家政权的更迭、朝代的改变。西汉武帝时代，统治者热心提倡迷信思想，神化其专制主义统治，董仲舒迎合这种需要，宣扬一套阴阳五行化的“新”儒学，致使灾异说大为流行。眭孟、京房、刘向等阴阳灾异家大量引用五行说法，比附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现象，这些说法必然充斥着唯心迷信思想。但又应看到，由于五行说的起源是用物质现象解释世界，所以在《五行志》中又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和例证，故为近代天文学史、自然史、灾害史等学科的研究者所重视，这就是《五行志》的文献价值所在。

（一）关于古代日食的史料

我国有世界上最早和最完整的日食记事。《春秋》所记 36 次日食，已为近代科学方法所验证。《汉书》继承了这一传统，详细记载了西汉 212 年中的 53 次日食，这份完整的记录，即见于《五行志》。这是班固对自然科学史的一项贡献。当代学者用近代天文学知识进行推算列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日食，《汉书》上的记载与之完全符合，足见《汉书》记载之完整。[1] 此后，历代正史记载相承，其中偶有误记，但基本上是正确可靠的。从先秦到清末，我

①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 3 册《日食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国古籍上所记历代日食共1124次。

(二)关于太阳黑子和哈雷彗星的记载

我国关于太阳黑子活动的最早记载也见于《五行志》:

> 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

这是关于公元前28年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比起外国的记载早了一千几百年。世界上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只是从公元1749年以后,有了利用天文望远镜的观测方法,记录才比较翔实。我国历代所记录的太阳黑子活动共有234次。《汉书》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还有:

> 文帝时日中有王字。
>
> 永光元年九月,日居黑仄,大如弹丸。①
>
> 成帝建始元年,昼昏,日中有黑气。②
>
> 天凤二年二月,是时日中见星。③

举世著名的哈雷彗星,从春秋到清末两千余年,凡逢这颗彗星复见,我国史志上都有记载。彗星,在古书上又称为孛星、星孛、蓬星、长星等。古人重视彗孛,认为是灾异出现,但观测勤劳,记录不断,后世赖以质证;西方学者常常以我国典籍来推算彗星的行道和周期,而断定它的复见。哈雷彗星即其中最著名的

---

① 《汉书·五行志》。

② 《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中,郑崇谏曰:"孝成皇帝时亲封舅五侯,天为赤黄,尽昏,日中有黑气。"

③ 《汉书·王莽传》。

一颗。

哈雷彗星出现的周期约为 76 年。但因行星对它引力的作用,它出现的周期有变化,最短约为 73 年,最长有时达 79 年。当它出现期,地球上能观测的日子比较长。如 80 年代出现的这一次,1982 年起即可找到它。自 1985 年 11 月 18 日起,昼夜出现。1986 年二月到近日点。1989 年,仍可观测到。前后出现共历八年时间。《汉书》上有关记载正可以质证它运行的这一特点。而《汉书》和其他古籍上保留的世界上最早和次数最多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又证明了我国古代天象观测和记录的可靠性。《汉书》提供了自春秋至西汉末哈雷彗星的记录共有 5 次,《五行志》所载有 3 次:

公元前 613 年《五行志》据《春秋经》记载:鲁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威廉著《中国彗星考》确称这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①] 比外国人关于公元 66 年哈雷彗星的记载早了 670 余年。

公元前 240 年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五行志》载:"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这四次,即指《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九年,彗星见,或竟天。…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三年,正月,彗星见东方。

公元前 12 年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王诸

① 本节有关哈雷彗星的内容,参考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 3 册第 5 编第 5 章。《中国天文学年鉴》1986 年"哈雷彗星"。《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

侯，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馀，晨出东方。十三日夕见西方，犯次妃、长秋、斗、填，蠭炎再贯紫宫中。大火当后，达天河，除于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而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去，五十六日与苍龙俱伏。①

（三）特异现象种种

近些年来，新闻媒介不时地报道国内外的一些“奇闻”。这类报导能使大众增加见闻，而对专业人员来说，则等于提供了有用的科学资料，具有信息价值。我手头的几份剪报就提供有：1989年初，河南洛宁县发现了一头罕见的牛犊，身上共长出七条腿，其中一条从背上长出，小牛犊自生下后活动正常。电视台还播放了小牛跑动的镜头。又，1990年初，云南一农村发现有母牛生下三条腿的小牛，已四个月，行走正常。电视台也播放了小牛随母牛上山的镜头。1989年初，非洲肯尼亚正遭干旱的西部地区，数日连降“黑雨”，居民家用的铝锅，煮过雨水后，铝锅内已变得漆黑。盛着雨水的杯内，沉淀一层厚厚的黑色物质。这片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工业设施，处处是田园牧地。黑雨从何而来，颇令有关人士迷惑莫解。此外还报导有毛孩、连体婴儿、老人头上长出的肉质“角”、男女性别转化等。

在今天，人们对这类“奇闻”并不感到骇异，相反地觉得它们有研究的价值。可是在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不明白其中

① 陈遵妫指出：克劳密林据《汉书》的记载，夸赞中国史志这次记载甚为详细清晰。这年10月8日哈雷彗星通过近日点，所以运行甚快。欣特（Hind）则据此《汉书》的详细记载发现了新法则，推算出哈雷彗星的轨道，知道当时轨道和黄道交角为十度，而现代约为十八度。他遂创立一说，认为：“哈雷彗轨道和黄道斜交的角度是古狭今宽。”

的道理,加上交通闭塞,信息传递困难,当一旦闻知有这类事情时,便会当作"灾异",最后引起特殊的重视才有可能记载下来。《五行志》中所载的"灾异"即有不少属于这类"奇闻",具有科学史的资料价值。例如:

发现毛孩。"鲁襄公时,宋有生女子赤而毛,弃之堤下"①。

连体婴儿。汉平帝元始元年(1)六月,"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同"向"),四臂共胸俱前乡,尻(音考阴平,臀部)有目长二寸所"。

男女性别转化。魏襄王十三年(前306),"魏有女子化为丈夫"。又,西汉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

老人头上生"角"。景帝二年(前155)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按:人体长"角"现象,现代医学上称之为"皮骨")

牛的变异。秦孝文王五年,"游朐衍,有献五足牛者"。又,景帝中六年(前148),"梁孝王田北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

马生角。文帝十二年(前168),"有马生角于吴,角在耳前,上乡(同"向"),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又,成帝绥和二年(前7)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②。

天雨血。雨鱼。惠帝二年(前193),"天雨血于宜阳,一顷所"。又,哀帝建平四年(前3)四月,"山阴雨陵雨血,广三尺,长五尺,大者如钱,小者如麻子"(按:这是台风或龙卷风把海上生物卷上天空,在空中又被风吹走,在别的地方降而为雨)。又,成帝

---

①② 《汉书·五行志》。

鸿嘉四年秋,雨鱼于信都,长五寸以下。[①] (按:其道理与“雨血”相似。以上三处地方,信都在今河北冀县,离海较近。山阳在今河南焦作,宜阳在今河南宜阳县境,也都离海不甚远)

(四)灾害史和气象学资料

《五行志》还记载有:地震。如汉朝发生的地震,就有惠帝二年(前193)、武帝征和二年(前91)、宣帝本始四年(前72)、元帝永光三年(前41)、成帝绥和二年(前7)等多次。

蝗灾。共记载春秋时期蝗灾12次。西汉7次。

旱灾。春秋仅鲁僖公至鲁定公即有旱灾14次。西汉惠帝至成帝发生旱灾13次。

这些是灾害史资料。还有天象和气象学资料,如:春秋庄公七年(前687)和西汉永始二年(前15)的陨石雨。又记载有春秋桓公十五年(前697)、襄公二十八年(前545)、西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昭帝始元二年(前85)冬季“无冰”的资料。

《五行志》也记载有荒诞的事,如其中记载:秦孝公二十一年(前340),“马生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②]。这一类皆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三 关于刘知幾对《五行志》的批评

刘知幾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文,对阴阳灾异的附会说法提出怀疑和批评,是很可贵的。不过这两文所指责错误或问题,应作一番认真辨析,不能不辨究竟,统统扣到班固头上。《〈五行志〉错误》一文,有的是从编排技术性和知识性角

---

①② 《汉书·五行志》。

度作评论的,这与班固的历史观、文化观关系不大。属于这方面的,有两类事例:一是批评班固引书失宜,有的将《史记》、《左传》的材料混淆交错,有的材料出自《周礼》,却未标明。二是批评班固叙述不当,只记载了异常事件发生时某人所作的评论,不交待事后的征验。这些地方,若从如何做到记载清楚、严谨来讲,固然也是问题,但从今天评价班固史学思想角度看,却不是大问题。刘知幾此篇击中要害之处,是他批评班固释灾多滥,附会征应。如《五行志》下之上,解释《春秋》所载"冬,无冰",即说国君为政弛慢,不行诛赏,失在舒缓,大夫擅权,因此用"无冰"来表示儆戒。但《五行志》又记:武帝元狩六年冬,无冰。解释为:先是遣卫青、霍去病二将军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归,而大行庆赏。然后武帝又悔恨连年征伐,烦劳百姓,遣使巡行天下,存恤鳏寡,于是天下咸喜。刘知幾责问说:像汉武帝这样既有赫赫战功,然后又能存问臣民,难道也能当做懦弱不敢施行刑赏来表示谴告吗?班固将春秋时的"无冰"与武帝时的"无冰"看作同样性质的谴告,是自相矛盾。

刘知幾根据上述《五行志》自相矛盾之处,批评班固有解释灾异牵强附会之错误,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刘知幾也有指责失当的。他说:"春秋以下至汉代,其间日蚀、地震、石陨、山崩、雨雹、雨鱼、大旱、大水、犬豕为祸、桃李冬花,多直叙其灾,而不言其应。"[1]并且举出《五行志》记载汉代日蚀等,皆不言其应。那么,"直叙其灾,而不言其应",难道真的是班固错了吗?不对。班固能够这样做,是免去附会,少言迷信的求实态度,是进步的,应该肯定。而若按刘知幾所说的去做,凡是日食、地震、石陨、雨雹,件

① 《〈史通·五行志〉错误》。

件都要找政治、人事上的报应,恰恰将增加大量的附会。

刘知幾这样批评,归根结底是他不了解《五行志》的内容具有既讲阴阳灾异、又提供天象和自然灾害史等项资料的双重性质。此外,《错误》、《杂驳》两篇所指责的条目虽多,但属于直接批评班固的条目却仅占少数。《错误》批评《五行志》中释灾过滥的共九条,有两个条目批评班固,有三个条目分别批评董仲舒、刘向、眭孟、京房,还有四条是补充刘知幾本人的说法。《杂驳》中刘知幾所辨驳的,是班固附会者,仅鲁文公二年"不雨"一条,其余有十条批评董仲舒、京房、刘向三人的说法,另外一条系指出文句有误。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史通》有关《五行志》的两篇,所指责的都是班固本人附会灾异之说,这是由于未加仔细核实而造成的误解,对此应予澄清。

(《人文杂志》1993 年第 1 期)

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向燕南

探讨《汉书·五行志》对于深入理解班固的史学思想和汉代社会是有意义的。

《五行志》是司马迁《史记》所无，班固新设的四志之一，在《汉书》中卷帙最大，共占4卷，远远高于《汉书》的其他部分。①此外，《五行志》的断限也有特点，像《汉书》中的《古今人表》及一些《志》一样，没有遵循《汉书》"断汉为史"的原则，而是始于成周，迄于王莽新朝，贯通整个春秋、战国、秦和西汉的历史。这些特点，表明《五行志》在《汉书》中具有特殊地位。《五行志》也是《汉书》中受到批评最多的部分。其中最有代表的是600多年以后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刘知幾《史通》除在外篇部分专门辟了《〈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个专篇外，还在内篇的《书志篇》中对《汉书·五行志》提出尖锐的批驳。刘知

---

① 据中华书局《汉书》点校本出版说明统计，《汉书》在流传过程中，于隋唐时期，"皆以卷帙太重，故析为子卷"，先后两次将原百卷的自定本分别析为一一五卷本和一二〇卷本。其中"今本卷一、一五、一九、二四、二五、二八、九四、九七都有一个分卷，卷二七有四个分卷，卷九九有两个分卷……"诸卷中只有卷二十七《五行志》被析为四卷，远远超过它卷，为全书之冠。

幾的批评对后来的影响很大，此后，《汉书·五行志》遂作为班固神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并由此殃及到对班固整个史学思想的评价。

客观地说，刘知幾对于《汉书·五行志》的批评不无道理，其中所反映的天人感应思想，今天看来确实是充满了荒谬。然而，章学诚说："论古必恕"。[①] 我们会问：班固为什么要在他呕心撰写的《汉书》中，花那么大的气力和篇幅记述自然灾异及其社会感应？班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五行志》在《汉书》中究竟起有什么作用和意义？设身论事，这些问题显然不能用简单的否定予以解决。前人的思想自有其在历史环境中的自身合理性，"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②]，联系班固撰述《汉书》的思想背景和社会政治环境，我们认为，借灾异天象来匡正汉主是班固在《汉书》中增设《五行志》的政治目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肯定：《五行志》决不是简单的所谓天人感应的呓语，而是寄托了班固沉重忧患意识的篇章，是班固用以展开现实批判的一种途径。

从理论的渊源看，班固持为《汉书·五行志》理论体系的《周易》[③]，本来就是被儒家学者目为思考现实与未来的忧患之书。《系辞》的作者说："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

---

① 《文史通义·文德》。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

③ 关于《汉书·五行志》理沦渊源，一般多认为是直接采自刘向的《洪范五行传》，实际并不尽然。所谓"五行"只是个外在的框架，而它的根本精神或理论核心实际应是被《汉书·艺文志》尊为"六经之首"的《周易》。所以《汉书·叙传》说："《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攸叙。世代实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述《五行志》第七。"又，关于班固撰《五行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目的，拟另文论述。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以后易学虽然发展并在形态上发生变化，但是《易》的忧患意识一直是易学研究中的一种传统。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命题，不仅是影响深远的史学命题，而且也是汉代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关怀的思想命题，这个命题，作为当时历史认识中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最终的归结，实质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和思考。所以汉武帝的“天人三诏”要提出：“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亦说：“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①]最终的落脚点都是现实政治。这表明，从理论渊源上讲，《汉书·五行志》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

从当时学术的发展及其与政治结合的特点看，《汉书·五行志》的编纂也不可能是脱开现实政治干系的单纯学术著作。近代著名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曾论汉代经学说：“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藉此以匡正其主。”而这种“借天象以示儆”的学术特点在当时的易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皮氏的另一著作《经学通论》说：“《汉志》易家有灾异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专言灾异一说。而其传此说者，仍是别传而非正传。汉儒藉此以儆君，揆之易理，纳约自牖，与神道设道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进谏之苦心，亦不背圣人演易之宗旨。”因此，凭借易学而推阐天人感应的

① 《汉书·董仲舒传》。

灾异之说，借助灾祥之变而言政治得失，是汉代社会中十分流行的做法。清赵翼《廿二史考异》卷二“汉儒言灾异”、“汉重日蚀”、“汉诏多惧词”、“灾异策免三公”、“上书无忌讳”等条，都是从史书中概括出的，与这方面史实相关并反映汉代政治面貌的内容。

从当时的政治发展讲，班固生活的明、章帝时期虽值盛世，但是社会上下已蕴含了危机。在下，是“农民战争的前浪接后浪的时期”①；在上，外戚的权利已经上升，朝廷中开始孕育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这些对于深受正统儒家思想浸润的班固来说不能不有所感触。这种“以天象示儆”、“匡正其主”的做法既有迷信荒诞的成分，也有一定监督、遏制某种不正常政治现象的作用。统治者对于这种天人感应理论的提倡与迷信，更促进了它的流行。当时行此法者，虽不乏“曲学阿世”之徒，但是更多的是怀抱儒家政治和文化价值的理想，追求自然与社会整体和谐，忠于刘氏王朝统治的儒生士大夫。这也是班固撰述《五行志》政治和价值层面上的意义。

整体看，班固对于天人感应是否徵验的态度很矛盾，例如他在《汉书》专为阴阳五行学者所立的合传《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赞语中，曾用不大肯定的口气评论说：“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而《五行志》也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

①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248页。

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志》,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这些都表明班固对天人感应学说的怀疑,和对诸说之间错与乖的洞察。虽怀疑而仍为之,表明班固编纂《五行志》应是别有深意。

对于《汉书·五行志》,一般认为主要是依拥刘向的《洪范五行传》。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检《汉书·五行志》洋洋四卷的巨帙,列举的天人感应的事例以数百计,却没有一件有关祥瑞的记载。而据《汉书·刘向传》记载:河平三年,刘向受命领校《五经》中秘,见《尚书》中的《洪范篇》,于是"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说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是"连传祸福",即包括"符瑞之记"的。班固《汉书·五行志》只言灾异不言祥瑞,其中的深意,我们说只有"藉此以匡正其主"能够解释。① "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书·五行志》开篇的这一自白,正说明班固是有意要继承文王、孔子在殷、周世道弛敝之时演《周易》、述《春秋》的忧世传统来撰述《五行志》的。《说文·人部》曰:"咎,灾也。"以灾异说明天人之道,"藉此以匡正其主",显然是班固在《汉书》中增设《五行志》的一个重要目的。

检索《汉书·五行志》的引文,依多寡顺序依次为:一、京房,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四《经学极盛时代》。

约一百七十余条；二、刘向，约一百五十二条：三、刘歆，约七十三条；四、董仲舒，约三十七条，余下前引文班固所举他人的言论仅仅是非常零星的几条而已。而这几位无一不是汉代历史中兼儒学学者、思想家、政治家三者为一身而且忠于自己儒家文化价值和政治理想的至为重要的人物。其中除董仲舒虽一度下狱几死，一生还相对比较顺利外，其他几人都是历经坎坷：元帝时期的京房，因反对专权的宦官石显，宣扬自己的“考功课吏法”，企图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而在政治斗争失败后惨遭杀害，年仅41岁；与京房基本同时的刘向也是“宗室忠直，明经有行”[①]，“拳拳于国家”、“忠精至诚”[②]的忠臣，先是反对宦官石显擅权而“遂废十余年”，继而反对外戚王氏，为改革政治，维护刘氏政权，抱着“吾而不言，孰当言者”[③]的决心，屡屡犯颜上书，痛陈利害却不能见用，抑郁而死；向之子刘歆，在对当时刘氏政权极度失望的情况下，本欲借王莽所谓的知遇之恩，重铸刘汉的意识形态，进而达到革新政治重振汉朝天威、实现儒家政治文化理想的目的，虽为狡猾的王莽所利用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不得已中仍告诫王莽，“居摄之意”只是“成圣汉之业”，“保佑圣汉，安靖元元”，“奉汉大宗之后”，而“不得顾其私亲”[④]，最终因策划倒莽，事泄，被迫自杀。而正是这样几位忠于自己儒家文化价值和政治理想“纳说时君著明者”[⑤]，在班固的心中唤起了最深切的同情。

---

① 《汉书·刘向传》。
②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卷十一。
③ 《汉书·刘向传》。
④ 《汉书·王莽传》。
⑤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对于班固来说,上述的几个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身为皇家宗室的刘向。班固在《汉书·叙传》所作的“汉承尧运以建帝业”的说明,完全就是刘向《世颂》“汉家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汉,涉魏而东,是为丰公”的翻版。而刘向自觉维护刘氏正统地位,奋力反对外戚专权的忠直,更是在班固的思想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据白寿彝先生统计,在《汉书·五行志》所引述的刘向说灾异的一百五十二条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① 而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则将其大致分为(一)影射或直接抨击外戚、宦官集团对王权的侵夺;(二)批评皇帝,怒其不争,以败亡相告诫;(三)为巩固皇权而制定的具体策略三类。② 其他几人的引文也大致如此。《汉书·五行志》对于前人论述灾异材料的采择,实质也反映了班固自己的思想。

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对现实的影射和批判,最直接的反映应是他自己的言论。而关于这一点,人们却往往未能予以注意。一般来说,在《五行志》中,班固引述他人的论述或观点时,都要明确写明论述者的姓名,例如:(《春秋》)“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董仲舒以为象王室将乱,天下莫救,故灾四国,言亡四方也。又宋、陈、郑之君皆荒淫于乐,不恤国政,与周同行……刘向以为宋、陈,王者之后卫、郑、周之同姓也……宋、卫、陈、郑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天戒若曰:不救周,反从楚,废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又“定公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僭过度者也……天戒之

---

①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一)。

② 《汉书·刘向传》。

曰:云高显而奢僭者”。所以钱大昕说《汉书·五行志》体例严谨是有根据的。至于《汉书·五行志》中所存在的大量的没有著明论述者姓名的论述,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班固本人的论述。根据记载,刘向纂辑《洪范五行传论》是在河平三年(前26)开始的。[①] 此后又因“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②]。这就是说,从河甲三年(前26)到绥和元年(前8)间的史事,除刘向的上疏间会有所涉及外,其《洪范五行传论》是不大可能涉及。至于刘歆此时一方面初涉政坛,一方面亦正想利用王莽的势力“更化”王朝政治拯救危机,所以不可能激烈地攻击外戚势力。因此《汉书·五行志》中有关西汉晚期的论述主要是出自班固之手。

据统计,《汉书·五行志》中没有提到论述者姓名的,除去没有感应史事的日蚀、陨石等异象不计,大约有一百五十余事,这中间多数论述的是河平三年以后的史事,而且多与外戚擅权有关。试摘录几条如下: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庙灾……是的大将军王凤专权擅朝,甚于田蚡,将害国家,故天于元年正月而见象也。其后寖盛,五将世权,遂以亡道。

鸿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庙北阙灾。十一月甲寅,许皇后废。

① 《汉书·刘向传》。

② 《后汉书·皇后纪》。

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灾。戊午，决后园南阙灾。是时，赵飞燕大幸，许后既废，上将立之，故天见象于凌室，与惠帝四年同应……天戒若曰，微贱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庙，将绝祭祀，有凶恶之祸至。其六月丙寅，赵皇后遂立，姊妹娇妒，贼害皇子，卒皆受诛。

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长乐宫临华殿及未央宫东司马门灾。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园东阙南方灾……是时，太后三弟相续秉政，举宗居位，充塞朝廷，两宫亲属将害国家，故天象仍见。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阳侯根代为大司马秉政。后四年，根乞骸骨，荐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国焉。

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宫鸿宁殿灾，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时，傅太后欲与成帝母等号齐尊，大臣孔光、师丹等执政，以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称尊号。后三年，帝崩，傅氏诛灭。

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庙殿门灾尽……是时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临朝，委任王莽，将篡绝汉，堕高祖宗庙，故天象见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摄，因以篡国，后卒夷灭。

联想班固纂述《汉书》之时，前朝所谓“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乱邦之迹”又有了复活的迹象，尤其是“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①，以至外戚“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权贵显赫，倾动京都”，既负重劳，陵肆滋甚”，“朝臣震慑，望风承

① 《后汉书·皇后纪》。

旨"的局面,[①]以大汉为王命所归,正统所在的班固,自然是不愿意看到东汉重蹈西汉的旧辙,从而形成他编纂《五行志》,影射、批判现实的目的。以后的历史发展不幸果真被班固的谶言言中:"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帏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最终亡毙在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之中。后代浅陋的史家,既没有班固时代的思想学术背景,也不存在班固生活的政治现实,徒袭班固《五行志》的皮毛,妄谈灾异祥瑞,从而影响了后人对于班固撰述《五行志》真实意图的理解。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① 《后汉书·窦融列传》。

《汉书·艺文志》[1]

来新夏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史志目录中颇负盛名之作。但是,这两部书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史志目录,而是在目录学中有重要地位的名著。为了供同志们阅读时参考,有必要再讲一下。

《汉志》是《汉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班固是东汉初年的史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他所撰的《汉志》是向、歆父子目录事业的继承和发展。班固的伯祖班斿曾"与刘向校秘书",还常常向皇帝报告校书情况,又因"受诏进读群书"所表现的才能而受到皇帝赐书,可见班斿对向、歆父子的目录事业是深有了解的。从班斿年龄推测,班固完全有可能亲聆班斿讲授的。因此,班固对刘向是推崇备至的。他在《汉书·刘向传赞》中举了孔子以后能符合"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标准的几位难得人才,其中就有刘向。《汉书》的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传的论赞,班固都以向、歆父子的言论作为自己的观点。《汉书》的《易序》、《书序》和《乐序》中多次提到刘向的校书。班固处处表明其与刘向父子的师承关系。他对《汉志》的取材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今删其

---

① 原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0 年第 1 期,原文有附题"《目录学浅谈》之四"。

(《七略》)要,以备篇籍"。所以说,班固是在向、歆父子的影响下,继承了《别录》与《七略》的已有成果,进行了剪裁、编次的工作,撰成了《汉志》,创立了新的目录体裁——史志目录。

《汉志》的体制是前有总序——概述了汉以前的学术概况、汉初至成帝时的图书事业、刘向的校书程序、刘歆的完成《七略》和自己的编成《汉志》等内容。这篇总序既是西汉以前的学术史和目录学史的大纲,又表明了《汉志》的学术渊源。全志分六大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六略。略下分三十八种、五九六家、一三二六九卷(此家数、卷数不确)。各略均有序。各种除《诗赋略》各种无序外都有序。书名的著录方法,有人归纳为六种:

> 一为先著书名篇数而后系撰人者,如《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即是。
>
> 二为先著撰人而后系书名篇卷者,如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
>
> 三为仅著书名篇卷而不录撰人者,如《荆轲论》五篇。
>
> 四为即以撰人为书名径系篇卷者,如《陆贾》二十三篇。
>
> 五为以撰人的发爵为书名,径系篇卷者,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平原君》七篇。
>
> 六为加文体于撰人后,即以为书名而系的篇卷者,如《屈原赋》二十五篇。"(钱亚新:《郑樵校雠略研究》)

目录之后,记录了种、家、卷的数目。各书书名下,有的有注,有的无注,如《六艺略·书》十四家和《方技略·医家》七家都无注,而有注的大致又有五种不同的注体:

1. 注撰人:如《急就》一篇,注称:"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
2. 注内容:如《周政》六篇,注称:"周时法度政教。"

3. 注篇章:如《太史公》百三十篇,注称:“十篇有录无书。”

4. 注真伪:如《伊尹说》二十七篇,注称:“其语浅属,似依托也。”

5. 注附录:如《鲍子兵法》十篇,注称:“图一卷。”

《汉志》以《七略》为主要依据,从宋郑樵始就对此大加抨击。郑樵在《校雠略·编书不明分类论》中说:

> 孟坚(班固字)初无独断之学,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律历、艺文则蹑刘氏之迹。

近人程会昌在《目录学丛考》中更加诋诃说:

> 班氏取《七略》旧文以成书,事等钞胥,难言著述,时有小善,未云大雅。

《汉志》是否仅仅只是“依缘”、“钞胥”呢?我看这些评论,未免过苛。班固依据《七略》撰成《汉志》,确是事实,但他是作了声明,并且也付出了剪裁、编次的劳动,表现了自己的特色。清代目录学家章宗源在所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八《七略》条目下特别论列了《汉志》与《七略》的相异各点,持论比较平允。我看从《汉志》本身也可以举出一些二者相承又相异的例子,如:

1.《汉志》对《七略》著录各书有调整去取之处。这些变动,《汉志》都用“入”、“出入”、“省”字样来标明。“入”就是《七略》无而新增入的书,如《六艺略·书》就有“入刘向《稽疑》一篇”。“出入”就是调整归属,如《兵书略·技巧》就有“出司马法入礼也”。“省”就是去掉,有两种情况:一是“省”去大门类,如《七略》有《辑略》,《汉志》去掉《辑略》而把其内容散入各略,这对后人阅读参考提供了方便,这是应予肯定的改进。二是“省”家、“省”篇,如《兵书略》的总计中就写道:“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这

是由于这十家和其他略中有重复，经过权衡考虑而去掉的，其中如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即重道家；孙卿、陆贾二家即重儒家；苏子、蒯通二家即重纵横家；淮南王一家即重杂家；墨子一家即重墨家。删除重复应该说是完全必要的。

2.《汉志》引《七略》文字有所改易。如《初学记》中引有《七略》如下一段文字："诗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书以决断，断者心之证也。"而《汉志·六艺略序》中则作："诗以正言，义之用也；春秋以断事，心之符也。"显然是据《七略》而作了改易。

3.《汉志》改变了《七略》的类属，如《〈史记〉正义》引《七略》说"《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而《汉志》法家无《管子》，而在道家则著录《管子》八十六篇。

4.《汉志》删略了《七略》的一些题解，如《文选》引有《七略》的《邹子终始》题解，而《汉志》的《邹子终始》则无此题解。《太平御览》引有《七略》的《申子》题解，而《汉志》的《申子》无题解。

5.《汉志》与《七略》著录书名有不同。如《〈史记〉正义》引《七略》说"《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而《汉志》儒家只著《晏子八篇》，既无春秋二字，又增益一篇。

由此可见，《汉志》并非完全固袭《七略》而是自有主张，并对学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汉志》始创史志目录一体，使目录成为地位尊贵的正史中的组成部分，存历代典籍之要，开千百年史志目录之局。草创之功，固不可泯。

《汉志》为后世学术研究保存了必要资料，清代学者杭世骏在《黄氏书录序》中说：

> 今夫兰台志汉，何尝不因向歆，然秦火之后，非此不彰。（《道古堂集》卷六）

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条理·叙例》中也说:

> 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

即使所著录的内容极简也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如《六艺略·春秋家》有一条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注)十篇有录无书。"从这条简略著录中可以了解到三点:

1.《汉志》撰成时尚无《史记》之名。

2. 会书实有一百三十篇。

3. 班固所见之书已缺十篇。

有些人物由于《汉志》的著录而流传下来,如所著"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一条。

清代学者杭世骏在《两浙经籍志序》中称道此事说:

> 经籍之误,所以补列传阙漏,固不为冯商立传,而续史记则志于艺文。(《道古堂集》卷六)

由于《七略》自唐以后亡佚,而《汉志》独存,所以还可从《汉志》著录中知道当时的存书和后来的亡佚,可供了解图书状况的参考。

《汉志》的论述也有细密可取之处,清代学者刘毓崧曾引汉、隋二志对法家的解释而加以论断。

《汉志》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隋志》说:"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

刘毓崧即据以论断说:"《汉志》兼言赏,隋志专言刑。此则隋志之疏不若汉志之密。"(《法家出于理官说》见《通义堂全集》卷十)

为《汉书》作注的是唐人颜师古,他固注《汉书》,当然包括了《艺文志》,主要解释了书名、撰人和内容,如"《汉著记》百九十

卷"一条,颜注说:"若今之起居注。"虽寥寥数字,但我们足以了解《汉著记》一书的主要内容。颜注多引《别录》和《七略》来注释撰人、师承、内容、版本和书名等等,保存了两书的部分资料。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又为《汉志》搜辑了一些前代的研究成果。

第一部专门研究《汉志》的著作是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四库简明目录》认为它"持论皆有根据",但对它增入二十六种不载于汉志的古书,却认为是"真伪相杂,颇为蛇足"。姚振宗认为此书是未完之作,他说:

> 其书考证本文者二七六条,考证篇叙者七十八条,考证本志所不著录者二十七条。即就所作玉海观之,似乎所得不止于此。反复详勘,似其未成之作。(乐家、春秋家、道家皆注云当考,是其未定之词也)

姚振宗所撰《〈汉书·艺文志〉拾补》及《〈汉书·艺文志〉条理》都有助于阅读《汉志》。

王、姚所著三书均见于开明《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

《汉志》的读法,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曾提出与迁、汉列传比读的方法,他认为"存其部目于艺文,载其行事于列传","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通之要,而列传之与为表里发明"。如读《诸子略》可与孟荀管晏、老庄申韩列传比读。姚振宗更扩大了比读范围说:"列传之外,纪志书表皆有可以互证之处。"这种读法确可收互证沟通而免于枯燥之效。近人张舜徽先生的《〈汉书·艺文志〉释例》一文(《广校雠通义》附)对了解《汉志》的义例也能有所稗益。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0 年第 1 期)

《汉书·艺文志》的学术价值

王恩涛

东汉时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他著的《汉书》里编写了“艺文”一志，虽是依据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编的《七略》，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书籍目录。《七略》早佚失，所以，我们要研究《七略》离不开它，研究我国古代目录的结构离不开它，研究我国古代学术源流同样也离不开它。一千八百多年来，《艺文志》在我国学术史的研究上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一部史书，它的存在为我国史学家和文学家提供了一个极其方便的研究条件和极为宝贵的参考资料。

尽管如此，历久以来，对《汉书·艺文志》的价值很有些不同的争论。持不同意见者，多指责《汉志》尽依据《七略》而少创见。这种指责即便有某些根据，也是由于未能彻底了解班固创此体例的深意所致，何况班氏并不是完全照录《七略》，而且有所增补与裁减。《汉志》前有总论以述其纲要，后有分论以明其流别，在考镜学术源流上，曾起到了它的积极作用。

首先是在目录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它几乎完整地保存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七略》的内容和结构，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功绩。

《七略》是公元前1世纪末年，由刘向、刘歆父子编著的古籍目录。目录是书籍的纲纪，因而在谈目录之前，有必要先淡谈我

国古籍的简要情况。夏商时代我国便出现了书籍,《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又《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这些书籍还是编穿成册的,甲骨文、钟鼎文中都有"册"字,便是明证,这可以说是书籍的开始。周时书籍便大盛了,周王室和诸侯国都设有专官来管理书籍。"司马氏世典周史"①以及"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②等记载都说明春秋时期书籍是掌握在史宫手里的。但这时的书籍没有目录来纲纪。直到汉代才有人编次目录。《汉书·艺文志》叙论记载:"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在刘向校书之前,张良、韩信已在"序次"兵法了,杨仆在撰"兵录"了,兵录即是兵书目录,由于图书之盛,目录也随而兴起,刘向奉诏编写了他的《七略》。《汉志》介绍它说:"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伎。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等大目录学家已经把纷纭庞杂的古籍,大致归纳成六类,分成四个研究组,不但确定了我国古代书籍目录的七分法,同时也为之后的四分法透露了消息。这种分别部居给我国目录学的研究上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班固的《汉志》就是在这样良好的基础上而又有所创见地编

① 《史记·自序》。
②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写出来的。班固所处的时代是典籍兴旺发展的时代。《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说:"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自此以后,参倍于前。"西汉官藏的书籍运到洛阳放在兰台;东汉又继续收集了一些书籍放在东观和仁寿阁,因而参倍于前。班固、贾逵、傅毅等大学者整理了这些书籍,班固参加最早,历时最久,旧藏和新书对他不能没有影响,所以他根据当时的学术情况,补入了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完成的著作。这种补充是符合他的记一代藏书之盛的编写目的的。对其他各篇目也有所移动。如有所删削,则在总数下写明"出"若干家、若干篇;由于重复而省去的则写明"省"若干家、若干篇;有增入的则写明"入"若干家、若干篇。这样做是正确的,既保存了《七略》原貌,又显示出班固当时藏书的发展情况。他在序中也自申:"删其要,以备篇籍。"唐朝颜师古注解这句话说:"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班固在删削、提要和补充时,必定广征众本、互勘异同,不然怎能体现这一"要"字呢?绝不是像郑樵指斥的那样"专事剽窃"照本直录。

《汉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巨大,是从如下两方面体现出来的。首先是在封建正统史书中创立《艺文志》这种结构形式。其创新精神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现实意义是,从西汉开始的学术界的古今文经学之争,延续到东汉已十分尖锐激烈。今文经为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以封建迷信和阴阳五行邪说去解释经学,谶纬之学大兴。古文经学则不如此,它是根据朴素的训诂来解释经学。当然,无论今文经或是古文经都是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两相比较,古文经有较大的进步意义。班固是古文经学家,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一个白虎观会议,组织诸儒讨论五经异同,会议目的想扶植今文经,但今文经学派却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次会议的总结,却叫古文经学家班固总结了这次会议,撰

写成《白虎通义》。可见班固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他把《艺文志》固定在奉诏撰写的国史中,这就是从官方来确定古文经学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汉代仍然是“学在官府”,博士讲经已经到了迂腐的地步。但当时封建学术思想的范畴却在逐渐扩大。东汉初年的著名学者如桓谭、王充、贾逵,以后的马融、郑玄等人,都是古文经学家,又都是精思弘畅的鸿儒、通人。他们再也不能容忍那种经学博士墨守章句、谶纬合流的学风了。通人,决不老死章句,而要“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博览古今,畅通大义。这种形势便要求展读国家所有的书籍,因而也就急需一个根据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编写的目录,班固就采用了这种编写方式,以扩大古文经学的思想阵地。所以说《汉志》的现实意义极为重大,正因为这种方式的有效,汉以后各代相继仿效,《汉志》以后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以至《明史·艺文志》和清人补写的诸史《艺文志》,约近五十余种。二千年来这些正史《艺文志》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书籍的流变情况,把它们汇缉起来就成为一部巨大的古今图书总目录,伟观的学术发展史,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国历史上文化事业比较发达的朝代是两汉、隋唐和宋代,但当时官修的目录都散亡了,只有正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内容保存下来了。就保存大量资料来说,班固这种创新体制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是巨大的。

其次,它的价值表现在提要钩元上。中国目录的特点是具有提要或解题的形式。我国古代书籍从孔子学派校书开始,都写序言,如诗序、书序等。战国诸子著书立说,多写自序,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撰写了较长的序言,都是对书籍内容作提要介绍,因而有目录学的性质。《七略》中的“辑略”就是全书的序言,班固根据“辑略”并参照诗经、春秋、史记等其他书籍和当代藏书情况写

了志序一篇、略序六篇、篇序三十三篇,有人把这四十篇序言说成是"辑略节文",是不够全面的,而章学诚没有认识到班固的结构形式,竟说:"班固删辑略而存其六。"这说法更不对了。辑略并未删掉,根据洪颐煊、严可均等五家辑本对照,是分散结构在他的四十篇序言中,而且有些增补,章学诚未能完全了解班固写书的深意。班固这样做是为了提要钩元、洞明流变。即便书已不传,后代人见其目录,阅其序言,察其自注,亦可探求其学属于何家,其书属于何派,为何如此部居,学术源流演变,可略识其大概。古人编书非常注意研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这种纲纪典籍的目的在于指示途径以便于学者,班固正是发扬了中国目录学这种优良传统。叙述百家九流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例如《诗经》志序说"诗分为四",到了秦代"乃燔灭,后来又是怎样整理的呢?篇序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我们不但了解《诗经》经过汉代的整理,分成齐、鲁、韩、毛四家,而且还知道了它们的源远流别,和班固肯定鲁诗的倾向。他在略序中说:"诗以正言,义之用也。"把"诗"看成是"正言"、"明义"的东西,这仍然是封建五常的观点,班固虽然反对以阴阳五行和谶纬学来解经,但他仍逃不脱历史和阶级带给他的思想局限,了解这些则利于今天的批判继承。而他的自注更能帮助读者了解一部书的内容、流别,作者经历,创作倾向等方面问题。他在《诸子略·儒家》"晏子八篇"目下自注说:"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这是作者经历简要介绍。如嫌不够,"有列传"三字便告诉读者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晏子列传,指途甚明。他在《道家》"黔娄子四篇"目下注

说："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说明黔娄是齐威王时人，有节操的高隐之士，威王很尊重他。把这几部分融合在一起，对所求之书，就会洞悉。正如唐人毋煚说："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①我国目录学上这个提要特点，可以说是班固确定下来的。《隋书·经籍志》就沿用了这种目录结构手段，姚名达说："今存古录，除汉志外，厥推隋志，亦惟此二志皆有小序，自后诸志则不复继述，故并见尊于世。"②指出了这二志被历代学者重视的原因。因为目录解题或提要，不仅仅指示门径，而且能使人"知旨"、"悉词"、"尽探精术"，"咸识睿思"。这正是《汉志》的学术价值所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如余嘉锡先生说的"目录即学术史也"，目录学在学术史上的卓越贡献，是为历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开拓不尽的园地。郭沫若先生肯定了这个特点，他说："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其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的一斑。"③如前所述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这种体制正是《汉志》所开创，实质上是对《汉书·艺文志》历史价值的肯定。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引金榜的话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这都是古今大学者从他们做学问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出《汉志》不但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突出的使用价值，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不可不读的一部书。

（《辽宁大学学报》1982 年第 2 期）

---

① 《群书四部录》序。

② 《中国目录学史》。

③ 《光明日报》1949 年 4 月 9 日。

论《汉书·王莽传》

沈　重　李孔怀

班固所撰《汉书》自问世以来，已有一千九百余年。其间封建正统史家曾长期尊其为"不祧之宗"的楷模①，而近几十年来，不少史家仅承认该书在保存若干重要史料以及史学体裁等方面有所创新，对其史学思想则贬多于褒。故而近年来研究班固及其《汉书》之论著，能见诸报刊者寥若晨星②。其实，这部史学巨著之史观，尽管烙有时代印记的封建糟粕，仍不乏突破当时视为"禁区"的真知灼见。本文试图通过对《汉书·王莽传》(以下简称《莽传》)的分析，进一步探索班固的史观，以就教于读者。

《莽传》系《汉书》纪传的最后一篇，也是最长的一篇。其篇幅约当于西汉开国君主《高帝纪》一倍，超过执政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武帝纪》两倍。《汉书》向以文字简要为历代史家称道，而撰写《莽传》竟泼墨如水，可见作者别具匠心。遗憾的是这篇传记历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

② 据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所编《史学论文目录索引》统计：1979 年至 1981 年 3 年中，全国史学论文有关《史记》研究的达 104 篇，而涉及《汉书》者仅 6 篇。又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12 期所载《一九八四年史学史研究概况》一文统计：全年发表研究《史记》的论文约 60 篇，直接研究《汉书》的只 2 篇。

来不为人注目，实际上正是这篇传记，作者通过对王莽家世、出身、入仕以及逐步禅汉经过的介绍，对新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记叙，就王莽政权覆灭所作的评论，不仅保存了新朝一代的重要文献，对王莽和新朝历史作了比较合乎实际的记录，而且就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以批判的眼光提出自己的看法，表达了卓越的史识。

一　了解古代帝王禅让之谜的钥匙

《莽传》的最大贡献，是通过王莽代汉的经过，在历史上第一次披露了所谓帝王“禅让”的真相。

传说中的帝王禅让始于虞舜。据说帝尧到了晚年，“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①]这个“传贤不传子”的传说非常动人，成为历代史家无限憧憬的理想政治局面，而尧和舜也就被儒生们奉为圣人而顶礼膜拜，历千百年而不衰。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甲骨、金文中无迹可寻；先秦文献内仅有一鳞半爪的追忆；西汉司马迁也只是根据当时传说，在《史记》中作某些介绍，但长期以来，仍是千古一谜。而《莽传》如实记录了王莽自导自演这出禅让闹剧的全过程，替人们了解这个帝王禅让之谜提供一把钥匙。饶有趣味的是《养传》记叙王莽禅汉经过时，竟处处以虞舜禅尧作对比，可以说是“千载同符”，亦步亦趋。

王莽自称是虞舜的嫡系子孙。对王莽胡诌的这段家世，班固

---

① 《史记·五帝本纪》。

特意作了详尽介绍①,而且对王莽每次自诩"皇始祖考虞舜"的言论,在《莽传》中尽量予以保留。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汉高祖刘邦自称是尧的后代②,王莽就做舜的子孙。通过家世渊源来说明禅让的"合法性",是当时政治野心家和御用史家惯用的手法。班固通过对王莽家世的记叙,不仅点明王莽觊觎帝位的政治权术,还暗示虞舜和王莽先后两次禅让确有相通之处。

"圣人"禅位为帝,必有超人美德。儒家经典《尚书》根据当时传闻,最早记下虞舜的美德,主要是"孝悌"二字。四方诸侯之长向尧推荐虞舜时,并未讲他有什么渊博知识或非凡才能,只是反复强调他正确对待父母兄弟的缺点错误,能用自己孝行美德去感化帮助他们改恶从善,由此而得到尧的垂青。从政后虞舜能以"五典"教导臣民,即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动。他统率百官,接待四方诸侯,都能以礼相待和睦相处,于是取得禅位为帝的资格③。

在班固看来,王莽比之虞舜则更显得不平常。"发于畎亩之间"的虞舜出身寒微,而王莽却生长在朝野为之侧目的外戚贵族之家。这个家族由于王莽的姑母王君政匹配元帝,生了成帝,"历汉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郡国守相皆出其门"④,可谓权倾一时。王氏兄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

---

① 《汉书·元后传》。
② 《汉书·高帝纪》赞。
③ 《尚书·尧典》。
④ 《汉书·元后传》。

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宫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①。生活在这样一个贵族之家的王莽能洁身自好,确是难能可贵,且为西汉一代所有外戚子弟所罕见。为此,班固在《莽传》中对王莽入仕前后的个人品德述之甚详。"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②。这是儒家对虞舜个人品德的概括,也是《莽传》渲染的中心。开头第一段,就对王莽入仕前的言行作风作了堪同虞舜媲美的记录,而且还特意选录陈崇的一篇奏章来称颂王莽:"窃见安汉公自初束修,值世俗隆奢丽之时,蒙两宫厚骨肉之宠,被诸父赫赫之光,财饶势足,亡所牾意,然而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笃于师友。"③

入仕后的王莽仍以儒家道德规范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莽传》对此又作详细记录。如成帝永始二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官拜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卿相大夫甚众"。公元前8年,三十八岁的王莽第一次出任大司马,"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吏,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王莽对自己亲属也约束很严。一次他母亲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这次任职为时较短,但已赢得极好声誉。

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王太后闻知"即日驾之未央宫,收

---

① 《汉书·元后传》。

② 《孟子·告子章句下》。

③ 《汉书·王莽传》,以下引文,凡不加注释者,均引自该传。

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瞬息之间政权易手,从此王莽成为西汉王朝实际统治者。他见时机成熟,就效法乃祖虞舜,开始代汉的禅位活动。

《莽传》所载王莽禅位的方法和步骤,可谓集千古"圣人"之大成。宣扬天命,消除政敌,先行摄政,最后登基,这是效法虞舜;"白雉之瑞",加封美号,则来自周公;伪造符命,由假皇帝过渡到真皇帝,乃是自己的独创。

首先,请看《莽传》所载效法虞舜的记录:

1. 制造舆论。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天命"二字是制造舆论的有效工具。虞舜禅尧为帝,孔子称之"天命",并引了尧的话:"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①]于是王莽也以"天命"为号召。他在登基大典的策命中大言不惭地宣称:"历数在于予躬。"

2. 消除政敌。历代所有禅位者刻不容缓的急务之一,就是迅速消除政敌,独揽一切大权。相传虞舜执政后就"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②]。对虞舜诛鲧的动机,屈原第一个提出疑问:"顺欲成功,帝何刑焉?"[③]如果顺从鲧的设想,治水也会成功,虞舜为什么要杀他?《吕氏春秋·行论》说得更清楚:鲧获罪的原因,在于他反对舜继尧为帝,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治水无功"仅仅是一个杀人的借口而已。

王莽执政后同样以果断无情的铁腕对待政敌。由于汉哀帝

① 《论语·尧曰》。
② 《尚书·尧典》。
③ 屈原:《天问》。

在位七年之间,"丁傅用事,董贤隆贵"[1],政权基本上被他们控制。王莽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之障碍,在奉太后诏入宫当天,立即"收缴董贤大司马印绶",迫使董贤夫妇"即日自杀",抄没其家财"凡四十三万万"[2]。鉴于哀帝无嗣,王莽就在刘氏宗室中选了年仅九岁的刘衎为帝,即汉平帝,由"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王莽大权在握,就着手翦除王氏以外的外戚势力,"废孝成赵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杀";把丁、傅两家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徙远方"。同时乘机将所有"素不悦者"都"傅致其罪",出现了"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的局面,为王莽代汉奠定了基础。

3. 先行摄政,再登帝位。这本是虞舜禅尧的步骤。相传"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3]。王莽完全仿照,于公元1年辅汉平帝,到公元9年正式登基,也正好是"摄政八年"。

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者,王莽在"摄政八年"中还取法儒家尊奉的另一圣人周公,使自己的禅汉活动尽量符合儒家道统。其方法是:

1. "白雉之瑞"。相传周公辅成王时曾有"白雉之瑞"。王莽辅政第一个月,即汉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就如法炮制,暗示益州地方官,让塞外少数族自称越裳氏,献上白雉一只,黑雉两只。王莽立即禀告太后"以白雉荐宗庙"。这出戏导演得不错,大臣们纷纷向太后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

---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佞幸传》。
③ 《史记·五帝本纪》。

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日安汉公"。这样，王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堪同周公媲美的封号——安汉公。接着王莽又让女儿做皇后，暗示亲信组织"民上书者八千余人"，要求仿照"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的官号，加封王莽为"宰衡"。第二年还得到"九命之赐"。这样，凡周公所有的封号、官号以及"九命之赐"，王莽样样齐全。

2."藏策金縢"。相传周武王灭商二年后身患重病，周公曾设坛祷祭，并"纳册于金縢之匮中"[①]。王莽对此心领神会。他担心年已十四岁的汉平帝将会成年执政，于是趁"腊日上椒酒"之机"置毒酒中"[②]，平帝当即一病不起。王莽就仿照固公在武王病重时的作为，"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不敢言"。不久平帝中毒身亡，王莽就加紧禅汉的活动。

3.居摄践祚。"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周"[③]。王莽非常熟悉这段历史，懂得皇帝年幼是"摄行政当国"的先决条件。于是在刘氏宗室中选了汉宣帝"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年二岁"的来继位。就在这个月，王莽借口"丹书著石"的符命，迫使王太后下诏："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王莽就像周公当年那样"服天子韨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正式做了"摄皇帝"。刚登基的刘婴则称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并改年号为"居摄"。

---

① 《尚书·金縢》。
② 《资治通鉴·平帝元始五年》。
③ 《史记·周本纪》。

虞舜是“尧崩，三年丧毕”以后禅尧，王莽是当了三年居摄帝位的“周公”后代汉。他真正的独创只是利用符命。公元8年冬，他以一个无赖伪造的两只铜匮作为引线，借口“天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公元9年正月初一，正式“顺符命，去汉号”，完成了禅位闹剧的最后一幕。

班固在《莽传》中如实记录王莽禅汉的全过程，历史上第一次披露帝王禅让的真相。它使后人认识到：那些所谓“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厥子，而名于无穷”[①]等等圣洁的颂词，常常掩盖着禅位者的政治野心，而“天命”、“历数”，只不过是攫取帝王宝座的权术和手段。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竟然将王莽代汉和虞舜禅尧相提并论，闯入儒家奉为圣人的“禁区”，这确是班固历史观的一大突破。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自王莽禅汉以后，中国古代历史舞台上又陆续上演一幕又一幕类似王莽禅位的闹剧。最早是东汉末年曹丕禅汉建魏，随之而来是司马炎禅魏建晋；到了南北朝，禅位简直像走灯似的频繁更替；就连李渊建立唐朝也不例外，都是“依唐、虞、魏、晋故事”[②]，在“禅让”名义下改朝换代。所有禅位者的步骤、方法，同王莽禅汉几乎分毫不爽，甚至连禅位时的策书，其词句也大多雷同，如出一人之笔。可是从《三国志》到新、旧《唐书》等正史中，对此都仿效《尚书·尧典》，替这类帝王禅让讴歌颂扬。但人们常以《莽传》作为一面镜子加以对照，使任何违背史实的粉饰之词，都只能成为历史上的笑柄。

---

① 袁宏《汉纪》所载汉献帝禅位于曹丕之诏书。转引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② 《宋书·武帝纪》。

二　刺坏谶纬符命假象的投枪

《莽传》另一重大贡献，是通过王莽的作为，对东汉初期盛行的谶纬符命迷信活动进行辛辣嘲讽，揭穿其假象，成为当时反谶纬、反神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潮的一部分。

源起战国的谶纬符命，西汉以来已流传于社会，尤其经过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倡导，这种迷信活动更是地位显赫，盛极一时，提高到与经学相等的地步，称之为“内学”。笃信儒学的班固在“天人感应”思想薰陶下，曾在《汉书》中创立《五行志》，详尽记录西汉时期的所谓“祥瑞”、“灾异”，附会人事；并在《汉书》其他篇目中也常常盛言阴阳五行之事，大谈天人感应之道，实际上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倡导谶纬迷信提供理论依据。后代一些史家曾就此对班固进行批评。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中特列《〈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章，就班固所举“祥瑞”、“灾异”逐条驳斥，批评班固“牵引相会”、“不知所出”、“矛盾自己，始末相违”[①]。可是班固在《莽传》中却一反《五行志》中所为，对王莽禅汉前后所搞的谶纬迷信作了如实披露，其嘲讽之尖锐辛辣，有如投枪，比之同时代反神学迷信的思想家桓谭和王充，并不逊色。

首先，班固在《汉书》有关纪传中详尽记录王莽利用谶纬符命禅位的历史背景。班固认为，在王莽执政前谶纬已渗入政治生活，而且往往同禅位联系在一起。例如昭帝时春秋家眭弘就以“大石自立”、“枯柳再生”等异象为依据，要求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②]。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作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

① 刘知幾：《〈史通·五行志〉错误》。

② 《汉书·眭弘传》。

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1]哀帝时"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哀帝接受此议,下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2]。王莽正是充分利用这种迷信思想来愚弄群众,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其次,班固在《莽传》中记录各种谶纬符命活动时,常常插入评论,直接指明其虚伪和荒诞。例如,公元5年冬王莽毒死汉平帝、选立年仅两岁的刘婴继位,这时"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后,文日'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班固在叙事之后特意插入这一句评论,提醒读者:王莽以符命作阶梯,开始于此。当王莽将此消息"使群公白太后时",《莽传》又借王太后之口指出:"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只是由于王莽羽翼已成,到了"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的地步,才顺利地"居摄践祚",做了"假皇帝"。

在选材时,《莽传》还把那些趋炎附势之徒所编选的各种符命一一照录,用事实揭穿其假象。主要为:

1. 符命纯属编造的谎言。其中最典型的是王莽登基前的"哀章铜匮"。哀章是个无赖,看穿王莽心意,曾暗制两个铜匮,"署其一日'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日'赤帝行玺某传于黄帝金策图'。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为了乘机骗取高官厚禄,哀章把王莽八个亲信大臣之名写在上面,另加三人,即两个王莽同姓之平民和他自己,"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当得知王莽向太后上奏"齐郡新井"等符命之

---

① 《汉书·李寻传》。

② 《汉书·哀帝纪》。

事，哀章认为时机已到，“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王莽闻讯喜出望外，当即“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前殿”，宣布自己“承天命”，正式登基称帝。哀章所写十一人皆受封拜，分别封为四辅、三公和四将。这个伪造符命的骗子顿时平步青云，当上国将、美新公。

2. 符命可以凭借权势任意解释。《莽传》特意记下一段史实：王莽心腹大臣甄丰之子甄寻曾仿照王莽“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替其父求封。王莽只好听从，封甄丰为右伯。甄寻见此法有效，又作符命，“言故汉平帝后黄皇后主为寻之妻”，异想天开地要娶王莽寡居之女做妻室。这一下惹恼了王莽，下令“收捕寻。寻亡，丰自杀”。后来抓到甄寻，有人说他手掌纹理有“天子”二字，王莽大吃一惊，“解其臂入视之”，果真不假。王莽灵机一动，把“天”字拆成两个字，说：“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当即把甄寻等人流放到外地处死。

3. 符命必须由封建统治者垄断。在班固笔下，王莽提倡谶纬符命并非出于虔诚的信仰，而是政治权术的需要。当谶纬符命能成为禅位阶梯时，就大力提倡；当看到大批利禄薰心之徒“争为符命封侯”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尤其看到另一些有政治野心者同样利用符命对自己进行挟制，出现所谓“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的局面，危及自身的既得利益时，王莽就一反常态，立即对符命加以限制。其办法就是独家垄断符命的“发行权”和“解释权”，不容他人染指。新朝立国第二年王莽下诏规定：所有上献符命皆由尚书大夫赵并验治，今后“非五威将军所班，皆下狱”。

值得注意的是，《莽传》将新朝立国后的大量符命从两个方面来记录，即权力上升之时利用谶纬符命欺骗别人，势衰力败之际

则依靠谶纬符命麻醉自己。前者表现在新朝建立之初,后者反映在农民起义军力量壮大之时。

以前者为例:公元9年,王莽登基不久即"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音十二,凡四十二篇"。这是王莽派到全国各地进行游说的"符命宣讲团",通过宣扬宗教迷信来巩固自己的万世基业。宣讲内容都是当时耸人听闻的怪异现象,什么在王莽高祖父王伯的陵墓,有根梓木门柱忽然长山枝叶、雌鸡变成雄鸡,凡此等等的"祥瑞",借以证明"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他们一路宣讲,一路"皆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以此来达到巩固新王朝之目的。班固对此曾无限感慨地说:王莽"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①

以后者为例,《莽传》更是不惜笔墨,通过大量事实来说明:以谶纬符命欺骗别人的封建统治者,同样需要用它来麻醉自己。即便象王莽那样任意编造谶纬符命的骗人老手,当他处于农民大起义包围之中,感到众叛亲离、智穷力竭之时,同样会乞灵于谶纬符命以制造幻觉,并将其作为克敌制胜的良方。例如,天凤四年(17)王莽遣使者对农民起义军招抚不成,就亲赴京师南郊仿照北斗星座铸一"威斗","欲以此厌胜众兵"。铸成后寸步不离,当作镇邪之宝。又如,频繁改元,想以此"诳耀百姓,销解盗贼",结果惹得"众皆笑之"。再如,王莽见"四方盗贼多",就迷信风水,大兴土木替王氏祖先建九庙,"欲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尽管

① 《资治通鉴·王莽始建国二年》。

“功费数百钜万，卒徒死者万数”，农民起义军仍蔓延到三辅地区。王莽束手无策，竟想寻觅“登仙”之道以逃避现实。他听从郎官阳成修所献符命，建造九层“华盖”，“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輓者皆呼‘登仙’”。最为离奇的是公元23年昆阳一战，王莽主力溃败，起义军直指武关，攻下长安南大门。这时说符侯崔发引《周礼》和《春秋左氏》建议：“国有大灾，则以哭厌之。故《易》称‘先号咷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王莽果真“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言”。他还规定“诸生小民会旦夕哭”，就供应粥吃；如哭得非常悲哀并能背诵王莽所写策文，则封为郎官。于是有五千余人凭哭声做郎官。《莽传》所载王莽上述愚昧荒诞言行及其可笑可悲结局，实际上是对谶纬符命本身进行无情揭露和辛辣嘲讽。

怎样认识历史记录中有关宗教迷信的记载？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①这是区别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古代史著中，包括《汉书》相当数量篇目在内，“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独有《莽传》能以确凿事实，“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这在谶纬迷信盛行的东汉初年，无疑是投下一帖清醒剂。

两汉之际，思想领域中曾出现神学与反神学、谶纬与反谶纬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的斗争。前者是当时思想界主流，尤其经过封建统治者和儒生们的鼓吹，使这种迷信思想“害风俗以陆沈天下，祸烈于蛇龙猛兽”①。清初学者王夫之对此有精辟分析：“经术之变，溢为五行灾祥之说，阳九百六之数，易理受命之符，甘忠可虽死而言传，天下翕然信天命而废人事，乃至走传王母之筹而禁不能止。故莽可以白雉、黄龙、哀章铜匮惑天下，而愚民畏天以媚莽。则刘向实为之俑，而京房、李寻益导之以浸灌人心，使疾化于妖也。子曰：无为小人儒'。儒而小人，则天下无君子。”②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而当时反神学、反谶纬思潮仅限于少数儒生著作之中。最早为扬雄之《法言》，曾对神学思想进行过一些批判，“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称莽功德可比伊、周”③，可见其批判尚较软弱。接着是桓谭，曾在王莽新朝官拜谏大夫，后又到东汉王朝任职，著有《新论》。他不同意提倡谶纬符命，认为这是“奇怪虚诞之事”；甚至以“臣不读谶”公开顶撞刘秀，如不是立即叩头认罪，险些丢了脑袋④。与班固同时代的有王充，曾是班固之父班彪的学生。他直接继承桓谭反谶纬的“火形神之说”，从理论上同谶纬符命和“天人感应”之说进行系统批判，但联系现实的政治较少，而且著作直到东汉末年才流传于世。历史记录最容易使人产生类比和联想。班固在《莽传》中以确凿史实，毫不隐讳地揭露：封建最高统治者是谶纬符命的编造者和鼓吹者；这种迷信一经渗入政治活动，最容易成为阴谋野心家的欺骗手段，而且也是麻醉他们自己的兴奋剂。这种尖锐批判，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反神学、反谶纬思潮的组

①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

③ 李贽：《史纲评要》。

④ 《后汉书·桓谭传》。

成部分，并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在我国封建王朝的正史中，如此犀利地揭露封建最高统治者玩弄谶纬迷信活动的记录，《莽传》可说是第一篇。

三　儒家复古思想大悲剧的实录

《莽传》以相当多的篇幅来叙述王莽改制的全过程，对其背景、内容、经过以及失败原因，都作了详尽记录。从秦国商鞅变法直到清末戊戌变法，两千多年来所谓变法、改制、新政可谓多矣，但在一篇人物传记内记载得如此详备，确为不多。

在班固笔下，王莽改制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当时社会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西汉中后期一些有识之士的一再呼吁；其改制内容也非异想天开的荒唐之举，而是集几百年来儒家政治蓝图之大成的一次社会大实践。因此这次改制失败，不仅是王莽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从孔子、孟子以来儒家复古主义思想的大悲剧。

班固认为，进行这场社会经济改革，已成为当时的人心所向。关于西汉中后期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班固集中反映在《汉书》所载各朝各臣奏议之中。哀帝时谏大夫鲍宣"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的奏议，可谓其中代表作。面对触目惊心的现实，从武帝时的董仲舒到哀帝时的师丹，不少有识之士提过不少改革建议，都因得不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重视而束之高

① 《列宁全集》第2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阁。而王莽也只是居摄帝位以后，君临天下，才有可能自上而下地进行改制。

对这场改革最热衷的大都是儒生，而在王莽之前早已有大批儒生入仕。“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以来，“以儒宗居宰相位”的先后有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和平晏等人。班固认为：这批人口诵先王之语，“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①]那么究竟有谁能出来领导这场改革呢？鲍宣曾提出改革时弊的两项措施：一曰按儒家经典行事。他希望做帝王的要“览《五经》之文，原圣人之至意，深天地之戒”。二曰选用贤能当政，即所谓“慎选举”、“大委任”[②]。王莽确实是完全按照鲍宣所提的这两个标准去做的。

王莽是饱读经书的一代鸿儒，在班固看来他还是一个有抱负有魄力的大政治家，尤其对王莽辅政平帝时的政绩，赞不绝口。例如元始二年的一次救灾，班固记得非常详尽：“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天下民资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③]如此不惜

① 《汉书·匡张孔马传》。
② 《汉书·鲍宣传》。
③ 《汉书·平帝纪》。

笔墨,在《汉书》中是少见的;而且还直接颂扬"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徵嘉应,颂声并作"[1]。由王莽出来领导这场改革,在当时看来确是"非君莫属"了。

据《莽传》所载,以居摄二年(7)改革货币为序幕,以始建国元年(9)颁布"王田令"为标志的王莽改制,其内容范围很广,包括田制、税制、币制、五均六管之制、官制、政区以及奴婢问题等,几乎涉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各个方面。在班固看来,王莽改制时不论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皆于古有据,有儒家经典可依。故而一再强调"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动欲慕古,不度时宜"[2];"莽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专念稽古之事",等等。这是班固对这场改制总的评价。说他"性躁扰,不能无为",这是比较而言,同"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的匡衡、孔光之流相比,王莽还是个想有所作为的人。说他"专念稽古之事","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这是对王莽改制内容的全部概括。至于改制失败的主要原因,班固只用了八个大字"动欲慕古,不度时宜",说出了一定的道理。限于篇幅,下面谨以三大经济改革为例,予以说明。

《莽传》把"王田令"的颁布放在显著地位,因其内容能集中反映几百年以来儒家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包含西汉各朝各臣、经师为解决土地问题所作的努力,以及对奴婢处境的同情。

自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以来,一直受到儒家卫道士们的攻击。这批复古主义思想家

① 《汉书·平帝纪》。

② 《汉书·食货志》。

把行之于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当作“圣王之治”的理想王国，吹得天花乱坠。其中尤以孟子们的阐述最为动人：“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①]到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提倡经学，加上当时“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②]，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于是攻击商鞅变法、歌颂井田制的复古思潮又甚嚣尘上。其中以董仲舒所上奏议最有代表性[③]。到元帝以后大批儒生相继入朝，官居要职。面对日益尖锐的土地兼并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他们束手无策，只能遵奉儒家经典，高唱所渭“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④]。王莽的“王田令”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笼的。稍加比较就不难看出，不少内容是历代儒家经师们议论的翻版。例如“王田令”把土地兼并当作社会动乱的万恶之源。“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犬马余菽粟”、“贫者不厌糟糠”，“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这项法令猛烈抨击西汉土地制度，认为汉承秦制，土地私有，尽管“汉氏减轻田租，三十税一”，但“常有更赋”；再加上“豪民侵陵，分田劫假”，仅以田租而言，实际是“什税五也”。这些分析同董仲舒的奏议如出一辙。“王田令”认为土地兼并源自商鞅变法的“坏圣制、废井田”，出现土地私有，使“兼并起，贪鄙生”。这是战国以来所有儒生的口头禅。又如“王田令”把恢复“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的井田圣制当作解救时弊的唯一良方，只要一实行就会“国给

① 《孟子·藤文公章句下》。
② 《汉书·食货志》。
③ 董仲舒奏议载于《汉书·食货志》。
④ 《汉书·师丹传》。

民富而颂声作”。这与师丹所说“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相同。至于“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源自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分配土地方法是“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皮”,基本上符合孟子设想。甚至违抗令者的处罚方法也效法虞舜,要“投诸四夷,以御魑魅”。

与前代经师们不同的是:战国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儒生,尽管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但只把儒家经典当作猎取名位利禄的工具,根本不想实行。有的一旦身登仕途,立即步豪强地主后尘非法兼并土地。以苦读经书入仕的匡衡,当了丞相就私占民田四百顷[①],以“经学精习”著称而拜相的张禹,“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②]。这些人贪财好色,生活糜烂。即使有几个骨鲠之臣也只能发发清议,无所作为。儒生中董仲舒算是不错的,直言不讳地指出土地兼并的严重性,建议“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③],但无人理会。哀帝时师丹、孔光重提“限田”之议,但一碰到大地主集团反对,马上束之高阁,“遂寝不行”[④]。在班固笔下,真正敢作敢为的还是王莽。他是儒家思想的虔诚信徒,对历代儒生宣扬的井田圣制深信不疑。他痛恨土地兼并,入仕后一再让田、辞田,以示洁身自好,还带头献田,希望缓和当时的土地兼并。禅汉后立即遵照儒家经典,以井田制为治国良方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在古代封建帝王中,能清醒认识到土地兼并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公开痛斥,并颁布法令试图凭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的,王莽是第一个。

①② 《汉书·匡张孔马传》。

③④ 《汉书·食货志》。

“王田令”还试图解决奴婢问题。诏令指出当时奴婢的悲惨处境：“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諄人伦。”其解决办法是将奴婢更名为“私属”，严禁买卖。班固认为，王莽对奴婢处境的同情源于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信条；其措施在董仲舒奏章及师丹限田之议中都已提及。不同的是王莽比较认真，连亲生子杀奴也要令其自杀偿命。但是，包括王莽在内的所有地主阶级改革家对奴婢的同情都很有限，他们一面提倡改善奴婢处境，同时自己照样蓄奴，甚至把大批无辜百姓继续没为官奴婢，从商鞅到王莽、刘秀，乃至唐宋，几乎无一例外。中国封建社会的奴婢问题直到清王朝覆灭始终未彻底解决，奴隶制的这一残余形式保存达两千年之久。但历史上一些地主阶级改革家能公开呼吁改善奴婢处境，这应予以肯定。

史称“王田私属制”的改革只实行三年就告结束。始建国四年(12)中郎区博规劝王莽：“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王莽在实践中碰壁，“知民怨”，只好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莽传》特意选择区博奏议作为这场改革的总结，明确指出商鞅变法是“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王莽想恢复“其废久矣”的井田制则是”违民心”，“民不从”，即使“尧舜复起”，也是“弗能行也”，这不仅是对王莽改制的评价，而且也是对儒家复古思潮的否定。

对于币制改革，班固是全盘予以否定。他在完整记下王莽所行五次币制改革的同时（其中四次载于《莽传》、一次载于《食货

志》)，详细写明其严重后果："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道。""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每一易钱，民用破产，而大陷刑"。"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等等。作为史家，班固并不简单否定了事，还深深探讨其背景、起因及历史教训。

首先，班固认为王莽改革币制是出于禅汉的需要。例如，居摄年间第一次改革币制时，有意"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又造契刀、错刀"①。这与王莽以周公自诩而居摄朝政相一致。第二次改革币制是为了巩固新政权。王莽的诏令非常坦率："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名。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

其次，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还选载大量背景资料，使后人能从更大范围来探讨这场改革的历史渊源。贾谊的《论积贮疏》和晁错的《论贵粟疏》即为一例。前者把农民经商看作"背本而趋末"，是"天下之大残"；后者将作为当时流通货币的珠玉金银看成"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建议"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元帝时贡禹上书，甚至把货币看作"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的万恶之源，建议"直罢采珠玉金钱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税禄赐者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意农桑"。这些重本抑末、重农轻商、重视实物轻视货币的儒家传统观念，长期被人奉为

① 《汉书·食货志》。

金科玉律,对王莽的币制改革有着重大影响。

班固还认为,改革币制之议并非始于王莽,早在武帝时就“更造钱币以澹用”①。哀帝时“会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只是因为“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而作罢②。但那些以“明经洁行著闻”的儒生仍在继续鼓吹“复古道便”的主张③。王莽改革币制就是以“追随古法,于是便也”④作为指导思想的。

王莽所改币制,名目繁多,真可谓五花八门。据陈绍棣同志考证,其品种、形制均效法上古,而且名文也引据先秦儒家经典,或以周钱为蓝本⑤。《莽传》详细记载王莽如何以政治权力强制推行这场完全违反经济规律的币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灾难性的结局,它通过具体史实告诫人们: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推行无视经济发展规律的措施,注定要失败的。

设立“五均六管”,这是王莽继田制、币制改革后的又一重大经济改革措施。《莽传》记载:始建国二年二月,“初设六管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于民,收息百月三。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班固认为,这些措施也是于古有据。以“五均”为例,来自经学大师刘歆的建改,以《易经》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为指导思想⑥。王莽下诏说:“夫《周

---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师丹传》。
③ 《汉书·贡禹传》。
④ 《汉书·贡禹传》颜师古注。
⑤ 陈绍棣:《试论王莽改币》,《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⑥ 《汉书·食货志》及颜师古注。

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①所指《乐语》为河间献王所献,内云;"天子取诸侯之土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穷,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②至于"六管",主要是"效法武帝"③,除酒以外,其余五项都不过继承汉武帝之制④。至于控制酒的生产和贸易,系来自羲和鲁匡的奏议:"请法古,令官作酒。"⑤法古就是效法周公。《尚书·酒诰》是周公对康叔的诰词,规定不准经常饮酒。只有祭祀时才可喝一点,严禁喝醉。西周统治者以殷亡为鉴,认为殷后期帝王"惟荒腆于酒","腥闻于上,故天降丧灭殷"⑥。历代儒家经师遵奉文、武、周公之道,反对无节制饮酒。孔子一再强调:"唯酒无量,不及乱。"⑦王莽正是按儒家之传统来控制酒的产量和流通,并以提高税率加以限制。

五均六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并且在技术上相当完善的市场管理法规,王莽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十余年尝试,最后以失败告终。班固认为,其原因不在这项制度本身,而是盲目"法古",追随前人。王莽见武帝时"吏益多贾人"⑧,也就起而效尤,起用一批富商来"督五均六管",甚至把"天下高訾""以为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食货志》臣瓒注。
③ 《汉书·货殖传》。
④⑤ 《汉书·食货志》。
⑥ 《尚书·酒诰》。
⑦ 《论语·乡党》。
⑧ 《汉书·食货志》。

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1]。这些人就利用职权,"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愈病"[2]。王莽就以严刑峻法强制推行,结果"奸吏猾吏并侵,众庶各不安生"[3]。

王莽一生主要作了两件事:禅汉立新、拟古改制,都以失败告终,加上自己葬身于农民起义烈火之中,故而近两千年来几乎受到历代史家同声谴责。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首广为传颂的七律反映了封建士大夫对王莽的评价。

班固是第一个替王莽立传的封建史家。他生于东汉建武八年(32),从永平元年(58)起撰写《汉书》。当时离王莽政权覆灭不过35年,有关新朝史实的文件随处可见,曾在新朝生活过的人还大批健在,他可以直接根据第一手资料撰写。加以王莽已被东汉王朝全盘否定,故而年轻的班固有可能在《莽传》中继承《史记》据史直书的传统,以良史之笔,突破陈腐的思想局限,就王莽一生"真、伪"两个方面作翔实记录。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在《莽传·赞》中对这个国破人亡、身败名裂,当时举国声讨的人物,做出以史实为依据的评论:"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即使干下禅汉立新这种"篡盗之祸,推而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其失败,主要是拟古改制,弄得"害偏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

[1] 《汉书·货殖传》。

[2][3] 《汉书·食货志》。

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比之历代正统史家，应属公允之论。尤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篇传记，确实表达了班固的卓越史识和勇敢的胆识。正是这篇传记，使我们感到对这位一代良史的史学思想，确有重新认识和研究的必要。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

班固思想的特色及其内在矛盾

祝瑞开

班固是站在中上层官僚的立场上阐述他改良社会的观点和愿望的，表现出正统和保守的色彩。

一 “天人”、“命行”的内在矛盾

班固沿袭了《易传》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阴阳五行神学，认为“太极之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并把“太极之元”和“天”巧妙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天在草创万物之中，就对其性命作了规定。他说：“天造出昧，立性命兮。”人生的“小路”，即所谓“术”，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出于“大道”；“大道”是“天”在冥冥之中规定，所以是天然合理的。这是班固唯心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它在其思想中居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班固继承刘向、刘歆等人的思想，注重人事，认为命运随着人们行为的好坏，可以消长变化。他说：“命随行以消息。”强调人们要顺从天性，但却要按礼义决断行事，他说：“所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这也是他父亲班彪“穷达有命，吉凶由人”的发挥。

班固认为只有圣贤才能归心“天道”，并“弘道”觉民。在

他看来，天道难知，孔子罕言，“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1]他写作《幽通》之赋就是为了“致命遂志”，阐述吉凶性命的根本道理，并表明自己的心志；写作《汉书》也是以天道性命、阴阳五行神学为指导的。他强调汉王朝得天正统，是顺从天道自然，协于火德之运建立起来的。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吉凶祸福，他也往往归之于“天命”，如说：“遇合有命，悲夫!”等等。他创立《五行志》，详尽阐述阴阳五行灾异，正是这一思想在史学上的反映。

班固注重人事的思想又使他反对淫祀、神仙、厚葬等迷信，并批评董仲舒等推演阴阳灾异，“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2]。班固本人立《五行志》，倡言阴阳五行灾异，但却又批评董仲舒等推演阴阳灾异是“亿则屡中”。这正是班固思想体系内“天人”、“命行”两种思想矛盾的反映，也是两汉晚期以来刘向、刘歆在天人感应神学体系下倡导人事这一思想矛盾的继续。

二　对“苛切”政治的抨击

班固继承两汉以来尊儒批法的思想，强调礼乐的德治，反对杀戮的法治，并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班固认为，人是：“有生之最灵者也。”靠役使万物，赡养自己，才能生存。然而人只有合群，才能用智慧胜物，要合群就必须相互“仁爱”，否则就不能合群胜物，获取给养，并陷入争乱。他说：“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

① 《汉书·外戚传》。

② 《汉书·眭两夏候京翼李传》赞。

足,争心将作”。圣人最能实行“敬让博爱”的德行,团聚人群,“众心悦而从之,是为君矣”。这说明:仁爱德让是成为君道的根本。他说:“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①]班固从人合群的需要上论证了“仁爱德让”的产生和必要性,使传统的宗法亲属仁爱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为基于物质利益之上的合群关系,为他的改良思想奠定理论基础。这和王充“王者,天下之雄也”[②]的思想在表现形式上不一样,思想实质有相通之处。这是一个发展,有其积极意义。

班固认为:礼教刑法都是圣人效法天地创立的,都为巩固封建统治所必需。但他强调礼教文法是本,刑法杀戳是末,后者只是前者的辅助手段。他说:“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强调只有抓住礼教文德这一根本,才能使刑罚威狱收效更大,达到所谓“刑错兵寝”的极治[③]。

在班固看来,天赋人以性情欲望,人不能根绝性情欲望,但却可以用礼乐教化来进行节制。他说:“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④]班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情欲,并认为人大体性情相近,表现出清醒的认识。这和他的改良思想是息息相通的。

班固激烈抨击了当时“苛切”[⑤]的政治,对当时人民生活贫困铤而走险,豪强地主和官吏相互勾结、陷害人民的现象进行了揭露,指出:“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襄橐,奸有所隐,

① 《汉书·刑法志》。
② 《论衡·初禀篇》。
③④ 《汉书·刑法志》。
⑤ 《后汉书·章帝纪》。

则狃而寖广:此刑之所以蕃也。”主张“制礼以正刑”[①],蠲除各种苛细的法律以改进吏治,缓和社会矛盾,达到治理。

班固赞美汉初文景之治和昭帝霍光辅政时期的“扫除烦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创《循吏传》赞扬劝民农桑、推行教化的良吏;并列《沟洫志》称颂人们发展水利的措施;对汉武帝的统治,尽管他对其文治武功有所肯定,但却多次进行抨击,持否定态度。

三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的社会改良方案

班固在农业以外,还重视工商在生产财货、供给人民生活、发展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和传统的重本抑末的思想稍有不同,他提出了食、货“二本”的思想,指出:“厥初生民,食货惟先”[②]。强调“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为此,他发展了司马迁《史记》的《平准书》,创立《食货志》。表达了他这一思想。这是汉代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活跃在思想上的反映。

东汉初期,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官府赋税的沉重负担,土地兼并、农民流亡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对此,班固主张效法古代的井田制度,授田定居,使流亡农民回归到土地上,并减轻农民赋税的负担,以发展自耕农经济,稳定并巩固封建统治。

班固主张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继承西汉以来“禁二业”的思想,强调“四民食力,罔有兼业”[③],要求限制官僚和工商主占有土地的数量。他称颂古代的情况说:“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

---

① 《汉书·刑法志》。

②③ 《汉书·叙传》(下)。

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①]他特别反对"庶人富贵",即从庶民中上升的大地主大工商主,谴责他们对贫民的奴役、掠夺和骄奢踰制。

班固肯定工商制作器具、交通有无的积极作用,但却反对"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使"奢欲不制,僭差亡极"[②],造成社会奢侈靡佚的风尚,并破坏封建的等级制。这实际是对大工商主的抨击。班固赞成官府掌握粮食、货物,以控制市场、物价,限制工商主对人民的巧取豪夺。他说:"故管仲之轻重,李悝之平采,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③]但强调要有好的官吏推行这些措施,才能真正利民利国,他说:"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他赞同昭帝时文学贤良"愿罢群国盐铁酒榷均输"的意见,批评桑弘羊违反"禁二业"的传统,弃本逐末,与民争利的错误。

班固幻想实行《管子》所谓"古之四民有得杂处"的制度,使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不为外物所引诱,"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④]。这既能使人民降低欲望,又能努力增产,消除社会的纷争和混乱。这样也就可以解决他那时的许多社会问题,使流民回归到土地上去,禁止兼并掠夺,同时改进吏治,提高官员质量,使贫富"平均",社会风气趋于俭朴,稳定并巩固封建等级秩序,这是班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的治国方案。

这个方案反映了一些中上层官僚改革社会的愿望和主张。它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汉书·货殖传》。
③ 《汉书·食货志》赞。
④ 《汉书·货殖传》。

对揭露社会的矛盾和黑暗有一些积极意义。但这时“贵者”同时也多是“富者”,并和“富者”相互勾结,兼并土地,操纵工商,掠夺人民。班固企图利用古老的身份特权来笼络稳定“贵人”,限制“富人”,以医治秦汉以来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这一社会症结,制止官僚、地主和工商主三者合流的趋势。这只能是“发思古之幽情”的苍白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班固这个方案在指导思想上和司马迁是针锋相对的。司马迁肯定人的利欲,班固则强调寡欲;司马迁认为人的情欲规定了农工商等的社会分工并各自劝勉其业,班固则认为封建的等级秩序需要强制四民各安其业;司马迁在一定意义上肯定“素封”,班固则反对庶人“富者”。在对待社会弊病的态度上,二者也有明显的不同:司马迁从鞭挞社会的黑暗,进而怀疑仁义法度(当然最后还是回归到仁义上来),班固认为社会的不合理和纷争混乱,是“法度之无限也”,根源正在于没有法度;司马迁由批判仁义法度转而向下层的游侠求取同情和援助,班固则站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和统治秩序的立场上,斥责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①。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对立反映了受压抑迫害的官吏和世代簪缨的官僚对于封建社会弊病的不同态度和主张。

班固的思想展现出中上层官僚改良思想家立足本阶层的利益提出的社会改良图案和哲学主张,解剖、分析这个思想体系对于了解一部分中上层官僚的思想面貌,把握汉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对于正确评价班固及其《汉书》,都将是有意义的。

(《光明日报》1984 年 5 月 16 日)

---

① 《汉书·游侠传》。

《汉书》中的天人关系

许殿才

《汉书》一向被认为是一部封建正宗思想较浓的史书,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它的思想特色,似乎已成定论。笔者认为,《汉书》不但取得了卓著的编撰成就,而且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从基本倾向上看,它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历史纪实,而不是上苍决定人事的神意启示录。《汉书》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宗神学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它承认天人之间互有影响,但认为人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对于神学目的论,作了适当修正;对于谶纬符命、求仙祈福等世俗迷信,作了一定程度的揭发批判。这些都显示出其史观中积极进步的思想倾向。指出《汉书》中留下的时代印记十分必要,但对它的思想采取简单否定态度的做法则不可取。

一 《汉书》中的天

班固在《汉书》中没有明言“天”是什么,但可以从其记述中抽绎出所谓的天,有下面几种含义。

首先,是指冥冥中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是一种至上的人格神。这是所谓“天人之际”中,对天所赋予的基本定义。这种天是有意志的,行使着惩恶劝善功能。如果人们的行为符合天的意

志,就会得到它的佑助。在世间事物中,帝王居于主宰地位,因此对于帝王的认可与否定是天的最主要职能。在班固思想中,这种天占有一定地位。《高帝纪》中出于宣汉需要,作了许多神异的描写,为高祖乃至汉政权戴上了天意的光环。在《陆贾传》中引用陆贾劝尉佗之言,说汉得天下,“非人力,天之所建”,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班固思想中的折衷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这里。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把天和人完全分离开来,人间事物由天主宰、帝王是在代行天的职权的思想具有广泛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未能摆脱这种思想影响,王充为了宣汉,也借助天命武器对汉政权的建立做了神意论证。汉高祖以平民百姓身份,只经过几年征战就取得了天下,这是当时的人们所未碰到,也无法理解的问题,因而产生一些神异的说法不足为奇。

书中的天,也指一种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不可知的,似乎是前定的神秘东西。有时班固把这种神秘的前定因素叫做“命”或“数”。《张良传·赞》中说:“高祖数离困厄,良常有力,岂可谓非天乎?”《田横传》中赞叹:“横之志节,宾客慕义,犹不能自立,岂非天乎?”所言的天都具有这种含义。《王子侯表序》中“孝元之世,无王子侯者,盛衰终始,岂非命哉!”《李广传》中因李广屡建奇功而不得封侯,叹其“数奇”,也都是这个意思。这是由于对客观事物无知,而对频数的偶然性聚于一身或一事感到不理解产生的推想。当然,它与有主观意向、专司人间赏罚的天还是有区别的。

其次,是指客观运行的自然界。《汉书·天文志》所叙的天象是对天体现象、天体运行的客观反映,其中不乏精密的观测结果和准确的观测记录,也有很多人们在天文学研究中取得的科学成果,只是其中糅杂了天人感应的糟粕。《五行志》中所言的天有很多处指的也是客观自然界。这种客观自然界有着自己的运行规

律,“一阴一阳,天地之方”①,是班固的基本看法。《五行志》中所记“《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昌邑王)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以及山崩地震等等现象都是自然界的正常变动。在人们认识能力受到限制时,往往对这种正常运行的天产生出一种神秘感,而与上述所说有意志的天混杂起来,并把世间事物与之联系起来看待。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本身就是从自然界中抽象出来的五种基本物质。用它们的运动变化,说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具有唯物主义因素。阴阳动静的道理,接触到了事物变化中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方式。可是它们被发挥改造之后,构成了三统循环、五德始终及阴阳灾异等学说体系,自然界的运行被打上了天意印记,成了解释与论证世事的工具。《汉书》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思想影响。《高帝纪·赞》中所言:“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就是运用三统五德之说,论证汉的建立与自然运行的天取得了一致,因而具有合法性。这里所说的天与有意志的天是有差别的,比神意史观前进了一步。

再次,是指一种客观趋势,即所谓的“势”或“时”。这其实接触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问题,在天的外壳下,包容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内涵。《汉书》中对天赋予这种含义的时候是很多的。对于王莽篡汉,班固认为“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所谓的天时,就是王莽“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②。其实指的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一种事件的发展倾向与趋势。书中引用魏相之言,兵

① 《汉书·叙传》(上)。

② 《汉书·王莽传》赞。

义者王，兵应者胜，兵忿者败，兵贪者破，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①。这里所说的“天道”，也是指人们所处客观境地决定发展后果的一种必然倾向。

时、势对历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在《汉书》中有着明显表现。周、秦的历史在《汉书》中居于特殊地位，是班固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参照。对于其兴亡，《汉书》主要从历史条件上加以解释：“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国势然也。”②刘邦帝业之兴，是当时讨论的热点，班固把时势的促成看作汉兴的最重要原因。《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的篇章。文中首先总结了从虞、夏、商、周到秦取得政权的方式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然后论证了刘邦所以能“亡尺土之阶，繇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创立了“书传所记，未尝有焉”的业绩，是因为秦始皇统治政策的失误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为汉的兴起准备了必要条件。秦始皇片面总结了周朝失败的教训，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于是“十余年间，猛敌横发乎不虞，適戍强于五伯，闾阎逼于戎狄，响应瘠于谤议，奋臂威于甲兵。乡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桀而速自毙也”。正是这种客观条件，使刘邦打破了“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的格局。《汉书》于此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了“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的结论。这里完全把历史依客观条件而变化作为论述问题的出发点，触到了历史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这一真理的边缘，是班固历史思想进步性的一个突出体现。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讨论刘邦得天下之由说：“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

① 《汉书·魏相丙吉传》。

② 《汉书·诸侯王表》序。

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把形势与天命并列起来加论证，较之班固的见解就有一定的差距。

《汉书》对于形势的认识中，还包含着时势造英雄的意味。书中论樊哙等人的兴功立业时说：“语曰：‘虽有兹基，不如逢时’。信矣！樊哙、夏侯婴、灌婴之徒，方其鼓刀仆御贩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勒功帝籍，庆流子孙哉？”[①]说明了历史环境对他们发迹的影响。武帝时代是汉朝人才最盛之时，对于人才辈出的原因，班固总结这是他们“遇其时”的结果，所谓遇其时，就是“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②]。正是对内健全统治机制，对外安边拓土的客观需要，才造就了大批文武人才。

二 《汉书》中的人

《汉书》中所讲的“人”，也有不同含义。

首先，它泛指一般意义上的人。对于人在天地之间所处地位，书中是这样论述的：“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③]这里所言虽然是从律度方面引申而来，但却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做了较好概括，对人的作用也做了充分肯定。

在《汉书》中，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居于重要地位。天地之

① 《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②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③ 《汉书·律历志》（上）。

性人为贵,历史活动的目的和是非评价的标准都应当以人作为出发点,这个思想在班固来说是自觉的。这与人道主义有些接近,与唯物史观还有一定差距,但在以神性扼杀人性的封建社会里,这一思想闪烁着理性的光芒。他说:"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①]"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能胜物,不能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②]。"这两段话的价值至少有三点。其一,人天生就有喜怒哀乐之情和种种物质生活欲望,这是天然合理的权利,是不容剥夺的。这一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启蒙意义。其二,礼乐刑法诸制度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使人的自然性情和物质欲望得到更好的发挥,其次才是对此加以约束节制,以免放纵过度,对自己和别人造成危害。这就把人作为各种制度的出发点,而不是把制度单纯作为限制人们行为的工具,摆正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到了本末有序。其三,他把君王的出现归结为统一调节人们行为的需要,君

① 《汉书·礼乐志》。
② 《汉书·刑法志》。

主存在的根据，只是因为它有服务于人们的作用，对于儒家君轻民重的思想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其次，《汉书》中闪烁着人民性的光辉。它的重民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

一是以民为本，民是历史活动的出发点。书中把合民心作为评价历史行为或政策措施的价值标准。这在封建政治中抓住了具有超前意义的关键环节，显示了班固历史见解的深邃。对于文景时代，班固倾慕不已，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景的政策使"黎民醇厚"①，"民用宁康"②。武帝虽然建树了巨大功业，仍受到班固的批判，也主要是没有效法"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③。宣帝时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改变对京师的漕运办法。宣帝没有听信萧望之以天人感应之说为根据的反对意见，而采纳了耿的建议，结果"漕事果便"，"民便之"④。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史起"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班固引用民歌"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⑤，高度评价了这一功绩。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汉书》重视人民对他们的态度。对宣帝时的贤明三辅长官赵、尹、韩、张、两王，班固于每人传末都要描绘出百姓对他们是如何怀念的。《李广传》介绍李广死后，"百姓闻之，知与不知，老壮皆为垂泣"。对于张汤之死，则写道："汤死而民不思"⑥。两相对比，历史人物的高下已不判自明。

---

① 《汉书·景帝纪》赞。
② 《汉书·叙传》(下)。
③ 《汉书·武帝纪》赞。
④ 《汉书·食货志》(上)。
⑤ 《汉书·沟洫志》。
⑥ 《汉书·食货志》(下)。

二是民心关乎国家盛衰,把重民看作了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这是班固通过历史研究总结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显示了《汉书》中蕴藏的智慧。在对秦亡教训的总结上,班固引用贾山的《至言》论道:"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①人怨不但是亡国之因,而且是天下坏之因,这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放到了重要的地位。

《汉书》对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认识还有一些表现。把《陈胜传》放到列传之首,并充分肯定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在武帝和王莽时期详记历次农民起义,并交待出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都说明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活动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对于人们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班固也有很好的认识。在《食货志》卷首,论述了经济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指明这是国家施政方针的最根本环节。他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他还多次引用李悝尽地力之教,"行之魏国,国以富强"②;秦修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

---

① 《汉书·贾邹枚路传》。

② 《汉书·食货志》(上)。

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等实例，论述经济活动在抚众安民、富国强兵诸方面的重要作用。

再次，《汉书》中的人，也指在历史发展变化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即人事与人谋。书中重人事的思想是突出的。班固认为在历史进程中，人是有所作为的，人的活动可以改变历史面貌。

《汉书》从总体上看是一部人文主义式的历史著作。书中所记基本是人的历史活动，人为因素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在书中展示的历史问题中，也占有主导地位。这对于直接或借助人的活动宣扬神意史观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对于历史问题的发展变化原因，班固基本上做出了取决于人的历史活动的结论。书中对文帝即位和昌邑王废立的对比描写，充分显示了人谋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诸吕及少帝被诛后，陈平、周勃等谋立当时为代王的文帝。文帝先与代邸群臣讨论了入朝安危。宋昌以有力的证据驳倒了入朝必危的畏葸观点，判定这是群臣真心迎立。文帝又派其舅薄昭与周勃面谈，探问无疑后才确定入朝。为保万无一失，文帝又派宋昌先行观变。平安到达渭桥，群臣迎接之时，宋昌谢绝了周勃与文帝单独交谈的要求。经过这些周密安排，文帝才安然即位。即位当夜，文帝就拜其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2]，之后又逐步削夺了权臣如周勃、陈平等人的权势，消除了肘腋之患。《汉书》于此展示了政治风云的波诡云谲，揭示出文帝由于机智果断，又与亲信之臣合谋共议，才得以在政治涡流中处变不惊，稳操胜券。与此相反，昌邑王的废立过程，充分表现了他的颟顸愦眊。班固

① 《汉书·沟洫志》。
② 《汉书·文帝纪》。

认为,除荒淫无道之外,昏庸无能也是被废的重要原因。昭帝死后无嗣,群臣征他入京时,根本不计利害安危,迫不及待,火速进发。太后于“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召其入京,“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①。路上又是求长鸣鸡,又是买积竹杖,又是以衣车载女子,唯独不考虑立朝之计。即位后处于权臣震主危如累卵的形势,却恣行淫乱。直到被废之时还懵然毫无所知,反问:“我安得罪而召我哉?”②这样的糊涂天子,只能遭受被废黜的命运。对于所谓天命攸归的天子职位,《汉书》令人信服地说明,同样要靠人的积极活动来取得并保全。

《汉书》还有杰出人才推动历史前进的可贵认识,这与上文所说时势造英雄的观点是相辅相成的。武帝时期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班固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时出观了大批杰出人才。在《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中论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指出了正是这些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才创造了光辉的历史业绩。此外,《汉书》在对秦亡汉兴的历史考察中,在兴利之臣的经济措施对社会政治、经济影响的记述中,以及在对陈汤、傅介子诸将在匈奴西域建树功业的描写中,都充分肯定了人才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同神学目的论的一种对抗,其进步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

① 《汉书·武五子传》。

②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三　对天人关系的回答

《汉书》对天人关系的看法打着时代的印记。它认为超自然的天是存在的，而且这种超自然的天在一定条件下与人产生着相互影响。

《汉书》中所言天对人的影响主要有两条：

一是认可人间的君主。如果天承认了一个帝王的合法，就会降下一些符瑞显示他的意志。高帝得天下之前在他身上出现了诸多祥瑞，宣帝起自民间，事先就有枯柳复生、僵石自立的征兆，都是天在行使这个职能。对于失德而不称职的君主，天也会降下灾异预示他的灭亡，慧星四见，荧惑守心，就宣布了秦皇朝末日的到来。这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在这种学说里加进了帝王要有德的先决条件，是其中的积极因素。

二是执政者如果昏庸暴虐，不合天意民心，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警告，如果还不幡然改过，那么天就取消对他的佑助，这就是谴告说。这种谴告说虽然荒诞不经，但在封建社会里，它对最高统治者的权威是一个限制，对其行为也有约束作用。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

这里所讲天对人的影响，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能司人间赏罚的人格神，体现了典型的唯心主义神学宇宙观，是班固思想中消极因素的主要表现。

《汉书》中也论及了人的行为对天的影响。所谓"妖由人兴也……人弃常故有妖"①，"和气致祥，乖气致异"②，"德胜不祥，义

---

① 《汉书·五行志》。

② 《汉书·楚元王传》。

厌不惠"[1],都是讲人事对天意的影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在天人感应的体系中,包藏着一些进步的思想。在《郊祀志》中,班固记载了殷武丁时"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说明只要修德就可以改变天意,使国家长治久安。哀帝时灾祸频仍,国家倾危。哀帝不从治理国家入手,进行努力,而只听信夏贺良等人之言,以为"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于是"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结果却是"卒无嘉应"[2],汉朝仍沿着败亡道路继续下滑。这又说明,如果不修人事,只是乞灵于天命,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班固用正反例子论证了天只起着被动反映人事的作用,对于人事的改变是无能为力的。这样,虽然它表面上还存在,实质上却被架空。这个修德以胜天道的思想,是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它已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放到了重要地位。在两汉时期天人感应之说十分盛行的情况下,班固着意阐发这一思想,对人的作用做出这样高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

《汉书》中还把天意与民心解说成了一个统一体。"天人同心,人心说则天意解矣"[3],是说只要人民欣悦,那么天神也就会对你满意。"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4],是说只要为政清明,有利于百姓,而能建功立业,那么政权也就得到了天佑而能保持长久。这里渺茫难知的天意具体化为民意,实际上还是讲只要人事活动顺应了民心,就可获致国泰民安的效果。

---

① 《汉书·艺文志》。
② 《汉书·哀帝纪》。
③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④ 《汉书·刑法志》。

天意变成了空壳,民意成为它的具体内涵,这种对天与民的折衷处理,把落脚点放在了民心上,体现的仍是重人事的思想。

《汉书》中还有"人则天","顺其时气,以应天道"①等要求人顺应天的思想。这里所说的天,指的是客观运行的天,即自然界,而不是有意志的、作为至上人格神的天。书中所说的"人则天"具有法自然的含义。自然界万物的动静消长,有自己的特性,人也应顺应自然界的变化,采取相应的行动,才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自然的法则。《货殖传》载:"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置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②这就是在生产活动中"顺其时气,以应天道"的最好注解。此处所说的顺天道体现的是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在顺应自然道路上不断前进的一个反映,和一般意义的天人感应没有什么关系。班固在这里把天还原为客观自然界,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很好的说明。人生活在自然之中,要受到自然的制约,但"天功人其代之"③,说明班固已经认识到人对自然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班固还认为,在与自然

---

① 《汉书·律历志》(上)。
② 《汉书·货殖传》。
③ 《汉书·律历志》(上)。

的关系上，如果“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①]，就走向了谬误的一端，发生了与天人感应目的论结合的趋势。

从上述所言《汉书》对天、人以及天人关系的看法中，已经可以比较出他与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差别。在董仲舒看来，天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它具有人格力量，“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②]，统辖着人们的行为，规定着人间的事理。人虽然具有特殊本领，“唯人道为可以参天”[③]，但这种参天的反作用是被“人副天数”[④]的前提限定的。人是天按照自己的模式复制出来的，在本质上就是天意的外化物。因此，董仲舒的宇宙体系是纯粹的神学虚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被笼罩于天神的灵光之内，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改变，人是无能为力的。班固虽然没有跳出天人感应说的藩篱，但他没有把天作为造物主来看待。他所认识的天，既是超自然力量，又有自然属性。对于人，他看到的也是自然禀赋的性情。在天人的互为作用中，更强调的是人的意志，是人的活动对世间事务以及历史客观进程的影响。因此，在《汉书》中，我们更多体味出的是人文气息，而不是宗教神学意味。

在《汉书》对天人关系所作回答中，更有价值的是它对求仙祭祀和谶纬符命的批判。

班固对祭祀求仙等迷信活动的批判，以《郊祀志》最为集中。

---

① 《汉书·艺文志》。
② 《春秋繁露·威德所生》。
③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④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本志继承了《史记·封禅书》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希望通过宗教迷信活动获取上天佑助或成仙得道的愚蠢可笑行为。志中指出了"无其德而用其事"的宗教祭祀活动对于乞福的封建统治者毫无帮助。秦始皇为使统治长久,到处封禅祭祀,搞得不亦乐乎,其效果却是"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秦二世即位当年就仿效其父礼祠诸名山,结果也是"其秋,诸侯叛秦"。班固这种把行动与相反效果对比记述的方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是对淫祀的有力批判。《郊祀志》对武帝任用方士求仙失败的记录,具有揭穿迷信本相的典型意义。志中相映成趣地描写了武帝的执迷和方士的骗术。少翁为了欺骗武帝,"乃为帛书以饭牛,阳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其他方士之术也大都如此。武帝虽然在发觉他们的骗术之后,把他们诛杀掉,但这并不足以使他醒悟,仍然设坛招神,任方士摆布,到最后只是一次次失望,上当。《汉书》用这个典型事例揭露了鬼神方术之事的诬妄。在"究观方士祠官之变",用史实对祭祀求仙等活动作了批判之后,班固还引用谷永之言对此作了总结:"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

班固基本否定了杂占望气等迷信活动,认为这是"惑者不稽诸躬,而忌妖之见","舍本而忧末"①的行为。对于汉代盛行的阴阳灾异学说,也作了批判。董仲舒是阴阳学说的大师,《汉书》记载:他居家时推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之意,其草稿被主父偃窃走后奏上。武帝让群臣讨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其师之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

① 《汉书·艺文志》。

复言灾异"[①]。把灾异学说的悖乱不可信揭诸篇端,说服力是相当强的。为了让人们了解灾异学说的详情,班固在《汉书》中设立了《五行志》[②],还特别为眭弘、夏侯胜,京房,李寻等五行学者立了合传。在对他们的学说及本人下场作了介绍之后,他评论说:"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③]说明这种学说并不可信,偶尔灵验也不过是亿则屡中而已,学者不应由此迷入左道旁门,重蹈这些人的复辙。

《汉书》对谶纬符命的批判,具有鲜明的特色。班固生活的东汉初期,正是谶纬符命沸扬之时。东汉统治者借助谶纬武器夺取政权后,把它视为法宝,尊奉为内学,对此稍有非议则严惩不贷。班固在现实中不敢表示异议,却借助于史学著作对它的骗人真相进行了揭发批判。这个批判是以王莽为靶子而展开的。

《汉书》明白地揭露了所谓图谶符命是根据统治者政治需要制造出来的骗局。王莽篡权的第一步是利用平帝年幼,自己辅政的机会,模仿周公故事,扩大自己的权势。于是他"风益州令塞外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关于对《汉书·五行志》的评论,详见拙作《〈汉书〉的成就》,载《史学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③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

蛮夷献白雉"，这就与周公辅成王时有"白雉之瑞，千载同符"，王莽就此当上了安汉公。王莽篡权的第二步是居摄作假皇帝。谋杀了平帝之后就有人"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对此，书中借太后之口说出真相："虬诬罔天下，不可施行。"无奈王莽羽翼已成，这个谶符就成了王莽居摄的阶梯。到了王莽"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时，又有梓潼无赖哀章"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①]。可笑的是哀章为了自己作官，又把自己和当时重要辅政大臣及王兴、王盛等吉利的人名写进去，作为辅佐。此匮献上，王莽喜出望外，当即利用这一机会宣布自己承天命，作皇帝，把蓄谋已久的篡汉企图变成了现实。为了表示顺从天意，王莽真的把哀章等人拜为高官，作了自己的辅佐。朝中没有叫王兴、王盛的人，只好到社会上拉来一个城门令史，一个卖饼的人来充数。

《汉书》还揭露了符命谶纬是操纵在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可以根据需要加以控制，并任意解释。王莽利用谶纬建立起新朝后，很多人"争为符命封侯"。王莽唯恐"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形成威胁，就下诏规定，所有符命都要由专门人员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垄断了谶纬的发明权。甄寻利用符命扩大个人权势，惹恼了王莽，被处死。他手中的纹理有天子二字，这对王莽的所谓天命是个很有威胁的挑战。王莽就把它解释为"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②]。符命

① 《汉书·王莽传》(上)。
② 《汉书·王莽传》(中)。

谶纬可以随意控制，任意解释，其欺骗性已昭然若揭。《汉书》还描写了王莽利用谶纬符命篡权后，到了败亡之际无计可施之时，又妄想依靠符命保住政权的一系列徒劳表演。事实告诫世人，谶纬符命除欺骗以外绝无其他效用。

总观班固对天人关系的回答，可以得到这样认识：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超自然的天的存在，也认为这种有意志的天和人事之间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对这种天的作用不能高估，在天人之间，人的作用更为重要。人事不修，单靠祈福上苍，则会在世事中失败。天作为一种象征的存在，主要保持了约束人间君主的功能。对祭祀方术、阴阳灾异学说以及谶纬符命的批判，在客观上揭示了其虚妄荒诞，有儆醒人心、教育民众的思想启蒙作用。在东汉初期神学迷信泛滥之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是当时反神学思潮的一部分。但对此不能作超时代的评价，不能认为这就反映了班固与神学迷信的决裂。笔者认为，这还是对“无其德而用其事”的批判，是用人事修正来战胜天命思想的延伸。在天人关系上尽量压低天而抬高人，充分肯定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就是《汉书》史观中的珍贵价值所在。

（《历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班固的儒学观对《汉书》的影响与制约

梁宗华

在史学领域,《汉书》与《史记》齐名,班、马并称已是公论。论及思想倾向及价值取向,却评论各异。历史上,班固的正统地位向为学者所肯定,而司马迁时有“异端”之嫌。现代研究中一般又以司马迁思想为进步的,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而班固《汉书》的思想倾向则相对落后,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实班固与司马迁著史皆以巩固帝业为目的,以“切于世用”为标准,都秉承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精神。他们的思想倾向、价值取向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差异,但这正映射出时代精神、社会思潮、文化格局等深厚而丰富的背景内容,故不能简单地以正统或异端、进步或落后来界定这种差异。

班固曾盛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良史”。同时,他又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班固在著史原则等方面悉尚于司马迁,只是在分析史事、评价人物的主导思想方面发生了变化。司马迁推崇儒家,但并不以儒学的是非为是非,不排斥其他诸子学说;班固则是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对其他

诸家学说都予以抑黜,这是造成班固与司马迁思想差异的主要因素。换言之,正是班固的儒学理念影响、制约着《汉书》的价值取向。

一

在《汉书》中,班固用以品评古今人物及诸子学派的唯一标准便是儒家的思想学说,其儒学观显然与司马迁有了明显的区别。

首先,班固把儒学始祖孔子及其弟子真正放到了"独尊"的地位。司马迁《史记》就表现出对孔子的推崇,他把孔子列为"世家",实际就是表明了对孔子"素王"地位的肯定和颂扬。班固写作《汉书》却是断代史,无论如何无法为孔子立传以颂之,但是他在《汉书》中设置了一个《古今人表》,谱列上古以降至秦朝的三六九等人物,其实正是对古代史的一个品评、总结,其表不列汉代人物,原因恐即在于此,因为汉代人物自有列传可以表现。

在《古今人物》中,所有人物被分为九等,上分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亦分上、中、下三等,下亦同之。在上上圣人一格班固共列了 14 人:太昊帝宓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帝金天氏、颛顼帝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汤殷商氏、文王周氏、武王、周公、仲尼。除孔子外,余皆儒家所推尊的古帝王。只有孔子以儒家创始人的身份,以一介平民百姓置身上上圣人之列,而且孔子亦是最后一位圣人,其后再没有第二人。另外孔门弟子有 5 人列上中仁人,有 20 余人位列上下智人,其后学子思、孟子、荀子皆居上中仁人之位。先秦儒家系统的代表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排在上等。

另一方面,反观其他诸子,情形则渊然有别。道家的创始人

老子，这位在汉初曾颇为风光的人物，在班固的排列中仅列中上，另一位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竟列中下；墨家的创始人墨翟列中上；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列中上；兵家孙膑列中上，孙武仅列中中。诸子百家除了最早期的管仲，几乎没有一人位列上等，较之儒家代表人物，显然是无法企及的。

从这种排列顺序可以看出，班固把儒学置于绝对独尊的地位。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或比拟儒学先师孔子的地位，上圣14人中真正见诸史籍记载、有典可考的不过帝汤、文、武、周公数人而已，孔子实际成为上圣之中第一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可以比拟儒家的地位。班固对儒家及其思想学说的这种执著理念，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尤其是汉宣以降儒学真正占据了统治思想正统地位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反映；同时，经过班固的梳整条理，儒学的独尊地位在史学中正式确立。

其次，儒家经典在《汉书》中被奉为至尊。班固对儒家"六经"有一个总体评价："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书·儒林传序》）在《史记》中，司马迁已经赋予儒家六艺经典以崇高的意义，他称引孔子之语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史记·滑稽列传》）。司马迁对于"六艺"经典之精神的理解和概括，正是由发挥、化解孔子而来："《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纪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中援征六经以为史论根据之处很多。

班固在司马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认定儒家经典对于治政

之功效,乃“致至治之成法”。具体到对六经的个别评价上,班固与司马迁有所不同,《汉书·艺文志》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故,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以儒家经典与五常、五行相配,反映西汉中期以后阴阳五行之说盛行、封建伦理纲常确立、巩固对于班固的影响,班固正是借此赋予儒家经典万世不易之地位的。

《汉书》称引儒家经典之处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是《艺文志》对图书典籍的排列顺序。班固于各类典籍中,首叙儒家六艺经典,次叙诸子十家九流之书;诸子略中,又首叙儒家,其余九家“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这种排列虽然原则上依照了刘歆父子《七略》的编排,但也表明了班固的著述宗旨。而且,《七略》佚亡后,后代史家对“艺文志”、“经籍志”的排列顺序皆是受班固《艺文志》的影响。虽然其后的分类规范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儒学居于第一的位置却从未有所改变,而是更加巩固、加强了。

第三,班固对儒家及其他诸子思想学说进行了评价比较,对于儒家的思想学说推崇备至,而对其他诸子虽兼容之,却皆有所批评。司马迁曾经称引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以示其对诸子学说的褒贬。司马谈对诸子学说一一析其优劣,认为各家皆有所长,亦有所短,但道家却是个例外。司马谈强调道家学说融诸家之长,至善至美,合于大道;他还特别就有关治理天下之道问题对儒家学说提出了批评,“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可以代表司马迁对于诸子学说的理念。

班固虽然没有这样一篇专文论述其思想，但《艺文志》“诸子略”每一家的序，对各家源起、职能、优劣长短等进行了比较集中的阐释，班固对各家的持论可见一斑。如同司马谈高扬道家一样，班固于诸家之中最为推重儒家。他认为儒家源出于古代司徒之官，其职责与作用就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他概括该学派的特点是：以六经为典籍，以仁义为宗旨，以尧、舜为本始而遵循之，以周代文、武二王为明法，以孔子为先师；他认为儒家最合道本，因为它所祖述、所宪章、所宗师的都是“已试之效者也”，在政治实践中取得的实效昭若日月。

非但如此，班固用以衡量其他各家学说的标准也是完全本之于儒家的仁义礼治思想。对道家和墨家的论析尤具代表性。以道家言，他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些分析大致符合道家学说的特征。然而他接着指出道家学说的长处在于合尧之德，恭谦克让，而道家的最大缺陷则在于抛弃儒家仁义学说，独以清虚自守为治理天下之根本，“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汉书·艺文志》）。评判道家之短长实以儒家思想为取舍的根据。

就墨家言，班固则完全是用儒学的观点立场来诠释墨家学说的内容特征，“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汉书·艺文志》）。在班固看来，墨家之长即在于契合儒学处，如养三老五更、选士大射等，这都是儒家礼制所倡，而以孝视天下

更是儒家重要的思想主张，尤其汉代以来，孝更是被抬到了极重要的地位；墨家之蔽在于“非礼”及不知“别亲疏”，则是违背了儒家“贵贵贱贱”的“亲亲”原则。

对于另外几家学派的评判一同于此，无不以儒学为尺度。如阴阳家，班固所称赞阴阳家的“敬顺昊天”、“敬授民时”，正是儒家所力倡的；他所批评阴阳家的“舍人事而任鬼神”，则是儒家一贯反对的，儒家历来主张尽人事而远鬼神。祭祀之事只是礼容之，仅出于一种人文需要。对法家，班固赞其“信赏必罚”，是对礼制的辅佐，而批评其去仁爱之理，弃教化之道，专任刑法，不利于宗法关系的维护。又如纵横家，班固赞其言辞专对，权事制宜，合于“诵《诗》”之意，批评其蔽在诈言无“信”，而“信”乃儒家“五常”之一。他对杂家特征的概括，亦以儒家占主导地位。他认为杂家之长就在于“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其蔽在芜杂，最终没有落实到儒家的仁义、礼制方面。对于农家，班固赞其重民生，批评其蔽在悖乱上下之序，不合礼制。儒家向来主张“先富后教”，特别重视百姓的衣食之源，力倡“以农为本”，班固基于儒家这一立场称扬农家的“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更从儒家礼制角度立论，批评其不要君王统治、齐整划一百业的主张。

综观班固所论各家学说，可见儒家的思想学说是班固评判诸子价值的唯一标准，而这与司马迁父子恰恰相反。《论六家要旨》评述诸家优劣，所依据的标准尺度乃是道家，诸家之长正是道家学说的精华所在，诸家之蔽正是道家所要批判、所要扬弃的。从个人因素言，这固然体现了班固与司马迁父子的思想差异；从时代因素言，这种变化更主要是由时代主导精神造成的，体现了西汉中期以降黄老道家日渐退隐、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历史轨迹。

总起来看,班固思想的根本点固守在儒学,他极力发掘诸子学说通于六艺、通于儒学的契合点,以期更利于平治天下,更利于文化的发展,"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

二

班固对儒学的执著理念,主导、支配着他在《汉书》中所寄寓的政治理想,深刻影响了他对重要史事的历史评价。

首先,由于固守于儒学的根本立场,儒家仁义德政思想也就构成了班固政治理想的主体内容。《汉书》各"帝纪"的写作正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其一,班固强调只有行仁政才可以纵横得天下,这从《高帝纪》可以得到明证。一般以为班固写作《高帝纪》注重神化刘邦,其实班固并没有为刘邦凭空添加些许神话,与《史记》重要的差异仅在于赞语:"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确实杂糅了西汉中期以降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的因素,这也是社会发展、思想发展使然。加之东汉统治者对史学的严格控制,《汉书》由私撰到官修性质的改变,都迫使班固为西汉政权作某种神学的论证。但这并不代表班固的政治思想主导倾向,皇权"天授"只是一种形式,尽人事行仁义才是实质内容。通篇观来,班固在客观史实的叙述中,着重总结的是刘邦行仁惠以得民心的方面,"宽仁爱人,意豁如也"的性格特点在刘邦一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刘邦正是以施仁行义、宽大爱人奠定了他事业的基础,并无任何天助神佑的特异之处。班固也叙及刘邦主观上鄙薄儒学的态度,但认为他在客观上采取的诸多措施正是与儒学的仁政、重民思想相通的,而这些方

面才是刘邦得天下最根本的原因。

其二,班固认为好的治政都是施行儒学的仁义德政思想的结果。这从他对诸帝纪的赞语就可以看出来。即以惠帝言,他认为惠帝虽仅在位七年,且受制于吕后,政绩不多,但仍不失为一位宽仁之主,因为惠帝之行合于儒家仁义、礼制的精神,"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悦,可谓宽仁之主"(《汉书·惠帝纪》)。

最典型的体现莫过于对文、景二帝的评价。在《史记》中,文、景二帝都是以"无为"治政而闻名的,"文景之治"向被认为是黄老治政的结果。班固却是从行仁德的立场予以总结的。他称赞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汉书·文帝纪》)并在行文中增加了许多显示文帝仁德的内容。以劝农务本力耕言,《史记》仅录文帝二年正月诏书及十三年五月诏书,《汉书》则载录了文帝五六次诏书,而且比《史记》的内容全面。从《汉书》著录这些诏书所占份量看,班固是把劝农力田务本作为文帝仁德的重要内容来彰显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诸子学说皆主以农为本,关键在于立论的基点、立场不同。儒家历来主张先富后教,出于"民本"的立场导民力耕。班固以数则诏书的内容显示,汉文帝之劝农桑完全符合儒家的精神,他之所以一再减免农人租税,恐怕并非基于黄老"无为"的立场,而是看到了"且吾农民甚苦",一定程度上亦考虑到农民的利益;而且他还要为耕桑立礼制,显然也是出自儒家学说。

班固还著录了文帝一则诏书,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

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也。"(《汉书·文帝纪》)这是一则很重要的诏书,《史记》未录。在班固看来,它表明文帝已经把孝悌摆到了治理国家很重要的地位;而文帝对孝道的这种重视,实际是确认了儒家学说对维护宗法社会秩序的必要性,而且在自觉地去实践、运用它。

由此可见,班固认为文、景时代是汉代治政最美好的时代,可拟于周之成、康;但这并不归功于黄老道家,而认为这主要是施行儒家仁德礼义的结果。

其次,班固非常重视礼制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作用。汉代儒家最初以陆贾为代表是强调仁义为本的,至贾谊虽然秉承了以仁义为本的精神,但在具体操作上却选择了儒家的礼制思想。其后,由于礼制对于君臣上下等级关系的外在规定性正适应了巩固统治秩序的需要,一直受到重视。尤其是经过王莽篡权,以及汉末的割据战乱,班固此时格外强调礼制思想,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

班固认为礼之产生乃用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汉书·礼乐志》)。正如荀子之论礼,班固亦主张礼由圣人为节制人的性情欲望而制作,"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汉书·礼乐志》)。进而,班固一一剖析了各种具体礼制的起源,强调如果没有这些礼制,或是不能很好地执行运用它,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失去秩序,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况,由此导致国家政权的丧亡,"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

之渐起”（《汉书·礼乐志》）。因为礼有人伦日用之礼，又有政治之礼，所以无论对于修身、治国而言，班固强调礼都是最重要的，力倡治政以“礼制”为要。

在倡言“礼制”的同时，班固亦非常重视“乐”的效应。他指出：“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乐”亦是“王道”所必备而不可或缺的，“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汉书·礼乐志》）他继承发挥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礼与乐实是一体的。二者相须而行，“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汉书·礼乐志》）。他强调礼乐的本质就是别异和同，别异以明尊卑，和同以附万民，所以对于固国安邦言，二者皆是不可或缺的，故而每个朝代、国家皆有自己的礼乐，“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汉书·礼乐志》）。从礼乐之中可以窥见国家治政状况。

基于这样的立场，班固虽然对汉武帝多所批评，但却盛赞武帝兴礼制乐、表彰六经之举，“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汉书·武帝纪》）。对汉武帝的评价如此之高，原因就在于武帝在文化上的诸多突出业绩，健全礼制之功尤不可没。实际上，武帝独尊儒术主要就是限在文化、制度层面，在治政指导思想上并未真用儒学。班固的赞语可以说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汉武帝一生的文治业绩，同时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班固对礼制建设的重视。

第三,基于对仁义、礼制重要性的强调,班固主张对人民施行教化,导民向善,导民为善。他认为这是衡量国家治政的一个重要标准,只有建立在老百姓普遍被施以礼义教化基础之上的政治秩序才有可能是稳定、巩固的,否则就会有坍塌的危险。这种理念在《汉书》中随处可见。《汉书》众多的人物传记,凡涉及与政治有关的人物,班固一般都要述及他有无教化民众的思想与业绩。

《汉书》有专为循吏设立的类传《循吏传》,亦有人物专传。这一立项是承《史记》而来,但其意义显然已与《史记》有所不同,显示出班固与司马迁思想的差异。《史记》首次设置《循吏列传》,司马迁序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史记·循吏列传》)可见司马迁所述循吏是奉法循理的无为型人物,他们的治政特征是"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史记·太史公自序》),"不教而民从其化"。班固笔下的"循吏"则具有了新的意义和特征,他们不再是黄老道家因循无为式的,而是基于儒家"富民"、"教民"思想,积极从事教化百姓工作的官吏,以化民成俗为己任,积极务实,治绩斐然。《循吏传序》称:"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班固认为文、景时代在尊奉黄老的同时,亦注重以儒家礼义教化人民,循吏正是这一任务的自觉执行者,虽然数量不多,但以倡仁爱教化为治民主旨的新型官吏在文、景时代出现了。班固对这一现象给予特别的注意,并进行了热情的颂扬,正是基于他以儒家学说教化人民的理念。

班固详述了诸多循吏的文化业绩及富民措施,以突出强调为

政“教民”、“化民”的重要性，这在史籍中具有典范的意义。即如对文翁的传记，重点载录了他在文化上的业绩：“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汉书·循吏传》）这是对郡县官吏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培养教育，“化民”须先“教吏”，为基层官吏打下精神的底子。其后文翁又立学校官，采取系列措施普及教育，奖励高才，诱民向学之心，使民间形成尚学之风，“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循吏传》）。其影响所及更非限于一时一地，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文翁首发之功实不可没。文翁卒后，“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循吏传》）。可见其化民功效之深著。

文翁作为一个有政绩的郡守，可以有许多事迹被载入史籍，如《华阳国志》曾载文翁“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而文翁兴建郡学的诸多举措并不在其郡守的职责范围内，当时的朝廷并没有制定普遍的教育制度。班固却针对其兴学重教的业绩予以重点著录，正是借以彰显“教民”、“化民”的政治理想。

班固强调儒家“养民”、“教民”思想要得到较好的贯彻，须靠君臣的共同努力，他对汉武帝、汉宣帝治政的评判皆以此为主要依据。他认为宣帝之世是一个“务在化民”的循吏辈出的时代。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教化”盛世出现，上得之于宣帝对教化人民的倡导，下得之于基层官吏深得儒学“先富后教”思想之浸润，能够倡导和实践之，“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

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汉书·循吏传》)。在"教民"、"化民"的实施过程中,君倡臣和,两个环节缺少哪一方面都不可能形成这种教化盛世的格局。班固对武帝的批评也是由此立论的,"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宽,居官可纪"(《汉书·循吏传》)。他揭示出武帝只是"以经术润饰吏事",对儒学的推崇并未及于政治上"教民"、"养民"为先的层面。

综上所述可证:班固对儒学立场的坚持固守最直接地决定了他对古今人物、社会发展及汉代史事的记述、评判,深刻地影响、规定了《汉书》的价值取向。班固与司马迁的差异表征着汉代思想发展的两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班固与《汉书》其实是我们透视汉代思想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窗口。

(《东岳论丛》1999年第3期)

《汉书》的文学价值

陈梓权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23)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媲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班可谓“登峰造极”,《汉书》被指骂为“尊儒反法路线”的“代表作”,“遭到了严肃彻底的批判”。怎样正确地评价《汉书》,这是关系到古代文学史拨乱反正、深入进行教学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不准备全面论述《汉书》的优劣或比较“史”、“汉”的高低,只从某些方面着重探讨《汉书》进步的思想内容和值得借鉴的艺术技巧,肯定《汉书》的文学价值,以期对于正确地评价《汉书》、确定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点裨益。

一

班固出身于世代显贵的书香门第，祖辈均为京都或地方官吏，其父班彪是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官①。在得天独厚的家庭摇篮里，聪明好学的班固"博贯载籍"，穷究九流百家②，而坚持以儒学为正宗，视儒家者流"于道最为高"③。他创作《汉书》，是为了继承父业④，但以宣扬汉德，突出汉家帝业为宗旨；对《史记》将汉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颇为不满，认定"汉绍尧运"，功高德厚，理应大书特书⑤。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氛围里，班固自觉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思想并用以指导《汉书》的写作，是不难理解的。

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史学家，班固非常重视历史真实的记述，恪守"实录"的原则。他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高度推崇《史记》"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还进一步认为《史记》"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即尚有录而欠详欠实之处⑥。因此，他力求把《汉书》写得更客观、更真实、更详备。尽管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描述、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存在种种思想局限，但客观上还是能够反映了西汉的社会现实。而且，班固所信奉的儒家思想固然有

---

① 《汉书·叙传》，第4207页，中华书局版第12册。

② 《后汉书·班固传》，见《〈后汉书〉选》，第106页，中华书局版。

③ 《汉书·艺文志》序。

④ 《后汉书·班固传》："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见《〈后汉书〉选》，第106页。

⑤ 《汉书·叙传》，第4235页。

⑥ 《汉书·司马迁传》，第2737、2738页。

其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在《汉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等糟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思想也还有一些进步的成分,例如民本、农本、爱国思想,反暴君、反苛政、反重敛等等,这些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反映到《汉书》中,也使它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

《汉书》有哪些突出的进步思想内容呢?

(一)暴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汉代的统治是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代表着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的利益。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和无可估量的财富。在统治者内部,经常爆发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纷争,往往形成不同的派系,互相倾轧、杀害。《汉书》的一些纪传真实地、充分地反映了这种派系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王子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其一。如《武五子传》叙述汉武帝五个儿子在他生前身后围绕帝位继承问题展开的长期争夺。太子刘據本是合法的继承者。因武帝近臣江充与他有隙,利用武帝年老昏愦、迷信巫蛊的弱点,伺机谗害了拥戴太子的一派宗室、臣僚,太子被迫矫诏发皇宫兵马捕斩了江充,却被丞相刘屈氂战败自缢,其三男一女及卫皇后皆遇害。王子刘旦、刘胥或封官许愿、纠合帮派,或行"诅咒法",图谋夺权,均事败自杀,其亲属部下也成了牺牲品。……这篇传记多么集中、突出地反映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冲突!虽然,作者表现了君主世袭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造反"、"篡权"者俱以失败告终;但在客观上恰恰暴露了这种封建制度的残酷、罪恶的本质,它正是产生统治者内哄的主要根源;它的恶果是社会动乱,下层官吏士卒以至无辜的老百姓遭殃——"灭族"、"株连"的事层出不穷,如霍光既废昌邑王刘贺,又诛杀昌邑群臣二百余人,但党争还是无法避免(《霍光

传》)。刘據发兵杀江充后,在长安城"欧(驱)四市人"与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刘屈氂传》)。内哄的剧烈、残酷及对于社会、民众的祸害,可想而知!

朝臣、官僚贵族之间尔虞我诈,互相陷害,是其二。如张汤GDP严助(《张汤传》、《严助传》),公孙弘排主父偃(《公孙弘传》、《主父偃传》),石显谗贾捐之(《贾捐之传》),王章劾王凤(《杜周传》),等等,在《汉书》的纪传中此起彼伏,不胜枚举。许多章节表明,封建帝王操生杀予夺的大权,携朝臣的祸福荣辱,其昏庸、骄淫、残暴等品行往往惹致朝政腐败、派争迭起,社会骚乱。车千秋上书汉武帝,借神灵名义为卫太子讲了句好话,即由高寝郎(看守高庙的小官)跃升为大鸿胪(掌管外交、礼仪及接待少数民族的长官),数月遂拜相封侯(《车千秋传》)。禀性忠直、有功于朝的京兆尹王章,因一言讥刺宠臣王凤而被成帝杀戮,殃及家族(《梅福传》)。大农令颜异,因对造白鹿皮币不表态,"微反唇",被张汤诬控为"腹非",竟遭武帝"论死","自此之后,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食货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君主专制统治的社会现实。

皇帝的嫡系与庶系之间的勾心斗角,是其三。如《外戚传》披露了汉宫深处"争宠相害"的种种阴谋、丑剧:有霍光之妻指使女医谆于衍毒死许皇后,得立霍女为皇后,又教唆霍后毒害太子的阴事;有赵飞燕姊妹在成帝刘骜后宫专宠十余年的丑史;有李夫人"以色事人"的悲剧;有陈皇后无子失宠、寡居长门宫的逸闻;有曹宫"御幸"产子、惨遭赐死的传说;等等,无不露出封建帝王淫恶阴毒的端倪。成帝亲手杀死"私幸"许美人所生婴儿一段故事,可说是真实、细致地记录了一宗发生在戒备森严的皇宫深处的政治谋杀案。凶手是身为最高立法者皇帝,同谋教唆者则是"位视丞

相”的赵昭仪。作案的动机通过他俩的一席对话和盘托出:“许氏竟当复立邪?”“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显然是关系到皇位继承权、谁当皇太后的根本问题。皇亲国戚之争在我国封建时代是有典型意义的。据《外戚传序》载,汉代皇帝的妻妾“各有爵位”,“凡十四等”,内宫的等级森严,有甚于朝廷的等级制。有女一朝入宠,其嫡亲旁戚也得以封官赐爵,飞黄腾达。因而内宫争宠相害,也是封建君主制的一种严重弊病,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特殊反映。只因发生在宫闱,不易为一般史臣、文人所发现和记述。《汉书》以春秋笔法,触及这方面的题材,写得很有故事性和感染力,对荒淫、暴虐的帝王后妃持批判的态度,确是难能可贵。这对于后代描写宫廷“秘史”一类文学,影响颇大。唐宋间有《赵飞燕外传》、《赵后遗事》等演绎,生发赵飞燕故事的作品,在民间也逐渐流传。辛弃疾词《摸鱼儿》所咏“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也见《汉书·外戚传》影响的痕迹。

(二)表现统治阶级的贪污腐化、奢侈淫乐和社会风俗的腐败

《汉书·食货志》写出文景之治“食足货通”、“国实民富”,至武帝后期则由盛渐衰的社会情景。由“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发展到卖官鬻爵,盗铸金钱,货赂上流,狱讼不决。“世家子弟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官场的腐败,习俗之恶劣,足见一斑,《张禹传》刻划了张禹广买良田,整天置酒设乐,“妇女相对”的奢淫情状;《外戚传》描绘了上官安骄横淫恶,“醉则裸行内,与后母及父诸良人,侍御皆乱”等丑态;《主父偃传》揭露了主父偃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倒行逆施的变态心理,反映了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贡禹传》、《杜周传》记叙了皇帝一味好色、选掠美女,造成“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殚天下之财”、“匮万姓之力”的恶果。《汉书》所载宫闱中奢侈淫乱事件屡

见不鲜。著名的如《东方朔传》,形象地揭露了汉武帝微行游猎,扩建上林苑等追求吃喝玩乐、不顾破坏生产、扰害民众的恶劣行径;作者对民众的"号呼骂詈"、聚会抵制寄予同情。传中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馆陶公主(武帝姑母)如何私幸董偃,巧施奸计,讨得武帝的赞许,使"董君贵宠",伤风败俗;并通过东方朔的直谏,一针见血地指出最高统治者的淫侈不轨是败坏民风的直接成因。

(三)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

官僚、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尤其是汉武帝以后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天灾人祸,使人民痛苦不断加深,导致各种形式的反抗,爆发了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汉书》有不少篇幅反映这方面的社会现实。记叙社会经济凋败,官吏盘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如《食货志》。《文帝纪》、《景帝纪》也透露,即令汉初相对升平时期,也难免"民有饥色"、官吏"渔夺百姓"的境况。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战事频仍,人民不胜军旅徭役之苦的,如《贾捐之传》。传中通过文、武二帝赋、役轻重的鲜明对比,有力地谴责武帝一心对外扩张、不顾人民死活的不义之战,流露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贾捐之与王商有一段对话:"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情景十分亲切动人!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其立意、意境岂非汲取《汉书》的精华?反映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剥削的,如《咸宣传》,就相当具体地描写人民反抗的猛烈气势,尽管统治者残酷镇压仍无法遏止。《王莽传》也记叙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终于"数十万人入关",灭掉新朝。无庸讳言,作者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诟称

人民的起义队伍为“盗贼”;但是,他能比较客观地看到人民反抗的原因,或是天灾严重,吏治残酷(《龚遂传》、《吾丘传》),或是征赋苛重,社会凋败(《食货志》),总之是由于“滔天虐民,穷凶极恶”的暴政所致(《王莽传》),从而主张“缓而后治”,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体现了儒家反暴政的思想。《汉书》有些篇章赞扬那些轻徭薄赋,刑简政清,体恤民情,发展生产的贤能官吏,赞扬那些摧折豪强,济贫扶弱,据理力争,敢言直谏的正直官吏(《龚遂传》、《贡禹传》、《赵广汉传》、《翟方进传》、《盖宽饶传》等)。同时,讽刺那些残暴奸诈,贪污腐化,趋炎附势,虐害人民的邪恶官吏(《张禹传》、《咸宣传》、《严延年传》、《陈万年传》等)。可见班固的基本立足点是在于除暴政,施仁政,宽仁爱民,廉洁奉公这一儒家的立场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民有利的,是进步的。

(四)歌颂忠于祖国,征御外侮,坚持民族气节,刚强勇敢的英雄人物,鞭挞投敌叛国,屈辱妥协,自私软弱的无耻之徒

西汉的边犯主要是北陲的匈奴,这个好战的、实行奴隶主统治的部族连年侵扰边郡,大批杀掠中国的人民和财物。汉武帝时开始改变汉初单纯的和亲、忍让政策,实行对匈奴反击和讨伐。此后或战或和,至成帝以后终于出现六七十年的“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和平共处局面。《汉书·匈奴传》忠实地记叙匈奴的社会习俗及其与中国长期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匈奴统治者野蛮、骄横、贪婪、侵略的本性;赞扬了在对匈奴实行和亲或抵御的过程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帝王将相、军民人等;揭露了李陵、李广利等挟私贪功、劳师深入,终于投降变节的卑鄙行径。《张骞传》叙述张骞出使西域,疏通邻国共击匈奴的壮举,表彰他两度共历十几年之久羁留匈奴而不失民族气节的事迹。《西域传》、《冯奉世传》、《赵充国传》描述了一些御侮西羌的爱国名将形象。象赵充国那

样一心报国、冒死解围、料敌制胜、威德兼备、老当益壮、罢骑屯田的生平史迹，我们今天读了也肃然起敬。感人至深的是《李陵传》和《苏武传》。前者展示了汉军与匈奴塞外鏖战的情景，刻划了李陵叛国偷生的丑恶嘴脸。后者塑造了苏武这个忠贞不屈、艰苦卓绝的爱国英雄形象。一反一正，成为后世一些戏剧、曲艺、诗画的题材，富有爱国主义的精神营养。我们决不可因为这类传记中打有封建时代忠君思想的烙印，而抹煞其爱国思想和人民性。

二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必须通过想象进行构思，创造典型。作品的形象典型性越强，越是深刻地表现了生活的本质，其价值就越高。作为史书，《汉书》忠实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而不是凭借虚构手段塑造形象，这是与小说、戏剧一类文学作品迥然不同的地方。作者不能骑上想象的骏马自由地驰骋，不可“虚加练饰，轻事雕彩”，在运用文学技巧上受到很大的局限；加上体裁、编例等约束，在洋洋一百篇、八十余万言中，简单的复述，平淡的记录，抽象的议论，呆板的说教，间或有之。但是，我们从前面的初步分析可知，《汉书》在许多方面以具体生动的、使读者可以感受到的历史的真实反映了西汉社会的本质，具有相当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而且，《汉书》在运用文学手段上也多可称道，不论是描绘人物事件、选材剪裁、谋篇布局、驱遣词句等等都是相当成功的，使整部《汉书》，尤其是人物传记部分有一定的形象性、典型性。

（一）题材丰富，剪裁适当

《汉书》反映现实的笔触广泛，记述了西汉二百三十年的历史

大事，社会的经济、文化、典章制度；单人物传记则有十二帝纪、七十传之多，仿佛是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各阶层人物事件的画廊。就描述个别人物、事件而言，取材也求其充实，既采集前史遗事，又旁贯琐事异闻，在真实的基础上对材料经过选择取舍，从而较鲜明深刻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体现作者的褒贬态度。如《霍光传》既涉及霍光生前身后有关的重要人物事件，又着重从他秉政二十余年的漫长政治生涯中选取武帝托孤、辅政昭帝、废昌邑王、拥立宣帝四件大事，加以集中描述，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霍光忠于汉室、独操权柄、沉静详审而专横恣肆的生动形象。作者对霍光身世的叙述，何等疏略而清晰；对其外貌的勾勒，何等粗放而明朗；摄取"周公负成王朝诸侯"这幅名画展开武帝托孤故事，在封建时代又是多么富于代表性和象征性！为了表现霍光忠诚辅政的功绩，作者具体而精练地选述了上官桀等官僚贵族内外勾结、密谋诬奏陷害和设宴暗杀霍光等事件，而这些事件都一一为霍光所识破和粉碎，又以"光威震海内。……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数句笼括，虚实结合，给读者的印象既鲜明又完整、深刻。传中以主要篇幅描绘了霍光发动的废昌邑王这场宫廷政变，所选故事情节更加生动曲折，人物的语言动作惟妙惟肖。霍光先找老部下田延年、心腹将领张安世等预谋，见其周密谨慎；未报太后擅召群臣在未央宫聚议的情景，见其专断威慑；采用明礼暗兵、突然袭击的办法监护了昌邑王、拘捕了昌邑群臣，见其部署缜密得当，政治上谋略过人；皇太后威仪抑抑，实为霍光外孙女，受他导演和支配；尚书令读奏书，则是霍光为首的实权派对皇帝的控告和宣判，霍光迫不及待，亲自解脱昌邑王的玺绶，这个细节十分逼真地表现他效忠汉室、秉先帝遗旨，态度坚决而骄横，恰恰与送走昌邑王时的卑恭、委婉陈词、"涕泣而去"的举止构成鲜明的对照，含蓄

地刻划了他施弄权术、立而复废昌邑王的复杂心情；昌邑群臣悉数连诛，进一步写出政变的结果，也赤裸裸地流露了霍光的封建正统思想和残酷毒辣的阶级本性。全篇突出霍光这个中心人物，就像是一出完整的戏剧，反映了宫廷尖锐复杂的派系斗争；几件在矛盾斗争中最能体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大事，将这出戏分成几幕，展观在读者眼前。《苏武传》表现苏武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爱憎分明和刚强不屈的性格，也从苏武八十多岁的一生中，重点截取、描述出使、羁留匈奴十九年的艰苦斗争生活；在羁留匈奴十九年漫长岁月中，又仅选择诱降迫降、幽禁断食、流放牧羊、李陵苦劝等几件带关键性和特征性的事件，作了细致的描写，充分表现苏武经得起生死攸关、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种种考验；还精巧地突出了苏武牧羊时"杖汉节"，"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及还，须发尽白"等含义深刻、形象鲜明的细节，使人物栩栩如生。其艺术感染力千百年来不曾泯灭，首先有赖于题材的典型性和精心的剪裁。

（二）善用对比和衬托，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思想

在描述一个人物、一件事情时，旁及他人他事，与此人此事紧密联系，互相比较，形成强烈的对照；除写人物、事件与他人他事的关系外，有时还写到周围其他社会环境与自然景象，记叙人物活动、事件产生的背景或效果；以发展的眼光描写人物，反映他前后的不同遭遇和思想变化，揭示他言与行、表与里的矛盾状态；等等——这些，都有助于映衬主要人物的性格和突出主题思想，也是《汉书》常用的艺术手法。如《苏武传》通过对人物之间犬牙交错般的复杂关系的描写，把苏武的形象衬托得非常丰满。汉与匈奴长年摩擦，单于骄横，加之虞常反叛、张胜介入，这样的政治背景和非常事件使苏武陷进了危境。然而他明察是非，临危镇定，

不肯“屈节辱命”，而“引佩刀自刺”。这样的凛然正气使同行的汉使们感动得痛哭流涕（“惠等哭”），使媚敌求荣、为虎作伥者心惊胆战（“卫律惊，自抱持武”），连敌国首领也敬而畏之（“单于壮其节”）。卫律迫降一段，展示了苏武与敌顽针锋相对的斗争。张胜在卫律的血剑下“请降”，固然表明他软弱怕死，也显示卫律的凶恶气焰；而苏武则据理争辩，毫不退缩，归根到底正反衬出苏武的坚贞不屈。作者用铺张的笔法，写卫律如何不知羞耻地自述投降的利害，而苏武先是“不应”，鄙夷不屑，后则忍无可忍地把卫律叛国投敌、破坏汉匈和好的阴谋罪行鞭鞑得体无完肤。这种表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烘托、对比手法，在写李陵劝降时则又较为委婉曲折。李陵置酒设乐，极力以挚友的深情打动苏武，又企图以苏武家属为汉朝廷所迫害的事实刺激苏武，断绝他对汉室的忠心和家庭的眷恋。在这样的“软刀子”面前，苏武没有采取对卫律那样横眉冷对，破口痛骂的态度，却是推心置腹地表达爱国忠君的情思、斩钉截铁地倾诉宁死不屈的心愿。反而使因个人恩怨而变节的李陵羞愧得无地自容！李陵高歌泣别苏武一节，没有正面描写苏武一笔，却从李陵这个侧面把苏武坚持斗争终于胜利的可钦可羡可歌可泣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苏武归国后皇帝、将相们对他的种种赏赐和推崇，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衬托、渲染苏武崇高的品格，表现爱国的主题思想。

又如《霍光传》写群臣聚议未央宫时，田延年离席按剑、气势汹汹，群臣惊愕失色、唯唯诺诺，这也是衬托霍光专横威慑的精采笔墨。本传在霍光死后，补叙霍光“阴妻邪谋”（包庇其妻指使乳医药死许后罪迹）一节，虽略略数笔，却与他一生貌似忠正形成极鲜明的对照，突出地流露作者对霍氏党亲连体、惹成后患的批判态度。通过写霍光的妻儿子侄骄横跋扈、鱼肉人民，监奴冯子都

竟与霍妻淫乱,霍家奴争道大闹御史府等生动情节,更把霍氏满门专横的气焰烘托得“炙手可热”,充分暴露霍光“阴妻邪谋”的祸害。后来有些诗文借题发挥,最早如后汉辛延年的《羽林郎》,已把霍家奴当作仗势欺人的一般贵家恶奴的代表。可见,《汉书》描述的次要人物形象,也不乏凤毛麟角。

《朱买臣传》用对照的写法刻划朱买臣在贫与富、得与失的不同处境下的精神面貌和炎凉世态。朱在家贫卖薪时为人坦直、朴实、乐观,以其妻不堪贫耻、另适他人为对照;朱“待诏”时为官吏人等所鄙夷不顾;及至发迹,沾染了“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的封建阶级思想,乔装回乡捉弄地方官吏人等,出尽他们的丑态;更狠毒的还故意令后车载故妻置府内给食,使她羞辱自缢;最后叙述他在官场上与忘恩负义的张汤勾心斗角、打击报复,终致张汤自杀、自身也被诛,深刻地暴露他奸诈、刻薄、狭隘、报复的心理。全篇情节虽较简单,但前后层层对照,通俗生动,含蓄有力地表现了封建社会某些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和精神状态,因而这个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

此外,如《董贤传》写董贤一朝得宠,步步飞黄腾达,荫妻庇亲,一旦失主,则日落千丈,死妻祸亲;《严延年传》以赵绣为两劾、张敞劝缓治、黄霸行宽恕、丞义畏毁上书,严母数责其多杀等情节,表现严延年为官的冷酷残忍;《张禹传》以张禹接待彭宣和戴崇的截然不同情景,揭露其奢侈虚伪的本质;等等,都是以客形主的巧妙的比衬。

(三)精练、生动的白描笔法

《汉书》贵在写实,在写作上遵照历史创作的原则,不事夸饰、虚构,但写人叙事,往往能抓住主要的特征,选择精练的语言照实地勾勒、细致地描述出来,类似绘画家的速写、素描手法,我们称

之为白描。这可说是《汉书》的本色,是它的基本艺术手法。上举名篇《霍光传》、《苏武传》、《朱买臣传》、《严延年传》等等,有许多精采的白描,如霍光废昌邑王、苏武拒降牧羊、李陵劝降泣别、买臣担薪戏妻、严延年斩赵绣……。其共同特征是,作者没用什么华丽的词藻,不加形容、夸张,也不插进抽象的议论,只是准确、凝炼地记述了人物最有代表性,能体现人物思想、个性的对话和动作,采用真切、典型的细节进行精细的、朴素的描绘,构成了富有戏剧性的场景或生动鲜明的画面,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印象很深。且如《张禹传》质朴地写张禹儿时观卜学经,为官则附下媚上、持禄保位,动辄称病、"乞骸骨",老来治冢争地等真实事例,其自私虚伪、骄奢淫逸、老奸巨猾的品性便跃然纸上。请看其中一段:

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筦弦。

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阳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弟多智,二人异行。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责师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也,禹见之便坐,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宣未尝得至后堂。及两人皆闻知,各自得也。[1]

除了"为人谨厚","内奢淫","为人恭俭有法度","恺弟多智",

① 《汉书·张禹传》,第3349页。

"心亲爱崇"一类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式的词语外,大体都是按人物事件的本来面貌作客观、冷静的介绍,作者的思想倾向没有直接说出,却蕴含于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禹在宣前道貌岸然,在崇前则淫奢纵欲,"自我对照",活现出伪君子的脸孔;禹、崇一样嗜好淫乐,相形之下,崇更露骨,显得无所顾忌,禹则因人而变,显得较险诈;宣、崇同为"弟子",品行迥异,但对禹均能相安自得,可想而知宣是个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的政客,而禹附会笼络的手段何等狡狯。文笔朴素无华,却自然而然地构成几层对照,把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刻划得入木三分,作者对禹、崇的讥刺贬斥、对宣则褒贬相兼的态度,也蕴蓄而不隐晦。

《李夫人传》描写李夫人"进宫"、"病笃"及汉武帝对她的"伤悼",均以白描见长。"病笃"一节①以晓畅的语言,对话的形式,形象地概括了李夫人以色事人、汉武帝以貌取人的典型事实。武帝开口封官,闭口赐金,再三欲见李的容貌,结果"不悦而起",其唯我独尊、思慕女色的帝王气质约略可见,而李夫人"以色事人"的悲郁、痛苦、忧伤、哀怨等复杂心理状态则写得极其委婉、隽永。中唐诗人李贺以《李夫人》为题写成一首七古,咏叹李夫人仙逝,汉宫中一片凄凉,武帝不胜伤悼、作赋弦歌以致哀思的故事,寄托着对宫嫔妃妾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其题材、意境、情韵显然得自本传的启迪。

宋·程伊川以为"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辞俱尽"。其实,《汉书》虽多褒善贬恶、直言不隐,但也不乏含蓄婉约的笔墨。李夫人对话的凄切动人,苏武在敌剑加颈时"不动"、对卫律的利诱"不应",彭宣、戴

---

① 《汉书·外戚传》,第3951、3952页。

崇对张禹的不同待遇“皆闻知，各自得也”，霍光听知其妻药杀许后之后“大惊，欲自发举，不忍，犹与”……等等，都有含不尽之意见诸言外。文浅情深，辞淡意浓，标志着《汉书》白描的成就。

（四）章法严谨，脉络清晰

《汉书》的布局，多用顺叙的写法，按人物活动、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为线索依次描述；但也杂以插叙、倒叙、补叙、夹叙夹议、先叙后“赞”的笔法，灵活运用，使文章结构严谨，错落有致，主线突出，脉络分明。如《李夫人传》，首段说李夫人以“妙丽善舞”得宠，少而早卒，为总冒；次段倒过来着重描述她临死前的可怜情态；三段再具体写她死后武帝的无限思念，如何令画遗容，如何赋诗伤悼；末段简略补叙李家族灭的结果。首尾完整，突出了武帝与李夫人的关系。《苏武传》篇幅较长，全文可分四大段。第一大段自“武字子卿”至“虞常生得”，交代、说明苏武出使匈奴的背景、目的、任务及被羁留原因。“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为下文苏武被拘埋下伏笔，“虞常谋反”及“私候张胜”，进一步为苏武被拘作了铺垫。第二大段从“单于使卫律治其事”至“武复穷厄”，紧接上段，写苏武为张胜牵连被拘并不屈服于威迫利诱、流放折磨的坚贞气节。这一段是敌我冲突的高潮，写卫律诱迫苏武，如短兵相接，气氛紧张，动人心弦；跟着写幽禁绝食，为高潮的继续，令人为苏武生命牵挂。至“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给人一线希望；而令牧公羊至产羊羔乃得归，又使人顿感失望。苏武牧羊含辛茹苦，中间插叙于靬王亲近苏武给衣食故事，令人稍事宽慰，不料王死，“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波澜又起。第三大段从“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至“及还，须发尽白”，插叙李陵与苏武关系，再写苏武不为所动、终于归国的经过。这是本篇的第二个高潮，由“敌”“我”的冲突转为“我”、“友”之间、“公”、“私”之

间的矛盾斗争。苏武不因朋友、骨肉的感情而丧失大节,经受了重重的考验。故事至此,高潮已过。但在归国之前,又经历揭穿匈奴"诡言武死"的阴谋的一番曲折,穿插了李陵和苏武诀别的悲剧性壮烈情节。第四大段自"武来归明年"至结束,叙述苏武归国后的经历。写他在统治者内部斗争中曾被免官,后又复官;被杀一子,后又赎回一子,受到敬重。全文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始终突出了苏武忠贞爱国、坚韧不拔的思想性格,构思自然而精巧。

南朝宋·范晔评论《汉书》说:

> ……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①

指出班固的《汉书》在叙事方面的成就,首先在于内容真实、丰富,褒贬得宜;其次得自"有体",在篇章结构上有相当高的造诣;再则语句渊雅、精练、娓娓动听。因而,使人读起来津津有味,不忍释卷。范晔的评论大体上点出了《汉书》的文学特色。

唐代史论家刘知幾说:"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又说:"文之将史,其流一焉。"②文与史息息相关,古代的文史著作往往相通,史传文尤然。《汉书》在很大程度上描绘出一个封建王朝的真实的历史面貌,闪耀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它基本上继承了前代优秀文史著作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而又断代为史,独树一帜;无论是写人、叙事、结构、语言都有所创造,别具风格,很有文学价值。《汉

---

① 《后汉书·班固传》,见《〈后汉书〉选》,第110页,中华书局版。

② 见《史通》"叙事"、"载文"篇,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第42、50页。

书》堪称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文、史名著，为其后封建时代的史书所竞相师法而望尘莫及。继续探讨《汉书》在文学上的成就，确是很有必要的。

(《中山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

班固的思想和文风

郭预衡

一

班固不是汉代最伟大的作家，却是最正统的作家。在汉代文章的作者之间，班固的思想是最正统的，文风也是最“醇正”的。他的《汉书》以及赋颂杂文，都可称为大汉文章的正统作品。要看汉代文章的正统特征，典型的作家不是贾谊、晁错，也不是司马相如、司马迁，而是班固。贾谊、晁错、司马相如、司马迁诸家之文，或“疏直激切”、或“虚词滥说”、或“纵横变化”，大抵都带有先秦诸子的余风，都带有过渡的时代性质。思想固然“不正”，文风也并“不醇”。而班固，生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百几十年之后，风气移人，已经形成一套正统思想；所为文章，也就很富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时代气息和特征。

二

班固文章的这一特征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在赋颂之文。人们说到汉赋，一般都以司马相如为代表。司马相如自然是汉赋的名家和大家，不过，他的思想却不够正统。代表正统思想的赋家还是班固。人们说到班固，一般又只评论他的《汉书》，《汉书》

固然是他的主要著作，但是，他的《两都赋》也是很能代表他的思想和文风的作品。

班固的《两都赋》，萧统编入《文选》，是冠于诸赋之首的，这也许是出于偶然，但《两都赋》的思想，在诸赋之间，确是最正统的。班固在《两都赋序》里说：在他之前，汉代之赋，曾有“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又有“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这些作品，“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班固是要继承这一传统的。但他不仅继承这个传统，而且有所发展；不仅一般地“抒下情”和“宣上德”，而是更明确地为朝廷的决策进行说教。《两都赋序》在论述了“武宣之世”赋颂发达的盛况之后，又说道：

> 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

这里所说的作赋动机，和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相比，就显然不同。不是讽谕，而是说教。

此赋是从“西都宾”和“东都主人”问答写起的。当西都宾讲了一段长安旧制之后，东都主人便“喟然而叹”说：

> 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开口称是“大汉”，这口气就与前人不同。然后历述大汉之德，也和前人有些不同。尤其是讲东汉之德，他以为超过西汉。说是：

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詟水慄，奔走而来宾。“孝武”、“孝宣”，号称西汉盛世，但班固认为，其德不及东汉。这在当时，是个新的看法。王充《论衡》也有类似之说。但时人贵远贱近，对汉德之盛，估计不足。因此他又说：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牺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

于是，西都宾终被说服：

主人之辞未终，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

最后，西都宾读了主人之诗，乃感叹道：

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

由此可以看出，班固写这篇赋，是旨在歌颂“汉德”、宣讲“正道”的。

从司马相如到扬雄，赋家之旨，都是讽谕天子。曲终奏雅，已成一种程式。而到班固，则变为替天子说教，有些近似官方的文告了。这样的赋，今天看来，也许算是最死板的，但在当时，却是最合时宜的。思想是最正统的，文风是最醇正的，是最直接地为大汉王朝的统治服务的作品。

其次，班固文章的这一特征，也表现于“解嘲”一类的文章。汉代文人于赋颂之外，往往要写一篇发泄牢骚的作品，东方朔谓之《答客难》，扬雄名为《解嘲》，都属一类。这类文章，常是不满

现实,向往古代,身在汉朝,心怀战国。班固也写了一篇《答宾戏》,名目虽相似,命意却不同。《答宾戏》有序云:

> 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

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曾假设"客难"之言说:"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而"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耶? 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东方朔于"答难"中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他把自己官位不高归因于时代不同。扬雄的《解嘲》在解答嘲戏时也是说:"世异世变,人道不殊,彼我异时,未知何如。"这也是把"玄之尚白"归因于时移世异。对于东方朔、扬雄这样的看法,班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回答这样的问题,应该"折之以正道"。什么是"正道"呢? 这就是文章里讲的:

> 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牺农,规属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和,枝附叶著,譬犹草木之植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零落。参天地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

这里也是开口就称"大汉"。在班固看来,所谓"正道",也就是要讲大汉之德。大汉之德,是参天地而化育万物的。其德之盛,不仅超过战国,而且超过"牺农"和"黄唐"。在这样的盛德统治之下,人们

就只应如同天地间的草木鱼鸟，或“得气”，或“失时”，或“蕃滋”，或“零落”，一出于自然，不可抱怨。只应歌颂汉德，不应向往战国。

由此可见，自东方朔以来的《客难》、《解嘲》一类文章，本是作者假借主客问答而发牢骚的一种形式，可是到了班固笔下，则变为宣讲“正道”的文字，已经没有牢骚和不平了。但正是这样的文章，才更能代表大汉王朝的正统思想。

又其次，班固文章的特征还表现于他写的一首最下工夫的“颂述功德”的文字——《典引》。司马相如写过《封禅文》，扬雄写过《剧秦美新》。《封禅文》和《剧秦美新》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典引》是继这两篇文章而写的。但《典引》不仅是歌功颂德，而且是一篇“遵命文学”作品。此文有序说：汉明帝曾经派人问他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太史公论赞”有何看法，他对答之后，明帝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班固至此便说：

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臣固顿首顿首，伏维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无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

这里说得非常明白,《典引》之作,是秉承天子的“圣论”的。明帝批评司马迁之“贬损当世”,而称赞司马相如之“颂述功德”,这对班固是很重要的暗示:写文章就是不要“微文刺讥”,尤其不可“贬损当世”;而要“颂述功德”,尤其是要颂述当今天子之德。于是班固在《典引》里就一再讲“赫赫圣汉,巍巍唐基”,“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而且终以“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最能体现班固文章的特征的,还是《汉书》。《汉书》是班固秉承天子意旨而写的更主要的著作,也是具有“遵命文学”性质的。当然,《汉书》不是出自班固一人之手。《廿二史札记》说:“《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且有史迁创例于前,宜其成书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经四人手,阅之四十年,始成定书。”但尽管如此,《汉书》基本上仍是班固的思想和文风,体现着大汉王朝的正统思想。

班固在《汉书》中表达的正统思想,又不仅来自天子的“圣论”,也来自其父班彪的影响。班彪生当两汉之交,当隗嚣问及“纵横之事”时,他曾表示坚决维护大汉王朝的一统天下,而反对诸侯割据。认为“周之废兴,与汉殊异”。并著《王命论》,说明汉继尧统,得“灵命之符”。虽逢世乱,而不可作非分之想。其正统思想是相当典型的。在班固写作《汉书》之前,班彪已经写了《后传》,《后传》的思想和文风自然要影响班固,甚至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于《汉书》的某些篇章之中。

班彪的思想观点在《汉书》中表现在哪些方面,虽然不可确指,但是,《后汉书·班彪传》载有他对司马迁的《史记》的一段重要评论,却值得注意。他说:

>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这段话在班固所作的《司马迁传赞》中曾有重述,文字微异,大意全同。从这样的话可以看出班彪的史学观点,也可以看出班固的史学观点。这些话正是体现了班氏父子的正统思想的。他们批评司马迁,也正是因为司马迁违背了大汉王朝的正统思想。他们特别提到"货殖"和"游侠",这说明司马迁"序货殖"和"道游侠",和他们父子的分歧最大。这里不妨作个比较。即以《游侠列传》为例。

司马迁写《游侠列传》,对于布衣之侠,闾巷之侠,是尽情称赞的。他在序言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对于汉代之侠如朱家、郭解等,司马迁竟公然为之辩护。他说:"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郭解是曾受当代国法制裁的侠客,是所谓"天子切齿"之人。司马迁为之辩护,这是明显的和统治阶级对立的思想观点。但班固不然,他写《游侠列传》,尽废《史记》的原序而不用,另写序言,和司马迁的看法几乎针锋相对。例如他说:

> 古之正法:五霸,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霸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

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班固在这里评论游侠，是从春秋战国讲起。讲“五伯”，是指春秋之“侠”；讲“四豪”，是指战国之“侠”。就是说，在夏商周时代，政由天子，诸侯不得擅权；春秋之时，政由五伯，大臣不得擅权。至于汉代，像郭解这样的匹夫小民，居然擅生杀之权，这是不能容忍的。班固所谓“古之正法”，其实是“汉之正法”。汉自武帝以后，法网逐渐严密，对于游侠，实行打击。这样的“正法”，古代是没有的。

赞成游侠，还是反对游侠，在大汉王朝专制时代，是坚持正统思想还是反对正统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司马迁的非正统思想，正表现在这里。自从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在某些王国取得政权之后，便把游侠看作专政的障碍。韩非著论，就以游侠为国蠹，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厌恶游侠，由来已久。汉武帝对游侠郭解等人的打击，乃是地主阶级专政的现行政策。司马迁称赞游侠，称赞郭解，这是违反当时的现行政策的。这可能也是“贬损当世”的一种表现。但班固对于游侠所发表的意见，则和司马迁相反，尽管他也承认游侠的“振穷周急，谦退不伐”，值得肯定；但他毕竟认为像郭解这样“放纵”，则“杀身亡宗”，是罪有应得的。

班固的观点何以和司马迁如此不同呢？

这并非仅仅由于两人教养不同的缘故，最主要的是由于时代不同。在司马迁的时代，武帝虽然开始罢黜百家，统一思想；但在一个时期里，思想是并未统一的。独尊儒术就曾受到窦太后的抵制，任用酷吏也曾受到窦太后的抵制。儒术之尊，法网之密，是窦太后死后逐步做到的。因此，司马迁著书之时，还敢于为游侠说

几句话。但到后代,法网日渐繁密,朝廷对游侠就更不容忍了。这时有些人教训子弟往往以行侠为戒。例如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就说:“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样的人,“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马援这话值得深思,他对于“豪侠好义”的人,“爱之重之”,却不愿子弟效法,因为这样的人是政府官员所痛恨的。这就说明,在那个时代,谁要行侠好义,政府就要打击。像马援这样的思想在汉代后期并不是个别的。汉人诫子之书有两个基本内容,其一是遗令子弟不得厚葬,其二就是告诫子孙“保身全己”。例如樊宏、张奂、司马徽等人的“戒子书”就都属于后一类。

班固的《游侠列传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条件下写的。他对游侠的看法如此,也就不足多怪。这是时代特征,不完全是班固个人的思想和文风问题。

班固在《汉书》里的思想和文风最不同于司马迁的例子,亦即最代表他的正统思想的例子,就是《游侠列传》。此外,当然还有班固对“货殖”的看法,也和司马迁大异其趣。这里可不备举。至于《汉书》列项羽和陈胜于“列传”,不再名为“本纪”和“世家”,则主要是个体例问题。实际上班固对项羽和陈胜的看法,大致仍沿司马迁的观点,甚至连司马迁所下的论赞之语,班固也并未大改。但今天一般评论班马异同的文章和著作,常把这一点看作班固思想保守的主要表现,其实,这倒不是主要问题。

三

班固一方面是个正统学者,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博贯载

笈、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学无常师、不为章句"的"通才"。这是和当时某些寻章摘句的博士一流人物不同的。因此，他的文章和著作，尽管具有上述那种正统思想的桎梏，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他有时也能突破这种思想的束缚，表现了一定高度的史识和正义感。这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具体的事例就是尽管他承袭班彪的观点而批评了司马迁，但他对于司马迁的为人还是十分赞赏的，他对《史记》中的叙事和论断也是大部分沿用的。有的时候他甚至完全照搬司马迁的观点。突出的例证是他写《司马迁传》，几乎完全采用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这两篇文章是充满着司马迁对大汉王朝的不满情绪的。而班固以之入传，并未附以任何异议。他在传赞中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不能"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也是惋惜之语，不是讥讽之词。

《司马迁传》之外，在《汉书》里比较明显地赞同司马迁观点的文章，还是《李陵传》。

司马迁于《李广列传》后面曾附李陵事迹，但文字甚少，未能尽意。而班固写的这篇《李陵传》，则可谓完成了司马迁想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对于李陵的英勇和战功都是写得非常充分的，笔端也是饱含着情感的。从这篇文章看，班固对李陵的同情和赞美，可以说不在司马迁之下。例如写李陵"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之十日，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

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李陵就是在这样艰巨的战斗之后,由于矢尽援绝而降。班固写到最后,是十分痛惜的。

班固不但具体地描述了李陵的战绩,而且在具体的描述之后,还把所谓司马迁"为阿陵游说"的话重复载入:

> 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以当以报汉也。

班固引述司马迁的这些话,等于给前面所描述的李陵事迹作了一个总的概括,也等于用具体事实来证明司马迁的"游说"是完全正确的。

《李陵传》不仅重申了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而且是《汉书》中一篇可与《史记》比美的有血有肉的文章。不仅思想和司马迁相同,文风也和《史记》相似。关于这一点,前人也有论述。《廿二史札记·〈汉书〉增传》说:"《史记》李陵传附《李广传》后,但云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与单于战,杀伤万余人。兵食尽,会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余人。盖迁以陵事得祸,故不敢多为辩雪也。《汉书》特为陵立传,评叙其战功,极有精

采。并述司马迁对上之语,为之剖白。”又说:“《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魏禧谓固密于体,而以工文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这些话是讲得不错的。两篇传记确实都写得“慷慨悲凉”,“极有精采”。体现着班固思想和文风的另一方面。

班固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精采的文章来呢?这不仅是个行文技术问题,也是同他的思想观点大有关系的。班固在这两篇传记中思想感情表达得充沛,是同他对汉武帝的意见有关的。班固对汉武帝的看法有三点和司马迁一致。一是穷兵黩武,得不偿失;一是任用酷吏,刑罚太滥;一是迷信方士,大兴鬼神之祀。关于武帝之对待李陵和苏武,班固又都是有所不平的。他除了单为李陵立传之外,在《苏武传》中也让李陵进行了申诉。例如李陵对苏武说:

> 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

当然,班固是拥护大汉王朝的,他并非赞成李陵投降。但他认为,李陵之降,确如司马迁之所估计:“彼之不死,宜欲以当以报汉。”至于他终于降而不返,则是武帝族灭其家所促成的。班固对此,是很愤慨的。

在《苏武传》中李陵还讲过武帝“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的话,这也都是事实。《廿二史札记》讲到“武帝时刑罚之滥”时,引《杜周传》说:“武帝时诏狱益多,二千石系廷

尉者不下百余人,其他狱案一岁至千余章。”对于这点,班固也是不满的。也就因此,尽管班固对武帝镇压游侠表示同意,但他对于武帝任用酷吏夷灭大臣则是反对的。他在《酷吏列传》中就沿用了司马迁的序文和赞语,这说明他和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完全一致。

至于《苏武传》最后写“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为搜粟都尉”云云,也有班固的愤慨不平的成分在内。

司马迁对于武帝的“穷兵黩武”,在《史记·平准书》中是揭露得比较充分的。班固则主要表现在《武帝纪》中。不过司马迁在《平准书》里是历述每次出征的得不偿失的数字,不加断语而褒贬自见;班固在《武帝纪》里则是列举武帝的各种功绩、独于武功绝口不谈。对于这一点,《廿二史札记》说:“《汉书·武帝纪赞》论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举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世得遵洪业,有三代之风。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辞。”为什么会这样呢?“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故班固之赞如此”。说武帝“穷兵黩武”、“为天下大害”,这话未免过分否定了武帝制止匈奴贵族侵扰汉族的功绩,但武帝以后,有些人对于武帝之“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则确曾不满,班固的意见也确实如此。

再有,《武帝纪赞》说到武帝“举封禅”事,同《郊祀志》有些矛盾。可能是连类而举,未必也认为“焕焉可述”。因为《汉书·郊祀志》照抄《史记·封禅书》之文,对武帝之“尤重鬼神之祀”,曾

是深致不满的。《郊祀志》不仅全载了武帝所奉行的“鬼神之祀”，而且讲到后代帝王（如成帝）之“重鬼神之祀”者，也深致不满。在班固看来，这种迷信活动，是有失“恭俭”之德的。因此，在这方面，他的观点也同司马迁一致。在这些地方，《汉书》的文章是和《史记》比较接近的。

四

《汉书》文章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些篇章比《史记》更多学术气息，更带文献性质。这也是汉代正统文章的特点之一。

《廿二史札记》曾讲《汉书》比《史记》“增传”、“增事迹”以及“多载有用之文”，从其所举例证看来，班固之所以增者，大抵是从文献方面考虑的。由此也就形成了《汉书》文章的学术性。

例如《史记》于景帝诸子，列为《五宗世家》，而《汉书》则给十三王分别立传。对于河间献王，特别详述他的学术活动：

>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此传特点是略去一般生平事迹而专讲学术活动，并且着重叙其搜集图书、保存文献之功。像这样的人物和事迹，在汉代是有特点的，汉代以前是少见的。

再如《史记》有《楚元王传》，但司马迁只是载其封国生卒以及子孙承袭之事，《汉书》此传则增述元王少时曾与穆生、申生受《诗》于浮丘伯。及封楚王，又遣其子郢至长安，与申公仍从浮丘卒业。申公之《诗》为"鲁诗"，元王之《诗》号称"元王诗"，等等。像这样的传记，实质上等于一篇《儒林传》；像这样的文章，也主要是富于学术性质。至于某些传记之中，《汉书》比《史记》增加了许多"经世之文"，例如《贾谊传》增载《治安策》，《晁错传》增载《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等，自然也都体现着班固文章的文献色彩，这是不待言的。

再有，《汉书》还比《史记》更偏重叙述学术源流。

突出的例子是《汉书》特立"艺文"一志。《艺文志》的总序是关于学术源流的重要文章。文章写得极为简要，例如：

>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

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笈。

这里说得明白：此“志”之作，是取刘歆的《七略》而“删其要”的。汉人大讲学术源流的，始于刘向，继之者是刘歆。刘向曾著有《别录》，盖即《七略》所据。《艺文志》又据《七略》，是有来历的。从学术发展看，班固立为此“志”，是需要的，是反映这个历史阶段史书的特点的。但刘知幾曾有不同的主张，他一则指出《艺文》取刘歆《七略》，是“因人成事”（《史通 · 史志后论》）。再则认为：“《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史通 · 书志艺文》）刘氏从一代之史的角度立论，不免一偏之见；若从学术源流看，班氏此“志”是不可厚非的。从史书说，此“志”反映修史的时代特点；从文章说，此“志”更富有学术文章的特征。

《汉书》文章的学术气息还表现于突出地给专家学者立传。这里可以《扬雄传》为例。

《扬雄传》在《汉书》里占的篇幅很大，凡为两卷。在《汉书》的文人学者传记中，扬雄之外，只有司马相如也占两卷。这篇传记几乎全用扬雄的《自序传》之文，选载了他的重要文章并《法言》的篇目。传文突出了扬雄作为学者的一些特点。例如：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此虽本之扬雄的《自序传》，但班固对他的看法也正是这样。只要

一读此传后面的论赞之语，就可知道班固对扬雄这样的学者是十分赞许的：

> 赞曰：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这是一篇异乎寻常的论赞之辞。其中补充了"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具体事实。心性恬淡，身世凄凉，纯乎其为学者。"好古而乐道"，这是班固十分赞赏的。钱大昕认为"赞曰"以下都是"传文"而非"赞"，其实这里的论赞和传文是很难区分、也不必区分的。

《汉书》文章的文献性质又表现于并非学者的传记如《王莽传》这样的篇章里。

《王莽传》是《汉书》里最长的一篇传记，名为"列传"，实同"本纪"。如果是司马迁，对于王莽，是可能列入本纪的。因为王莽称帝十几年，实际当权二十几年，在历史上"新莽"实在是一个新的朝代。班固出自大汉王朝的正统观念，列为传记，是不得已的。

班固认为："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因此，在《王莽传》里，便不仅对于王莽的

“无道”和“祸败”详加叙述，而且对于他“诵六艺”、“文奸言”，也无不备载。例如一开始写王莽未得位时，曾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子弟：

> 莽父早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

从这段文字来看，王莽俨然是个温良恭俭的儒者，一点都不像“乱臣贼子无道之人”。

此传文章尤其突出的是备载王莽的书奏以及群臣颂莽功德之言。其中的鸿篇大作如孙竦为陈崇起草的颂莽功德一文，是最典型的效忠文献。还有各方面对王莽的歌颂，班固也备载其数字。如：

> 吏上书讼莽者以百数。
>
> 贤良周护宋崇等深颂莽功德。

又如：

> 吏民前后上书者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见者，皆叩头言：宜急加赏安汉公。

班固在罗列王莽的书奏和王公吏民上书的同时，又加上详细的统计数字，这就突出了这篇传记的文献特征。对于这样的文章，从前的衡文之士是不大理解、也不甚满意的。例如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评《汉书》时说道：

> 方望溪《书〈王莽传〉后》谓此传尤班史所用心，其拘抉幽隐，雕绘象形，信可肩随子长；而备载莽之事与言，则于义无取。……余谓莽僭号十六年，孺子婴居摄二年，又平帝五年，政皆由莽，合二十三年之事惟于一传见之，固不得不详尽。……惟备载莽书奏及诸颂莽功德之言……皆游辞谄语，令人发指，有污简牍。

方苞对于“备载莽之事与言”不满，李慈铭对于“备载莽书奏及诸颂莽功德之言”也不满，他们大概都认为这是有损于文章的“雅洁”、不符合“桐城义法”的吧？但我认为这正是《汉书》文章的一个特点。《王莽传》的佳处，正在有这两个“备载”的内容。如果不备载王莽之事与言，就无法看出王莽图谋帝位的全过程；如果不备载他的书奏以及别人歌功颂德之言，也无法看出王莽收买人心以及人情世态的实际情况。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备载“诸颂莽功德之言”，是有意义的。王莽之所以能够代汉而作皇帝，是同某些人的吹捧分不开的。而且当时歌颂王莽者，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成千上万；也不是等闲的人，而是包括诸侯王公在内。这些人在王莽垮台之后，有的又去歌颂刘氏了，但这既成的历史事实还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这也是“班史所用心”，不可不知的。

五

今人评论班固，一般都是说他思想保守，文章也不如司马迁的生动活泼。这是不错的。不过，评论古人，不可脱离其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司马迁生当武帝初罢百家之时，虽然说是独尊儒术，对于黄老之学也并未能禁止。因此，司马迁著书之时，他的思

想还是比较自由的。班固则不然，在著《汉书》之前，就曾因被诬告私改国史而下狱；为郎之时，明帝又曾下过圣旨，明确指出司马迁著书“贬损当世”，不是“谊士”。这对班固的思想压力是不小的。拿司马迁来同班固比较，是可以的。但是，只凭同异也难论是非，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 1 期）

《汉书》典雅优美的历史记述

许殿才

《汉书》作为史学名著，在历史文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它的语言典雅富丽，规范整饬。叙事则有条不紊，错落有致，颇有章法，传人则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别有匠心。既提供了汉代社会的广阔画卷，又绘制了传神的人物丹青。《汉书》的历史文学成就历来为文人学士所津津乐道，心往神追。它和《史记》一样，作为汉代散文的代表作，哺育了无数古文专家及文史爱好者。对中国古代史学和语言文学的发展，《汉书》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一　语言典雅，长于叙事

《汉书》的语言古拙典雅，有规矩法度贯穿其中，与《史记》跌宕隽逸，有飘洒的灵气跳跃在字里行间的语言风格，各有千秋。茅坤对此作过形象说明："太史公与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唯其以风神胜，故其遒逸疏宕如餐霞，如啮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读之，解颐不已，唯其以矩矱胜，故其规划布置，如绳引，如斧钊，亦往往于其复乱庞杂之间，而有以极其首尾节奏之密，令人读之，鲜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尝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则韩、白之兵也，批亢捣虚，无留行，无列垒，鼓钲所响，川沸谷平；乃若班掾则赵充国

之困先零、诸葛武侯之出岐山也,严什伍,饱餱粮,谨间谍,审向导,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其动如山,其静如阴,攻围击刺百不失一。两家之文,并千古绝调也。"[①]

班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的遣词用字皆经过千锤百炼,具有准确凝炼的特点。他叙述了王莽擅改币制后,接着说:"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②]寥寥数语即把王莽扰乱经济秩序的严重后果勾勒于读者面前。在《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中夹叙的"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为国家兴榷管之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与上官桀等谋反,遂诛灭",仅四十余字已述尽其一生大关节处,可抵一篇桑弘羊传。《五行志》中言武帝"师出三十年,天下户口减半",一语道尽武帝之过,可谓片言如约。另外,言宣帝时"狱刑号为平矣"[③],翟方进"号为通明相"[④],两个"号"字下得均有深意,非泛泛之言可比。

对于提高史书的文字技巧,刘知幾曾提出"用晦"。所谓用晦就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⑤]。这是压缩史书篇幅,提高文字表现力的重要方法。所谓用晦之道,正是刘知幾从《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优秀史著中总结出来的。《汉书》讲究锤字炼句,不乏用晦的精彩范例。班固记贡禹为河南令时,"以职事为府

① 茅坤:《茅鹿门集》卷一《刻<汉书评林>序》。
②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
③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④ 《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
⑤ 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

官所责,因免冠谢。禹曰:‘冠一免,安可复冠也!’遂去官”[1]。只此一事揭出,贡禹其人气节之高已不需烦言点明,以用晦之道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充实丰满,个性鲜明,这是班固文学技巧的表现。《汉书》记载王凤临终推荐从弟王音代已之事时,提示说:“音敬凤,卑恭如子,故荐之。”[2]一言写尽王音之谄媚无耻,且讥讽了王凤的无识、成帝的昏庸,真正做到了“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3]。此种用晦之法,令人叹服。

作为历史学家,班固是当之无愧的大手笔。在对历史状态、历史趋势及政治变故的描述中,班固表现了驾驭文字的功力。

《汉书》指次形势如指诸掌,《西域传》首对西域情况的概述是较好的例证。书中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用简明的语言把西域的政权情况、地理位置、四至规模以至山川形势,叙述得清清楚楚,读者虽无图籍在手,也可了然于心。

《汉书》叙述历史发展态势脉络清楚;首尾可稽,无紊乱纷杂之失。书中各志表的序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律历志》的序是这样写的:“《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

①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② 《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
③ 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

也。自伏牺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汉兴，北平侯张苍首律历事，孝武帝时乐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这里把律历学说的源起、意义及从古到汉的发展演化大致情况叙述殆尽，已相当一部律历学简史，使读者开篇就可获得对于此志的完整印象，是颇具章法的史笔。《食货志》对于从古代到王莽新朝的经济状况、经济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叙述得也是有条不紊，详略得中，堪称严整有度的古文佳构。

《霍光传》是《汉书》写政治变故的得意之作。此传头绪众多，但详而不紊，剪裁得法，人称《汉书》第一传。传中把武帝托孤、燕王谋反、昌邑王废立以及宣帝即位、霍氏败亡等事件写得跌宕起伏，有声有色，具有逼真的艺术效果。其"叙废立事，尤为出色。当是时也，以一弱龄女主端坐于上，众文武大臣罗列于旁，一昏庸废帝匍匐于下，挨次写来，亦既摹绘如画矣。而于废帝过失，只用奏议一通，绝不自为断语。更于群臣读奏议之中，间以一'止'字顿挫之，最后以一'可'字收束之，酣畅淋漓，逐字生动，千载而下，如见如闻"①。另外"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②。这一描写放在光传之末，既客观反映了霍光的不善自处，又揭示出其家族败亡的真正原因。

---

① 李景星：《四史评议·〈汉书〉评议·〈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②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

用细节描写交待政治变故的契机,这是《汉书》得心应手的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运用于此起到了提顿全传的作用。在记载徐生上疏始末,以见宣帝对霍氏之欲擒故纵之后,在此用似闲而实严的笔法为光传对霍氏败亡的铺陈描写作收结,极错综变换之致,尽开合放收之妙,体现出班固叙事撰文的技巧。

书中的《高帝纪》、《陈胜项籍传》、《楚元王传》、《霍光金日磾传》、《萧望之传》、《翟方进传》、《儒林传》、《货殖传》、《匈奴传》、《西域传》、《王莽传》及《刑法志》、《食货志》、《地理志》、《异姓诸侯王表序》、《诸侯王表序》、《百官公卿表序》等篇章在叙事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刘知幾曾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怿,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①《汉书》当此,是无有愧怍的。

二 刻画人物,栩栩如生

《汉书》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善于刻画人物是它的特点之一。汉代的历史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在班固生花妙笔之下,异态纷呈,妍媸毕现,无不以鲜明的个性站在读者面前,使人千载之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汉书》塑造人物成就突出的篇章有《窦田灌韩传》、《李广苏建传》、《朱买臣传》、《东方朔传》、《杨敞传》、《赵充国传》、《陈汤传》、《隽不疑传》、《刘辅传》、《匡张孔马传》、《王莽传》等。

对于政治家,《汉书》不但善于记述其事业大节,使其历史活

---

① 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

动始末得到清晰展现，而且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勾画出其人的性格特征及思想品质。《王莽传》是班固精心结撰的佳作，传中王莽的形象十分鲜明。班固通过他未窃高位时，侍王凤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为夫人，皆惊"等事，刻画了他的虚伪、矫饰。用义军起后"莽忧懑不能食……及事迫急，但为厌胜"等描述，揭示了他的昏庸无能。用临亡拜将，"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重，莽愈爱之，赐九虎士人四千钱"，反映了他的吝啬贪婪。用迷信谶纬，自欺欺人的一幕幕闹剧，反衬了他的愚蠢可笑。传中多处记载的迫使三子二孙寡嫂孤侄自杀，其妻因数丧子而涕泣失明等事，又可见其何等自私残忍。通过这一系列描写，王莽的丑恶嘴脸活现于世人面前，王莽其人千载以来受尽嗤笑唾骂，与班固对他人品的揭露是有直接关系的。

《汉书》擅长用讽刺笔法刻画反面人物。《陈万年传》中陈万年教子的场面具有戏剧效果："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通过这一场景把陈万年为人的谄媚奉迎、卑鄙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禹是班固精心撰写的一个封建官僚，他以博学通经起家，处处为己打算，一生无有建树，却爬至宰相高位，享尽人间富贵。传中首先介绍了他儿时喜观卜相之术，而且揣摩得精到熟练，"才能"由此得到显示，乃开始学习儒经。这个交待是观察他一生活动的眼线，综其一生，无非是以卜相之术揣摩人心，投机钻营而

已。他作官后，政绩无闻，却“内殖货财，”“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过着花天酒地的淫乐生活。为了固宠保位，他机关算尽。班固对他待人接物的描写，集中反映了他处世学问的“高深”：“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阳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悌多智，二人异行。禹心爱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也，禹见之于便坐，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宣未尝得至后堂。”对其学生尚且如此，对待他人不问可知。此公还非常有长远打算，年老之时，后事安排得也井井有条：先为自己请下了最好之地作为陵寝，又开口将女婿从边疆调到身边。他的小儿子还没当上官，成帝来看望他时，他“数视其小子”，直看得成帝心领神会，当场赐给了他儿子官做。因为争地他曾与国舅王根有所龃龉。当永始、元延年间日蚀地震频数，吏民争相上书指控这是王氏专政所致时，成帝就此事询问张禹。张禹明知这是吏民借机反对王氏专权，可他“自见年老，又与曲阳侯（王根）不平，恐为所怨”[①]，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大拍王根马屁。用他通经的特长，论证此事与王氏无关，为王氏化解了一次危机。自己也就此博得了王氏欢心，解除了后顾之忧。张禹形象的塑造；具有典型意义，这是封建贪官群体的一个缩影，是为人们认识封建政治提供的一个活教材。

《汉书》还通过人物摹写了人情世态。朱买臣早年“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即使打柴路上，也要诵读诗书。其妻难耐贫寒，又受不起世人白眼，乃另嫁他人。后来朱买臣做了高官，富贵还乡，

---

①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

气象大不相同,百姓修道,官吏相迎,好不威风,其故妻因之愧悔自杀。这个素材曾被作为描写世风人情的典型事例而编成故事、戏剧,在社会中产生了长期广泛的的影响。其实《汉书》中写朱买臣拜官前后,众人对他态度的对比才是摹写世态的绝妙文章:"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使。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①]通过买臣还邸众人不视,守邸见印而惊,众人不信,素轻买臣者证实后,还走疾呼,坐中惊骇,相推排列中庭拜谒等一系列动态,把人情世态反映得活灵活现,且入木三分。这样的文章真是生趣盎然,百读不厌。

《汉书》成功地刻画了反面人物,也热情歌颂了得到人民喜爱的正直官吏和节操高尚的英雄人物。书中所记朱云直谏之事非常感人:"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选,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上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②]朱云之

① 《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② 《汉书》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

言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朱云之节感天动地,鬼泣神惊。这不但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成帝之朝是振聋发聩的金石之音,而且在长期的中国社会鼓舞了千百个贞直之士,励节励行,慷慨赴死,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佳话。

韩延寿是汉代以仁政化民的好官。他宽仁忠厚,处处以身作则,下官有过失则痛自刻责,至有人愧悔自刎。他的"恩信周遍二十四县",在其治下,"吏民不忍欺殆",大有耕者让畔,邑人止讼气象。就是这样一个难得官吏,却因官场的勾心斗角而被处死。当其临刑之日,"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延寿不忍距逆,人人为饮,计饮酒石余。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莫不流涕。"[①]这一动人场面,不仅使延寿仁慈爱民的一贯品质得到升华,而且不啻对黑暗朝政的有力鞭挞,别有意味。

《汉书》中最感人的篇章当数《苏武传》。传中班固倾注满腔爱国热情,着力表彰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塑造了一个精诚爱国,公而忘私,利诱不为动,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形象。北海牧羊一段,集中描写了苏武"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的英雄气概:"(卫)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之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阅后令人肃然起敬。艰难困苦不能摧折苏武的意志,匈奴又请出苏武的故交李陵前来劝降。李陵尽管诱之以利,动之以情,反复

① 《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

劝说,无奈苏武心如铁石,毫不为动,表现了为民族大义宁愿肝脑涂地的凛然正气。以至于当苏武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分已死久矣!必欲降苏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时,李陵不禁感到无地自容而喟然长叹:"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苏武的崇高气节愈益放射出耀眼的光华。苏武在匈奴经历十九年磨难,终于要返回祖国时,班固又意味深长地描绘了李陵送苏武的景况:"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于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贯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主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①这一场面情景交融。李陵的大段表白不能说毫无道理,李陵的矛盾、痛苦心情,也不会使人无动于衷,但正是这些内心剖白和痛苦流露,进一步反衬出苏武爱国情怀的高尚和浩然正气的可敬,使苏武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汉书·苏武传》沉郁顿挫,慷慨生色,谱写了一曲千古绝唱。千百年来苏武的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有口皆碑,成为激励人们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三 广收文章,为书增色

《汉书》取得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收录了大量优秀文章。广收文章是《汉书》的特色之一。纵观历代纪传体史书,

①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汉书》所收文章可以独步古今。它所收文章品类众多,有诏书、对策、上书、辞赋、书信等,内容广泛,包括朝廷体制、政治得失、民族政策、经济措施以及规谏君主、歌功颂德、咏叹身世、抒发理想等。西汉一代有价值的文章,《汉书》几乎搜罗殆尽,说它是汉代文献渊薮是并不过分的。可贵的是众多文章经班固熔冶剪裁,与《汉书》文字汇为一体,不但无生硬杂糅、文气中断之弊,而且为《汉书》增添了文采,使其叙事简明而详实,立论义赅而理丰,传人准确而生动。以文代述、以文代论、以文代传是班固对丰富史学方法所作的贡献。

引用文章记述史事起到了事增文省和事文并茂的效果。昭帝死后无嗣,霍光等人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后又因荒淫无道将其废掉。对于昌邑王的过失,昌邑王传中不载,霍光传中也未直接记述,只是在废黜之时,通过群臣所上奏章逐条述出,恰到好处地点明了废黜的顺理成章。在废黜的重大场景中,奏章起到了提顿全局的作用,中间再插入太后听到奏章的反映,使这一历史场面绘声绘色,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效果较之在他处平铺直叙有霄壤之别。成帝与赵飞燕姐妹合谋毒杀亲子的残酷事实,也是通过臣子所上奏章详细讲明的。奏告此事如稍有罅隙,必遭杀身之祸,所以奏章不惮其详,叙述了谋杀过程,交待了当事人及见证人等,可谓铁案如山。此事如在传中客观记述,必然要作大量删节方合史体,这就容易使人产生烛影斧声之感,而且不会收到如此触目惊心的儆戒效果。书中引用鲍宣"民有七死七亡"的文章,是对黑暗社会现状的最有力揭露,胜却无数记实之语。

引用文章讨论重大政治及政策问题是《汉书》收录文章的最基本方式。这些文章使《汉书》对汉代社会的记述研究,更有系统性、理论性、权威性。通过贾谊的《治安策》,班固讨论了汉初社会

问题;通过汉末刘向诸人上疏,班固讨论了后妃外戚对政治的影响问题;《赵充国传》中屯田平羌问题的反复辩论,提供了一套完整、成功的戍边方略;严尤的《平匈奴三策》贡献了匈奴和战政策最有价值的意见;贾让的《治河三策》则是对黄河水利问题的权威论证。正是这些文章的采入,增强了《汉书》的史学权威地位,《汉书》较之《史记》表现出更多的历史特色,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班固对人的描写不拘一格,看重大节,一般只记其平生可述者,而不屑于生卒年月籍贯名号等。借文章写人是他撰写列传的手法之一。《汉书》中这类例子很多,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徐乐、严安等传都是。其中贺谊、晁错诸传还略记传主生平行事,徐乐、严安等传则除其文章外,几乎不叙行实。《徐乐传》介绍“徐乐、燕无终人也”之外,即刊载其论天下大患在于土崩之文。《严安传》除载其上书外,也只介绍了他是“临淄人,以故丞相上书”,“后为骑马令”而已。这种借文传人的方法反映了班固的别识鸿裁,因为有时文章既已刊布,其人大节既可概见,再细述琐事实属无谓。《司马迁传》只裁其《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两文,则司马迁之家世、之事业、之抱负、之为人、之学术均已一一坦露于世,较之别采材料,重加编次,效果不知好出几许。《杨王孙传》刊出其论裸葬之文,则其一节之善已足传诸百世,《贾谊传》载其《治安策》,则其忠心谋国的肝胆更加可耀千秋。这些都是以文传人的成功范例。

对于《汉书》的广载文章,曾有人加以攻击,认为是班固爱文不能剪裁,有悖史体。这种见解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大量文章的入载不但未影响《汉书》完美的整体结构,反而使记述手法更为丰富,所记历史更为生动传神。更何况采录的优美文章本身又增益了《汉书》的文采,为之增色不少。其二,《汉书》收录文章,并

非好博嗜奇，而是很有选择的，所收多为有益世用的好文章。在这方面，如果说司马迁爱文还勉强说得过去。《史记》对于贾谊，只收了其《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班固则补入了《治安策》，这是班固历史眼光胜于司马迁之处。对于引文得失，我们只能从其是否得当，而不能从其数量多寡上来加以判定。一部赅备一代史事的史书不应该忽视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了相当影响的重要政论及思想、科技文献，也不应该忽略足传千古的优秀文学作品。《汉书》收入这些文章，是尽了史书职责的。很多优秀文章借助《汉书》才得以流传至今，这是《汉书》对中华民族文明事业所作的一个贡献。其三，正如上文所论，《汉书》用文章写人物、写历史、写议论，也是为丰富史学表现方法所做的有益探索。

《汉书》还善于吸收民谣，增强记事效果，“前有赵、张，后有三王”①是人民对京兆地区贤明长官的赞颂；“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②则鲜明地反映了群众对义军的拥护和对王莽军队的唾弃。对于赵飞燕姐妹的恃宠跋扈，妒杀皇子，以至最后败亡，《汉书》用童谣“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③做了形象概括，对于成帝之无行，这也是个辛辣的讽刺。王莽居摄，刘崇与张绍联合起兵反对，兵败后，张绍从兄张竦（字伯松）感受连累，与刘崇族父刘嘉主动请罪，得到赦免。张竦又为刘嘉上奏，大献谄媚，博得王莽欢心，结果竟因祸得福，二人均被封侯。班固在这里用长安民谣“欲

---

① 《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
②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
③ 《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

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①]痛快淋漓地讽刺了张刘二人的无耻和王莽的愚蠢,真可以说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民谣的引用使《汉书》文字更为生动,增强了它的艺术魅力。

(《史学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

司马迁与班固

白寿彝

一　时代的特点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汉代的人物。司马迁是在西汉，班固是在东汉。

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与过去有显著的不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中占了支配的地位。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抗，成为基本的社会矛盾。

两汉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方面看，农业、畜牧业、水利工程都有很大的进步。冶铁、煮盐和纺织工业也和过去不同了。漆器工艺大不一样。造纸有了新的发明。造船工业大发展，已经能造很大的海船。

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由于生产的需要和长期研究的积累，一些相应的学科发展了。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在两汉时期，初步形成了它们的科学体系。这种发展，不是偶然的、零零碎碎的，而是在许多部门都有明显的进步。

从劳动力方面看，社会劳动中，主要的已经不是奴隶劳动力和农村公社劳动力了，而是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有比较高的劳

动兴趣的个体农民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一个是耕织结合的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这就是说,一个农民得到一块土地,老在这块土地上劳动,这块土地可以私有,也可以占有,由他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比奴隶的被迫劳动和村社农民在村社公地上轮换耕种的积极性高。农民和土地结合,也就为地主保证了劳动的人手。耕织结合的个体家庭内部,有了生产分工,在比较好的条件下,吃穿可以自给自足。这两种结合,对于农民的生产兴趣是有刺激作用的。个体家庭是分散的,不易组织起来,他们作为劳动力被地主阶级掌握以后,就成为封建经济不可抗拒的基础。这时候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当时的劳动力相结合,就使奴隶制生产力转化为封建制的生产力了。

两汉时期封建的等级所有制和两个阶级的对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矛盾中,都占有主要的地位。当时的地主阶级带有等级制的特点,农民阶级也带有等级制的特点。

地主阶级中,除了皇帝是最高地主以外,有封建贵族地主,称为世家地主,有豪强地主,还有高资地主。世家地主有比较高的爵位,如王、侯、君,都从国家那里受封,得到土地,也得到农民。这是封建贵族里很重要的一个阶层。他们中间包括宗室(就是皇帝的本家)、外戚、功勋和学术上的贵族儒宗。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全国的总户数和人口总数与诸侯王的总户数和人口总数(包括估计侯国的总户数和人口总数)之比,是四比一。东汉时候,全国户口数下降,诸侯王的户口总数和人口总数的比例上升到四分之一以上。世家地主都有特权,除接受国家封赏的土地以外,还用各种手段侵吞老百姓的土地,数量很多,但无

法查考。从两汉的记载看来，世家地主掌握全国户口中这样大量的劳动力，说明他们在地主阶级中，占有主要的支配地位。过去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废除“封建”，诸侯国依然存在，“封建”还是很严重的。他们有土地，有农民，收赋税归他们自己。世家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内很强大的一部分。

豪强地主包括六国之后和地方大族。六国之后在秦汉之间活动的能量很大。秦末农民起义时，好多六国后裔参加，而且夺取了农民军的领导权。六国之后原为贵族，秦灭六国，这些人身份转化为豪强，他们在地方上有势力，在政治上无地位。地方大族也是在政治上无地位，在地方上势力大。如东汉初年，四川一个地方大族，家奴有一万人。地方大族的土地、人民都不是国家给的，而是靠祖上传下来的。他们常常与封建贵族发生很多矛盾。另外在边境上也有豪强地主，如班固的祖先在北方掌有牛羊几千群，这不是地主，而是豪强牧主，力量很大。

高资地主也叫富人地主。家财的数量较大，一般要有约三百万才算高资。他们中多由于做生意，进行商业活动发财致富，赚钱买地，成为高资地主。他们在法律上无地位，受压。汉初规定他们不得穿丝衣，不能坐马车。但他们的实际活动能力很强。

地主阶级的等级制特点，从对土地的权力上说，皇帝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权力，世家贵族分享了皇家对土地的权力，豪族地主享有被皇家承认了的自己已有土地的权力，高资地主基本上是在非法的情况下取得了土地。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说东汉是“豪族政权”，这不确切。刘秀起兵时，有相当一部分“豪富”参加。“豪富”，是豪强和高资地主的总称。但刘秀称帝后，他们都转化为贵族，已经不是豪强地

主和高资地主了。而且他们跟"豪富"之间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农民中也有等级制。秦汉有二十等爵的制度。老百姓也有取得爵位的机会。爵位不同,身份也就有高低。司马迁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农民本身,因财产的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而且会有各种不同情况的分化。

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的特点。等级不同,土地权就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论述所有制形式,说"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是跟等级的所有制密切地联系起来的。《共产党宣言》说:"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往往遮盖了阶级的视线。

两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封建关系,但不像汉时成熟。两汉以后的社会变化,也不像汉时变化这样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三大流域内,才能基本统一,并在语言相同、地域接近、民族意识增长的条件下,形成了汉族。在这样的时代,学术文化方面取得了大的成就,产生了两个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以前,历史著作还没有与作者个人的名字结合在一起。《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传说为孔子删修,现在还有问题。《左传》至今不知是谁作的。《史记》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个人名义与成就结合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西汉建立六七十年,汉武帝当政时期。早在秦皇朝已灭,汉皇朝新建的时候,在统治阶级内部总是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秦皇朝为什么灭得那样快?汉皇朝为什么兴得这样快?楚的优势为什么很快失去?汉为什么能以弱胜强,得到天

下？到司马迁的时候，汉皇朝已达鼎盛时期，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秦皇朝那样强大，为什么二世而亡？政治家问，思想家也问。这个变化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汉皇朝今后怎么办？历史会怎样发展？这样思想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根据这个时期的特点，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秦汉这样的变化？

班固的时期不同了，已是东汉前期转到中期，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政局比较稳定，逐渐转入后来外戚、宦官当政的长期动荡局面。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他不但要从经济上、政治上，而且要从思想上、文化上统一。他提出：第一，思想上大一统；第二，皇权神授；第三，实行“三纲”。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已经明确。从汉武帝、董仲舒，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儒家思想的神学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套。在白虎观会议上，儒生聚会，皇帝亲自出席，听取各派辩论，皇帝自己决定是非，这是以教主的姿态出现。这说明，皇家提倡的那一套，到这时候已达到最高峰，达到强化阶段了。班固参加了白虎观会议，他承担的角色是奉诏写成一部《白虎通议》，把那些儒家的议论综合到一起，成为最后的定稿人。班固不是像司马迁那样，去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而是去答复如何维持目前的局面。他们承担的时代任务不同，因而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二　马班的异趣

司马迁是龙门（今陕西韩城）人，班固是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附近）人。今天我们看到的二十四史中，第一部就是《史记》，是司马迁著。第二部就是《汉书》，是班固在《史记》之后写的。《史

记》写了黄帝到汉武帝之间的历史，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几千年。《汉书》写了汉高祖刘邦到王莽之间的历史，共一百卷，包括二百三四十年。

《史记》有很大的创造性，它把过去《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所不能包含的材料，都包含进去了。过去基本上按年编，按时代顺序编，遇到无年月的材料就不编。甚至有的大事，年月不可考，也无法编进去。《春秋》、《左传》对一些历史人物，社会上不少的活动，由于年月不可考，写不进去。《史记》开创了新体裁，有本记、表、书、世家、列传。

本记，基本上是编年体，也不完全是。内容是一些大事的总纲，也包括帝王个人的事迹。

表，有年表、月表，把各地区的政权，不同地区的活动或相互交叉的活动，按年月编起来，彼此参照。

书，是社会制度、专题的综合论述。

世家，是记诸侯国家或如孔子之类在历史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

列传，是记社会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

《史记》全书，规模宏大，远非《春秋》、《左传》所能比拟。有的体裁如“书”，是过去已用过的，但不是用于记载历史。司马迁结合历史，发展了这些体裁。

《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后来有很多人续《史记》，光是有名有姓可考的，就有十几个人。班固的父亲班彪就曾作过续《史记》的工作。

班固所处的时代是在西汉结束以后。《汉书》写了从西汉建国，经王莽失败，到光武继位，正好断代。他开创了断代史的新体裁。《汉书》一百篇中，有五十几篇用司马迁的《史记》材料，单是

列传就用了四十篇。世家没用。发展了书，改为志。后世人谈到重要的历史著作，都要谈到司马迁的通史和班固的断代史。马、班都有很大的贡献。

司马迁和班固在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但二人很不一样。因为他们二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一样，他们要回答的问题也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学风。司马迁写《史记》时对朋友说，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天，往往是指时势（在历史变革方面）和际遇（在个人关系方面）。"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历史的发展。中心是"通古今之变"，把古今变化的道理弄通，目的是为了将来。他要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班固是把西汉的事写出来，"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就是说，把西汉的世事整理出来，用五经的道理将上下二百年的历史妥贴讲通。

司马迁研究的是社会发展历史变化，这是他的主题。班固要旁贯五经，想要通过历史进行说教。他们答复的问题不同，所抱的目的不同。司马迁是要弄通历代变化，找出历史经验。班固是要通过历史说教，巩固皇朝统治。清代大历史家章学诚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迁书体圆而用神，班书体方而用智"。"体圆"是灵活运用，不拘泥。"神"，是传神，即发扬历史发展过程的精神。"体方"是规矩方正，"用智"，就是运用知识。这两句来源于一个典故，易经上说"智以藏往，神以知来"。"往"就是过去的事，"来"就是未来的事。章学诚说得很好。他对马班的区别，从形式上看，归结为"圆"与"方"。从内容上看，归结为"神"与"智"。

司马迁思想的中心在"通古今之变"，他的成就也在这点上，"究天人之际"，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也有迷信。"成一家之

言”,他做到了,在历史著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在“通古今之变”上,例子很多。如对于商鞅变法、吴起变法,传统上是否定的,司马迁却肯定他们的成就。对于秦始皇,西汉很少人说他好,认为正因秦坏,才有汉代。司马迁却说他“世异变,成功大”。这些例子都说明司马迁贯彻了“变”的思想。《史记》中到处有“变”的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十表中。十表中,每表前面都有一个短序,一般人不爱看,不大懂,其实这是《史记》的精华,体现了“通古今之变”的主要思想。每个表,基本上都表示了一个历史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楚汉历史、汉兴以后到武帝的历史等。每个表都表示出这段历史的特点。《汉书》不能掌握各段历史时期的特点,比较平板。

司马迁主张“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从开始原原本本追究,再看它的末尾,考察始末。从盛世能看到衰落的征兆,很不容易。如讲汉兴到武帝时,社会经济繁荣,但他说“物盛而衰”,说地主贵族腐化奢侈是衰象。汉武帝打匈奴得到胜利,匈奴跑了。司马迁记载时,虽不明说,却隐约写出汉的损失更大,老百姓吃亏受罪了。他认为用打的办法不能完全解决匈奴的问题。汉武帝晚期,山东各地方农民起义、暴动很多,司马迁如实记下来,言外之意是汉已出现危机,类似秦末情况。这是一般史学家不敢说的。后来,由于汉武帝改变政策,才缓和一些。这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解高明之处。

司马迁在讲历史变化时,很注意社会经济的关系、社会经济的重要性。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其本身所遵循的路子,不是行政命令能够勉强的。又说,人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总是受其经济地位所左右的。地位不一样,道德观念就不一样。他认为讲仁义是富贵人家讲的,老百姓没资格。司马迁这

样一些看法,使他接触到了真理的边缘。对于社会变化的原因,社会地位的作用这些社会的根本问题,他都接触到了真理的边缘。他甚至模糊地触及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当然司马迁不可能深入到真理的核心,不可能达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高度。他只看到事物的量变,看不到质变。有时甚至讲变,本是进步的变,还带有循环论的思想,对旧循环论的思想不能摆脱。但从史学史上看,司马迁的"变"的思想是光辉的思想,在当时能达到这样高度,已很不易。

《史记》中讲"通古今之变",除十表之外,还有三篇,即《货殖列传》、《游侠列传》、《伯夷列传》。《伯夷列传》还很明显地反对天命论。

班固承担的时代任务与司马迁有区别。他把司马迁创立的"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抛弃了,代替的是"天人感应"的学说,这是继承西汉末年兴起的阴阳五行思想,跟他编定的《白虎通议》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首先对汉代历史的看法与司马迁就不一样。司马迁认为汉代是从春秋、战国、秦、楚汉之争发展起来的。班固认为汉的传统是直接从尧那里来的,"汉承尧运"。他把历史发展按五行循环论去解释,把汉说成是继承了尧的传统,从而说明汉皇朝是承天命的皇朝,是上天决定的。照他的说法,东汉是西汉的继续,西汉是周的继续,不承认秦,也不承认王莽。班固认为秦与王莽的存在,好象年历中的闰月一样,不是正统,只是剩余的东西的拼凑,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小插曲。当然,刘秀是正统,刘秀得天下是天命,理所当然。《汉书》开篇就是讲汉高祖刘邦是得天命而做的皇帝。在《高帝纪》中记载有许多神奇的事情,而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没有。现在看到有一点,也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史记》中只是讲刘邦如何能干。《汉书》就强调天命。

《汉书》一百卷,最末一卷是班固自己的传。第九十九卷是王莽的传,他把王莽是摆在末位闰月的地位。《汉书》讲刘秀继天命,得天下,是汉室中兴,天命所归。这可见班固是想通过历史的说教,把现行秩序稳定下来。因此司马迁处理历史问题时表现的一些进步的观点,在《汉书》中被抹掉了。如讲“游侠”,《史记》区分“游侠”中的不同人物,颂扬那些路见不平、帮助受压迫人的“侠”,反对那些仗势欺人的“侠”。班固站在皇家的立场,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游侠”,一律认为非法。又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拥有物质财富的人,他们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司马迁作了说明,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而班固则无区别地反对一切发财致富的人。

司马迁和班固的政治态度不一样,历史态度也不一样。司马迁是比较客观地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态度接近科学,政治上向前看。班固的态度是拿封建道德教条为框框,用历史事实去适应那些教条,再拿封建道德观念去评论历史。他的指导思想是唯心的,政治上是保守的、向后看的。政治态度和历史态度的不同,是马班异趣中一个最大的区别。

马班异趣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时代不同。同一时代,也可以出现不同的人物。例如,同是在汉武帝时候,司马迁是进步的,董仲舒就不进步,开始神化政权。《史记·儒林列传》中的董仲舒传与《汉书》中董仲舒传不同,《史记》中根本不提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原原本本地都写上去了。又如,班固和王充也是同时代的人,班固比王充大几岁,同属于地主阶级,但王充著《论衡》,好多论点就是针对《白虎通议》的,是比班固高明的。因此,马班不同除时代原因以外,还可以从家庭出身和本身的经历上找原因。

司马迁在自己的自传中说,从祖上到他这个时候,家庭没落了。原来家里做过将军,军事上有名望,政治上有地位,后来逐渐没落。他本身更受到压抑。他到过的地方很多,从陕西到东南、西南和北方。接触面宽,眼界也宽。班固是豪族出身,祖上在北方有几千群牛羊,在当地地位高。以后进入宫内,皇帝让他祖父管理藏书。班固作为贵族公子,思想感情是与皇朝相通的,倾向于保护皇家的权利。因此,班固的思想、出身与司马迁和王充都是不一样的。

同时,思想意识方面的东西,也有一个积累过程,有传统影响。对于社会影响,它有相对的独立性。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可以评论六家的优缺点,拿出自己的看法,今天看,基本不错。他对司马迁影响很大。班固家里是儒学世家,他的父亲班彪著有《王命论》,认为,按天命刘秀应当做天子。

三　八书和十志

《史记》中有八书,即: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书。《汉书》中有十志,即: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志。

书与志是论述典章制度的,称为书志体。这是史书中很要紧的一部分,是从司马迁开始有的。八书中最精彩的是《平准书》。《平准书》讲的是社会状况、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河渠书》讲的是水利工程等。《封禅书》实际是讽刺帝王的宗教迷信,话说得不太明白,但显露出无神论的光芒。《天官书》把《史记》以前的天文学知识,特别是星宿的知识,作了汇集。他把天象分成五个大区,说明每个区有多少星宿,记载了相当多的恒星和彗星,留下

了一些日蚀的记录。在天文学史上,《天官书》有重要的地位。《历书》中历法讲得很清楚。但是,《史记》开创的书志体虽有光辉篇章,却很不完整,后来又有遗失。相对说来,完整的还要算《汉书》。

班固将书志体完善起来,他死前没来得及把十志写完,是他妹妹班昭和马续接着完成的。班固为史学上的有关学科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是很有地位的。有的为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历史地理各科的学术源流,提供了开创性的著作。十志的范围不限于汉代。自古以来的典章制度,包括传说,都写进十志了。好多分支科学都是从十志开始有了记载。研究两汉及汉以前的典章制度,必须要看《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特别是把十志搞清楚,才能搞清后世的典章制度。

要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及封建国家的作用,班固在十志中提供了很好的材料。现在研究历史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样长,封建国家起什么作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缺乏。前些年,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一伙就会给扣上"封建地主阶级立场"的帽子。但是,封建社会两大对立阶级地主和农民中,主要矛盾方面是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社会生产的主要是农民,农民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劳动者。他们是分散的,受剥削受压迫,不能形成国家。组成国家靠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他们是国家的组织者。这是唯物主义观点。

从十志中,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统治集团的作用。对于改变历史著作的内容有好处。《律历志》里面讲了历法和度量衡,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国家政治上发生了变化,往往也要改变历法。这些都是一般农民做不了的。汉武帝时办了一件大事,就是改了历法。从此以后,历法变得越来越精了。武帝时

制太初历，司马迁参与了这件事。秦到汉初的历法，以每年十月为第一个月，每年九月为年底。武帝时改为每年正月为第一个月，十二月为年尾。这是顺理成章的。过去逢到闰月多加在年末，这时也改为闰月放在哪月合适，就放在哪月。这件大事，封建国家是起了作用的。当然，那时对历法也还有些迷信的说法，这不是主要问题。

《礼乐志》主要是讲行礼，包括穿衣、使用器具、修坟、乐器等等，后来什么都有了，都规定了等级，清楚地体现了成套的封建等级制。皇帝使用的东西，别人不能使用，在皇帝坟上抓一把土就是罪大恶极。

《刑法志》。刑法，是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统治的暴力工具。违法就要判刑。

《食货志》。食，就是吃的。货，不只是货币，首先是穿的，其次是别的必需品和货币。《食货志》主要讲男耕女织个体经济问题，也包括商业交换等。

《郊祀志》讲祭天；祭祖先，这是讲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

《天文志》是天文知识。

《五行志》主要是用迷信解释一些不常见的自然现象。但所记的异常现象，还是珍贵的资料，可供有关方面的参考。

《地理志》记载了禹贡以来直到两汉的地理，是历史地理的沿革记录。

《沟洫志》记修水利、治黄河以及各地灾害情况。在这方面，封建国家发挥了很大的社会职能。比如，黄河决口了，要修几百里大堤，靠分散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是不行的。还得靠封建国家来组织。当然，农民是修水利工程的劳动力量，没有农民是修不起来的，但是组织的还是封建国家。

《艺文志》把西汉末年皇家图书馆保存的藏书名称、作者、卷数，分门别类讲清源流。这是现存最古老的一部目录书，也是学术史的最初的雏形。

班固在十志方面的贡献，超过司马迁。班固时所见的典籍、材料，比司马迁时，内容要丰富。班固的十志，在体例上，吸收了司马迁的成果而比司马迁做得更好些。但从思想性看，如《平准书》，司马迁要高于班固。

四　寓论于史

司马迁长于寓论于史。这在历史文学上，历史写作上，给我们开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在许多地方不是直接说出他的观点，而是把人物事迹、历史进程以及各种问题写出来以后，让读者看到事实原委，最后，由读者做出评价和结论。这是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往往看到一些文章，事实材料还没有写清楚，就笔锋一转，“由此可见”，“显而易见”，使读者感到“由此”不下来，“易见”不到，有点强加于人，态度粗暴。应该学习司马迁，让历史事实说话，作者不要站在前面大声吆喝。

司马迁有些文章很好，说服力很强。如在《李斯列传》中，写李斯“少年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后来他到仓库里，看到“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叹气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司马迁是用这段小故事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他不过是想找个好地方，过得好。如果找不到，就凑合着过。一切为了“自处”。这说明此人思想低下，眼光短浅。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后来李斯和赵高合谋立二世，“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

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直到要腰斩咸阳市,在刑场上,还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都是在最紧要的关头上,李斯念念不忘的全是“自处”的利害。司马迁对这些细节的描写,表现出在一定的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

从《李斯列传》中,还可以看到李斯听从赵高而立二世,像这样的天下大事,两个人就决定了。这使人感到专制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毒害。

《万石张叔列传》中,写他们父子五人都作了官,非常谨小慎微。万石君的小儿子庆官为太仆。一次,为皇帝驾车,皇帝问他车有几匹马?他都不敢立即答复,而是“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司马迁写道:“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司马迁这样描写,是为了说明他们的恭谨对于他们自己做官很有好处。这反映当时朝廷上的一种不健康的政治气氛。

《史记》写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很生动,使人读后留下深刻的印象。

司马迁善于用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写他要写的历史问题,从而表达他的深刻的寓意。如在《淮阴侯列传》和《萧相国世家》中,对比韩信和萧何。司马迁认为韩信精于用兵而疏于自全,自以为能而有功,对刘邦不警惕。刘邦在定赵、燕后,袭夺韩信、张耳军,韩信并未警惕。定齐以后,韩信请立为假王,刘邦发怒,韩信仍不警惕。灭项羽后,韩信由齐王徙为楚王,还未觉察危险。甚至他当淮阴侯的时候,还可以跟刘邦有这样的对话:

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

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

上曰：于君何如？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

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

因此，他就终不免于被害。萧何则不同，很早就意识到刘邦对自己的猜疑了，千方百计地使刘邦不感到自己有什么野心。而正是由于萧何随时考虑如何解除刘邦的疑忌，才能使自己保全下来。司马迁有意把韩信跟萧何对着写，显示了两人历史的不同特点，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刘邦统治下的政治倾向、政治气氛的一个重要方面。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这个评价是很公正的。

——在北京六所高校历史系联合学术讲座会上的讲话。

陈其泰、赖长扬记录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史资料》1979 年第 2 期。今选自《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

赵光贤

《史记》成书后，最早对它做出批评的人大概要算班彪、班固父子了。《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有这样的评论：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按指孔子)：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后汉书·班彪传》述彪对《史记》的评语是：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两段文字，大同小异，班固的话当然是根据其父的话，他们的话虽是批评《史记》，其实是批评司马迁的思想。

过去读《史记》的人，多不同意班氏父子这样的评语，但都语焉不详，本文拟就班氏父子提出的三点作进一步的探讨。除了不可避免地重复前人的话外，也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一 先黄老而后六经

这条指摘是根据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自序对于“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都论述其优缺点,最后推尊道家,其言曰:

>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以“虚”为常道,以“因”为君纲,以神为生之本,这都是黄老家言。

>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与此比较:

> 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这种议论在汉初黄老盛行之时,是不足怪的。但是这些议论,《自序》中明明白白地说是司马谈的。“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

元封之间",这太史公当然是指司马谈。下文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更可证明《论六家要旨》的不是司马迁。班氏父子不察,竟误以《论六家要旨》为司马迁之言,真是张冠李戴。

以下我们从《史记》中举出一些对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反证。

《史记》的体裁,列帝王于本纪,列公卿大臣于世家,列一般人物于列传,这是有等级性的。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自序》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列老子于列传,《自序》只有十字:"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与韩非同传,显然他是扬孔而抑老,这是反证之一。

《孔子世家》赞先引《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后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这几句话可见司马迁对孔子的崇仰心情。又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尊孔子为至圣,不独非老子所能比,连五帝三王都没有得到这个美称,这是反证之二。

司马迁在《自序》中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先人有言”指其父司马谈临终时命他继续作《史记》之意，他不敢辞。而《史记》之作并不仅仅是记事，而是要“正易传，继春秋”，这至少是司马谈的想法，而被他接受了的。他对壶遂的问话，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这是他谦让的话。他在答壶遂时引董仲舒的话很多，而董仲舒是讲《公羊春秋》的大师，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司马迁引董仲舒的话答壶遂，其意旨很明显，就是作《史记》，以继《春秋》。这是反证之三。

司马迁是儒家，认为儒家应当行孔子之道，因此对于曲学阿世之徒非常有反感，常于文中自然流露出来。他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

> 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

关于荀卿，他说：

>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从这些话里，可见司马迁感于儒道不行而发的慨叹。在《叔孙通传》以鲁两生与叔孙通对比，讥讽叔孙通曲学阿世、用意亦同。凡此都可见司马迁尊崇儒家的思想。这是反证之四。

司马迁著《儒林列传》讲述汉兴以来,儒学由衰而盛,其序曰:

>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从这段言论,可见司马迁对战国以来,儒学由盛而衰,汉兴黄老之言盛行,至武帝时儒学又由衰而盛,深有感慨。所以在这些篇序的开头就说:"余读功令(按指武帝时下的法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表示儒学经历过坎坷,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几乎中绝,到武帝时居然又复兴起来,他是多么高兴。这是他轻六经、重黄老的有力反证之五。

《伯夷列传》开篇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六艺是儒家经典,也是最古的史料,孔子用以教学生。

《滑稽列传》首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司马迁于《滑稽列传》中为淳于髡、优孟等人作传,而首引孔子的话,用意何在?这表明淳于髡之流能以滑稽语言讽谏君主,使之改过,往往胜于正言直谏,"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合于六艺,可为儒家之羽翼。这是反证之六。

《货殖列传》首引老子之言而驳之(详见第三节),这是反证之七。

孔子主张德治,反对法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司马迁相信孔子的话,他在《循吏列传》序中说:

>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在《酷吏列传》序中也有类似的言论,这都说明司马迁是儒家,此班说反证之八。

从上举八项反证来看,班氏父子批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是完全错误的,今有人受其谬说的影响,认定司马迁是道家可以迷途知返了。

二 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班氏父子这一条指摘,本于《游侠列传》,传首有长序,以游侠与儒生对比,班氏只看文章表面,司马迁的真义并未读懂,以致发生误解。下面试将《游侠列传》摘要加以解说:

>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按此指史书),固无可言者。

开篇引《韩非子·五蠹篇》二语,从法家的观点看,儒与侠都犯法禁,二者皆为韩非所讥。但学士即儒生往往见称于世,而任侠之人则多默默无闻。下面再分析儒生也并不一样。有的儒者“以术

取宰相、卿大夫”，暗指叔孙通、公孙弘之流，能阿谀奉承世主以取高官厚禄，并不是真正的儒者，所以说“无可言者”。

>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蔬)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真正的儒者如季次、原宪，是颜渊一流人物，“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虽然终身穷苦，但他们死后四百余年，弟子们还思念他们。司马迁将二种儒者加以比较，显然他推崇后者，而鄙弃前者。

>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以游侠与季次、原宪相比较，其行动往往“不轨于正义”，但“言必信，行必果”，正是孔子所称道的。至于“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使将亡者存之，将死者生之，“而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正是游侠的可贵之处，不能一笔抹煞。以下司马迁又借题发挥他的愤慨，他历举古时“有道仁人”，如舜、伊尹、傅说、吕尚、管仲、百里奚、孔子等人，都曾有不幸之时，遭逢困厄，“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这是为他自己发牢骚。下文又以有德的人与无德的人作对比。什么叫有德？他说：

>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以)飨(享)其利者为有德。”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

> 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鄙人指一般人，他们认为有利就是有德，什么叫仁义？有利就是仁义。司马迁愤慨当世是非颠倒，义利混淆，所以同意《庄子·胠箧》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是愤世嫉俗之言。下文说：

>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

这全是反话。因为乱世里没有什么仁义，没有什么是非。这样看来一些儒生读书，自命清高，而穷困一生，真不如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下交征利”，还有什么仁义可说，所以他说：

> 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语矣。

这就是说，从表面上看来，真正的儒生若季次、原宪，穷困一生与“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不能相比。司马迁也是儒生，即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文字上同情游侠，实际上是为儒生鸣不平，也为他自己发牢骚。所以我们读《史记》不能只看正面，还要看反面，才能理解司马迁的真义。班氏父子读《史记》，看游侠受到称赞，就认为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那真是根本不理解司马迁。

三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史记·货殖列传》与《平准书》讲的都是汉代经济史，但其

中心思想与《游侠列传》是一贯的。我们读《货殖列传》应当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司马迁承认自秦末大乱之后，经过文景用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到武帝时，经济恢复战国时盛况，并且有所发展，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发达到一个高峰，这是大势所趋，不可违反。所以在传首引老子言"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之后，立即加以反驳说："必用此为务，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说明司马迁根本反对老子的幻想，所以他是反对道家的。司马迁认定社会总是前进的，生产是发展的，农、工、商各业必定随着人民的需要而与时并进。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违反。所以他说：

>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经济生活自然向前发展，统治者最好是因势利导，而不能与之争。老子的开倒车想法，就是要"与之争"，那是最坏的。人民要生活，统治者更是穷奢极欲，农、工、商、虞各种生产活动不能禁止，所以他说：

>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按此指物价），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是说，人们从事生产，流通之业，是符合"道"与"自然"的，不是人主用行政命令强迫能得到的。他并且进而说明其理论根据。

他说：

>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
>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
>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这就是说，人的天性，就是为了生活，为了满足嗜欲，用各种方法追求富和利。于是他列举古之名人，如管仲在齐，范蠡在陶，白圭在周，猗顿、郭纵、乌氏倮等无不致巨万，比于王侯。“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除了商贾之外，地主阶级也兴盛起来。

>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按此指地主）、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此字衍，《汉书·食货志》无户字）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此下有错简，删）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这是没有封邑的地主阶级不劳而获、专以剥削农民致富的非常形象的描写。这在西汉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总而言之，汉代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无不孳孳谋利，司马迁如实地记述下来，认为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有一个问题，即司马迁对于上述情况是

不是满意呢？应当说，不满意。他在《孟子荀卿列传》序的开端就说：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呼！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这几句话表明了司马迁的根本思想，继承了孔孟，反对自天子至于庶人，地位虽不同，好利争利却无区别。天子影射汉武帝，在《平准书》里详叙武帝穷兵黩武，豪强兼并，民不聊生之状。他说：武帝初年，

……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其后汉数伐匈奴，形势又变：

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结果必然使政治日趋腐败，于是：

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固（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

其时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

> 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其费以亿计……而富商大贾或蹛(滞)财役贫……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其后连年用兵，府库空虚。元封元年以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汉书·食货志》作"大司农")，管理天下盐铁，禁止郡国商贾冶铁煮盐，完全归国家经营专利，"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为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总之，武帝一朝，官家与商贾争利，人民遭涂炭。司马迁不敢公然加以反对，只是照事实直叙下来，其意自见。《平准书》以引卜式之言"烹弘羊，天乃雨"作结，戛然而止。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皆史家于叙事中寓论断法也。"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当时兴利之臣的作法是不赞成的，特不敢公然反对而已。

司马迁因谏李陵降匈奴事而被刑，是他一生中最痛心的事，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把他满腔悲愤之情尽情宣泄出来。当时他的《史记》还在撰写中，否则他是会自杀的。武帝时买官赎罪，公开进行，如果他有钱，他很可能不受刑而出狱，可是他苦于"家贫不足以自赎"，这使他非常痛心。因此他对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富商大贾的致富巨万，存在非常矛盾心理。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又认为像武帝时"上下交争利"的现象是危险的，是不符合儒家的治国之道的。特别

是联想到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那些富商小贩都能坐致巨万，而自己是读书人，又是天子的近臣，“太史令”的官也够高贵的，但是俸不过六百石(《自序》《索隐》引《博物志》)，不要说不能与富商大贾比，也不能和种田的秦扬、掘冢的田叔、博戏的桓发、贩脂的雍伯、卖浆的张氏、洒削的郅氏、卖胃脯的浊氏、马医张里等人比，他从这些人得出结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侯同乐”。这就是说，富贫不是天生的，在于会不会谋利赚钱。司马迁说这话显然是在发不平之鸣，这是反语，必须从反面看，才能理解司马迁的心情，认识他的思想。班氏父子只看文章的正面，不会看反面，当然是不能理解司马迁的。

(《史学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隋唐《汉书》学的发展

瞿林东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人们都非常熟悉：马、班齐名，《史》、《汉》同辉，赞誉者蜂起，仿效者不绝。其实，《史》、《汉》的命运毕竟还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隋唐之际，《汉书》研究成为显学，而《史记》研究却大不如前者。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突出地表现在涌现了一批专治《汉书》的学者。

隋朝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被称为"汉圣"，足见其研究《汉书》功力之深。当然，超过"汉圣"的人还是有的。学者杨汪曾经问《礼》于沉重，受《汉书》于刘臻。隋炀帝时，杨汪任国子祭酒。据《隋书·杨汪传》，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由此亦可证明杨汪学术之精深。炀帝时期有位光禄大夫于仲文，曾任"右翊卫大将军，参掌文选事"，亦撰成《汉书刊繁》三十卷。隋朝《汉书》学的泰斗，还应算是萧该和包恺，炀帝大业中，萧、包二人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可谓盛况空前。

关于萧该，据《隋书·萧该传》记，隋文帝时，他被"拜为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音义)》及《文选音义》，咸为当

时所贵”。萧该的《汉书音义》,看来也是属于发愤之作。

关于包恺,是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王仲通,《隋书》无传。《隋书·韩擒虎传》记:王仲通,朱崖人。其兄王万昌于隋文帝仁寿初“作乱”,旋败;俄而“仲通复叛”,亦被“讨平”。包恺的《汉书》学知识,主要来源于王仲通。

萧、包教授《汉书》,弟子数千,门庭若市,堪称隋朝《汉书》学的魁首。

唐初,《汉书》学继续发展。唐高祖时,曾任廉州刺史与鄂州刺史的颜游秦撰《汉书决疑》一书,成为唐代《汉书》学的开山。颜游秦是著名学者,颜师古的叔父,所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

颜师古既受叔父启迪,乃继承家学,钻研《汉书》及前人研究《汉书》成果,终于成为唐初《汉书》学的一代宗师,且对后世《汉书》学的发展亦有深远影响。颜师古注《汉书》,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一年,据《旧唐书·颜师古传》记,“时(太子)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颜师古的注《汉书》,用力至深,注本“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时人谓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极为恰当的。

唐太宗至唐高宗时期,唐初的《汉书》学发展到它的极盛时期。据《新唐书·儒学传》记,“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皆名家”。内中,秦景通与其弟秦景晫“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如此看来,当时的《汉书》学,不仅涌现了一些著名学者,而且已形成了若干学派。隋朝的萧、包,唐初的颜、秦,都可视为突出的学派。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发展，在当时的封建知识分子中是有广泛的基础的。萧、包门人数千，颜家叔侄相承，秦氏兄弟齐名，皆致力于《汉书》学。这些，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人热衷此道。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又是得到当时某些统治人物的重视和支持的。杨汪任国子祭酒，隋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萧、包讲学，门生以千数，没有统治集团的支持也是不可能出现的。颜师古注《汉书》，更是当朝太子支持的；注成之后，又得到当朝皇帝唐太宗的赏识。敬播注《汉书》，则是在唐太宗的重要辅臣房玄龄的具体指示之下进行的。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物是十分重视《汉书》研究的。

那末，为什么当时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对《汉书》这样感到兴趣？《汉书》学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的人并成为显学，而《史记》却“传者甚微”？唐初的历史家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作了回答的。他们认为：

> (司马)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讫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至后汉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讽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家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故断自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合为十二纪、八表、十志、六十九传，潜心积思，二十余年。(《隋书·经籍志》)

《隋书》作者的这些议论，不是没有根据的。班固继承其父班彪

《王命论》的“汉德承尧”的思想，认为“汉绍尧运”，批评司马迁是“私作本纪”，把刘氏王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间”。可见，唐人是窥见到班固的这一主旨的。

《汉书》作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始祖，它的产生是由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其中主要之点在于：它是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需要和产物)。但是，从著述者的主观认识来看，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条件，即“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每一个朝代都按照《史记》那样去撰写通史，都一无例外地从黄帝写到当今。因此，随着统一的封建王朝的建立，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的巩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等等，势必要求出现“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于是《汉书》继《史记》之后应运而生。它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若因为司马迁以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间”，就似乎是小视了刘汉王朝；所以必须“断自高祖”以体现“汉绍尧运”，这就未免太荒谬了！班固的这个主旨，正是迎合了封建皇帝“唯我独尊”的政治需要。反之，若是按照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写法，岂非每一个新的王朝的历史都得“编于百王之末”了。这是封建皇帝所不肯甘心的。正因为如此，魏晋以来，虽有“三史”(即《史记》、《汉书》、《汉纪》)之学，然则《汉书》逐渐显要，《史记》“传者甚微”，这是毫不足怪的。

隋唐之际，《史》、《汉》的这种不同的命运，即便在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的笔下，亦不例外。刘知幾在《史通》中批评司马迁《史记》为体不当，撰述繁琐，“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也”。在他看来，《史记》真是一无可取。可是刘知幾对于《汉书》的评论却完全是另一种口气，他写道：

>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刘知幾对隋唐之际《汉书》学之所以成为显学的一个理论上的总结。

今天，我们是把《史》、《汉》并提，马、班同列的。作为著名的史书，它们都有自己的优点；作为古代史学大师，他们也都有本身的长处。如班固那种反对把本朝历史“编于百王之末”的历史学观点，是应当摒弃的！

（《历史知识》1980 年第 5 期）

刘知幾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

许凌云

刘知幾是我国唐代一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其理论之精要皆荟萃于《史通》中。其间，几乎贯穿全书，占有关于全局地位者，是关于纪传史的评论。在纪传史评论中，他尤其瞩目于《史记》、《汉书》两部名著，其议论不厌其详，时寄赞扬之情，常有规过之语。本文仅就刘知幾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略加评述，试图以小见大，从中窥见其史评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

一　溯源流，颇有源流倒置之嫌

说到纪传史的源流，司马迁创例于前，班孟坚因袭在后，源流分明，人所共知。作为史学理论家的刘知幾，不该是源流莫辨的。他曾经说过：

>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荀悦、张墦，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①

① 《史通·二体》。

刘氏将唐以前史体归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又以编年、纪传为正史二体。对照史学发展的实际,六家、二体不能概括古今史籍,故其论未得其宜,史界同人曾有专文布世①,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刘氏上述的一段议论倒是十分清楚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纪传体史书中,《史记》是源,《汉书》是流。他也正确指出《汉书》"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②。由此看来,他并未割断《史》、《汉》联系,明明白白地承认《史记》创例于前,《汉书》因袭在后。不过,他在叙述六家之后有个小结,说"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③。因而有《二体》篇,所言二体,实指班、荀(悦),声言"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这样就把《汉书》提到纪传史之祖的地位,而曾被他肯定的纪传史之祖《史记》则说成"其体久废"了。这实际上是贬低了《史记》的历史功绩。况且,明言肯定"班、荀二体",即是肯定断代的纪传史和编年史,而把纪传体通史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这就是刘知幾对纪传史源流的实际结论。由此观之,刘知幾虽不曾明显地抹杀《史记》的创例之功,但从其含糊其辞、自相矛盾的叙述中可以窥见他不得不言子长,而实际属意于孟坚的思想倾向。

如前所述,从纪传史源流看,马迁创例,班固因循,这是不可改易之史实!若论两家之功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当代著名史家翦伯赞认为纪传体是司马迁的"伟大的创造"和"不朽之功",而"班固的《汉书》,不过《史记》的拟作而已,又安能望《史记》之

---

① 瞿林东《读〈史通〉札记》,《史学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
②③ 《史通·六家》。

肩背?"①这样看还是比较公平的。

浦起龙按云:

> 以"左、荀"等字当"编年"字观,以"班、马"等字当"纪传"字观,会此替身,乃得具解。……错举多书,总归二体。盖揭二体之两行,非评诸书之优劣也。②

这样似乎把上述的疑虑解释清楚了。也许不少研究者读到浦按而信以为是。其实不然!除前言《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已经有力证明刘氏轻视史迁外,《二体》篇叙述编年、纪传二体的关系时,亦表明了刘氏对史迁创例的态度。他先言左氏编年,难以"括囊靡遗",再言班固纪传矫此之失,"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又言荀悦编年,厌纪传"迂阔","又依左氏成书,剪裁班史"。这里至为明显地遗漏了司马迁之纪传史的《史记》。这决不是刘知幾无意的疏忽。其实,班固是承史迁之成例,只是"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那就决不是"设纪传以区分"的事,因为司马迁早在他以前已经"区分"完毕,这不是把纪传史创例之功归在班氏门下,而将其真正的始祖迁于祧庙吗?

浦起龙相当巧妙地搞了个"以固例迁"的夹释,想使班、马平分秋色,亦掩饰其偷梁换柱之嫌。即使如此,亦源流倒置。既然叙述史体演变之源流,就应该源流分明,就不能漏掉司马迁,舍此便不能说明问题。关于史体演变之源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论述的脉络清晰。他说:

① 《论刘知幾的史学》,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② 《史通·二体》。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①

在这里,他指出了《左传》与《史记》的关系,亦即编年、纪传二体的关系,也指出了《史记》与《汉书》的关系,即纪传体的源流问题。试想,抛却《史记》这个重要环节,能把编年、纪传二体的关系及其源流说清楚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刘知幾如此处理并非不知道《史》、《汉》孰先孰后,孰祖孰宗,孰源孰流,在他的思想上确实认为《史记》家其体之失太多,因而对纪传体通史多所批评。他说:

寻《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②

历史地看问题,刘知幾所言也有根据。在刘氏之前,还未出

---

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

② 《史通·六家》。

现第二部像样的通史之作，而“非芜即缺”的《通史》不但未为通史家增辉，反而损其荣誉，成为“述者所宜深诫”的教训。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讨论过《通史》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学者企图规模《史记》，但“无其笔力”，这是颇有道理的。但刘知幾因《通史》而罪及史迁，抛弃纪传体通史，“欲令作史者于纪传家以断代为正”①，这就贬低了纪传体通史的历史意义，由之“别家于班，数典忘祖”，不免有源流莫辨之嫌。

现实的未必是合理的。《汉书》以降，断代成风，犹如刘氏所言“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确是实情。究其原因，一因断代为书可避免像司马迁那样把高祖“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状况，易于为一姓王朝服务，适应了当时统治者的愿望和要求；二因断代为书易于成功。刘知幾评论《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皆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②便是从这两点考虑的。“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即指前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即指后者。因此之故，刘知幾推重断代史是不足怪的。章学诚说：

>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③

这便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论证了断代成风的原因。但章氏接着指出：

---

① 《史通通释·六家》。
② 《史通·六家》。
③ 《文史通义·书教》(下)。

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①]

说明断代之史并未为史学发展开拓广阔天地，“拘守成法”把它死死地框住了。的确，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很少更易，不敢稍变。这种状况，同轻视史迁“体园用神”之法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通史的潮流本是史学的进步潮流，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一旦具备客观的需要和条件，通史之作便会应运而生，所以应该给通史一个重要的历史地位。刘知幾忽视通史尽管不必过责，却说明他的史识尚浅。就纪传史而言，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前者发凡起例，后者发展成型，源流分明，各有千秋。混言纪传体“是《史》《汉》之体”[②]，可；“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③]，可；“祖马宗班”，亦可；但舍马祖班，则断不可！因为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二　析体例，较多“名实无准”之论

刘知幾曾详尽地评论了史汉诸体，锋芒所向，直指司马迁的《史记》，亦涉及于《汉书》以降的断代诸史。概而言之，刘氏的评

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

②③ 《廿二史考异序》。

论是正误相参,有贴切之论,亦有偏激之见。如果就其主流而言,他则是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评论司马迁创例的纪传史诸体,较多"名实无准"之论,换言之,他的评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不实事求是的。

勿庸讳言,刘氏对史汉诸体的评论,在某些方面曾经较为切实地正其义而称其功,即是说他曾为之裁定名义、评定作用。于此,当今论刘知幾者,多所阐发。然而,刘氏评论的基本格调是纠其谬而规其过。作为一个史学评论家,对古人古史提出批评意见,纠谬规过,是分内之事,天经地义。诚如清代学者钱大昕所言:"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骑龇前人,实以开导后学。"[①]问题在于,在纠谬规过时要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不能"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陈义甚高,居心过刻"[②]。而刘知幾既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又以褒贬自任,也没有司马迁那样卓越的史识。因而当他驰骋笔墨,裁定司马迁所创纪传史体时,往往是处于不解其真义,又把某些正统观点硬加在司马迁身上,并且将它奉为真理,作为裁判得失的标准。这就必然导致他评论的许多失误。

刘氏正统观点的表明首先是所谓"传以释纪"论。他说:

>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③]

①② 《廿二史考异序》。

③ 《史通·列传》。

明确地提出了“传以释纪”的理论。他把纪传史本纪与列传的关系完全理解为传统的所谓“传以解经”关系，而解为“传以释纪”。《春秋》与《左传》的关系是否是“传以解经”，这里不辨。但刘氏把这种看法照搬到纪传史的本纪与列传上，则是牵强附会的。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纪传体创例于司马迁，分析纪、传关系当本之于《史记》，至于《汉书》以降的断代诸史，则又有不同情况。

首先，刘氏对“本纪”体例的理解则远离太史公的原意。史公自云：

>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①

这就是以“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即“王迹所兴”，因“著十二本纪”“以科条之”。显而易见，这“本纪”当然就不专指天子，而是有天子、帝王，亦有实际左右天下形势的“王”，如那个“西楚霸王”项羽。既然要对“王迹所兴”来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历史考察，即“通古今之变”的考察，这“王迹所兴”当然就是个历史过程。可见，司马迁以“本纪”名篇反映了其进步的历史观。使人惋惜的是，班固因《史记》而撰《汉书》的时候，他学到了《史记》的体例，却丢掉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灵魂，实际上是用一种封建正统观念，即“天子称本纪”的观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点对待“本纪”体例，以此来为封建统治服务。这种正统观念统治了几千年，刘知幾“以天子为本纪”的立论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可以这样说，司马迁所创“本纪”体例，到班固手里已经改变面貌，刘知幾坚持正统立场，因而误解了司马迁的原意，并给予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以不切实际的责难。此时此刻，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刘知幾，责备他不能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但是，我们也有责任为太史公辨诬的。

请看，刘知幾非常肯定地说：

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①

这不是歪曲了司马迁的原意吗？其次，所谓“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的说法亦不尽符合史迁原意。比如《秦始皇本纪》，详叙秦始皇一生事迹，“包举大端”者有之，“委曲细事”者亦有之，如载焚书坑儒事，至为详悉。但一切围绕着秦始皇这个中心人物展开，或言以其编年，围绕着“王迹所兴”这个主题展开。由于《史记》是五种体裁的结合，司马迁在行文时区域有限，以免重复，自然有详略之分。《项羽本纪》详叙了“鸿门宴”的始末，《高祖本纪》于此就相当简略了。当然，帝王是最高统治者，国家大事往往编年其“本纪”中，这大概是考察“王迹所兴”，因而就显得“包举大端”。而《汉书》之后的断代史，皆以天子为中心，不管天子有无作为，都以编年形式书述国事，这便成为“本纪”“包举大端”的原

① 《史通·本纪》。

因。可见,“纪以包举大端”不是司马迁的本意,而是封建社会帝王中心论的反映。刘知幾的“传以释纪”论正是儒家正统观念和帝王中心论的表现。

刘氏正统观念的又一表现是“求名责实”论。他在评论史汉各体时,往往拿出“求名责实”这个武器。他振振有辞,好似真理在握。比如他非难司马迁为项羽立纪,为陈涉立世家,就是如此。他说:

> 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①

又说:

> 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②

首先需要指出的,所谓“陈胜起自群盗”,这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队伍及其领袖的诬蔑之辞,刘氏被这种阶级偏见所左右,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公正地评论陈胜的历史作用。他说项羽

① 《史通·本纪》。
② 《史通·世家》。

“僭盗”,亦不正确。我们要问,秦失其政,诸侯逐鹿,楚汉相争,为什么刘邦得胜而成“帝”,项羽失败而为“盗”呢?这不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封建正统观念又是什么呢?

刘知幾提出“求名责实”,似乎主张名实相符。他口口声声责备司马迁“名实无准”,“再三乖谬”,其实,真正做到名实相符的是司马迁而不是刘知幾。

司马迁把陈涉列入世家,将项羽立为本纪,这正是当时历史实际的真实记录。他这样写道:

> 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①
>
> 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②

司马迁如此真实地记载了秦汉之际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充分肯定了陈涉的首义之功。承认陈涉的历史地位,承认他自立为王,“号为张楚”的正义性,是不能不把他列入世家的。况且,承认陈涉是个“诸侯”也是对当时舆论的尊重。那时节,“天下方扰,诸侯并起”,陈涉是个首难的诸侯,刘邦于沛起事“以应诸侯”,就是响应陈涉起义军。同样,项羽巨鹿一战决定了秦王朝覆灭的命运,尔后“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俨然已成为天下的共主,“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因列入本纪,给予其帝王的地位。可见,司马迁非常尊重历史事实,真正做到了名实相符。

而刘知幾的“求名责实”论便脱离秦汉之际的历史形势,即是说离开了“实”,当然就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究其原因,关键是正

---

①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② 《史记·陈涉世家》。

统思想作怪,其次是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总言之,刘知幾的“求名责实”论,就是以名责实,亦即“正名论”。以固定的名分来责难千变万化的历史实际,评判史书,仿佛都要套在其固定的模式之中。事实上,其言名,既歪曲了太史公的原意,又视名为万古不变的东西,故其名不正;其指实,实不确。他评论史书体例多流于笼统和抽象的议论,往往离开史书的内容谈形式,离开历史的背景论是非,离开实际的效用谈好恶。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刘知幾的失误就在于用一种正统的、固定的模式,来对待丰富多彩、变化发展的历史。纪传体史书自班固断代为书以降,便墨守成规,很少创造精神,这种“谨守绳墨”之风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由此也使我们感到司马迁“通变化”、“体圆用神”的难能可贵。刘知幾不能看到这点,反而用“谨守绳墨”的框框去责备司马迁,适如章学诚所言“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①,岂不悲哉!

三　评表志,充满任情褒贬之见

刘知幾在评论史汉(当然,也评论了史汉以外的纪传史)表志时,曾经原则上加以肯定,认为“表以庯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是该体之长。但在其具体评论中,却又横加指责,给予否定。工诃古人,任情褒贬。

首先,他对纪传史设表发表了反对意见。以为“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②。他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为理论根据,指责《史记》“重列之以表,成其烦

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

② 《史通·表历》。

费,岂非谬乎?"进而批评班固和《东观汉记》"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①]。但他在《史通》外篇《杂说》上却又肯定了司马迁创表之功:"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两处评价截然相反,说明刘氏对问题的看法是矛盾的。

及言之书志,曾肯定它"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②]。但又说:

> 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虽递补所阙,各自以为工,榷而论之,皆未得其最。[③]

大体说来,他对众史诸志,责备者多而肯定者少。特别是对影响深远的《天文志》、《艺文志》力主删除。

天文志保存了历代人们对天文的知识,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这是历代史家的卓越贡献之一。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人们对天文历法的知识有着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的认识发展过程。尽管史书记载较多重复,还是把人们的认识记录下来,这就是一个绝大功劳。但刘知幾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为借口,先批评《史记》书有《天官》,"读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④],次指责"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进而攻击晋隋史家"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

① 《史通·表历》。
②③ 《史通·书志》。
④ 《史通·书志》。

极"[1]。总之,一概否定了史家作《天文志》的功绩。

再如艺文。刘知幾评曰:

> 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2]

此论显然又失之于偏颇。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作为史学理论家的刘知幾理应给其以公正的评价,却多加诋毁。他提出了两个理论根据,一是"史臣所书,宜其辍简",一是"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两条都有道理,亦不能绝对化。国史宜述当时之事,但事有沿革损益,绝对地"述当时之事"是做不到的,特别是书志一体。近代史家梁启超指出: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其"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有统括史志之必要"[3]。刘知幾指责其"繁复"当然对,而忽略其"源委"则不妥。况因其缺点而主革除,不是史家应取的态度。而杜佑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扬其长而除其弊,统括史志,卓然创作了体大思精的《通典》这部关于"书志"(即典章制度)的通史,较之刘知幾的空发高论,岂可同日而语哉!可见,就对待书志而言,刘知幾前不及《隋书》作者,后不如撰《通典》的杜佑。这是刘知幾过执己见、工诃古人的必然结果。

过执己见、工诃古人的特点是以己为是,以人为非。他武断

---

①② 《史通·书志》。

③ 《中国历史研究法》。

地认为历代纪传史的书志“皆未得其最”，而独出心裁，欲立“都邑”、“氏族”、“方物”为诸志先。书志的历史，确有如刘氏所言“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的情况，这正符合事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规律，不必大惊小怪。《汉书》创例撰《艺文志》，乃“古无而今有”，意义重大；《隋书·经籍志》较《汉书·艺文志》为详，刘知幾因指责其“广包众作”，“骋其繁富，百倍前修”。其实“前略而后详”，正反映了学术发展。所以说，历代诸志，各有作用。就是刘氏倡议的三志也得到后世史家重视，南宋郑樵撰《二十略》，其中就有《都邑略》、《氏族略》和《昆虫草木略》，大概是受了刘知幾的启发。但是，如果考究孰为重要孰为次要的话，倒是杜佑“以食货为首”的意见切合实际。

己见应该有，古人可批判。但批判，即使是严格的批判，也决不等于工诃。两者的界限只能看是否实事求是。我们并不主张拜倒在古人脚下，亦步亦趋，谨守绳墨，没有任何创造精神，也不主张把古人踩在自己的脚下，任情褒贬，合者是之，违者非之。刘知幾自负过高，过执己见，不能如实地对待自己和他人。郭延年说他“高自标榜，前无贤哲”①，黄叔琳说他“间有过执己见，以裁量往古，泥定体而少变通”②，今人张孟伦先生更说他“自己尊若菩萨，他人贱如粪土”，“意气骄矜”，“成了一座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的丈八灯台”③。这都是切实之言。自负过高挡住了他的视线，因而他的史识受到很大的局限。质言之，他对历史遗产的态度不那么正确，不那么公正。就胆识论，其“胆”则有余，“识”则不足。

---

① 《史通·郭延年序》。

② 《史通·黄叔琳序》。

③ 张孟伦：《中国史学史论丛·刘知幾〈史通〉评》。

反映在史评上，颇多见解赶不上同时代人，甚至前人。比如在史籍分类上，他落后于《隋书》作者；在对纪传史诸体的认识上，实不如司马迁；在对待书志上，如前所说，他逊色于杜佑。他的史评，尽管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出现了那么多的过失，这除了时代、阶级的局限外，更有思想和品格的原因。刘知幾评史汉体例的种种失误，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汉书》颜注评议

周晓瑜

史注是读懂古代史籍、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国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书》的颜师古注同《史记》的三家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皆堪称史注的典范。不过,它们的特点各有不同。这里,仅对《汉书》颜师古注(以下简称"颜注")试作几点分析,以示颜注的特点、方法和价值。

一

颜师古,名籀,以字行。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其先世仕江左(今江苏一带),后移居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师古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终年六十五岁。

颜师古是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小学家。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其祖颜之推是北朝著名的文学家,著有《颜氏家训》、《还冤记》及文集等。其父颜思鲁也为一代名儒。其家藏祖传典籍、古图画、器物、书帖非常丰富。师古自幼就博览群书,精通文字、音韵、训诂,又善于写文章。他一生历任朝散大夫、中书舍人、中书侍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太宗时,奉诏考订《五经》文字,撰《五经定本》。写成后,太宗召集诸儒评

议。诸儒各持所习,群起非诘发难。师古根据晋、宋以来各种古今版本,广征博引,随方晓答,言之成理,人人叹服,于是作为经书的标准本由皇帝颁行于天下。颜师古平生著作很多,与人合著的有《五经正义》、《隋书》等;自著的有《匡谬正俗》、《急就章注》、《〈汉书〉注》等。《〈汉书〉注》是他的代表作。

《汉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西汉王朝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它内容博洽,体例严密,语言繁富缛丽而又十分凝炼,在中国古代史学、文学等各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班固好用古文奇字,故《汉书》问世以后,即被认为是一部比较难读的书,非口耳相传不能悉谙其义。《后汉书·班昭传》记载:"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三国志·孙登传》记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这就迫切要求《汉书》有一部好的注释。自东汉至魏晋间,为《汉书》注音释义的虽已有二十余家,但各家都存在一定问题,到唐太宗时,太子承乾命秘书少监颜师古重为《汉书》做一部新注,使其"博喻胄齿,远覃邦国,弘敷锦带,启导青衿"①。学识渊博的颜师古,以疏通古代典籍为己任,"罄力"而为。自贞观十一年(637),至贞观十五年(641),历时四年,终于完成了这部洋洋大观的巨注。

《汉书》本为一百卷,颜注析为一百二十卷,将注音释义分别置于相应的正文之下。注完之后,由太子承乾表上,藏于秘阁。

---

① 颜师古:《汉书·叙例》,下引凡不言出处者同此。

二

唐朝初年,距产生于西汉初年的我国第一部传注《毛诗故训传》已八百余年。在这八百多年中,传注的对象已经从儒家经典扩展到子、史、集和佛书;传注的体裁已经从单人注发展到集注和义疏,传注的方法也早已完善。所以,以学问世家出身,且精通文字、音韵、训诂的颜师古,能把前人的注释经验集于一身,并运用到《汉书注》上,使得这部注释博大精深,别开生面,一直为后人所赞扬。通观颜注,至少有如下特点:

1. 有一个较完备的凡例。凡例是作者写书的原则,也是读者读某部书的向导。古人注释典籍,通常没有专篇凡例,只是把实际存在的凡例散见在注中,与颜师古差不多同时的孔颖达等著《五经正义》就是这样处理的。这样做,一般读者,特别是初学者,往往不易掌握。颜师古《〈汉书〉注》则不同。他把凡例分为两种,重要者集为《汉书·叙例》一篇,附在《〈汉书〉注》之首,"粗陈指例,式存扬榷"(见下文所引)。而零碎者,如一字二词音义的注释原则等,便散见于注中,均以"他皆类此"、"此下皆同"提示。例如《高帝纪》"乃闭城城守"注:"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类此。""羽亨(烹)周苛"注:"亨谓煮而杀之,音普庚反。他皆类此。"《哀帝纪》"复御史大夫"注:"复音扶目反,此下皆同。""他皆类此"、"此下皆同",是指《汉书》中凡是意义与这里相同的"守、亨、复"都读这里注的音。又如《高帝纪》"沛公如薛"注:"如,往也。他皆类此。""沛公安在"注:"安在,何在也。他皆类此。""他皆类此"是指《汉书》中凡是同这里用法一样的"如、安在",都与这里注的意义相同。另外还有关于征引前人旧注的凡

例，如《高帝纪》“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注：“应劭曰：‘芒属沛国，砀属梁国，二山之界有山泽之固，故隐其间。’苏林曰：‘芒音忙遽之忙。砀音唐。’师古曰：‘砀亦音宕。所言属沛国、梁国者，皆是注释之人据见（现）在所属，非必本当时称号境界。他皆类此。’”这是揭示旧注以注者当时地名解释古代地名的凡例。

2. 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且兼下己意。关于《汉书》的注释，有两次集大成的工作，一次是颜师古，一次是王先谦。颜师古之前，给《汉书》作音注的，共有五种。第一种是汉服虔的《〈汉书〉音义》。第二种是汉应劭的《〈汉书〉音义》。第三种是西晋晋灼的《〈汉书〉集注》，这部书收录了服虔、应劭的音义，另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说解，并增入了自己的见解。第四种是臣瓒的《〈汉书〉集解音义》。瓒姓氏无考，大约是西晋初期的人，他总辑上述各家，添入刘宝《〈汉书〉驳义》，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以上各种都是不载《汉书》正文，仅注文单行的。第五种是东晋蔡谟的《〈汉书〉集解》，他总辑服虔等各家关于《汉书》的注解，分载于《汉书》相应的句下，撰成了第一部关于《汉书》的正文、注文兼载的书。颜师古在《叙例》中又另列三家，一是东汉荀悦的《汉纪》三十卷，二是后魏崔浩的《汉纪音义》，三是晋郭璞的《汉书·司马相如传》注。凡二十三家。其实还有一家，那就是师古的叔父颜游秦。《新唐书·颜师古传》附有颜游秦的传，说他“撰《〈汉书〉决疑》，师古多资取其义”。所以，更合理的说法，在师古以前，《汉书》的音注等共有二十四家。

颜注吸取了各家注释之长，并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据他的《叙例》所言，大体可分为五种情况：第一，“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这是说旧注正确的全部采用。第

二,“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这是说旧注的基本意思已经具备,但归纳阐述得不好,师古便推衍其意,使之贯通全面。第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这是说对那些诡异怪僻、越理乱真的旧注,要录下来加以批评,以免其惑人蔽众(这是颜注中一部分极重要的内容)。第四,“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只秽篇籍,盖无取焉”。这是说对那些平庸无当,字数多而杂乱无章,或者苟且标新立异,只是污秽篇籍的旧注,一概不取。第五,“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这是说对旧注无解说的词句,他要全面详细地加以补释,使文意贯通。可见,他对旧注的处理原则是谨慎而科学的。关于兼下己意,除了上述对旧注斟酌,或者扬弃、或者矫正、或者批评、或者补充、或者另注外,还表现在以下一点:“六艺残缺,莫睹全文,各自名家,扬镳分路。是以向、歆、班、马、仲舒、子云所引诸经或有殊异,与近代儒者训义弗同,不可追驳前贤,妄指瑕颣,曲从启说,苟会扃涂。今则各依本文,敷畅厥指,非不考练,理固宜然,亦犹康成注《礼》,与其《书》、《易》相背,元凯解《传》,无系毛、郑《诗》文。以类而言,其意可了。”这里是说,《汉书》所载那些人物如刘向、刘歆、班固、司马迁、董仲舒、扬雄等人的作品中引用的六艺经典,文或有异,与后世学者解释也不尽相同。对于这些,既不能强求作者之间的统一,更不能曲从于后世学者的某些说法,而只能“各依本文,敷畅厥指”。这虽有点唐儒注经死守疏不破注的味道,但显然是尊重了汉儒传经家法不同的客观事实,也当属他下己意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表现形式上,为眉目清楚,颜注采择上述各家(颜游秦除外)皆题名“某曰”,他自己的注释也署“师古曰”,以示区别。

3.校勘精审。师古给《汉书》作注的时候,《汉书》已经成书

流传了五百五十多年。这时当有很多种传本。但是,注释与正文兼载的却只有蔡谟的《〈汉书〉集解》。钱大昕说:"小颜所注[1],盖依蔡本,而稍采它书附益之。"[2]这话虽为猜测之辞,但当是可能的,因为这时只有蔡谟本最适合作颜注的底本。如果我们姑且认为颜注用了蔡谟的本子作底本,那么,颜师古校勘的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校《汉书》作者的手下之误。师古说《汉书》所载"爰自陈、项,以讫哀、平,年载既多,综缉斯广,所以纪、传、表、志时有不同,当由笔削未休,尚遗秕稗,亦为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随手率意,遂有乖张"。作者留下了一些同一人或同一事彼此记载迥异的自相矛盾之处。对于这些《汉书》作者遗留的问题,颜师古用本校与理校相结合的方法,都给以"穷波讨源,构会甄释",区别了是非。例如《百官公卿表》:"姚丘侯刘舍"注:"《侯表》及诸传皆云'桃侯',独此为'姚丘',疑误也。"又"广安侯任越人"注:"《任敖传》及《侯表》皆云:'广阿侯',今此为'广安',此表误。"上二例,清夏燮《校〈汉书〉八表》完全赞同颜注的说法。另一方面是校传写过程中出现的讹舛。师古说:"《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释者,皆从而释之。"例如:《高帝纪》"亦视项羽无东意"注:"《汉书》多以视为示,古通用字。"《五行志》"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者"注:"仄,古侧字。"《地理志》"苟扇"(古地名)注:"届与漏同。"这是核对古本,直接将俗字恢复为古字(其实有些是借字),再以俗字解释。处理这类情况,师古常用"古通用字"。"甲古乙字"、"甲与乙同"等术语。又

---

① 小颜,指颜师古。

②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如:《叙传》"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注:"马邑人聂壹之类也。今流俗书本多改此传'壹'字为'懿',非也。"《孝成赵皇后传》"及壮,属阳阿主家"注:"阳阿,平原之县也。今俗书'阿'字作'河',又或为河阳,皆后人所妄改耳。"这是核对俗本,指出俗本中的错误,并加以纠正。另外,《汉书》的八表传到唐初,线条格局也已"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严重影响到以表载史,其文省,其事繁的妙用。对于这些舛误,颜注"寻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荡愆违,审定阡陌,就其区域,更为局界"。遗憾的是,《汉书》自颜注本出,他本相继淹没,今本《汉书》各表的表格究竟哪些是经颜师古纠正错误,重新画过的已无古本可核对,不可详考了。

4. 注音不厌其详,且兼有破字。对难字的注音,师古是不吝笔墨的,随有随注。正如他自己所说:"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众所共晓,无烦翰墨。"例如在《宣帝纪》中,引孟康注"复音服",又"复音扶目反",又两次出现"复音方目反",同一个字的同一音注了四次。《赵尹韩张两王传》中,"风读曰讽"出现了三次,"喜音许吏反"出现二次,"治音直吏反"出现了三次。颜注的注音,一般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单纯注音,一是被注者如果是个假借字就注音兼破字。单纯注音,也有两种方法,一是直音,例如:《李广传》"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注:"赵食其也。食音异,其音基。"一是反切,反切要多于直音,随处可见。例如:《邹阳传》"慷慨不苟合"注:"慷音口朗反。"师古有时还给自己注中的难字注音,例如:《苏建传》"置煴火"注:"煴谓聚火无焱者也,音于云反。焱音弋赡反。"注音兼破字,在颜注中,有时用直音,有时用反切,但最常用的方法是用"甲读与乙同"、"甲读曰乙"来解决。例如:《叙传》"逡遁致仕"注:

"遁读与巡同。"这里是说"遁"是"巡"的借字,当读"巡"音。《萧望之传》"乡使鲁君察于天变,宜亡此害"注:"乡读曰向,亡读曰无。"这里的"向"和"无"是本字,"乡"和"亡"是借字,"乡"、"亡"当分别读作"向","无"。

5.释义确切灵活。师古注《汉书》,以解释字词之义为中心,阐明句子的思想内容为目的,方法十分灵活。他解释字词的意义,根据是《尚书》以来的古代典籍和《苍颉》、《尔雅》等训诂专书。他说他的原则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有的句子,只有部分难词,只要扫除了词义方面的拦路虎,句意就涣然冰释。这时候,他就只解释个别词,例如:《陈胜传》:"胜少时,尝与人佣耕。"注:"与人,与人俱也。佣耕,谓受其雇直(值)而为之耕,言卖功佣也。"有的句子,虽然没有难词,但句意不好理解,就只给以串讲,例如《英布传》"可先未发诛也。"注:"及其未发兵,先诛伐之。"有的句子,既需释词,又需串讲,意义方能明白,就兼此二法,例如《田仁传》"后使刺三河"注:"为刺使于三河郡。三河谓河南,河内,河东也。"有些句子释词串讲完毕,在上下文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还没能表示出来,就点明一下其含意。例如《文帝纪》"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注:"登,成也。言五谷一岁不成则众庶饥馁,是无蓄积故也。"注文"是无蓄积故也"点明了原文的含意。有些不用释词的,就只点明含意,例如《蒯通传》"犹如阪上走丸也"注:"言乘势便易。"有些词义、句义历来就有不同解释,对于有较高参考价值的,他还用"一曰"、"或曰"等术语给予了保留。这显示了他注释史书的严肃性。例如《高帝纪》"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注:"逮捕,谓事相连及者皆摘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属不绝,若今之传送囚耳。"对于那些出现于不同篇章的同一个词语的注释,颜注则采取互见的办法,有的在首

见之处详细注释,再次出现时就只简单解释一下,然后注明参见前面详解处。例如:卷三十九《萧何传》"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注:"服虔曰:'为人解通,无嫉害也。'应劭曰:'虽为文吏,而不刻害也。'苏林曰:'毋害,若言无比也。一曰,害,胜也,无能胜害之者。'晋灼曰:'《酷吏传》赵禹为丞相亚夫吏,府中皆称其廉,然亚夫不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苏说是也。'师古曰:'害,伤也,无人能伤害之者。苏,晋两说皆得其意,服,应非也。'""毋害"又写作"无害",再次出现于卷五十九《张汤传》"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茂陵尉,治方中"注:"师古曰:'无害,言其最胜也。解在《萧何传》。'"有些词语的意义,不好简单概括,就在首见处详细解释,再次出现时则仅指出其参见的篇目。例如卷三十六《刘向传》:"《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颜注在这里对《春秋》记载的每次日食、地震详细注明了年月日,而当卷六十《杜周传》中再次出现"《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一句时,颜注仅指出了"解在《刘向传》"。颜注用互见的办法,指出其前后呼应之处,为《汉书》的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6. 不引杂说,阙所不知。颜注广征博引,以穷《汉书》之义,但对于杂家传记,择取綦严。他说:"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他的这种主张,符合小学家、史学家"无征不信"的要求。七十年后,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曾在《史通》中设专篇讨论这个问题。他在《采撰》篇中说:"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例如关于"四皓"的姓氏,司马贞《史记·留侯世家》注引王劭《陈留志》,解释得很具体:"四人,四皓也。谓东园

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按:《陈留志》云:'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又孔安国《秘记》作'禄里'。此皆王劭据崔氏,周氏系谱及陶元亮《四八目》而为此说。"师古注《汉书·张良传》则没有采纳《陈留志》这一说法,只是简单地解释为:"四人,谓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所谓商山四皓也。"

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①颜师古严格地遵守了这一原则,在《汉书注》中,对于他所不明白的事物或词句,采取了存疑的办法,一概不予解释。不过,他的存疑并没有用"阙"、"未详"等术语,只是不注而已。这在《律历志》、《天文志》两篇注释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注文比其他各篇明显地减少。例如《天文志》第一句:"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如此复杂玄妙的天象,师古竟无一字之注。这事实本身固然不能说是颜注的长处,但似不宜强人之难,苛求于古人。这要比本来不知而穿凿附会,强自以为说要科学得多。后者是伪名欺人的态度,而前者却是严谨的态度。

三

颜师古《〈汉书〉注》是《汉书》注中最受推崇的书。它刚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赞扬,称之为"班孟坚忠臣"②。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师古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要其疏通证明,

---

① 《论语·子路》。

② 《新唐书·颜师古传》。

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王先谦在《前汉补注序例》里也说：“颜注发明驳正，度越曩哲。”“自颜监注行，而班书义显，卓然号为功臣”。古来学者们认为颜注卓然为《汉书》功臣，并非谀美之词。今天看来，颜注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是阅读《汉书》的有力工具。《汉书》文字艰涩，当时著名学者如马融即不能自读。到今天，又已逾一千九百年，一般人阅读它更是不易。况且《汉书》所载词语，后代工具书，如《辞海》、《辞源》也未能全部收入。要想顺利阅读，了解西汉历史，唯赖前人旧注。例如《韩信传》：“诸校效首虏休，皆贺。”“诸校”《辞海》、《辞源》均未收，它指什么？只有靠颜注解决。颜注：“诸校，诸部也，犹今言诸营也。效，致也，谓各致其所获。”不仅解释了“诸校”，还用“谓”指出了“致”在上下文中的具体含义。又如《叙传》：“然而器不贾于当己，用不效于一世。”“当己”《辞海》、《辞源》亦未收，如果不弄明它的意义，全句内容即茫然。颜注：“当己，谓及己身尚在，犹言当年也。”如果没有颜注，它的意思很难理解，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另外，词类活用后的意义和修辞意义也是《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中查不到的，然而颜师古差不多都做了解释。例如《叙传》：“兄事斿而弟畜稚。”对于“兄事”、“弟畜”一类结构，时当南宋的金王若虚已不能正确理解[1]，更何况今人呢？颜注：“事斿如兄，遇稚如弟。”“如兄”、“如弟”就把“兄”、“弟”这两个名词活用为动词作状语的意义说得很明确了。又“本根既微，枝叶强大”。如果把“本根”理解为树的根，枝叶理解为树的枝与叶，显然不合文义。颜注：“本根谓王室也，枝叶谓诸侯。”在工具书中是得不到如此具体的解释的。对于句义，当然更不可

①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

能直接从工具书中得到。由此可见，颜注对阅读《汉书》，研究西汉历史，扫清了文字上的障碍，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其实，颜注作为阅读史书的工具，远不止是对阅读《汉书》有帮助。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说："《汉书》多本之《史记》，通《汉书》之训，即已通《史记》之半。"这话是完全正确的。

2. 是文字、音韵、训诂的宝库。颜师古注《汉书》解释词义的根据是《苍》、《雅》，这些均为先秦典籍。他集中了自东汉至魏晋凡二十余家旧注，这些旧注所用的也是汉魏间语言的音义，或更古的音义，再经过他本人的字斟句酌，兼下己意，就使得《〈汉书〉注》综合地、全面地反映了隋唐以前古音古义的情况，成为后人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宝库。

关于文字，师古对《汉书》所用的古文奇字进行了考校，为后人研究汉字形体的变迁和异体字、通假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仅《叙传》一篇内就有二十几个之多，如"㮚，古栗字"、"眂，古视字"、"关，古笑字也"、"墬，古地字"、"鱻，古鲜字也"、"逌，古攸字也"、"呰与疵同"、"繇，读与由同"等。

关于注音，自应劭、服虔至颜师古，间越四百余年，所用音切非一时一地，比较复杂，但也为后人研究汉唐的音韵系统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

关于释义，有明引《尔雅》、《说文》的，如《叙传》"侯屮木之区别兮，苟能实而必荣"注："侯，发语辞也。《尔雅》曰：'伊、惟，侯也。'"《成帝纪》"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注："昆，众也。昆虫，言众虫也。又许慎《说文》云'二虫为䖵，读与昆同。'谓虫之总名。两义并通。而郑康成以昆虫为明虫，失之矣。"有暗用《尔雅》、《说文》等古代训诂书解释词义的，如《叙传》"平津斤斤，晚跻金门"注："斤斤，明察也。跻，升也。金门，金马门也。"其中，

"斤斤,明察也"用《尔雅·释训》义;"跻,升也"是用《春秋谷梁传·文公二年》文。又"赳赳景王,匡汉社稷"注:"赳赳,武貌。音纠。"用《诗·周南·兔罝》传。又"胜、广熛起,梁、籍扇烈"注:"飞火白熛。扇,炽也。烈,猛也。言陈胜初起而项羽烈盛也。""飞火白熛"用《说文·火部》"熛"字义。可见,颜注释义构成了关于词语古义的丰富宝藏。

今天,颜注所依据的二十余家旧注等资料中,只有荀悦的《汉纪》幸存,其他二十三家旧注早已散亡,这就更显示出颜注的珍贵。

当然,颜师古《〈汉书〉注》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缺陷首先表现在说字有失考之处。师古说字,对于古今、异体、通用、假借关系,时有混而不清之失,如《叙传》注"龢,古和字也"。"龢"、"和"在《说文》中是两个字,"龢"的意思是"调和","和"的意思是"唱和",《汉书》中"龢"当是"和"的借字,师古却误认为古今关系。

师古注音也时有错误,例如《王子侯表》"蒉侯方"注:"蒉,音口怪反,字或作费,音扶未反,又音秘。"王念孙说:"蒉字从艸,贵声,音求位,口怪二反。不音扶未反,亦不音秘,且不得与费通。"[1]又"广城侯疌"注:"疌,竹二反。"王念孙说:"疌音捷,不音竹二反。"

释义方面也有不当之处。有不明词义发展源流而误释的,如《高帝纪》:"沛公,项羽追北。"注:"服虔曰:'师败曰北'。韦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师古曰:'北,阴幽之处,故谓退败奔走者为北。……韦昭之徒并为亡矣'。"这里的"北"字,韦昭认为

① 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下同。

是古“背”字，表示“背去而走”，是脊背之背的引申义，是对的。师古却认为是表示方向的“北”字的引申义，这就不对了。还有把虚词解为实词的。例如《成帝纪》“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注：“言云者，此举著令之文。”这里的“云”是句尾语气词，表示语气的结束，师古解为“令文”之“文”。另外，有些是合成词，应该作为一个意义单位看，颜注也做了穿凿的解释，例如《武帝纪》“日月所烛，莫不率俾”注：“率，循也。俾，使也。言其循其贡职而可使也。”王引之认为“率俾犹率从”①，即相率而从。

其次，《新唐书》师古本传说他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师古多资取其义”，但颜注中未载游秦，《叙例》中也不列游秦之名。关于这点，清代洪颐煊、王鸣盛、朱一新、王先谦等均曾指出②。古代治学虽有父子世业，学成家言之习，但作为史注似无先例，终不如备列为公平合理。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给洋洋百卷的鸿篇巨制作注，要求它十分完善是不现实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其实，把这些缺点同成就相比，瑕不掩瑜，丝毫不损于颜注的价值。

（《文献》1987 年第 4 期）

---

① 王引文：《经义述闻·尚书述闻》。

② 洪颐煊《读书丛录》十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书叙例”条；朱一新《〈汉书〉管见》“枚乘传”；王先谦《〈汉书〉补注》“前汉补注序例”。

主要论著索引

一 《汉书》研究论文目录

总论、专论

《汉书》略说/骆鸿凯/湖南大学期刊/第2卷第5期
《汉书》释例/杨树达/燕京学报/第2期,1928年6月
《汉书》臆解/徐复/考古学会杂报(2本)/1937年第6期
略论《汉书》纲领/黄侃/斯文/第2卷,第19、20期,1942年9月
怎样评价班固与《汉书》/光明日报/1961年8月24日
班固与《汉书》/冉昭德/历史教学/1962年第4期
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与冉昭德先生商榷/牛致功/文史哲/1965年第1期
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冉昭德/文史哲/1966年第1期
是批判的继承,还是全盘肯定——再与冉昭德先生商榷/牛致功/文史哲/1966年第2期
班固《汉书》评述/安作璋/破与立/1978年第1期
谈《汉书》/张传玺/文史知识/1994年第5期
班固与《汉书》/曹之/图书馆论坛/1997年第2期
隋唐《汉书》学的发展/瞿林东/历史知识/1980年第5期
试论《汉书》的学术成就/刘隆有/天津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陈其泰/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汉书》的成就/许殿才/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
班固窃父书/顾颉刚/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断代为史,继往开来——《汉书》述评/章惠康/衡水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汉书》的成就及历史地位(博士论文提要)/白寿彝、许殿才/文献/1991年第3期
《汉书》著述目录考/张傧生/女师大学术月刊/1931年4月
班固所据古史料考/杨树达/大公报文学副刊/229期,1932年5月23日
《汉书》材料来源考/王利器/龙门杂志/1卷,1-4期,1947年3-6月;文史/20辑,1984
从史学和史料来论述《汉书》的编纂特点/卢南乔/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汉书》的编纂及史料价值/冷鹏飞/自修大学(文史哲经专业)/1984年第2期
试论《汉书》的资料与编纂工作之特点/刘敦玉/湘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试论班固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杨翠兰/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汉书·叙例》在体例上的创造性/钟岱/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
谈《汉书》的体例/许殿才/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班固与图书编撰/王宗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班固的史材/杨翼骧/经世日报·读书周刊/第70期,1947年12月17日
谈谈班固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安作璋/光明日报/1983年3月23日
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期
《汉书》史论的评史方法/田文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班固的首创精神与进步思想/冉昭德/西北大学二十三届校庆学术论文集·历史分册/1963年版
班固的庸俗思想及其人文思想/侯外庐/中国史学史资料/1964年第8号
班固的思想与文风/郭预衡/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班固思想的特色及其内在矛盾/祝瑞开/光明日报/1984年5月16日
班固的爱国思想/杨济东/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
论班固的重时命、反神学的进步思想/杨济东/晋阳学刊/1986年第1期
《汉书》的实录精神与正宗思想/许殿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1期
班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施丁/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汉书》中的天人关系/许殿才/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班固史学思想新探/汪涌豪/思想战线/1992年第5期
《汉书》宣汉思想新探/范红军/河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论班固史传文学的成就/孙玉亭/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挣脱天命神学的努力——班固历史观述论/梁宗华/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论班固的创新思想/赵永春/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傅永聚、范学辉/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
班固的儒学观对《汉书》的影响与制约/梁宗华/东岳论丛/1999年第3期
班固董子思想献疑/孙景坛/岭南学刊/2002年第1期
《汉书》的文学价值/陈梓权/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论班固的文学思想/刘怀荣/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汉书》人物传记的文章风格/马春香/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
班固文学思想述评/辛保平/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班固的人格审美意识与《汉书》的人物形象/赵东栓/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汉书》典雅优美的历史叙述/许殿才/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汉书》写历史变化/许殿才/求是学刊/1999年第2期

《汉书·艺文志》笺/许本裕/国故月刊/第2卷,1919年4月
《汉书》十二纪钩沉/沈昌佑/国学卮林/第1期,1920年
《汉书》十二帝纪校勘拾遗/谢秉洪/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
《汉书》十志与"通古今"/郭炳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对《汉书》十志的总体考察/陈其泰/汉中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1994年第2期
读班固艺文志书后/姚光/国学丛选/卷8
再读艺文志/马其昶/民彝/第1卷第5期,1927年6月
读《汉书·艺文志》/钱文晋/艺林/第1期,1929年9月
读《汉书·艺文志》拾遗/王重民/北平图书馆馆刊/第3卷第3期,1929年9月
评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李笠/武大文哲季刊/第2卷第2期,1931年4月
汉志辞赋存目考/朱保雄/清华中文月刊/第1卷第3期,1931年6月
读王氏《汉书·杂志》献疑/杨树达/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3期,1932年5-6月
《〈汉书·艺文志·庐江〉考略》/杨铸秋/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卷第2期,1933年2月
《〈汉书·艺文志·九江〉考略》/杨铸秋/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袁行霈/文史/1979年第12期
《汉书·艺文志》——目录学浅谈/来新夏/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0年第1期
试谈《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史内容/倪晓健/黑龙江图书馆/1980年第4期
试论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反映的西汉学术思潮及其历史特点/孙风态/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汉书·艺文志》的编撰及其特点/倪晓健/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汉书·艺文志》的学术价值/王恩涛/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汉书·艺文志》集释/施之勉/大陆杂志/第71辑,第1-6卷,1985年7-12月
《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学文献情况简析/沈炎/四川图书馆学报/1993年第3期
论《汉书·艺文志》附注的价值/徐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4期
《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浅析/那世平/图书馆学刊/1995年第2期
《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及学术价值/诸海星/天中学刊/1997年第4期
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王庆华/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汉书·艺文志》——《七略》的再延续/黄顺荣/现代情报/2002年第3期
《汉书·艺文志》的齐学与鲁学/傅荣贤/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2期
从比较史学论《史记》和《汉书》/易孟醇/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汉书》辨正/刘黎明、罗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论儒学对《汉书·艺文志》编撰思想的重大影响/陈双燕/鹭江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汉书·艺文志》所见文献数量统计/傅荣贤/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3期
《汉书·艺文志》的文学思想/伏俊琏/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
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汉书·艺文志》的个案分析/潘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
论《汉书·艺文志》的编次/尹海江/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研究的成就和不足/许刚/四川图书馆学报/2006年第4期
浅谈《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所列篇目卷数的意义/鞠飞/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古代图书目录之瑰宝——《汉书·艺文志》/阎志华/兰台世界/2006年第6期
历代《汉书·艺文志》研究述略/陈锦春/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9期

书汲黯传后/张诚/民彝/第 1 卷第 1 期,1927 年 2 月
读《汉书·儒林传》/杨树达/国学丛编/第 1 卷第 2 期,1931 年 7 月
由《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简析班固的史学思想/王红霞/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2 期
读班氏《古今人表》/姚光/国学丛选/卷 10
《汉书·古今人表》识要/丁毅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 5 期
《汉书·古今人表》撰述旨趣新探/王记录/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
《汉书·食货志》志疑/金少英/甘肃师大学报/1959 年第 3 期
《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张孟伦/兰州大学学报/1983 年第 2 期
《汉书·地理志》与中华区域风俗文化/李剑林/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
《汉书·食货志》辨疑/李庆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 5 集,1984 年
《汉书·五行志》凡例/缪凤林/史学杂志/第 1 卷第 2 期,1929 年 5 月
试为《汉书·五行志》拭尘/彭曦/天津师大学报/1984 年第 4 期
《汉书·五行志》平议/陈其泰/人文杂志/1993 年第 1 期
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向燕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汉书·五行志》考论/王华宝/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
从《汉书·五行志》看刘歆的灾异观/吴从祥/殷都学刊/2007 年第 1 期
《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赵濛/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第 3 期
论《汉书·王莽传》/沈重、李孔怀/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汉纪》补润《汉书》例证/李书兰/史学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
《〈汉书〉补注》补正(《食货志》上)/金少英/西北师大学报/1979 年第 1 期
《〈汉书〉补注》补正(《食货志》下)/金少英/西北师大学报/1980 年第 4 期
王先谦《〈汉书〉补注》评述/李家骧/南京师大学报/1982 年第 4 期
王先谦《〈汉书〉补注》略论/吴荣政/兰州大学学报/1982 年第 4 期

王先谦《〈汉书〉补注》质疑/李廷先/文献/1982年第11期
《汉书》颜注评议/周晓瑜/文献/1987年第4期
《汉书》颜注再探/孙兵/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汉书》的论赞/许殿才/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6期
《〈汉书〉新证》两版本的比较研究/陈文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论班固创作的个性色彩/孙玉亭/长沙电子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汉《易》与《汉书》/吴怀祺/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
试析班固对屈原之批评/姚静波/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
班固"天人合一"的法制观及渊源——兼与姜晓敏同志商榷/任汝平/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1期
《汉书·刑法志》评述/李媛媛/呼兰师专学报/2003年第3期
从《汉书·刑法志》看西汉的德治与立法/关健瑛/求是学刊/2003年第2期
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李根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史学家的经济学思辨——班固经济思想解析/李剑林/学术论坛/2005年第3期
塔西佗与班固史学风格比较/王三义/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班固《汉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与人民性探析/朱凤祥/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论班固的风俗观/孙关龙/南都学坛/2004年第6期
论班固史学思想的神意化倾向——兼论班固神意化史观的理论渊源/汪高鑫/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
试析班固的民族观/刘春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汉代信仰风俗与班固及其《汉书》/昝风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6 年第 3 期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蒋方/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德行决定命运:汉书文化精神解读/刘德杰/中州学刊/2006 年第 5 期
班孟坚年谱/郑鹤声/史学杂志/第 1 卷第 1 期,1929 年 3 月
班固诞生一千九百年纪念/杨树达/大公报文学副刊/第 229 期,1932 年 5 月 29 日
班固生卒年新说/孙亭玉/长沙电子学院学报/1997 年第 2 期
历代《汉书》研究述略/周洪才/齐鲁学刊/ 1987 年第 3 期

史汉比较与班马异同论

史汉研究绪言/郑鹤声/史学杂志/ 第 2 卷第 2 期
史汉西域传记互勘/赵惠/禹贡半月刊/第 5 卷第 8－9 期合刊
读史札记(《史记》、《汉书》)/王元崇/考文学会杂报/第 1 期
史汉异同/黄子亭/史地学报/第 4 卷第 1 期,1926 年 10 月
中国三大史家思想之异同/傅振伦/新晨报副刊/1928 年第 11 期
班马论叙诸子流别次第各异说/苗可秀/东北丛镌/第 1 卷第 12 期,1930 年 12 月
马班异同论/陈柱尊/学艺/第 13 卷第 7 期,1934 年 9 月
史汉论略/姚尹忠/民钟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35 年 5 月
读史汉札记/陶元甘/责善半月刊/第 1 卷第 12、17、18 期,1940 年
司马迁与班固/白寿彝/史学史资料/1979 年第 2 期
马班异同论/苏渊雷/哈尔滨师院学报/1964 年第 2 期
马班史汉异同论/苏渊雷/明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79 年第 1 期
读史汉随笔/邓绍基/古典文学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史记》《汉书》/朱自清/经典常谈/三联书店/1980 年版
史汉写人物细节的比较研究/施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 2 集,1981 年
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价/郭双成/郑州大学学报/1981 年第

2 期
史记汉书传记文学二题/陈庆元/南平师专学报/1983 年第 3 期
《史通》尊班抑马辨/杨绪敏/徐州师院学报/1983 年第 3 期
论《史记》与《汉书》/吴匡忠/古籍整理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史记·匈奴传》与《汉书·匈奴传》/余胜椿/民族研究/1985 年第 1 期
刘知幾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许凌云/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西汉社会风气的变迁/宋超/学术月刊/1985 年第 10 期
司马迁班固经济观之歧异及其思考/归青/上海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
《史记》《汉书》比较/瞿林东/文史知识/1987 年第 12 期
从《史》《汉》货殖传看两汉义利观的演变/宋超/求索/1988 年第 5 期
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赵光贤/史学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史记》《汉书》许慎注通考/李尔纲/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劣固而优迁"抑"甲班而乙马"——试讲史记汉书的差异/邓韶玉/辽宁教育学院/1989 年第 2 期
《史》《汉》西南夷传比较研究/侯绍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
《史记》《汉书》悲剧人物形象的写作比较/徐金凤/福建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刘一龙/湘潭大学学报/1990 年第 3 期
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异同/朱枝富/人文杂志/1990 年第 4 期
《史记·平准书·货殖列传》与《汉书》有关部分的对校/陈连庆/中国古代史研究/1992 年
论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施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 年第 4 期
司马迁、班固的民族观及史学实证精神异同论/张新民/民族研究/1993 年第 6 期
《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比较三题/游翔/华中师大学报/1994 年第

1期

略论马班异同的内容与发展的历史/张大可/渭南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史记》《汉书》对读评议/李廷先/扬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

《汉书·匈奴传》与《史记·匈奴传》对校刍议/阿其图/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汉书》继承改动《史记》的得与失/韩兆琦/天人古今/1994年第4期

史汉游侠考述/韩云波/川东学报/1994年第1期

《史记》《汉书》对读评议(续一)/李廷先/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司马迁、班固史学观的对比论/吴绍礼/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5年第1-2期

略说《史记》与《汉书》的异同/韩兆琦、俞樟华/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3期

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张子侠/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史记》《汉书》对读评议(续二)/李廷先/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傅正义/渝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史记》《汉书》对读评议(续三)/李廷先/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史记》《汉书》对读评议(续四)/李廷先/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差异/孙祖眉/社会纵横/1996年第4期

《史记》《汉书》景帝至武帝间年表中民族史料考异与订误/朱凤相/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从《史记》《汉书》的匈奴传看汉匈民族关系/向敏功/昆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史记》《汉书》校读札记/周俊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2期

关于《汉书》不著司马迁生卒和死因的初步探索/栾继生/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马予静/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论班固和司马迁之孰优——《史记》《汉书》同篇目比照评述/冯家鸿/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12期

试论赵翼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徐家骥/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

《史记》《汉书》中的译名秦人问题/李志敏/喀什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

司马迁、班固义利思想比较/张光全/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汉书》与《史记》相比较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许正文/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走向边缘与矛盾反弹——《史记》《汉书》的梦幻话语/南生桥/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史记》《汉书》正误六则/徐晓青/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唐代史汉古注考/张固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王子今/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从《史记》《汉书》透视西汉初年同姓王的政治生活/杜振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002年司马迁与班固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综述/吕培成、毛金霞/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月

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之比较/刘春华/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张光全/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论司马迁、班固的“实录”精神/张光全/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蒋方、张忠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宋叙五/国史探微/2004年第5期

评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王记录、王青芝/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

《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荣新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崔军伟/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新中国《史记》《汉书》民族思想比较研究综述/夏民程/贵州民族研究/2006 年第 1 期

从《史记·货殖列传》到《汉书·货殖传》看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的对立/肖波/晋阳学刊/2006 年第 3 期

《史记》《汉书》中考古匈奴的文化/周昆田/中国边政/第 17 期

史汉体例比较/吴福助/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 11 卷第 8 期

从《史记》《汉书》《儒林传》比较司马迁及班固的思想/刘安立/新亚历史系刊/第 5 期

《汉书·艺文志》小学书目略说/徐善同/民主评论/第 11 卷第 16 期,1960 年 8 月

读《汉书·艺文志》举例札记/潘锦/大陆杂志/第 33 卷第 3 期,1966 年 8 月

《史记》及两汉书作者记述边疆民族史的时代与文化背景/阎沁恒/幼狮月刊/第 40 卷第 4 期,1974 年 10 月

《史记》与《汉书》之关系初探/吴福助/东海学报/第 16 期,197 年.6 月

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徐复观/大陆杂志/第 57 卷第 4 期,1978 年 10 月

《史记》与《前汉书》/李则芬/自由谈/第 31 卷第 8 期,1980 年 8 月

《汉书》论赞研究/陈静/中华学苑/第 24、25 期,1981 年 9 月

班固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辩/王叔岷/台湾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1981 年第 10 期

司马迁与班固史学之比较/赖明德/中国学术年刊/第 4 期,1982 年 6 月

《汉书》采西汉文章探讨(上、下)/吴福助/东海中文学报/第 3、4 期,1982 年 6 月、1983 年 6 月

《史记》《汉书》传记文学比较研究/朴宰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0年

史汉异同研究史略/朴宰雨/中国文化月刊/第150期,1992年4月

《汉书》对《史记》的补正——以贾谊、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的事迹为例/李伟泰/台湾大学中文学报/第5期,1992年6月

史汉随笔(三则)/李伟泰/台湾大学中文学报/第6期,1994年6月

史汉平议/蔡信发/台湾大学人文学报/第12期,1994年6月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较析/黄榕/中国语文/第84卷第2期,1999年2月

史汉论赞之研究/高祯霙/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1年

《史记》《汉书》《袁盎晁错传》较析/许淑华/辅仁大学第三届先秦两汉学术研究生论文集/2002年1月

《史记》《汉书》合传之平议 蔡信发 第四届汉代文学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2002年5月

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

班固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张家钊/四川大学/1984年

班固略论/杨济东/北京师范大学/1985年

《汉书》颜注反切考/黄富成/四川大学/1986年

《汉书·五行志》初探/王春光/华中师范大学/1988年

《〈汉书〉补注》辨补/李尔钢/湖北大学/1988年

《汉书》颜注初探/孙兵/四川大学/1989年

班固的审美观和《汉书》人物传记/赵东栓/东北师范大学/1989年

《汉书》史论研究/田文红/西南师范大学/1990年

经学对《汉书》思想义例及文风的影响/李士彪/山东大学/1995年

《汉书》引《尚书》研究/周少豪/台湾政治大学/1997年

《汉书》复音词研究/张延成/南京师范大学/1998年

《汉书》人物传记的文学成就/马春香/兰州大学/1999 年
臣瓒《〈汉书〉音义》辑佚/杨仙/武汉大学/2003 年
《班马异同》所据《汉书》版本考/周晨/武汉大学/2003 年
历代《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略/傅荣贤/西南师范大学/2004 年
苏林《〈汉书〉音义》辑佚/殷榕/武汉大学/2004 年
宋人对两汉书的整理与研究/颜士刚/中国人民大学/2005 年
论《汉书》的博洽/陈海燕/北京师范大学/2005 年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对比研究/葛莱云/安徽大学/2005 年
博士学位论文：
《汉书》疑义通说/王继如/华中师范大学/1988 年
论《汉书》的史学成就/许殿才/北京师范大学/1990 年
论班固、塔西佗的史学思想/蒋苓/北京师范大学/1997 年
道家思想与汉代史学/王萍/山东大学/2000 年
《汉书》历史哲学/刘国平/台湾师范大学/2000 年
《汉书》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研究/李艳红/四川大学/2004 年
前四史论赞文体艺术及其文化内涵/赵彩花/复旦大学/2004 年

二 《汉书》研究著作目录

总论及专论

《前汉书》菁华录(4 卷)/(清)高嵣/上海:广益书局 /1901 年版
读《汉书》札记(4 卷)/杨树达/1912 年铅印本;收入《二十四史订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 年版
读《汉书》札记/宁调元撰,柳亚子辑/太一遗书续刊本/1915 年版
《汉书》正误(4 卷)/(清)王峻/1912 年铅印本;收入《二十四史订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 年版
《汉书》札记(7 卷)/(清)李慈铭/北平:北海图书馆/ 1929 年版

姚惜抱先生《前汉书》评点/(清)姚鼐/京华印书局/1915年版
《汉书》补注(100卷)/王先谦/上海:同文图书馆/1916年版
《〈汉书〉补注》补正(6卷)/杨树达/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读两汉书记/马叙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班固年谱/郑鹤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汉书》知意/刘咸炘/成都尚友书熟推十书本/1931年版
《汉书》评议/李景星/济南四史评议本/1932年
读《汉书》蠡述(3卷)/李澄宇/未晚楼全书本/1933年版
《汉书》音义(3卷)/(隋)萧该撰,(清)臧庸辑/1935年版
《汉书》辨疑(4卷)/(清)钱大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汉书》琐言(5卷)/沈家本/北京:中国书店/1958年版
《汉书》新证/陈直/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班固与《汉书》/安作璋/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汉书·律历志》正伪/王元启/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律历志〉补注》订误/周正权/楚风楼杂著本/1920年版
《前汉书·食货志》注/刘光贤/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地理志》补校/杨守敬/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地理志》校注/王绍兰/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地理志》补注/吴卓信/二十五史补编本
新校注地理志集释/钱坫、徐松/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地理志》详释/吴调阳/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陈澧/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吴承志/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2卷)/丁谦/浙江图书馆/1915年版
《汉书·地理志》校本(2卷)/(清)汪远孙/1922年版
《前汉书·艺文志》注/刘光贤/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艺文志》举例/孙德谦/孙隘堪所著书本/1917年版;又见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艺文志》注解/姚明辉/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7 年版
《前汉书·艺文志》注/刘光贲/烟霞草堂遗书本/1921 年版
《汉书·艺文志》讲疏/顾实/商务印书馆/1925 年版
《汉书·艺文志》拾补(6 卷)/(清)姚振宗/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1929 年版
《汉书·艺文志》条理(6 卷)/(清)姚振宗/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1929 年版
《汉书》人表考校补/(清)蔡云/1920 年版
《汉书》人表考(4 卷)/(清)梁玉绳/中华书局/1985 年版
校《前汉书》八表/(清)夏燮/上海:文瑞楼书局、北平:直隶书局/ 1928 年版
《汉书·艺文志·方技》补注/张骥/成都义生堂/1935 年版
汉志郡国沿革考/黄大华/二十五史补编本
《汉书·古今人表》通检/孟森/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 年版
《汉书·古今人表》疏证/王利器、王贞珉/齐鲁书社/1988 年版
《汉书·艺文志·方技》补注/张骥辑/成都:张氏义生堂/1936 年版
《汉书·艺文志》讲疏/顾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汉书·食货志》/王云五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年版
《汉书》艺术研究/常任侠/上海出版公司/1955 年版
《汉书》选/冉昭德、陈直主编/中华书局/1962 年版
《汉书·西南夷列传》/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辑/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1979 年版
《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岑仲勉/中华书局/1981 年版
《汉书·地理志》稽疑/(清)全祖望/中华书局/1985 年版
《汉书·西域传》补注/(清)徐松/中华书局/1985 年版
《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清)梁玉绳等撰,吴树平等点校/中华书局/1982 年版
《续〈汉书〉人表考校补》/(清)蔡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 年版
《汉书·刑法志》注释/赵增祥、徐世虹/法律出版社/1983 年版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陈国庆/中华书局/1983 年版
《汉书·刑法志》注释/辛子牛/群众出版社/1984 年版
《汉书》窥管/杨树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汉书》注校补/(清)周寿昌/中华书局/1985 年版
《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洪业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汉书·食货志》集释/金少英、李庆善/中华书局/1986 年版
《汉书》与《后汉书》/王锦贵/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汉书·艺文志》通释/张舜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陈其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版
《史记》考索(外二种:《汉书》/《后汉书》)/朱东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汉书》辞典/仓修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班固评传:一代良史/安作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班固评传/陈其泰、赵永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汉书》选评/汪受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
《汉书·艺文志》通释/张舜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徐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版
《汉书》解读/张新科/华龄出版社/2006 年版
《汉书·地理志》汇释/周振鹤/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汉书》疏证/(清)沈钦韩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
《汉书》选/顾廷龙、王煦华选注/香港:今代图书公司
《汉书·西域传》补注/(清)邓廷慎、徐松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版
《汉书》引经异文录证/缪祐孙/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版
《汉书·艺文志》补注/广文编译所编/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69 年版
《汉书·艺文志》问答/正中书局编审委员会编著/台北:正中书局/1969 年版
汉班孟坚先生固年谱/郑鹤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
《汉书》著述目录考/张傧生/台北:德育书店/1980 年版
《汉书》论赞研究/陈静/台北:著者印行/1980 年版
《汉书·古今人表》疏证/王利器、王贞珉/台北: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0 年版

班固与《汉书》/安作璋/台北:学海出版社/1991 年版
二十五史新编·《汉书》/李国章、赵昌平主编,李孔怀新撰/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公司/1998 年版
中国历代刑法志/谢瑞智、谢俐莹注译/台北:文笙书局/2002 年版
《汉书》人名索引/魏连科/中华书局/1979 年版
《汉书》地名索引/陈家麟、王仁康/中华书局/1990 年版

史汉比较与班马异同论

史汉研究/郑鹤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年版
史汉研究法/陈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4 年版
《史记》《汉书》所记各地经济情况/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
史汉论稿/徐朔方/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韩)朴宰雨/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年版
《史记》《汉书》用字考证/国学汇编第 1—3 集
《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附)《史记·货殖列传》/(日)加藤繁/日本:岩波书店/1942 年版
《史记》《汉书》匈奴地名今释/张兴唐/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 年版
《史记》《汉书》儒林列传疏证/黄庆萱/台北:嘉兴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6 年版
史汉初学辨体/潘椿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版
史汉文辞异同斠视/季洛生/台北:弘道文化事业公司/1975 年版
史汉关系/吴福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版
班马论述诸子流别次第各异说/苗可秀/中国期刊汇编第 37 种/台北:成文出版社/1987 年版
《史记》《汉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篇)/(日)藤田胜久/日本:爱媛大学教育学部/ 1994 年版

责任编辑：郭银星 王亦妮

封面设计：海马书装



史料整理丛书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

《史记》研究（上、下）

《汉书》研究

《后汉书》、《三国志》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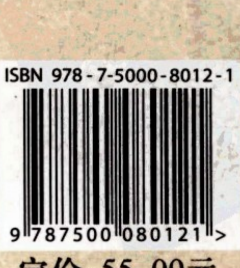
《晋书》、『八书』、『二史』研究

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

《宋史》研究

《辽史》、《金史》、《元史》研究

《明史》研究


ISBN 978-7-5000-8012-1

定价：55.00元